

巴比塞著 ■ 徐懋庸譯



從一個
人看
一個
新世界



從一個人的
看一個世界

徐懋庸 著 巴比塞



W. S. P. 6

目次

引言

第一章	沙皇治下的一個革命者	一
第二章	巨人	三
第三章	鐵腕	六
第四章	民族的團結	九
第五章	初層的基石	一六
第六章	寄生的戰爭	二一
第七章	偉大的口號	二九
第八章	農村	三九
第九章	明天做什麼	四六
第十章	兩個世界	五三
第十一章	把能的人	五九

687795

引 言

莫斯科和那橫跨歐亞的大俄羅斯的中心，是紅場。紅場的中心，是一座墳墓，在那裏着已經復活似的列寧的墳墓上面——有五六個人，一排站定，稍隔幾步看起來，他們的模樣兒彼此都差不多。

四周，大批整齊的，蟻隊似的烈衆，忽而集合，忽而散開的紛動着，好像從地下爬出來又爬進去。這也許是一個什麼儀式，繽紛地從廣場的一邊，向另一邊伸長，擴大着；一列無盡的隊伍，飄揚着滿是字號和標語的紅的布，紅的綢——獵獵作聲的旗幟。也許，這是一個盛大的運動游藝會；五光十色地如同一個花園似的行進。或者，這是當世最偉大的軍隊的集合，紅軍的隊伍，排成長方形。

從這邊，從那邊，人們都能切近地看見那在行進中的，雜色的森林的若干部分：移動着的刺刀的桐子的閃光，或者是青年男女的行列，或者單是他們的魚貫的險子，顯着高傲和幸福，發着笑，放着光。

這裡的騷動了多時的能够思想的波浪*和那從密集在克里姆林宮的鏽齒形的牆邊的演說臺旁

的羣象中間反射過來的熱情，激起一陣有一個中心的，喧嘩和叫喊的怒濤。這叫聲形成着這樣的着實的字眼：「斯大林！」「同志斯大林萬歲！」站在列寧墓上的一批裡面，有一個人，手尖碰着帽沿，或者舉起曲成直角的手臂，攤開了手掌，揮動着。這人穿着一件寬大的軍裝外套，但是並不因此顯得跟旁邊的別人有什麼兩樣。

這人就是中樞。這人，就是在莫斯科周圍的版圖上大放光明的一切事物的中心。

他的相貌——雕像、畫像、照像——傳遍蘇維埃的大陸，跟列寧的像樣同樣流行，而且總跟列寧的在一塊兒。一個工廠，一個營房，一個辦公室，一個店頭，倘不在一張美麗的社會主義統計表（反宗教的圖畫）和鏟刀抱着鎚子的國徽中間，用紅顏色做背景，掛着他的圖像，那簡直不好算是一個地方。最近，在俄國和各聯邦共和國的無論何處的牆壁裡，所揭的一幅告示上頭，大幅地加印着兩個死人和一個活人的側像：馬克斯、列寧、斯大林。此外還有千千萬萬勞動者和知識份子的房間裡，少有不掛斯大林的圖像的。

你所愛的或是你質恨的，這佔着世界六分之一的民衆，這新的民衆，它有着這樣的一個頭兒腦兒。

幾個鐘頭之後，是吃中飯的時間了。（這在俄國是很亂的：許多「負責的」要人，往往隨着服務的時間而定）。今天，你若高興，就算是兩點鐘罷。

克里姆林，是一所顏色鮮明的強固的堡壘，一個矗立在莫斯科中心的壯麗的小城市。在建着

水 這是指紅場中的羣象的。——譯者

塗了紅綠兩色的粗獷的城樓的，高大的圍牆裡面，那完全是一座滿佈着古代的金頂的教堂和舊式的宮殿的城子。（也有一所新的大宮殿，那是十九世紀羅曼諾夫族的一個富地主所建，樣子像一個卡爾登旅館。）

在好像開着教堂和宮殿的展覽會的這克里姆林宮中，你看，在某一宮殿的腳邊，有一所三層的小屋。倘不經人指點，你決不會注意到它的這小建築，廁身於宮殿之羣裡面，它先前原是給沙皇的內侍住的。

我們走上掛着白色亞麻布的窗帘的第一層樓去。這一層的三個窗子，就是斯大林的住所的窗子。在很小的入口裡，我們頂頭看見一件掛在軍帽下面的軍裝外套（Coat）。屋子裡面有三個房間和一個食堂。房間跟二等旅館裡的一樣簡單。食堂是橢圓形的；吃的飯，是外面的領子裡送來的，或是一個女用人燒的。倘在資本主義的國家裡，就是一個中等的職員見了這種房子和飯食，恐怕也要皺眉，不堪其簡陋的。一個小孩子在屋角落玩耍。大兒子傑斯契加晚上睡在食堂里，把一隻長椅子當做眠床，小兒子睡在一個小房間裡的一張床上。

我們的主人公吃好了飯，坐在靠窗的圈椅裡吸起煙來。他永遠穿着同一套衣服。說是制服麼？那是誇張了一點的。只好說是穿制服的表示，比一個尋常的兵士所穿的還來得簡單的服裝：長靴，馬褲，直襟的 shirt。我們記起看，不，從來不會看他穿過別樣的服裝，除非在夏天，換上白色的亞麻布。他每月有幾百盧布的進款，這在共產黨的官吏的微薄的薪俸中要算到頂的了。

（大概值中國洋三四百元）。

是不是這個穿着煙斗的人的那雙外國風的，略帶亞洲式的眼睛，給他那副很粗糙的臉上加上了一層譏諷的神氣呢？他的眼光中的一種表情和他的肌肉，使人相信他常常微笑，或者說他快要笑了，從前，那「另一個人」神氣也是這樣的*。這與其說是那對略帶橘色的眼珠的緣故，不如說是那雙時常眯縫的眼皮的緣故。與其說是那獅子臉的皺變的緣故（雖然他是有這種皺變的）不如說是那農民風的精明狡黠的緣故。總之，他十分良善地很容易發生微哂和大笑。他很少說話，——他也能够談論起你偶然向他問起的一個問題，至三個鐘頭之久，而一點不模糊。但比起說話來，他更愛發笑，甚至於捧腹大笑。

這人，就是我們的同時代人裡面第一個重要人物。他領導着二千一百萬平方公里上面的一萬七千五百萬人民。他有無數親密的同志。這些人無不愛他，信仰他，需要他，而且形成着一個擁護他，和推崇他的集團。他在歐洲和亞洲，在今日和明日，都佔着很高的地位。這是一個最被世人注目，却不大被了解的人。

加里寧說：斯大林的傳記，好像就是俄國勞動者革命運動的極重要的一部分。

而且是很完整的一部分。你無論走到那裡，凡是知道這運動的人物，都會用同樣的話，告訴你同樣的事實。

這個投身於一樁大陸的事業的人，這個從他身上可以看出整個世界和各個時代的政治的鬥士，要把他的精神明白表現出來，是一件極重大的事情。把他的一生研究起來，我們就插足於

*這一句中所說的「另一個人」，就是列寧。——譯者

「新的」歷史，我們走上新的道路，我們到達了人類的聖經所不會發表的種種境界。材料還不斷地增加着，積聚着。在這變革的局面中所包含的全部材料，簡直使人覺得太多了。在這熱烈的，而且可怕的，完全活生生的百科全書中，我們應該分割一下，從連續的斷面圖中去找頭路。

這就使我們觸着了不但是——而且是一時代的——而且是萬世的最大的問題的中心，有史以來就那樣受着苦難的人類，前途究將如何呢？人類所能希望的幸福的分量和世上的正義的分量，究竟將到什麼程度呢？全球之上，二十萬萬人的希望，究竟是怎樣的呢？

這問題發生於（人類的）下層。它被許多想用正當的地震改革一切的近代發明家所提起，所解決，所現實化，而我們眼前的這人，便是（那些發明家的）代表。

第一章 沙皇治下的一個革命者

是在戈里 (Gori) —— 喬治亞的一個好像鄉村的都市裡，是半世紀多點以前——一八七九年。一個名字叫做約瑟夫的孩子，誕生在一所陋屋裡面，這屋，有許多突角，幾堵磚造的牆基，屋身是樹的，屋頂是板的，在正面，有一頭門，在後面，有一個通地窖的洞，四週的景象也是毫不漂亮的，屋面前橫着一條硬石鱗鱗的小街道，路的另一邊，是一排修繕得不很整齊的，而且到處豎着種種管子的板屋。街上的石子中間，陷成着一道河床。

母親加德琳，臉子漂亮而嚴肅，有一雙黑眼睛，(黑得好像兩個黑色的傷疤似的從周圍的眼皮中突了出來) 在最近的許多照片中，我們看出，這罩着黑色面幕的方正的臉孔，是某種年齡的高加索女人之中的舊式而嚴正的一類。父親維沙里洪·杜卡徐維里，本是蒂蒂·里羅村人，以補鞋爲業。他在離故鄉不遠的提夫里士——喬治亞的首都——的一家鞋店裡辛苦地工作。如今在某一博物院裡，人們可以看到被他用得破舊了的一隻用繩子纏着的矮凳。這是一個不幸的人，教育受得很少，却是個好人。他送約瑟夫進戈里的一個小學，(樹陰環繞，好像一個農家的一所小房子)，後來又送他進提夫里士的中學——這就是說，他對於兒子，實在是盡心竭力的了。



後來：「我參加了革命運動，那是十五歲的時候，我跟發現於外高加索的俄國馬克斯主義的
秘密團體發生了關係。這些團體給我很大的影響，使我愛好起秘密的文學來了。」他自己這樣說。

約瑟夫·維沙里諾微支視察他的四周。人類裏面，大部分是承認了法定的權威，不聲不響的
遵命奉行着。這就是塔西特*所說過的一輩。塔西特還說，全靠了這批閉口的市民，「一切事情
才能做成」。另外有一批，佔極少的少數的，却要非議——他們不承認一切。

於是他留心看着，聽着。

喬治亞(遠着阿美尼亞和亞塞爾拜然)在高加索的南部，黑海和裏海之間，形成着外高加索。
在一番很悠長很英勇的歷史之後，喬治亞(當基督教徒對土耳其人最後一次「進軍」的時候)失
去了它的獨立，而在十九世紀初葉被併入了俄羅斯帝國的版圖。雄踞聖彼得堡的俄羅斯的中央，
努力要消滅這國家的民族性，使它俄羅斯化，如它在這帝國的大集團的不調和的各部分所做的那
樣——而且依照各大國對付其殖民地 and 屬國的傳統的辦法，作為宗主國的，開始為吞食，然後試
用種種工人的方法迫使同化，而且主要的辦法總是虐待和迫害。(在俄國的各處，沙皇一味的完
全剝奪人民的自由，儘量剝奪人民的教育)。所以統治像喬治亞那樣的異民族，其實就是蹂躪他
們。那時有人說：「高加索民族只能享受一種權利——被審判」。他們只有一種自由——受苦，
但又只准用俄國話說。在數這種情形之下，從這直接附屬於俄國版圖的殖民地裏面，終於發生了

Tacite 據讀者所知有兩個。一爲拉丁的歷史家(53—120 A.D.) 一爲羅馬皇帝(98—117 A.
D.)。這裏所說的不知是那一個，大約是前者。——譯者

以求喬治亞之自由平等爲理想的民族主義的思潮。但是因爲有許多的人種不但難居在外高加索，而且難居在喬治亞，所以問題變得複雜。在喬治亞的，有喬治亞人，有阿美尼亞人，有土耳其人，有猶太人，有庫爾特人，還有十幾種別的民族，這些各式各樣的民族，同樣處於俄國的壓迫之下，却是彼此之間，互相敵對地生活着。要是做得到的話，他們不但要攻擊彼得堡的監督人，而且要互相攻擊的。

除了這種後來逐漸團結成一個相當堅強的「聯邦主義」的政黨的，舊的分離主義的傾向以外，也有着社會主義的運動。

在俄國發生了反應的一切集體的爭自由的偉大思潮，在高加索也很快的發生反應了。

一八五六年，克里米戰爭失敗之後，（開發民衆的靈魂的，往往總是戰爭）。那種使俄國停留於比歐西各大國較爲特殊的，野蠻的特權的情況之中的專制主義，引起了反動。傾向較好的布爾喬亞的改革者，注意起從西方來的那種光明來了。

一八六〇——一八六九：幾項的改革給這種傾向一點滿足；如農奴制度的廢除，地方議會（Zemstvo）的設立，司法制度的改良。但是這些表面上似乎很動人的改革，並不使實際情形有所改善。農奴制度的廢除，根本不是基於公正的理由，這首先是爲了財政上的原因，其次，是爲了大地主的利益，又次，是由於政治上的動機：「爲了使農民的解放運動不至從下層自發起來」（沙皇自己的話）。由於這種幻滅，這種欺騙，就發生了激烈的民粹派運動（Narodnik）。這回不再是受西方的影響了，反之，現在是回到俄國的特殊傳統制度，如「米爾」Mir——農村公

社)阿爾退爾(Артур——勞動組合)，就由這途徑，俄國的民衆「沒有經過資本主義的苦難而到達了社會主義」。這個民粹主義的大時代，(當時的組織有：土地與自由社民衆的自由社等等)是一八七〇——一八八一之間。在這時代，民粹主義者，即歐洲人所稱的虛無主義者，拚着性命，用炸彈和恐怖的暗殺手段，對付冬宮的專制魔王們的統治。後來，因爲一八八一年亞歷山大二世的被害，警察的壓迫摧毀了民粹主義的組織，於是這種主義，只能殘存在文學理論裡面了。年紀很輕的時候，列寧就常常出席民粹派的集會，他的哥哥亞歷山大，是民衆的自由社的一分子，於一八八七年被絞死了的。瑪麗亞·烏里亞諾夫娜——列寧的姊姊告訴我們說當那宣告死刑的悲慘的消息傳到烏里亞諾夫的家庭時，年方十七的烏拉第米爾·伊里支，「臉上現出一種難以形容的表情，喃喃地說道：『不對，我們應該走別的道路。這條路是不行的。』」

所謂別的道路，就是科學的社會主義的道路，這是完全繼承了政治的自由，特權的廢除，平等主義，萬人博愛主義關於這些舊的觀念，而在十九世紀中葉由馬克斯重新確定的一條道路。馬克斯學說的基本原則中，有一項是把舊社會主義從它的可笑而不利的幼稚病中提拔了出來的，那就是經濟和政治的聯繫，社會主義和勞動運動的聯繫。這種聯繫的必要性，我們在今日看來，好像是很明顯的。但這並不是向來如此的。當這道理還不會剖析明白的時候，那是必須找出這個公式來的。

社會主義佈置了一道國際的網。從馬克斯和恩格爾斯所直接建立的「確定了無產者鬥爭的意識基礎」的第一國際開頭，接着是「替勞動運動預備了一個廣大的發展的地步」的第二國際。科

學的社會主義——跟那些包含着幼稚而激烈的原素的社會革命黨及無政府主義者相反——不用恐怖手段和暗殺。這類的盲目的外科手段。往往粗暴地離開本來的目的，造成意外的結果，這不是科學的社會主義的任務。他的任務是，由利益的分清，意識的訓練以及一種實際的學說的積極聯繫，而「組織」起被剝削者和被壓迫者的大潮來。

因為民粹主義的急劇的機械的分解，又因十九世紀末葉的俄國相當地工業化，科學的社會主義的進展是很快的。列寧是完全投身於其中了。我們看他寫了馬克斯主義的組織和大眾的組織，而與無紀律的浪漫主義和民粹主義的「實際上是反動的」夢想，起了廣大而激烈的鬥爭。（一個證人告訴我們，一八九三年某晚，在莫斯科秘密舉行的一個秘密的「陰謀很大」的會議上——這會議是誰都開口發言的——人們看見「這個微禿的，態度十分別緻的青年，已成為馬克斯主義者裡面的大頭腦——那時列寧還只有二十三歲——他跟那個著名的理論家V. P. 伏浪佐夫佔優勢地抗辯着。」）

然而，俄國的社會民主主義者的第一次的綱領，却是早在一八八四年，由勞動自由社發表出來的。在這期間，這團體的全體盟員差不多都集合在瑞士的一個湖上的一艘船上開會。起初，這運動幾乎純粹是智識分子（和民粹派一樣）的運動。一八九一年，的大饑饉，方才推動了智識分子的先覺者——如普列哈諾夫和阿克塞洛特等，去跟勞動階級接近。那時有許多的小組，許多的同盟。一八九八年在閩斯克開第一次大會，這纔把所有的組織統一起來，而且選出了中央執行委員會，但是因為大會的多數會員的被捕，種種的決議不能實現。

在這年青的黨裡面，已經發生了某種的分裂，尤其是，如有的人所說那樣，在經濟鬥爭（勞動者方面的）和政治鬥爭（全體民主主義者方面的）之間顯出了分別。

列寧竭力促成團結，而且真正地組織起這個直到一八九八年方才顯然存在的社會民主黨來。在反動當中，在全俄的畜生似的民衆陷於奴隸狀態的時候，在羅曼諾夫朝的獸性的統治之下，在充塞各社會層的，奢侈的監獄官們濫費國帑的當兒，他工作着，他獲得了成功。

由馬克斯主義來組織俄國內外的革命傾向和革命勢力的這個時代，就是我們剛纔所注目的時代了，那是一八九七年，約瑟夫·維沙里諾微支，杜卡·徐維里領導起提夫里士中學裡的馬克斯主義團體來——據桑特羅·米拉皮徐維里說，他簡直把一個公共寢室變成了第二個學校*。

這中學，也和一切中學一樣，是一個被傳統的愚民主義和寧息政策所支配的溫床，而且是操在奸惡的管理人的掌握之中的。

斯大林自己說過：「我們在這裡面受着一種屈辱的統治，遵守着種種專制的規則。在這裡面，到處有着偵探。早上九點鐘，鈴聲就催我們去吃早飯。我們聚集到食堂裡去。吃好飯回去的時候，我們每每看出，當我們吃飯的當兒，人們已經搜查過我們的房間，箱櫃都被翻得七頭八倒……」

雖然如此——而且正唯其如此——這中學却成了個「思想的苗床」。原來，無論怎樣，對於上述的種種事情和別的許多同類的事情的不滿和抗議，終於在這學校裡暗暗的發生起來了。「不

* 這是形容斯大林在學校裡講演討論的情形。——譯者

遲之徒」們的團體先後成立——當然，這類人的表示思想，是很秘密，很輕聲的。這中間有民族主義者的團體（其目的在求喬治亞的獨立！）民粹派的團體（打倒專制君主！）和馬克斯主義者的團體。是在最後的一種團體裡，約瑟夫——不如說是蘇蘇·杜卡徐維里——懷着強烈的愛力，參加進去。

「我還能够記得，」埃奴基支說：「我還記得一九〇〇年在提夫里士第一次看到的那個年少的蘇蘇·杜卡徐維里的樣子。」

他是怎麼一個樣子呢？兒童時代，他是很瘦小的，看上去膽子很大，而且臉皮相當的厚，老是儼然的抬着頭。後來，跟着年紀的增加，他長了一些，但是更加清瘦，態度頗優雅：一個極其文弱的書生的頭顱，一頭的密髮，黑得和墨水一般。少年時代的清瘦，特別顯出他那險惡的喬治亞式的橢圓形和他那種族所特有的怯弱的眼睛來。在埃奴基支所說的那個時候，這年少的戰士表現出一種特別的混合的態度，因為，他的書生氣和工人風都是十足的。不久之後，他的肩膀闊了一點，臉龐長了一點，茁起纖細的鬍子，嘴唇皮變得厚些，鼻子變得瘦而直些；一隻鴨舌帽略微地攏在濃密的黑髮上——這位大眾的征服者，這位世界的搗亂者，樣子就是如此的。

再往後，斯大林的相貌又有點改變，尤其是現在，在他的依舊濃密却剪得很短的髮，略帶了些灰色，人們見了他，會得想道：他的容貌是更加普羅化，戰士化了。——這種想頭的一部分，也許是他的服裝所引起的。不過，我們也不能說他有了什麼大變化。至多，我們只能說，他的容貌上所表現的精神和戰鬥力，比從前更分明了，因為他這個人，在本質上是不會改變的。

人們早就認識他的言語的簡要了，在三十五年前，開茲珂維里叫他「好同志」。這個青年真是出奇的不高興說話。他跟那些專愛在高談闊論指手劃腳之間求效果的人們，恰恰相反。「簡單，明白，正確是他的主要的幾種性格。」

他在提夫里士的中學裡私自讀着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書籍，——這事不利於他的安寧。他把實際知識的有毒的文字，帶進不准有越軌思想的教室裡。這種罪狀終於被當局所發覺了。真正自修的需要，跟中學校裡的純粹的傳統主義是不相容的。這年青的蘇蘇，就被開除了，開除的理由是他缺乏「政治的確信」。

「他頭也不回的走了，一直走到勞動者中間去了。」

一八九八年，他加入了俄國社會民主勞動黨。這一年，就是前面說過的，那個第二國際的俄國支部正式成立的那一年。

這樣，他是走上他的道路了。他不曾白費時間去找尋路徑，他是立刻走上康莊大道的。這個智識分子，一個做手工的農民的兒子，他抓住了做「職業的革命家」的任務。起初，他加入提夫里士的鐵路工人中間，後來，他加入菸草工人和製紙工人中間，後來，他又加入氣象台的工人中間——幾乎無所不到。實際上，他是個爲了工人們而工作的工人。

埃及基支是高加索的革命事業的最初的鍛鍊者之一，也是現在的一個重要的領袖，他在那時，跟蘇蘇，杜卡徐維里很接近，據他說來：「他（蘇蘇）對工人們是很會說話的，」這一種容易跟一切人接近的本領，也就是此他大十來歲的列寧的特點之一，列寧那時正在俄國社會主義運動

動的幾個核心裡工作着。當整個俄羅斯正受着內外的打擊，潰壞不堪的時候，就預計着電化半個舊大陸的這個列寧，這個能够清楚周密地想出人類的頭腦從未想到的實際的大計劃的理想家，他也是很能够對工人們說話的，連個別的談話，也談得很好。他的帽子罩住他的圓而禿的頭頂，目光閃閃，雙手插在口袋內，態度像一個規矩的小商人，頑固而狡猾，在工廠門口走來走去。他勸一個工人，因而引起親密的談話——從此就永遠有了交情。他能够使一個馬馬虎虎的人變成一個不平密，使一個不平密者變成一個革命者，（農民們提到他，總說：「你知道麼，那個紅頭髮的，有幾點小麻子的人，原來是跟你我一樣的老實頭人。他好像是剛才放下鋤頭的。」）約瑟夫維沙里諾微支是和這同類的人，因為這道理，這兩個人的影子，在各地羣衆的心目中，是早就連在一起的。

「蘇聯的天生的賢機，他的個人生活條件的絕對的無私，他的性格的堅強，以及他的在當時已頗出色的學問，造成他的威信，使他引起別人的注意，而且永遠受人注意。提夫里士的工人們叫他是我們的蘇維。」

這種能够適合羣衆的本領，就是這人得到羣衆信仰的理由，也就是他把偉大的任務許給自己的理由。但是我們不要弄錯：所謂適合，並不是自己降低，自己縮小，或者一味卑諛地去媚悅羣衆之意。和這差得遠哩。當時的蘇維的同志奧拉開來徐維里給下過一個很明白的定義道：「他既無學究氣，也不落俗套。」一個社會主義的鬥士，在他看來，就是一個翻譯員——翻譯那些最博學的理論家所說的話的人，不過翻譯的時候是適合着羣衆的頭腦和文化程度的。怎樣適合呢？就

是利用具體的形象和活生生的例證。

「我們，」奧拉開來徐維里說：「我們另一批跟他一起組織宣傳機關的人們，我們却不能够避免使用術語。我們膠住說『正』，『反』，『合』和別的許多辯證法上的公式。我們的演說裡的這一套花樣，在工人和農人們聽來，總嫌太艱深了。斯大林的演說裡面，就沒有這一套。他從另一方面，從現實生活方面去剖明事理。舉個例說，他說明了布爾喬亞的民主主義的觀念，接着又十分明白地指出，這種民主主義比起專制主義來，爲什麼是好的，但是比起社會主義來，却又見得不好了。這樣一來，人人都明白，民主主義這東西，雖然在破壞專制制度的時候，很有用處，但到後來却成了社會主義的大礙，所以應該把它打倒。……」此外，他又很會尋開心，——但是工作的時間除外，工作和尋開心兩件事是不可混在一道的。「有一天（這也是奧拉開來徐維里所講的）他們在一個重要的高加索同志的家裡開會，（他們之所以在人家家裡開會，是因為找不到別的地方的緣故。）吃中飯的當兒，主人的小孩子走了進來，坐在父親膝上；做父親的不住地哄騙這孩子，要他安靜下來，因爲孩子對於他們的嚴重的討論毫不感到興味（總是吵鬧），終於，斯大林站了起來，和善地抱起小孩子，把他放在門外，并且說：『小朋友，今天的議事日程裡沒有你在內呢。』」

「他對於反對派，從不諷罵。」同一個證人告訴我們道：「那班孟雪維克真叫我們爲難哩，當着任何聽衆的面前碰到一個孟雪維克的時候，我們總忍不住要拼着全力去攻擊他，跟他激烈地爭論。斯大林却不愛這一手；言語的橫暴，在斯大林是一種禁用的武器。至少，當他用了一番簡

單明白的隱諷，已經說得對方無話可說，而對方正要閉口逃避的時候，他却要用一句流行於外高加索的俗語，射箭似的投過去，譬如這樣的說道：「你真是一個膽小的傢伙，在我們這樣的無用的人們之前，你何必害怕呢？」

秘密的煽動者的工作，職業的革命家的工作（這工作，吸引他跟着別的許多人去做），實在是一種可怕的工作。他變成了不法之徒，永遠被政府機關所偵察，被警察所追遂；沙皇的劊子手及其無數鬻得好好的走狗，咬牙切齒，磨拳擦掌地武裝着，他跟流犯一樣，本身的自由不絕如縷，只能躲躲閃閃地活動。他是一個微小的革命者。差不多單人獨馬在羣衆裡面出沒。他不爲「聰明人」所了解，他投身於籠罩各國的（不止沙皇統治下的一萬八千萬臣民而已，所有的世上的人們都在內。）資本主義的大潮之中，但是他却想和他的少數的幾個朋友，努力變革這一切。他忽而在這里出現，忽然在那里出現，撒播憤怒的種子，鼓勵人們抬頭，他的唯一的武器，就是他的信念和他的言語的力量。

這種工作，無論從那一條路進行，前面總橫着牢獄，西伯利亞和斷頭台的影子——人們若單是「願意」幹這工作，那是不夠的。

（這類的）人，應該有一種經得起種種危難，拿得出絕大的精力的健康的身體；要能夠無限地做事。應該變成能够通夜不睡地工作的好漢，要能够依照指定的時間變換工作，要能够忍耐，要能够避免緝捕，假如被捉住了，要能够設法脫逃。要能够即使被燒紅的鐵灸着皮膚，或者被打落了牙齒，也不供出一個姓名或一個地址來。要把整個的心奉獻給確定的宗旨；決不分心

於別的事情，決不離開自己的立場，決不偷懶，決不貪錢。

這樣還不够，還該有堅強的希望，即便在最黑暗的時代，遭逢了極大的失敗，也毫不自緩而失去勝利的希望。

但這樣還是不够，還有頂要緊的，是應該把事情看明白，而且清楚地知道各種人的需要。

由於這一點，馬克斯主義，這纔把革命看實際地武裝起來，而且使每個新的人物能够把握形勢，而且常使他們有非常的先見之明！

在從前，要完成一樁革命的工作，無論怎樣，只要勇敢就行。——至少在暫時之間。至於說到持久下去，那麼事情就複雜得多……有一天，勃拉斯哥·伊本達茲，這個可愛的虛偽的大人物，長歎着對我訴說他的悲哀道：「有一個時代，人們只要跑到街道上，一小隊一小隊決心地聚合起來，就能够顛覆一個政權，但是這樣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呢，機關槍出現了——一切障礙物只等於厚紙板了，這樣一來，工作是受到很大的破壞了，因此，他就不高興工作了。」

機關槍當然是有的。但是，那種由現實的變成浪漫的舊的革命方式之所以被廢棄，却並非單是爲此，那實在是因爲現在的革命，性質與前大不相同，工作也更爲重大了。今日以前的那種政治上的小紛擾，往往總只是把中央政府的名單換過一張，或者再改換一些儀式，此外就毫無改革。至於全世界下的各階級所艱苦地等待着的大衆的利益，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馬克斯主義指明了現社會的這些必然的大動亂的深因和要求（這兩者是互相聯繫的），並且

決定了解決這些問題的原則，馬克斯主義，並非如有些莫明其妙的人所說那樣，是許多複雜的理論的湊合，也不是文法和聖經那樣，只要心裡記得就好的條規的集成。這原來是一種方法。而且是很簡單的。這完全是現實主義的方法，這是一切理想的「分極」(Polarisation)，這是衝破了宗教的或形而上的神祕主義，衝破了幻想的行列，衝破了憑空分歧的路線。而向着堅實的地段，穩固的基石和開架進行的一切努力的摸索。能懸空自己支持的理想或公式，是沒有的。卡爾·馬克斯是個現代的思想家，他的偉大，吹散了『思想的天空』中的烏雲。他的方法，鼓勵人們：總要追擊根源，總要求出一個結果，永遠不離開現實，要使理論跟實踐密切地聯繫起來：真理，現實，生活。

因此，社會主義已不是一個朦朧而感情的幻夢了——在這種幻夢中，人們除了空想一通之外，一點具體的結果都得不到的，社會主義，現在是成這樣一種理論——它首先計算了一切人的合理的需要，而叫每個人依照最簡單的方法，正直地工作，而實現這樣需要，它包含着改革現狀的作用。它掃蕩謬說，證明真理，使人瞭解現在和將來，這是一種堅實的知識，它自然而然地推動『破壞』和『建設』這二重的事業。

馬克斯主義的概念是科學的，它跟科學的概念一致，一個革命者，通常總是一個使徒，一個兵士，但是，他首先還是一個在十字街頭的學者。另一方面，世界上所有的學者，實際上都在無意之中實行着馬克斯主義，恰和茹爾丹先生(Monsieur Jourdain)自己口裡說着散文，却不知道所說的就是散文一樣。

從平常百姓裡面創造出革命者來的，那是對於社會的一種批評的判斷，而並不是一種忿恨的，瘋狂的，或者激昂慷慨的衝動——至少，那並不單單是這樣的一種衝動。這是一種「打算過」的衝動。社會的缺陷正和寫字的錯誤一樣。一切事情的錯誤，遲早總是要由它自己來矯正的，但是人類的意志應該憑着先見之明，促進這種有機的改革。然後，熱心地把事情引上軌道。意志是最要緊的。至於感情——這可貴的動力——只應該發生在理智之後，而且服從理智。感情這東西，一定要受「理智」的支配，要是讓它獨立去活動，那也是容易被瘋狂所利用的。

三年以前，那個德國的作家愛米爾·露特維希 (Emile Ludwig) 曾經問斯大林道：「你之所以變成這樣的一個革命者，是不是因為在小時候受了爹娘的虐待的緣故？」聽了這話，我們是不禁要微笑起來的。

好個愛米爾·露特維希，他還鐵一般的頑固地相信各民族的傳統觀念，以為一個人之所以成為革命者，一定是兇惡和忿怒所致，或者是兒時挨爹娘的敲打的緣故。這真是可憐的論調，即使單是想借此罵人，也未免太不通了。不幸的境遇能够推動個人和羣衆的肩膀。那本是無疑的。然而，一切革命者，走上了集團的進步之路，却絕對不是任何一個人的境遇的刺激所能夠解釋的。斯大林對於露特維希所提出的問題忍耐地答道：「完全不對，我的爹娘從不虐待我。我的變成革命者，只是因為我覺得馬克斯主義者們的道理很對。」

「只有合乎主義的政治是對的，」斯大林接着列寧之後屢次說過這句話。這句話是基本的確信，主要的教條，斯大林還說，這種確信還能「克服種種非常困難的狀況」。至於那推動社會進

步的大動力，則是大衆的信仰。這種存在於勞動大衆中間的信仰，就是口號，就是行動的命令——這些是斯大林一生中說得最多的。「一個領袖容易犯到的最壞的一種毛病，」他告訴我們：「是對大衆的害怕。」一個領袖的需要大衆，比大衆需要他更切。一個領袖應該了解大衆，比大衆的了解他更爲要緊。當一個領袖開始離開了大衆去做他自己的小事的時候，他就完結了，無論在勝利上，在利益上。

我們所說的這個積極的煽動家，就這樣的以現實主義爲武器，厭棄一切廢話和空想，而開始鬥爭起來。

在這裏，我們應該注意一下那個庫爾拉托夫斯基的影響，這個人是列寧的戰友，也是外高加索的革命思想的先驅者。他是把J. Y. 杜卡徐維里和列寧主義聯結起來的金鎖。據阿陀拉茲基的理論的定理說來，馬克斯主義，「叫我們把握現時代中的新萌芽，」列寧主義，則是已與時代環境的情勢相配合的馬克斯主義。

在鬥爭中，我們的主人公假造了各式各樣的名字：達徹特，科巴，尼日拉支，乞齊科夫，依凡諾微支，斯大林等等——他的有計劃的煽動，也取着種種不同的形式。

第一步，他在黨的內部，新舊兩派的鬥爭中，確定了自己的地位和基本傾向。舊的一派主張寡而均的制度，並且主張從「純粹的宣傳」做起，然後選出工人代表來，由他們去散播福音。新的一派，則主張直接行動，而且到「街頭」去行動。我們似乎用不到在這裏多說，斯大林怎樣的贊成第二種主張——而且使這種主張得到勝利。

罷工，一九〇〇——一九〇一年之間，提夫里士發生好幾次大罷工，這當兒，這個地位已經很重要的煽動家，當然的不會置身事外的，這些罷工運動，尤其是一九〇一年五月的大示威，我們可以說就是提夫里士社會民主黨幹部分裂的原因，也就是這黨完全變成非法性的原因。

他那時不名一錢，尼奴亞和別的幾個同志，供給他的吃食，一九〇〇年的時候，在提夫里士，他每天晚上要出席八個他所領導的小組，討論問題。

一個煽動工作的後備隊在暗中組織起來。提夫里士有一所「違法的」秘密房子，就是我們的主人公所住的。陽台的柱子，非常瘦細；尖弓形的大門，非常狹小，這房子，跟提夫里士普通屋子差不多，從它所盡的任務上講起來，那它要算是第一等的了。

開會的時候，斯大林總是出人意外的到場，一進門就坐下，一聲不響，只是聽着——直到要說話的時候才開口。他常和兩三個同志一道，派一個站在門口守望，他從不在會場久留。當要逃避的時候，他有敏捷穩警地躲閃的本領。

「……」這個秘密會所靠近着一個戲院的邊房，因此，當警察包圍住這個會所的時候，人們只好溜過一道門，裝着高興的臉相，混進戲院的觀眾裏面去。」

「……」他剛剛走進玻璃夫大書店裏。他要了一本柏林斯基的書，他仔細瀏覽着，一面翻着一隻眼睛去看一個助手的行動，把兩張假的護照交給那助手——一點都不給別人看見，認出。他們是要安排兩個同志的逃走，要是誤了時候，——只消就擱一會兒。那兩個同志就會落入警察手裏的。這個玻璃夫是一個王黨的書商，倒是因此，同志們竟很容易在這裏碰頭：斯社魯亞，里科

次，多特里亞，埃奴基支。」

他有很強的鑑別力。他憑着敏銳的靈感，阻止巴庫的工人們（他們信賴了某一團體的同情，但這種同情其實是一種奸計。）去援救一批被關在牢裡的示威者——這批人的被捕，是在跟那拿着「至尊」的肖像的「黑色百人團」*發生衝突之後。

但是，這個革命家雖然在他本國屢次失敗，却從國際間來了堅強的支持：列寧在外國所辦的一個報紙（*Pravda*）（火花）——這是理論的中心，也可以說是謀略的中心——在它的批判號（批判號是一九〇一年的正月在慕尼黑出版的，）的評論中，以如下的呼聲作結：「我們應該攻陷敵人的營壘，只要我們把覺醒了的無產階級的一切力量聯合起來，就能攻陷它。」

而且，他並不一味把行動秘密起來。有時候——揀極安當的時候——他也公開地冒險；例如高加索的第一次五一總大會，（一九〇一年）是他出面發起的，又如：當提夫里士的露工的罷工團體被警察所阻礙，說是倘不解放就要開槍的時候，他就出頭代表工人們說：「你們用不着威嚇我們，我們只要所有的要求一滿足，就會分散的。」（後來警察的黨整終於不會制服罷工者。）他到帝治亞南部的阿勃卡希的巴登地方法去，組織了一個委員會，這事情，由拉瑪巴說來，是「他的偉大的傳狀中的新的一頁。」佳到却奧巴的卑濕的郊外的時候，蘇蘇又煽動起莫泰雪夫和羅斯貝爾工廠的工人。

「黑色百人團」是一個極保守的專制主義的組織，專門直接行動，製造恐怖。「至尊」的肖像，是指沙皇的肖像。——譯者

警察追趕他來，他就趕快逃到戈羅陀克去，他的運動很麻煩，因為有一副秘密的印刷機得隨身帶走，這是他無聲地發表演說之工具。

三月一日發生了一次示威運動，他在這次運動中所處的地位，使他成了一個靶子，這次運動的結果，有十四個人被殺，四十個人受傷，四百五十個人被捕，這樣一來，他跟他的印刷機又得搬場了。

近地有一所墳場（那是屬於蘇—烏克—蘇的），這墳場的掘墓人是他的一個朋友。他們就在這墳場裡面秘密開會（開好會之後，他們得把香煙蒂頭小心地掩埋在那些回教徒的亂墳中間）。

有一天，他們要把印刷機趕快搬到墳場裡去。那個掘墓人的手臂裏，抱着機器和一個裝滿活字的大瓶。他帶了這些東西，向着近旁的玉蜀黍田走著。但是，半路上他只好着地躺倒了，他看見一隊警察領着一隊哥薩克兵，正在那裡搜索印刷機。

另外有什麼地方可以安置印刷機而且發行印件呢？他們想起了卡辛的屋子。

卡辛是一個老頭子，他的回教農民的誠樸的心腸，一下子就了解了蘇蘇的為人，而且尊敬起來。有一天，他對蘇蘇說：「我是人裡面頂渺小，頂苦命的一個人，我從來不跟領袖們說話，但是你，我却認識你。」不久，當他多聽了蘇蘇的幾次談話之後，他又說道：「我看你是對的，你是個 *Atichata*（阿勃卡希的一個英雄），你好像雷公電母所生的，你很和善，但是你有偉大的精神，偉大的心腸。」

這老農和他的兒子，把印刷機搬到自己家裡，蘇蘇也就住在他家。許多望着回教徒的面網的

婦人來到這村中。她們都是近地人，狀貌都很粗笨，她們就是排字工人，她們進這個臨時的工場的時候，都十分小心。

從此以後，人們看見那個可敬的卡辛，每天早晨從家裡出去，戴着頭巾，垂着銀髮，手裡挽着一個裝滿了蔬菜和水菓的籃子，但在水菓下面，藏着論文和宣言。他到各個工廠的門口，兜售蔬菜和水果。看清了是相識的買主，或者看來是可靠的人，他就用論文包水果賣給他們。

但是，印刷所裡的鬼鬼祟祟的活動和那機子的響聲，竟引起了附近的農民的懷疑，他們以為卡辛家裡的客人蘇蘇，是在那裡製造偽幣。

他們對於所猜的這件勾當，並不十分肯定，他們明知道這種事件是要很複雜的技術而且非常成問題的。一天晚上，他們去找蘇蘇，對他說：「你在製造假鈔票，無論怎樣，這也許並不是一件壞事情，因為我們已經窮到這個地步，我們相信你的勾當是害不到我們身上的。但是你的那些假鈔票，什麼時候纔流通開去的呢？」

「我並沒有製造假鈔票，」蘇蘇分辯道：「我所印刷的，是講你們的痛苦的文章。」

「啊，這好極了！」那些農夫驚嘆道：「倘是假造廣告的事情，我們不懂得方法，那就不能幫你的忙，至於你所說的這件事，那也是我們的事情。我們懂得，我們要謝謝你，我們還要幫你的忙。」

……在這裡，我們要離開年代的順序，暫時插說一件另一時代所發生的事情。地方還是原地——還是卡辛家的園子裡，但時候是一九一七年。那年革命成功之後，這老農夫回到老家，檢

查他的園子，因爲在好幾個月以前，當他匆匆地離家時，他曾把那副秘密的印刷機埋藏在這裏，他的家曾被一隊兵士所佔據，那批丘八，滿屋亂搜，從地下掘出了印刷機，并且把機上的零件拆散，搗爛在全園。卡辛把那些機片一一找着，小心地聚集起來，事畢之後，他對他的兒子說道：「你看，我們曾經是用了這些東西革命的。」

……話又回到一九〇二年四月來，有一天，蘇蘇吸着烟，對康吉拉基談着話。他是在一所大房子的一個角落裡，這青年，皮膚很黑，身體很瘦，打着紅色方格子的領帶，他有着浪漫派藝術學徒所蓄的黑鬍子，滿頭黑髮，「好像被風吹往後面」，「短短的高鬚，長長的發孔，大膽的愉快。」這是，那〇（公安局）正在注意他，同時，警察已經密佈於他所在的達拉徐維里支大廈的四周，圍困住了。蘇蘇他們已經落在羅網之中了。但是他說道：「一點不要緊，」依舊吸他的烟。終於軍靴和軍器的聲音雜沓而上，警察進來了，要發生的事情就發生，蘇蘇被捕了，先關在巴登的牢裡，後來遷解到庫泰依司去（到了那裡，他組織了一次囚犯的罷工——獲得勝利）。

這之後，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的依爾庫茲克省，……沙皇政府對於西伯利亞，不知道，不能夠，也不願意從經濟方面加以經營，只是用政治手段統治它，在此地的大平原中間，設立了一大串的集中工作營和牢城。

但是，不久以後，有一個身穿軍服的人，忽然出現在巴登。這就是科巴；他不客氣地逃脫了獄卒的監禁，自費的回到了中央亞細亞。

這其間自然是損失了許多時間的，但並不如人們所想那樣的多，因為一個革命者總是革命者，即便在牢獄裡面的時候，他也還是個革命者。

社會革命黨員西米翁·惠雷徐恰克是斯大林的頑強的政敵（據台明·培特尼說來，他對於斯大林，一點點滿意之處都沒有，連鼻子，連頭髮，連說話的聲音——無論什麼，他都不滿意！），他說一九〇三的時候，他和斯大林關在巴庫的同一監牢裡——這監牢，建造的時候本是打算只容四百個犯人的，但那時卻容納了一千五百個：「有一次，一個新的面貌出現在關着布爾雪維克黨的小屋裡，人們說：這就是科巴。科巴爲什麼關到牢獄來呢？因爲他教育民衆。——許多教育團體成立了起來，這個馬克斯主義者科巴，在教師們中間顯得特別出色。馬克斯主義是他的原則，在這原則上，他是不折不撓的……」惠雷徐恰克還形容這個青年道：「穿着一套青色絲光布的學生裝，領口開着，沒有腰帶，也沒有帽子，一件外套披在肩上，手裡老是握着一本書。」他解決組織上的重大的論爭（科巴常常喜歡跟各個人論辯問題）。在一次關於農民問題的論爭中，綏爾戈·奧爾佐尼基支跟他的一個對手——那社會革命黨員卡爾學瓦支——辯論不休，繼以打罵，結果，奧爾佐尼基支被那班社會革命黨員打得半死。後來，當惠雷徐恰克在牢獄裡碰到斯大林的時候，他被這個多數黨囚犯所有的那種堅強的信仰（以爲多數主義一定會得到勝利的信仰）大大地感動了。

稍後，科巴被移押到麥洛夫監獄的第三號監房裡，他在這裡面依舊進行他的工作。監獄的變換，只是替他換了一個活動的地方罷了。

不歇的苦工和極壞的待遇，在戰士們中間撒播着疾病，科巴感到了結核症的初期的現象，把他的遺病治好的，倒是那個公安局——不過那醫治的情形，他可是不必感謝的。原來他一天在西伯利亞的曠野上工作，忽然，一陣叫做 *Pouga* 的可怕的大冰雪風暴襲擊過來。要逃脫這襲擊，只有一個辦法，就是把身子躺倒，鑽在雪堆裏。科巴所爬的路，原來却是一條冰凍的河。他爬了好幾個鐘頭，經過三公里的距離，方才到達一所小屋。他爬進了門檻，人們竟當他是一個鬼怪，從頭至尾，他完全成了一個冰人。後來人們把他融化開來。身上的冰一融化，他就跌倒了，一直睡了十八個鐘頭。經過這回事情之後，他的結核症就永遠斷根了。西伯利亞就是這樣的一個地方；它倘不把害肺病的人們殺死，那就會把他們很快的醫好，它的寒冷，不是除掉人的性命便是除掉病的根（這大抵是偶然的），沒有中間的情形。

一九〇三年，他在牢裡，得知一個重要的消息。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大會中，由於列寧的提議，布爾雪維克和孟雪維克之間的裂痕，暴露得十分明顯了。布爾雪維克：是徹底主義者，是不屈不撓的階級的鬥士，是鐵一般的戰鬥者。孟雪維克：是改良主義者，是機會主義者，是折中者，是妥協調停的專家。孟雪維克對於那班似乎故意把要求提得過高的布爾雪維克，非常嫉視（他們想：這班倒霉的東西想控下月亮呢！）。

裂痕日漸大了起來，人們得決定何去何從了。在問題還沒有後來似的嚴重的時候——那時沙皇的威權和壓迫還很大，資本主義的毒害的繁榮程度還很高。——斯大林就毫不遲疑地選擇了布爾雪維克。他贊成列寧。

凡是行動的人們往往會遇到這樣一個關頭。他得決定一個影響他的畢生運命的傾向。我們記得古代希臘的一個意味深長的神話：那海勾力士，當他的神聖的武功的使命開始的時候，他是被放在「善」與「惡」之間的牆脚下，由他自己選擇的。但是，這其間的贊成和反對，難道是毫無理由的麼？改良主義者們是很動人的。他們的態度似乎很聰明，他們的態度似乎很慎重。他們的態度似乎不捨得流血，但若是眼光遠大，懂得邏輯上和社會的數學上的大原則的人們，有豐富的歷史經驗的人們，就會知道，那些忍耐的機會主義者，妥協的改良主義者所走的路，第一步是幻想，第二步是陰謀，第三步是反叛，——這是毀滅和摧殘的路。老實的人們要說，這只是程度不同的問題，不對的！這是橫和直的問題，是生和死的問題，因為那種起碼主義 (Minimalisme) 也有人叫做「最少的作惡」，實在是極其保守的。

科比 (這是他的名字之一) 於是實行了第一次的越獄。從此以後，外高加索和俄國的許多地方，時常有一大隊警察，週期地注意搜索他，忽而又把他捉住，忽而又要重新搜捕他，這樣的一共有六回，不多也不少，越獄以後，科比就跟喬治亞的孟雪維克鬥爭起來。「一九〇四到一九〇五年間」，奧爾佐尼基支記着道：「在孟雪維克看來科比是高加索的布爾雪維克中間最可恨的人。他變成他們的著名的領袖。」

有一天，奧利巴支的一個工人對他說道：

「不過，討厭得很，蘇蘇同志，孟雪維克在黨裡總佔着多數哩，無論如何！」
這個工人如今還記得很牢，那時蘇蘇的答覆是：

「多數！那並不是真的多數。只消再等幾年，你就會明白，誰是對的，誰是錯的了。」此外，所有這時候在高加索活動的戰士，都還記得：那裏孟雪維克的妻人，如埃諾·拉米維里或塞特·合夫達里亞尼之流，當那個「階級的布爾雪維克」科巴來與他們論爭——換言之，是來「搗亂他們的平靜的生活」。——的時候，會經怎樣的怒罵過。

最近，布勃諾夫所發表的話，是十分確實，十分明白的：「俄國的布爾雪維克，運氣很好，他們在十五年中間，當革命成功之前，早就對於各種歪曲的傾向，有過系統的，堅強的鬥爭。」這真是說，俄國革命以後不必再在暗中摸索了，因為黨早已在理論的研究尤其是策略的實踐中，測定了路線，成功地決定了合理的觀點和真實的觀點，所以革命能夠進步得很順利了。

「我們都知道拿破崙有句名言：人們犯了錯誤，仍當固執不變，最後總會合理。」這話是很動聽的，況使你覺得很美妙，大有藝術的文學的意味。然而（請藝術家們原諒我），這話實在是大錯的。跟事物的真實和事物的發展不相一致的東西，是絕無存在之理的。倘有人說着和這相反的話，那一定是在宣傳着資本主義精神所賴以滋養的各種錯誤之一；這種錯誤，畢竟是要因它自身的飽滿而滅亡的（凡爾塞的滅亡，就是先例）。

因為這樣，所以他們同時要跟無政府主義者鬥爭，跟社會革命黨（這是和無政府主義者同類的）鬥爭，要跟眼睛看不到國家的鼻子以外的國家主義者鬥爭——要跟孟雪維克鬥爭，而且實行鬥爭了，在提夫里士，在巴登，在齊亞都里，在庫泰依司，在巴庫。到了一九〇五年，斯大林在別的許多工作中，同時主辦一種非法的布爾雪維克報紙：無產階級的鬥爭。他又用喬治亞文寫了

一本書：黨的論爭中的若干問題。「啊，作者的立足點是多麼堅固啊！」這是乞楚亞薩了斯大林
的著作的發表部分之後，對陀尼支所說的話，直到現在，乞楚亞還不會忘記這話。

在斯大林的影響之下，工人運動大大地發展起來，方法也與前不同了。他們的革命宣傳，不
再主張間接的選舉制度了，換句話說，他們不再主張精選了工人的代表，一層層地，間接地去參
政了。在大衆中間傳染着的信仰，強有力地推動戰士們，採取更直接的，更明顯的方式去行動，
無論是個人的活動或街頭的羣衆運動。在新的領導之下，種種活潑的攻勢的組織，得了勝利；
示威運動，緊急會議，宣傳品的大量的散發。

許多年份，是在活躍而沉着的工作中過去了。

「科巴同志既無家族，也沒有家庭，他的生活和思想，全用在革命上面。」瓦辛克這樣說；
「而且他從不錯過一個示威的機會。」據瓦辛克說，當巴庫廣裡的一個學生，死於蘇主的命令之
下而下葬的時候，有一隊音樂隊在同教寺院前演奏哀樂。但是警察局長到來了，他禁止這演奏。
「於是，科巴同志就在工人中間組織起兩個合唱隊來，一隊走在棺材前面，一隊走在棺材後
面，」——兩隊人馬當着警察的面，衝着警察的耳朵，一齊唱起革命的輓歌來。於是警察又來禁
止合唱了。但是，科巴又領導工人們一齊用口吹出嗚呼聲——漫長的悲哀的嗚呼聲。這新的合奏，
也十分熱鬧，却使得警察無法禁止。結果，這場哀樂中的示威運動，變得非常盛大。

公安局的秘密偵探們，曾經對他們的上司——提夫里士的警察的長官，報告關於「囚犯警察
二百五十條的社會民主主義的革命組織」的事情，那裡面說：他們都看見那個組織裡面，有着

「被人們叫做『前衛的勞動者』的人們」和許多知識分子如約希普，杜卡徐維里等等，這些報告裡面，有一個說：杜卡徐維里這人，竭力「用煽動手段和非法文學的刺激鼓動膽小的工人們的勇氣」；他「鼓吹一切民族的聯合」，他「勸誘一般民衆秘密捐款，以作『反對資本主義和貴族制度』之用。

還有，公安局巴庫分局長報告他的上司總局長說：農民約希普·杜卡徐維里是一個企圖建立秘密印刷機關的會議的領導人物。還有，一個偵探報告他的尊嚴的上司道：現已入獄的自稱領袖尼月拉支的囚犯，並非別人，就是那個農民杜卡徐維里，而且此人十分大膽，「不承認自己犯了罪」。

丹尼羅夫告訴我們一場審訊的情形，那是一個警察長傳出來的，——這種警察跟世界上過去現在的一切警察一樣（只有現代的一個國家的警察，能够守法，要算例外）；總是首先用木棍去對付百姓的。——却說那個警察長，穿了青色的土耳其裝，口啣雪茄，「身上發散着『Popov's的香氣』」濫用着他的心理學家的才能。」他後來在報告書中，這樣的形容他所訊問的那個犯人道：「杜卡徐維里·約瑟夫·維沙里諾維支，中等身材……聲音低沉……左耳有一烏記……頭相平常……你是個平凡之輩。」我們知道，這個精明的警察長眼睛，實在一絲一毫不會忽略，真是關於斯大林的頂完全的報告：「左耳有一烏記！」

第二章 巨人

莫時在俄羅斯的某幾處（而且也時常往來於歐洲），已經有着一個偉大的領導者，所有的革命者的一個偉大的兄弟——這人我們曾在上文得到一個大概的印象。就是那列寧。他不但對國家的努力作戰，同時也和本黨黨內很大的一部分人鬥爭着。他要求一個強固，純粹，正確，一致，毫不妥協的黨，這就是他的包括一切的大理想，大事業。他說，這黨要完成改變地球面的使命，唯有在這個明白的條件之下，方才可能，而且這是第一要緊的問題。他根據這理解，修正了社會主義之中的社會主義。

我們已經知道，斯大林是根據了同志們所給的報告，在獄中時候，對於列寧在第二次黨大會上所取的立場，就完全贊同了的。在這次大會上，烏拉第米爾·伊里支固執地，堅決地，強調了蓋雪維克和布爾雪維克之間的戰略上的區別，並且還在這兩種傾向之間掘了一道鴻溝——這在這個愛護統一的人自己，也覺得是一種非常嚴重的措置。但他的做了出來，自有同樣嚴重的理由：兩種相差太甚的傾向的統一，只能是表面的名義的，這只能存在於紙面上。還是一種個人的統一。斯大林同意於這事。況且，這種措置與他的氣質和精神，正是相投的。我們可以說，他在

選擇之前，早就把傾向選定的了。列寧和斯大林之間，實在從未有過矛盾。

反之，他們兩人在黨內都有強烈的敵人，首先是托洛茨基，那個頑固而饒舌的左翼維克，他以爲布爾雪維克的不妥協性會得甚麼不成爲。托洛茨基把列寧着做組織的割裂者，和勞動階級的分化者。

列寧，這個獨斷者，這個世界的政治家，在他的確實性上，又是一個超人。他靠着這確實性，在無產階級鬥爭之中，徹底地完成了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的綜合，而從不離開馬克思主義的範圍。列寧主義，是正確地出於馬克思主義的。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新的一章。這並不是一種修正，這是馬克思主義在一定環境中的活用和特殊化。斯大林寫道：「列寧主義，就是帝國主義時代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那精通法文的馬努依爾斯基會用法文寫道：這真是「簡單明白的宏義。」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對於一時代的正確的答案。一八四七年共產黨宣言裡面所規定的社會主義的基本的大原則；列寧並未添補加以變動。列寧和馬克思是兩個偉大的同心的人物，而且他們兩人其實都是在前人所設定的範圍之內活動的。列寧的獨創的天才，則發揮在把社會主義的理論變化爲實際革命進軍階上（後來又變化爲革命政府的建立）。

一切現實的理論，既然與生活相適應，那一定是很柔軟的。然而它的柔軟是在其表面上，不在其基礎上；是在方式上，不在原則上。（誠然，原則本來就是現實之理想的組成）。堅強地支持這些原則，防止任何過激的修改的傾向；這是頂要緊頂艱苦的工作之一，這就是後來斯大林的

我們應該知道：布爾塞維克主義，雖然具有強力的進步的力量，但是無論何時，無論何地，並不強迫我們無意識地採取過激的解決。在某種環境之下，倘若用出這種機械的迫激手段來；那是會有超出原來的目標，破壞已成的事功，使前進的革命事業反而後退的危險的。

總而言之：不要信從一種永遠是先設定的左傾主義。所謂「走在前頭」，並不是這樣的意思。在實踐者們手中的理論，應該與動的現實相聯繫，它的實現，乃是一種不斷的調整，不斷的飢遠。

爲易於瞭解起見，我要舉出一個代表底例子，以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施之間的聯繫的柔軟性，和轉化的活動性。我們知道，列寧是堅持這樣的想頭的：爲使無產階級的革命也能在俄國那樣的農業國家發生起見，必須使農民階級也成爲工人階級在社會鬥爭中的同盟者；然而，他雖在一八九四年，對農民方面，把社會主義的基本目的應用於土地計劃上（就是：大領土的沒收，歸於國有），可是直到六年之後，二十世紀的開頭，他對他們演說的時候，還不曾提到這地步。在這中間，革命認識已經成熟了，而且，農民問題，也因爲二千五百萬農家對於革命運動，還是參加呢，或是中立呢的問題，而大大地激劇化了——對於農民問題，列寧曾有認真深刻的研究，社會民主黨却並不加以注意（這在列寧看來，是重大的，不可恕的政治上的錯誤）。

一九〇〇年，列寧起草一個新的土地政策綱領，在這裡面，他唯一地指出一件事實，就是：俄國的農民階級，不但歷史的地非常落後，而且在其本國的環境中，也站爲落後，它還是似着封建制度的犧牲，而不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犧牲——因爲那封建制度，雖然經過了「解放農奴」這不

祿的喜劇之後，其實依然盛行於俄國的農村中（而且由於亞歷山大二世在這種絳絡民心的姿態下，所用的毀滅和束縛的手段，封建勢力反而愈加強大了。）

因此，一九〇〇年的列寧的農民政策，只限於要求這些還在迫害農民的封建關係的廢除——在亞歷山大三世的封建反動之後，這種情形是更加嚴重了——以及一切從農民身上強奪來的東西的歸還，原來的農民們，是被強迫用荒唐的高價去買他們自己的土地的。

在這里，由於急切的戰略的要求，列寧利用種種能够直接廣大地面感動農民的明白的諷刺，藉以獲得農民的密切的接近和臨時合作的機會，使他們跟工人階級一同參加革命的壯劇的第一幕：就是奪取政權。在這樣的時候，他在農村計劃上，只顧到這第一幕，而不顧到最後一幕——那組織新社會的最後一幕，是要等到口後再布置的。

馬克斯主義就是這樣進行的。它的全部原則，是這樣的：眼光要看得儘量的遠，而預計和行罰却須適應各個時期，不要忽略一切發生着的條件——這些條件時常是顯得混雜不清的；總而言之，應該具有一種基本的智能，這種智能使你能够像支配一個人似的支配現實，它是一切創造新事物的人——學者，藝術家，或社會的轉動者——所必需的。

在只容易成爲一種中產階級革命的起事的前夜，把許多最重要的革命目標保留起來，這事例如，使我們看出一種獨創的才能，凡要成爲「馬克斯的衣鉢弟子」如列寧者，或成爲「列寧的衣鉢弟子」如斯大林者，是非有這種才能不可的。

這裏要說到列寧和斯大林的相識。

「我的認識列寧，是在一九〇三年。但這回並沒有跟他相見；只是通了一次信。對這第一次的書面的相識，我保留着永不磨滅的記憶。其時我正被流放在西伯利亞。當我把十九世紀末年的列寧的革命活動研究了一番之後，尤其是一九〇一年『工人報』出版之後，我就深信，我們有着列寧這樣一個非常的人。在我眼中，他不單是一個黨的領導者，實在是一個真正的創造者——因為只有他知道我們的黨的性质和迫切的需要。我把列寧和別的領袖們——他的同志們——比較，我覺得他們的頭腦總在列寧之下。比起他們來，列寧不是同等的人，他是超羣的一個領袖者，是高山的主宰，他無畏地戰鬥着，經由俄國革命運動從未探覺的途徑，大膽地領導黨而前進。這種極深刻地在我心裏的印象，使我感到有寫信給一個飄流在國外的好友，議論列寧而且問他對於這人的批評的必要。過了不久，我在西伯利亞接到那好友的熱烈的回信，同時也接到列寧的簡單而深刻的信，我知道我那好友曾把我的信給列寧看過。列寧的信是比較的短，但是激烈痛快地批評着我們的黨的實際工作，而且非常明白正確地指示着本黨將來一切活動的計劃。」

這封信，斯大林現在想來大概早就燒掉了，這原是「叛黨的常事」，但他對於這信的毀滅，却永遠感着後悔，這小小的信件，在革命的義務方面，在最切實，最堅強，光輝地盡這義務的做人方面，都使這二十四歲的戰士茅塞頓開。斯大林承認，從那時起，他纔真正理解了列

寧。但是：

「我和他第一次相見，是一九〇五年，在塔梅爾頓（芬蘭）的布爾喬維克大會上。事前我等著要見這個我黨的領袖，這偉大的人物，我不但從報刊雜誌上覺得他偉大，同時以為他在人格上也很偉大，——因為，在我的想像中，列寧乃是個威力逼人的典型的巨人。然而，一見之下，我是多麼失望啊，原來他竟是一個中等身材的，毫無出眾之匠的常人！」

「照例，一個大人物總可以較遲的對會，讓賓客焦灼地等候他的出現。一個大人物出現的時候，往往總是先之以「噓！……不要作聲！……他來了！……」這類聲音的。但是我知道列寧的到會，倒還在別人之先，我又看見他在會場的一角，限許多平凡的代表，談着極普通的話。他的行為，顯然是反乎慣例的。」

「和他本人同時出現在我面前的他的樸實性和謙遜性，他的不要被人注意的願望——至少是不要顯出自己的崇高的願望，這是列寧——這新的羣衆的領袖，人類之中最樸實而深厚的大衆的領袖——的最強的特點之一。」

……就像這樣的，在北方，在喬治亞的俄國叛黨之間，這個活動範圍已經越出了高加索的革命青年（斯大林），第一次的限於另一個人（列寧）相接觸——那人，由他的一個信徒列塔台華形容描寫起來，只消一句話：「他很樸實，人人都可親近，而又那樣偉大。」

以上所說，都是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的前夜的準備。日俄戰爭（俄國失敗）的結果，刺激得這次革命起早發生，稍微有些偶然。這是第一次的平命，這一次固然失敗了，潰滅了，但也不

是毫無益處。這是在一種恐怖的壓迫的環境之中，引論偉大的功課的序文。

斯大林後來會這樣解釋道，假如那班在勞動階級中有着重要的組織，而且在當時能够左右全局的孟雪維克，不把一九〇五年的革命的領導權放棄給中產階級，那麼，這次革命的結果，一定要大不相同——那時的孟雪維克所依據的，是一種傳統的理論——這由列寧和布爾雪維克們形容起來，乃是孟雪維克的「*Strachan*」(打算)——照這理論說來，俄國的革命，應該是中產階級的，至於無產階級，在整個的組織中，只起着「極端左傾的反抗」的任務罷了。上述的種種限制和曲解，發生在應該完全投身於事變，而且把理論化成能够刺激勞動階級的感情和口號的時候，結果就使一九〇五年的偉大的起事中途流產(至少，這是流產的原因之一)。有許多「合法的」馬克斯主義者，還盡了許多文字上的辛勞，想叫勞動階級去完成中產階級的革命呢。

有個拉丁詩人曾說，誰若開頭做一件事，他就已成功了一半。和這相反，我們可以同樣確切地說道：誰若只做了一半，就等於沒有做。多半以來繼續不斷的民衆的大運動告訴我們：無論何時，無論何地，無產階級倘若不把全部掌握在自己手裡，那就一無所得。

可怕的報復的逆流。虐殺發生於各處，而且不斷地擴大又擴大。我們只要舉出一端就够：一九〇五年到一九〇九年這幾年中間，俄國每年的政治犯的數目，竟由八五、〇〇〇人增到二〇〇、〇〇〇人。所謂政治的屠殺，由於「黑色團」的流血的劫掠而更加嚴重起來。——這「黑色團」是俄國民衆協會(這是一種極端專制主義者的組織)的分支，它的構成者，是一大羣戴黑面具的白黨黨人，搗搗是非者和盜匪。

和一九〇五年革命之後的曾經過激的野蠻的壓迫同時，人們看見在反動的俄羅斯的最高層，扮演起德謨克拉西的滑稽戲來。立憲的模樣，議會的外表，自由主義的幻影；近代史提供了這些大幅的形象給我們看（它還在提供着）。

沙皇，曾廢而風靈，是皇后的奴隸（皇后這人，最憎恨別人的自由，她想完全把神聖俄羅斯裡面的自由消滅）。是教士和巫師們的玩具，但當他清醒的時候，却很榮耀：「一個人都不准脫放」！「誰都不許向我求饒」！——在一九〇五年之後，這個將俄國的人民監禁，絞死，鎗斃的兇手，會遺囑宣言。此外，他又是對日宣戰的負責人，爲了他的在滿洲的一擄可以獲利的生意。

沙皇的左右和下面，是內閣；那班大臣們，盡心竭力的只要把工人們弄得盡如庖豕；要叫民眾都去吸煙；要扼得無產階級透不出氣；要把農民有陷於比農奴制度廢除以前更惡劣的狀態；他們保護那些克里姆林宮貴婦人們所賞賜的妖人（*Thaumaturge*）的下作的陰謀；他們放任官吏們的無所不至的荒唐的舞弊，他們縱容那些醉心於專制主義而組織「黑色團」的兇徒們的罪惡，他們布置「坡格陸」虐死猶太人的運動（這是比別的一切更盛大的一種事業）。

那時有着好幾個灰色的，非常薄弱的立憲政黨，如「十月黨」「立憲民主黨」之類；他們的政綱裡所謂「民主」，是反對社會主義的，只在白黨的眼中，他們是帶點粉紅色的。他們十分耐煩十分恭敬地等候着，希望一種中產階級的革命，會把內閣閣員的名額分配給他們*。

當一九〇五年的起事失敗之後，布爾雪維克社會主義者的組織，沉着地繼續發展着。只有他

們不會失去主意，因為他們不會失去信仰「他們注意於將來的羣衆運動」。

一九〇六年，在斯托克霍爾姆開黨大會，斯大林用了伊凡諾夫的名字，作爲提夫里士方面的布爾雪維克分子的代表而出席。

在這次大會上，列寧發動了對於孟雪維克的鬥爭。孟雪維克的精銳的部隊，全部出馬；普列哈諾夫，阿克塞洛特，馬爾托夫。列寧憑着他的倔強的挑戰的，壓倒的明辯，一一擊破了他們的論調。

列寧完全不是一般的所謂雄辯家。他正是一個說話的人。除了在某幾種時候（特別是十月革命的「那時候」），或者爲了要激起羣衆的直接衝動，或者爲了非在強大的人羣之前表示自己的奮激不可，此外，列寧在說話的時候，大抵不做手勢。在會議場上，人們竟會覺得他說話太簡單，甚至於太「枯燥」。他只要「說得」它的聽衆心服，他只是設法從內心把他的信念灌輸給別人，而不從外表入手，他完全憑着內容的力量，而不靠裝腔作勢。因此我們可以說，有些人所想像的列寧的種種雄辯家的姿勢，其實是不大對的，他的動作從來不多，好像他的雕像那樣。

* 不過關於那個週一點兒任務都沒有機會實踐，在反動和十月革命中間，實已被構成扁平的立憲民主黨，我們有一點應該注意，就是該黨的領袖們雖是布爾雪維克的不共戴天的敵人，但是他們還在歐洲大陸以前，早就宣言：如果西方式的立憲政體代替了沙皇政權，那麼對於一九〇五年以後沙皇政府所舉的外債，新政府概不認賬，「因爲沙皇所借的外債，是用以壓迫民衆的。」一九〇六年，當俄國政府籌辦恐慌政策的時候，國庫十分空虛。後來全靠法國的借款來充實，路維埃他本來是個像兒內閣的這類舉動，使得壓迫的工作又更厚地恢復過來——連俄國的最溫和的分子也承認這是事實。——原註

列寧所採取的簡單而飽滿的演說態度，斯大林也天生的具備着，而且他從來不會放棄它。

他又不希望做一個講演台的柱石，也不願學慕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樣，「唔嗎叱呢」；他也不會模仿律師們的把戲，像亞歷山特洛夫那樣，善於刺激聽眾的眼球，耳鼓和淚腺；也不會作甘地那樣的禿羊的叫聲。他從來就比列寧說話更為簡潔，至今不變。對於革命作出過力的勞拉非瑪，戈普耐會說，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她是怎樣被斯大林的關於彼得堡蘇維埃活動的演說所感動。（在那個蘇維埃裡面，只有他是布爾雪維克分子。）那是「一場極其簡短而包括一切的演說」；一切情形都被說明着，人們不能刪掉或改動它一個字。同樣地，奧拉開泰徐維里也證明道：「在斯大林的演說裏，真是一滴水都不動的。」

雖然他用了一種含糊糊糊的聲音，「在牙齒縫裡」說話，也不做手勢，單是把心裡的想頭表示出來就算，但是，斯大林也和列寧一樣，却以事後印了出來的演說辭的本質，控制人們，說服人們，顛倒人們。在他那些印刷本中，對於讀者，保存着內容的豐厚和組織的邏輯。一九三三年的年終，斯大林所發表的關於「五年計劃的總清算」的，那充滿着希望，和預言的演說辭，實為一種文學的傑作。

……然而，在斯托克霍爾姆的這次大會上，却是孟雪維克佔着多數。大部分的會員中，公然敵人多於旁聽者。所以布爾雪維克終於失敗了。那時候，便怎麼好呢？……

「……我第一次的看到列寧的成了失敗者的態度。但是他並不氣餒，他想着未來的勝利。許多的布爾雪維克，却不免有點垂頭喪氣了。列寧激勵他們道：『同志們，不要傷心流淚，我們將

來一定會勝利的，因為我們是合理的。」對於哭泣的智識分子的輕視，對於我們的力量把握，對於將來的勝利的確信：這些都是列寧那時候用以鼓舞我們的。於是大家都感到布爾雪維克的失敗只是暫時的，將來一定會獲得勝利……。」

第二年（一九〇七），斯大林到柏林去，勾留了幾時，爲的是與列寧晤談。

也是在一九〇七年，黨的大會重新在倫敦舉行。這一次，布爾雪維克畢竟勝利了。於是：

「……我第一次的看到列寧的成了勝利者的態度。但是他跟那些因勝利而沾沾自喜的領袖們不一樣。勝利只是使他變得更加小心謹慎。他對我們這班圍在他的左右的代表說：『第一，不要謳歌勝利；第二，要趕快消滅敵人，他們現在只是被打倒罷了，這不會殲滅呢！』對於有些輕浮地談着：『從此以後，孟雪維克就完結了』的代表們，他加以嚴厲的諷刺。」

在沒有達到最後目的以前，人們不應該驕矜，倘若目的已經達到，那麼又用不到驕矜了。

「不要因失敗而傷心……」「不要因勝利而謳歌……」列寧所說的這些偉大的格言，從斯大林身上得到很大的反響，他在許多要緊的情勢中，屢次引用它們。這些格言，適用於現代社會主義的廣大的發展上，適用於爲創造一種全新的文明而作的最後的鬥爭上；然而它們並不使人覺得是古代最嚴正的道德家的苛禱的鎮靜，並不使人覺得是希臘羅馬的斯多噶派的（沒有基礎的！）最高的境界；它們也不像是一個埃比克塔特（Epictete——一世紀時的羅馬哲學家，也是斯多噶派的）或馬克·奧察爾（Marc-Aurèle——二世紀時的羅馬皇帝，也是斯多噶派的哲學家。）所說的那種嚴酷無情的言語！

一九〇七年的年底，從倫敦的大會回來之後，斯大林住在巴庫。他發行巴庫無產黨報。（一九〇七年中，他已經在提夫里士辦着 *Dei*——時報）在兩個月中間，他把巴庫的社會民主黨的分子，多半引導到布爾雪維克的陣營裡去。

也在這一年，像和列寧，對奧佐夫派（*Ozovistes*）起了一場激烈的鬥爭。這極左的一派，主張那些參加議會（*Duma*）的革命的議員，應該由黨召回。錯誤！——列寧和斯大林說：這個幼稚的組織，無論它怎樣腐敗，好的分子總應該儘可能的留在裏面，以便建立新的關係和新的宣傳的出口。（這事證明着：布爾雪維克的政策雖然強硬，但是他們很知道永遠不可越出實事求是的意義的範圍，而且，在無論怎樣情形之下，他們容認合法手段的運用。）後來，爲了去見列寧，他又去過外國。後來，他又被公安局捉住過一次，但是他又逃脫了。後來，他和列寧，又跟主張「神性的教化」的人們起過鬥爭，這一派的創導者波格達諾夫優待的辯護者盧那卡爾斯基和高爾基，都想根據了社會主義而創造出一種宗教來，爲的是使社會主義能够更加普及於民衆。但是，那種把營意和利己的要求劃分得非常清楚的明確的理論（社會主義），要給它一個神祕而人造的基礎，那是不嚴肅而且不堅固的。

此後的幾年，情形依然一樣。艱苦地，英雄地，又確實地，這個不折不扣的指正者，吸收了許多信仰者到黨裡去，到了一九一〇年，斯大林又被捕了。

一九〇九年到一九一一這幾年，對於分散在帝國之內的革命勢力，是一個苦難的時代；被捕的時代，失望的時代，簡直是恐怖的時代，俄國社會民主黨，在反革命勢力的不斷的打擊之下，

失去了信仰。知識分子退縮了，不少的工人也這樣。漸漸的，不但孟雪維克分子，連許多布爾雪維克分子也考慮起試作合法活動的種種方法來。「取消」秘密活動的這傾向，竟發展到想要組織一個合法的，甚至於官辦的自由黨。這種傾向是必至陷於自殺的：引了柏拉圖派的毒麗的格言來說，就是：「爲了生存而放棄生活的意義。」列寧堅決地激烈地反對這種墮落，斯大林站在他的那邊。在這種傳染病的時代，人們簡直有對整個世界鬥爭的必要。然而到了後來，列寧終於勝利了，「因爲他是合理的。」

一九一一年，斯大林憑着他自己的手段，又脫離了監獄，住在聖彼得堡，後來又被捉住了，流放到伏羅格達，但不久又脫逃，而回到鬥爭中去。他又到聖彼得堡，在那里展開非常緊張的活動，不斷的參加秘密的和半秘密的鬥爭，對這對那，——對孟雪維克（特別是托洛茨基），對無政府主義的工團主義者（Anarcho-Syndicalistes）。

一九一二年初，在普拉格舉行的大會，斯大林沒有出席。這次大會，在社會運動史上，留下一個紀念的日子：在列寧的影響之下，孟雪維克和布爾雪維克是決定地分裂了。那時列寧已經脫離了社會民主黨而組織一個純粹的布爾雪維克黨。斯大林雖然沒有到會，却當選爲新黨的中央執行委員。

人們到處可以看到他。斯大林巡察俄國各區的黨的組織，發行 *Zvezda*（星報），他也是 *Pravda*（真理報）的創辦人之。他又被逮捕，重新被放逐，但也重新從守兵和警察的鬍子底下逃了出來。這年秋天，他到國外去，和列寧商談。在克拉珂維亞（Cracovia 波蘭的一個城市）的布

爾雲維克黨大會上，人們見他出席，聽到他的演說（一九一二年末）。

這時候，正當俄國的外交家，在外交政策和和法國的外交家進行着陰謀，并且和法國外交家交換着這樣的外交文件：自公布之日起——在歷史的毫無掩飾的光亮中——把世界大戰的大部分責任，由俄法同盟來擔負。所謂俄法同盟，就是君士坦丁堡和海峽，亞爾薩斯——勞倫（報仇和鐵礦，伊斯特爾斯基和模恩朝雷）。這個「伊斯特爾斯基流氓」，如若萊（Reber）所說那樣的，這個伊斯特爾斯基流氓（此公的看人，跟若萊一樣的清楚），他用了魔術似的說服手段，突然改變了報紙和新聞記者的輿論，尤其是時報（*Times*）和泰迪歐先生。

也在這時候，發生了一個新的「革命的衝動」，這次運動，對於大眾，明白地預告了一種將要被遠卑污的專制制度的偉大的起事，原來在西伯利亞發生了列那（*Lenin*）的屠殺事件，在這事件中，軍警向罷工者的代表和羣衆開槍，殺死了五百多人（一九一二年），這引起極大的憤慨，馬上發生了怒吼的先聲。

那些真正的革命者，在他們的鬥爭的立場上，盡着最大的努力，要創造一個純粹的黨，——這黨是堅強的，有效地革命的，是實能改革政治和社會基礎的，而爲人類造福的，是能够代替那非毀滅不可的，敗北主義的孟雲維克主義的。他們要在許多錯綜紛紜的傾向中間，堅持一條正確的路線——這時，「取消派」主張取消革命的手段，而投入合法的活動；有一種人，走向另一極端，對於利用某種合法條件的可能性這問題，極感不安；另有一種「以妥協的外衣，掩飾自己」的人，鼓吹無條件的統一，主張各種互相矛盾的勢力，聯合地進行，連常識都不顧。（這是托洛

茨基的立場)——主張複雜已極。

列寧和斯大林則主張同時儘量地採用一切非法的和合法的手段。他們反對那種虛偽的統一後退的奸計，但是他們却爲了真正的統一，爲了黨的進取的一致而奮鬥着。

我們在現在，像看地圖一般的看着過去的歷史，那自然很容易斷定列寧和斯大林他們的主張是合理的。但是，我又要說了，那些被捲入在某一時代的浪潮裡面的人物，若要把那個時代支配得像日後的樣子，算得到一切結果，明見未來的情形，那是需要一種極強的現實主義的才能的 (Cf. First Course de Leninism)。在這種地方，「明見」就是「創造」。

列寧對於斯大林所寫的意見，極其重視。一九一二年時，他這樣表示道：「珂比的論文是最值得注意的。對於我們的和平主義者和妥協主義者們的意見和希望，要想出一種最好的駁論來，本是一件難事。」

列寧又說道：「托洛茨基和他的同流，比一切坦白地表示自己的思想的，——『取消派』更來得下流——然而，托洛茨基先生們欺騙工人，掩飾自己的毛病，使它不被別人看出，並且變得很遲不可救治。凡有支持托洛茨基派的人們，都是支持那種欺騙工人的政策，支持那種靠掩飾『取消主義』而存在的政黨的。」

許久以來——更正確地，應該說是「向來如此」——斯大林早已沒有私生活，他沒有護照，永遠化裝着，每天要換一個住所。但是他所幹的在非法狀態中鞏固布爾塞維克黨的工作，却離也不能加以阻止……，應該建立幹部，組織中央執行委員會，使能在已經開始的革命衝動中，去組

織大眾，領導大眾。」（劄維寧語）

斯大林的另一樁心事是各民族的社会主義政策問題。這是一個與蘇維埃的理想實現關係極大的重要問題。對於這個問題，他在一九二二年寫了一批有決定的影響的研究論文，後來集成專書，名叫「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關於這個，我們後面還要說到。

Pravda（真理報）被封閉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替它取了一個大膽的假名為「真理」，而重新出版。這個報又被封閉了；但接着又出版：在「真理之路」的名稱之下。

這之後，斯大林又被捕獲了。那是一九一三年的七月，人們把這位「可怕的維沙里諾微支」帶到西伯利亞的都魯康斯克區去。這位仁兄是屢次攻取了伏羅格達，奈里姆和別的地方的看守人，具着從警察的手裡脫逃的天才的。這一回，人們防範得非常嚴緊了。他們帶到離北極二十基羅米突的地方，在一個叫做庫萊卡的村子中；那地方，只有兩三間屋子，而且也只有兩三個月沒有雪。「他只好像魯濱遜一般的生活在冰天雪地中」——末末啞茨甚告訴我們道。他製造了許多漁獵的工具，從網罟之類起，直到漁叉和碎冰的斧頭。他整天地打漁行獵，砍樹生火燒飯。整天地……但是，在那小屋的粗木桌上，在專管偵察犯人的守卒的探究而愚蠢的眼光之下，他的討論一切大問題的文稿，也一張一張的堆積起來。

他在西伯利亞被禁到一九一七年。這時的地平線上，那黑暗的一邊，呈現着世界大戰，那光明的方面，則是第二次的俄國革命。

以上是我們所接觸的他的生活的第一個時代。誰若去問問一個公正的裁判人看，例如，向卡

加諾薇支那樣的一個人，問他對於「這一時候的斯大林的生活的特點，可不用一句話來評定」，那麼，他就會用了熱情橫溢的聲言答道：「這是一個老布爾雪維克的典型！」接着他又說道：「斯大林的政治活動的最出衆最特別的地方，是他從不和列寧相參差，從不忽左忽右的擅離。」那個在領導匈牙利的布爾雪維克革命而獲勝之後，却因社會民主黨的叛變（這是主要的原因）和歐洲帝國主義的武力進攻而被迫屈服的倍拉·鏗——那個在列寧的生前死後都和斯大林有密切的工作關係的倍拉·鏗，他也說過同樣的話，此外，比雅特尼斯基，馬努伊爾斯基，克諾林等也都同樣地說過。奧爾佐尼基支也說過：「在這反動的數年中，當俄國的布爾雪維克組織建立形成之際，斯大林是列寧的忠實信徒，那時托洛茨基却對列寧和黨猛烈地攻擊着，他叫列寧是『分離者』，他辱罵那些採用非法手段的布爾雪維克，而且躍武揚威地質問，爲什麼布爾雪維克黨的機關報可以叫做真理。」

世界的大屠殺由那時的當權者決定了。俄羅斯的民衆爲了海上的大英帝國，英國的民衆爲了銅鐵委員會，法國的民衆爲了君士坦丁堡，而且各各爲了對付敵人，而進行這大屠殺了。

一九一四年八月的事實，證實了布爾雪維克的理解，那國際的社會民主黨，果然，由大多數決定，擁護國家，而且晉成起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及民族的帝國主義者的神聖同盟來了。這是犧牲和劍子手們的爲了劍子手的利益而組織的同盟！（如李卜克內希所說：『是狼羣和羊羣的同盟！』倘若不是無恥的人，那是不能同時成爲國際主義者和國家主義者的，這種樣子的妥協，無非表示

第二國際的道德的墮落而已。

大戰爆發的時候，列寧和齊諾維夫是在加利亞(Gallien)。他們回到瑞士，創設俄國布爾雪維克黨的機關報社會民主報，又發表一批論文，這是在「反對現勢」(Contre le Courant)這題目下結集出版的。這一小羣布爾雪維克，處置在一隻木筏之上，當着歐洲的狂亂的愛國主義的打擊，冒着風濤之險，嚴正地指示出正義和真理是在那一邊。奮然而起，反對世界的現勢的，原只是少數。有良心的人——比起全人類來，是並不多的。然而這些把握着一種堅強的主義的人們，却終於打破了他們的逆境，因為「他們是合理的」。到了相當的時代，「歷史」會得做裁判人，那時我們會得看見，歷史對於那些需要這種主義的人將怎麼說，對於不需要這種主義的人又將怎麼說。

從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一日的創刊號起，社會民主報就把勒諾台爾、蔡台肯、哈斯、考茨基和普列哈諾夫等當作「耶之益而攻擊，布爾雪維克的不妥協性的重要，在這里表現着。這是宗派主義麼？迷信主義者的鳴高立異麼？恰恰相反，這確實是一種偉大的常識。在事實上，普列哈諾夫、考茨基和朱爾·蓋斯特等是放棄了無產階級的立場，而溜到布爾喬亞的陣營裡去了。(國家主義乃是一切變節的社會主義者所經過的路)在事實上，是那些戰鬥的使徒們所拚命地保持的堅強的不屈性，挽救了俄國的革命了。一切事情都證明着這話。假如沒有他們，俄國革命一定會像德國和奧國的革命那樣的歸於失敗的。而且在事實上，要阻止這個世界的戰爭，只有使整個社會到好的方面去的一法，沒有別的辦法。

當我們追求一種目的的時候，必須研究種種手段——比這樣教訓我們的法則更高的道德法則是沒有的了。

列寧這個不犯過失的超道德者 (Super-moralist)，他起來反對這些懷着祖國觀念——還是有破壞性的觀念——的道德家，因為那時的這種祖國觀念，只是單純的地理崇拜。(當這種觀念在整個民族裡面有了高度的進化時，那就不同了。)他又說：「第二國際已經死了，它是被機會主義所破壞的，我們要打倒機會主義，而擁護那個不想擺脫了背黨者，而且也擺脫了機會主義者的第三國際！」

這是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一日所寫的。而第三國際全副武裝地實現在列寧的頭腦外面，則是四年半以後的事。

從一九一四年起，當布爾雪維克們在彼得格勒對政府的反動作戰，對孟雪維克和別的敵人作戰的時候，當議會裡面的布爾雪維克份子被放逐到西伯利亞去的時候，列寧是在歐洲鬥爭着。一九一五年，在齊美爾華德 (Zimmerwald) 的理想主義者大會 (Congress Idealists) 上，他強調地提出三個關於戰爭的帝國主義性和一九一四年的社會主義的破產的動議。一九一六年，在基恩塔耳 (Kiental) 大會上，他在會場的混雜的議論中間，又特別強調這種情勢。

在這些可紀念的機會當中，有許多本來態度灰色的社會主義者，倒恢復了一種布爾喬亞的純潔。另外一種人，則取着更英雄的態度：能在羣崩的時候不失其鎮靜，能够繼續把行動去配合理想。這兩種人的差異，只在於前者是出於道德的正直，後者却基於認識的切實。有一個字，却可

以說明雙方，那就是「良心」。「良心」，在我們的解釋上是一切人的心象（Image de soi-même）。

一九一七年二月，俄國中等階級的運命發生，沙皇退位，里伏夫，大會和克倫斯基的政府成立。

列寧從瑞士經德國而回國。法國政府不許他從另一條路通過（我們知道「關防火車」的故事和這個荒唐的傳說中的其餘的一切事情）。他是一九一七年四月三日到達彼得格勒的。從相反的方向，斯大林也同時回來了。在全俄布爾雪維克大會之後，他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這次大會中，舊有的兩種矛盾的勢力又復出現，斯大林擁護列寧的陣線，反對加勉納夫和別的人們的機會主義。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政治部也成立了。斯大林又被選在內。

對於那些要正直地進行的人們，對於那些真正的純潔的要把將來改好的人們，情勢反而嚴重起來，——這是因為沙皇制度的破壞，使許多革命者覺得已經光榮地滿足了希望緣故。

革命就可以停止在這地步麼？被那班痛苦而憤怒的羣衆送進克里姆林宮的卑劣庸懦的傢伙，不會把革命出賣麼？依照自古以來，沒有例外（有之除非一八七一年的曇花一現的巴黎公社），世界各處（在有人住的一百三十億公頃的地面上）猝然發生的種種民衆暴動的結果看來，這種形實在是很多危機的。

許多的人們，只要在那破壞的歷史的舊貨上面罩上一頂花冠，只要把一個自稱民主的中等階級政府去代替彼得大帝的子孫的世襲的獨裁，只要讓兩三個口頭上是民主，事實上是反民主的政

黨輪流去統治，只要把皇帝換做大總統，御座換做靠手椅子——這樣就夠，不希望把局面更推進了。在這種情形之下，除了勳章的取消，國旗和郵票的改樣，以及編年史的頭幾頁上，換了一個壓迫民衆的人，此外就沒有別的。至於所謂無產階級獨裁，同樣連那社會的正義——都一直沉沒到這種共和的混合物裏去了。而那種內戰和人剝削人的制度，依然完全地保存着。對於民衆，發生了新的欺騙，新的政治罪惡。

斯大林非常明白地指示着道：「布爾喬亞革命的主要的工作，只在於取得政權，而使這政權適應現存的布爾喬亞經濟制度，至於無產階級革命的主要的工作，則是在取得政權之後，建立一個新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

換句話說，布爾喬亞革命是保守的。一種只做了一半的革命，其實就是反革命。因此之故，在那些斃命流血而佈置了一個「偉大的前夜」的人們看來，實際的情勢是那樣的可悲，因此，他們的義務也就顯然，就是從此發動第二次的革命，毀滅布爾喬亞革命的毒害。

列寧「這個被種種困難鍛鍊成爲力量的巨大的人」（斯大林語），就擔任了這種極其合理極其緊要的工作。他建立一種會被人們叫做「變重政權」(L'industrie du Pouvoir)的組織：存在於國家裏面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是在官樣的政府的旁邊，另外組織一個清一色的政府，這政府是以彼得格勒的蘇維埃爲中心，它作用着，鞏固着，預備變成一個唯一的政府。勞動大眾漸漸公開地歡迎起這個存在於官樣政府旁邊的政府來了。

斯大林竭力支持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八月的第六次（非法的）黨大會上，斯大林做了一個政

治報告。他猛烈的拒絕托洛茨基所授意，普萊勃拉索斯基所提出的一點修正——那是加於他的政治分析的第九點上的——據他們的意思，社會主義政府的建立，有待於西方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的爆發。（這個「一國獨自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是黨內的多數派和反對派爭執最激烈的許多問題之一——直到最近還在爭論着）斯大林願意把他的整個命運交給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爲什麼不可以由俄國開例呢？」列寧和斯大林預先看清了他們所相信的事情。普萊勃拉索斯基的修正沒有被接受。當日如果接受了這個，那末今日的一切局面，就要大不相同了。

「在十月的前夜」加里寧告訴我們道：「斯大林是跟列寧在一起，瞞着頓諾維夫和加勉納夫（那時他們也是中央委員）而決定起事的少數人之一。」

季諾維埃夫和加勉納夫是不贊成起事的。「在那時候」，斯大林說：「他們公然宣言，如果發動了革命，我們必致自取滅亡，他們以爲應該屬望於立法會議；他們以爲實現社會主義的必要條件尚未成熟，而且一時也不會成熟……季諾維埃夫和加勉納夫是受着棍子的威脅，這棍子參加革命的；列寧用了棍子趕他們去……他們勉強追隨着革命……托洛茨基是自願地參加的，但是那時他也有着一種與季諾維埃夫和加勉納夫們差不多的願慮……他說，在西歐的革命沒有爆發沒有成功以前，一個革命的俄羅斯是抵抗不過整個保守的歐洲的；他又說，誰若懷疑這種托洛茨基式的主張，那就是贊成那種狹隘的國家觀念。」

「然而，」斯大林又說：「除這三個人以外，列寧和黨，却毫無顧慮地進行了。」

季諾維埃夫和加勉納夫的不守紀律的反對行爲，有加無已，甚至於在一個報紙的論文上公然

攻擊起事的決定——這決定，本來當然是秘密的。這種出賣的行爲，使克倫斯基得以在事前佈置武裝的警備。列寧把季諾維埃夫和加勉納夫看做「奸細」，主張把他們排除在黨外。後來，這兩個人終於離開了中央委員會。

在十月的期間中，中央委員任命斯大林爲五人委員會（這是負責指導革命的政治工作的）和七人委員會（這是負責指導革命的組織的）的委員。

無產階級的革命，是在十月二十五日（公歷的十一月七日）那一天發生了。

列寧對於這一次歷史上的壯大的暴風雨，給了決定的推動，在這事的開頭，人們就最先看見他的偉大的手的指揮。在十月二十四日——即十一月六日——即那偉大的日子的前一天，他寫信給中央委員會道：革命的時機已到，應該趕快發動了，「起事的延緩，實在等於尋死……一切事情都像懸千鈞於一髮……」一切繫於一個問題：就是民衆，武裝的羣衆。……不該讓克倫斯基和他的同黨把政權竊據到明天以後，不管他們的情形怎樣，方式怎樣。……這件事情，在今天黃昏或夜晚，絕對地就得決定……」

能在這個時候，敢行無產階級革命的人，是需要一種非常清明的遠見的。當工人、農民、兵士們忍耐不下去，正在粗暴地要求和平的時候，這事實在冒着直接干涉的危險；當布爾喬亞的幹部正在預備軍事獨裁，克倫斯基開始要陷布爾喬亞維克黨於非法的時候，這事好像是作孤注一擲。這是「黑暗中的躍躍」。不過，在這裡面，我們看不出憔悴的企圖和絕望的努力。在「黑暗中」麼？對於列寧那樣能够在世界的混沌之中看出光明，而且能够辨別什麼是「合理的」的人，是不

能這樣說的。

到後來，當得了自由的人類，慶祝他們的獲得自由的各個階段時，爲他們所最慶祝最熱烈地紀念的日子，就是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十一月七日）——這個把喜劇的革命突然變成真實的革命的日期。他們也最崇拜那環創造這個日期的人們。

十月革命，那革命以上的革命（Sur-revolution）是成功了。

十月革命，在直接的和平（這是第一個該實行的條件，混亂狀態中的第一次的掃除）之後，就宣佈了全部政權歸於蘇維埃，這就是無產階級的獨裁，由這地各部分人所造成的權力，人的政權。十月革命宣佈了布爾喬亞政權的從頭到底的毀滅，不但純粹地，單一地而且永遠地用那向來被壓迫剝削的階級的政權去代替它，并且要由唯一有效的手段（無產階級干政的手段）來組織一種完全一致的社會秩序，最後，還要建立一個真正人人勞動的社會，一個無階級，無壓迫，無剝削的完全合作的社會，一個不可分割而能合理地包括人人的人的集體。一向包圍着全世界的資本主義陣線，如今在佔着大陸面積的六分之一的廣大的地面上完全失陷了。

一種立場堅固，不失其純粹的革命精神的無瑕的社會主義，輝煌在克里姆林宮中，馬上，另外一種社會主義——那種中庸的，詭計的，幻想的社會主義，那種以部分的逐步的進步自蒙，而讓布爾喬亞政權乘機混入，取得一切，一旦毛羽豐滿就要反對大眾的社會主義——被和那些舊的月亮（舊的迷信），舊的鬚髯（舊的謬說）一同淘汰成爲過去的東西了。

約翰·里特（John Reed）在他那「震撼世界的十日」一書裏所記載的這次事變的情形，是

合乎現實的，他的描寫之逼真，簡直是一幅驚人的圖畫：議會裡面的社會民主黨的要人們循着他們的牧師式的長鬚，慌慌張張的像一個從化學實驗室滾出來的煉丹師，走到彼得格勒的大街上，爲的是想處置革命的動亂，在中途被一站崗兵所攔住了，「朋友，我是議會裡的議員呢。」「我可不知道，我們已經把這些東西掃蕩光了。」——那個簡單的兵士這樣答道，他依舊攔住這班接着沙皇而失位的社會民主黨老爺。這班想不到自己會失勢的可憐的老爺們，到了第二天，竟發覺他們的情形，竟和那個長睡了一百年之後回到家裡的李迪（Lid）歐文所著李迪大夢中的主人翁）一樣了。但是睡在夢中的人們遠不及覺醒的大衆那樣的多。人類歷史上的全新的局面展開了。遠自這個世界成爲世界以來，人們從不曾看見過這樣的局面。

但在這時候，一個充滿了可怕的困難和無名的阻礙的新時代也開始了。

好在「列寧真正是個革命運動的天才」，斯大林告訴我們道：「在急促的轉變中，他能夠料

到各階級的運動的方向和革命的必由之路，真是瞭如指掌那樣。」

應該開始建設起來，不過，首先還得保持住已有的勢力，——要抵抗白黨，抵抗那些把病態的傾向傳染到黨裡面的孟雪羅克，抵抗那些被斯大林叫做歐斯迷里諾者的人們，就是社會革命黨和無政府黨，（斯比里陀夫那曾在一次集會上拔出了手槍威脅列寧，但列寧毫不爲動，而且泰然的大笑……那些無政府主義者，只有一句大得不着邊際的口號：「沒有上帝，也沒有君主，」他們老是昏頭昏腦地一加一的呆板地算着，他們有一天會得對字母表宣戰呢。）……而且抵抗列強和內奸，抵抗破壞和飢荒，抵抗經濟的崩潰和財政的恐慌。

應該解決帝國主義的戰爭問題以及各民族的問題——有許多民族，迫切地痛心於沙皇的壓迫，一旦看到了自由，就各爲自己打算，威脅着要完全脫離。

於是，對德對奧的和議實現了，這事情，在起初，曾經逼着一次悲劇的地決定的變化，這也給人以「黑暗中的跳躍」的錯亂印象。斯大林也參與這事。人民委員會希望和德國方面去談判停戰協定，因而就主張先停止軍事行動，他們把這樣的訓令交給總司令杜康寧將軍。

「……我記得那一天列寧，克里連珂（後來的總司令）和我三人，我們打緊急電話到彼得格勒的參謀部，和杜康寧將軍談判。這時候可怕極了……杜康寧和他的參謀們無條件地拒絕執行人民委員會的命令。部下的軍官，都是舉在參謀部的手裏面的。兵士們呢？我們都不知道這班服從那些反抗蘇維埃政權的組織的軍隊的意思如何。我們知道一個地主貴族的暴動正在彼得格勒醞釀着。而且，克倫斯基也正在進攻首都……我還記得，電話機前面沉默了一會兒之後，列寧的臉上忽然亮起一種我所形容不出的異常的光輝來。顯然，他心裏已經決定主意了。『我們到無線電報局去』，——列寧說：——它對於我們有用處；我們下特別命令，罷免杜康寧將軍的職權，我們委克里連珂代他做總司令，我們直接通告兵士——不經過他們的長官——叫他們逮捕他們的將軍，停止軍事行動，對德奧的軍隊表示親善，由他們親手來實現和平。』

事情就這樣地實現了。

爲求俄德兩國的和平的勃來斯得·李托斯克和議開始了。得勝的布爾喬亞國家，對於這和議所產生的勃來斯得·李托斯克條約大加嘲罵；法國的拉魯斯大辭典上(La Dictionnaire Larousse)

——這是一種偏頗的，排外主義的，反動的，帶點官辦性的，有外交作用的作品——形容這條件是「恥辱的條約」。

這輿論斷是應該澈底檢討的。我們倘把許多事情真切地一考察，那就會得到跟拉魯斯大辭典的編纂者們相反的意見，覺得在這件事情中，一切的恥辱，完全在於那些勝利國家方面，尤其是法國和英國。俄德兩國的和平，只是有點對不住那些背棄宣言，不顧信義的好賊們罷了。

一九一八年，正當進行和平談判的時候，若克·薩杜爾從莫斯科寄給阿爾培·多瑪的許多信件中，完全說明着這件重大的事情的内幕。據協約國在大戰期中大吹大擂地宣傳着的宗旨上說，他們本是主張一種不兼併，不報復的和平——「德謨克拉西的和平」的。在作戰的四年中，每個國家的政府的口頭上，曾以怎樣的慷慨，說過「除了亞爾薩斯——勞倫（這一件例外的事情，是從頭就明白地規定着的）問題之外，協約國的戰爭的目的中，決不包含兼併土地和報復之意」的話啊！無論在前線在後方，那種保證「不圖私利的德謨克拉西的和平」的漂亮話，在我們耳邊不知經過多少回啊——那無非爲了煽動我們去參加戰爭，「打到末了！」罷了！

然而，這一切都只是籠絡和欺騙，那些協約國，其實存着一種野心，要先取一大部分的戰利品，彼此瓜分——這事在幾個月之後果然實現了。而且當那班冒稱文明的大人物們，對羣衆指心立誓，表示得大公無私的時候，實在早已簽訂好瓜分的條約了。在勃萊斯得·李托斯克，俄國和戰勝的列強之所以分裂，原因是這樣的：由於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的布爾雪維克的督促，俄國主張對德成立「德謨克拉西的和平」，而且光明正大地宣佈他們的戰爭的目的，僅列強却加以拒絕——

而且掛出種種的理由。社會主義的俄國不贊成這一種違反世界和平的希望，延長屠殺的慘劇，而且會引起新的戰爭的動機和德國法西斯主義的發展（這個我們在今日已經看到）的背信行爲。那些由勞合·喬治們，機思凱爾們，克雷孟梭們……所代表的大國們，並不因為俄國的提倡和平，而改變他們對它的輕視的態度，這態度，直到他們覺得可以和這巨大的俄國市場通商獲利的時候，方纔——至少在表面上——改變了過來。從從容容的「未來」，會得把這班領導民衆的可敬的大人物們的欺騙行爲暴露無遺的。

完成這和議的，是那復歸於布爾雪維克主義而成爲政府委員的托洛茨基。列寧讚了斯大林的幫忙，從中指導着。有一次，托洛茨基直接打電報向列寧請示，列寧回他這樣一個電報道——「發電的日子是一九一八年二月十五日——」給托洛茨基的覆電。我想先跟斯大林商量一下，然後答覆你的問題。不久，到了二月十八日，列寧直接打電報告訴道：「致托洛茨基。斯大林已經到來。等我們兩人研究情勢之後，再給你一個共同的答覆。列寧。」

當締結勃來斯得條約的時候，斯大林盡了什麼決定的任務，人們是知道得很少的。當時黨裡面的左派的全部，——還有那些在奪取政權時最出力的分子——他們都反對和約的簽字，還有托洛茨基，他死守着他那「沒有和平，也沒有戰爭」的公式，而且以爲必待世界革命成功之後，戰爭方能真正停止，因此他也反對媾和。只有列寧和斯大林兩人主張這種直接的結束。當時列寧還躊躇着不欲利用他個人的權威。還是斯大林使他決定這樣幹的。他們的這場小小的晤談，對於革命的前途，實有非常重大的關係。

的確，在這時期中，「列寧是每天非見到斯大林不可了，」S.比愛斯托夫斯基記着道：「這當然是因為我們在斯摩爾尼的辦公室，恰巧和列寧的辦公室相貼近的緣故。一天之中，有時列寧打電話叫斯大林過去，有時他親自到我們的辦公室來，把斯大林邀到他自己那里去。這樣的，斯大林的每天的時間，大部分在列寧那邊度過……有一天，我到列寧那里去的時候，看到一個很有趣的場面：牆壁上掛着一幅巨大的俄國地圖。地圖前面，有兩隻椅子，椅子上站着列寧和斯大林兩人，他們用手指劃着北邊的一條線……」

到晚上，斯摩爾尼這地方靜了下來，斯大林於是去打他的專用的電話，打了好幾個鐘頭……

第三章 鐵腕

另一個非常緊急的問題又臨到新政府的頭上：內戰。各路武裝的敵人——其中有幾路是受着歐洲各大國的有力的接濟的——圍困了俄國，壓迫它的四境，在好幾處已經侵入。

「有幾個時候，尤其是一九一九年的十月間，這個新共和國竟呈出快要崩潰的樣子。無論是白軍，是波蘭的侵入，是農民的暴動，是飢饉，都不能退讓，而且都被列寧所恢復了，列寧的破碎的戰鬥，竟戰勝了十四個國家。」以上是一個反動的 *Tournai* 馬雷先生在一篇報告中所寫的話，這位先生本是滿心信仰資本主義，而且非常有偏見的。

這里應該表出斯大林的個人的工作來了。

在內戰的前線的無論何處，只要那里有了重大的危險，人們就派斯大林到那里去。

「在一九一八和一九二〇年間，斯大林是唯一的一个被中央委員派來派去地派到最能危害革命的前線上去的人」（加里寧）。

「凡是紅軍退却的地方，凡是反革命勢力大獲成功的時候，凡是騷動和恐怖快要變成毀滅的時候，這地方，這時候總來了斯大林，他整夜的不睡覺，組織着，把領導權握在手裡，攻破着，

堅持着——直至挽回局面，調整形勢爲止」（卡加諾微支）。

最好聽他自己來說：「人們把我改變做一個專門掃除軍政部的馬廐的人」*。

這是斯大林的工作的最驚人的方面之一，也是被人知道得少的方面之一。那兩年中間，他在戰線上所用的手段，所得的成功，也儘够使他成爲一個著名的，爲大眾所崇拜的戰士了。

在這動亂的時期中，這個被卡加諾微支叫做「內戰的勝利的最著名的組織者之一」的人，關於他所做的「軍事工作」，伏羅希洛夫和卡加諾微支曾經供給我們如下的提要。

在兩年中間，斯大林去過察里津的前線，和伏羅希洛夫及米寧一同；去過在卑爾姆的第三軍的前線，和斐爾索斯基一同；去過彼得格勒的前線（對付侵但尼赤的第一次的進攻）；過斯摩棱斯克的西部前線（對付波蘭的侵入）；去過南部前線（對付但尼金）；後來重新去過西部的對波蘭的戰線，在齊托米爾境內；後來重新去過南部前線（對付烏朗格爾）。

比十月革命的人們所處的情況更可怕的情況，我們簡直想像不出了；一九一九年，俄國完全成了一片滿佈着廢墟和死屍的戰場，在這上面，人們還得繼續爲了「政治制度」這戰爭的最高目的而鬥爭。

在莫斯科，正醞釀着社會革命黨的發動。在西部，叛變了慕拉維夫。在烏拉爾，捷克的反革命發展着，強大着。在南端，英國人進迫着巴庫。真是一四面楚歌」。斯大林去到泰里津。在列寧和他之間，不斷地通着電報。斯大林的到察里津，並不是檢閱軍情去的，他的任務是指導俄國

* 這話是關於托洛茨基所領導的軍隊的無秩序的。——原註

南部的供給糧食問題。察里津的形勢有着非常的重要性。因為頓河流域的反動，和察里津的失陷，也就是把北高加索的全部麥田的失陷，不幸的斷送啊。

他到了之後：

「我跟着每個需要我的人跑來跑去，商量一切。我希望最近能够恢復。列寧同志，請你相信，這裏誰也不偷懶，無論是我，或是別個——而且，馬上我們就要送麥子給你。假如我們的軍事專家們（他們是班木頭）不睡覺，不閑散，這裏的戰線本來是不至於失陷的，如果日後戰線得以恢復，那一定不靠他們幫忙，而且全靠他們的不幫忙呢。」

因為斯大林在各處發見了一種令人「不能相信的無秩序」。蘇維埃的組織——工團的和共產黨的——軍隊的組織，這一切都四分五裂，亂七八糟。在各方面，只見那受着佔據烏克蘭的德軍的有力的經濟的哥薩克反革命軍的勢力，可怕地擴大着，白軍逐個逐個的佔領了察里津周圍的地方，完全阻止了莫斯科和彼得格勒所期待的「小麥的囤積」，而且已經直接地威脅着察里津了。

「一見之下，斯大林就知道首先應該把那脆弱的動搖的軍事領導權握在手裡。七月十一日，斯大林打電報給列寧：『事情的棘手實由於北高加索的參謀人員絕對不能與反革命勢力戰鬥之故，——他們把自己看作是參謀部的成員，只是來設計設計的，好像是第三者，是客人，這事先生，絕對不像是幹事的人。』」

斯大林不是一個把話說明了就算的人。應該做的事，他就做！當「加爾寧（在北高加索）前線的軍餉的接濟已被切斷的時候，當整個北俄羅斯的麥田已被切斷的時候，我不相信我可以坐視



斯大林組列寧在十月革命中

A. SURVOROV 作

參謀部的這種麻木的態度而不加過問。我要糾正這種弱點和別的許多部分的弱點。我正在設法，要做到滯免那些失了資格的高官和指揮官——不管明明有多少困難，我總要克服它，因為這是必要的。在這事情上，當然我自己是對於上級的意旨負全部責任的。」

莫斯科答覆道：好，把全部赤色的組織再建立起來：「恢復秩序，集中一切分散的部隊，組織正規的軍隊，任命一個適當的指揮，驅逐所有的違命的人。」（這是共和國的革命軍事會議的電報，這後面註明道：「這個電報是得着列寧的同意而發的。」）

當這個備略的命令，這概括着一種非常重大的工作的三行文字到達察里津的時候，那里的形勢還在增加嚴重：從頓河流域的草原上受德國軍隊的進迫而退走的烏克蘭的紅軍，亂紛紛的到了察里津。

這樣的一種形勢，似乎是萬萬不能恢復的。但是，有一個人的如火如荼的意志，却還要大有所為。他在當地設立了一個革命軍事會議，馬上就着手於正規軍隊的再組織。很快地，軍隊成立起來了，整理就緒了，師、旅、團都編好了。所有的反革命分子都被從參謀部，軍餉處，以及後方的軍事組織之中逐出了——連當地一切的蘇維埃組織和共產黨組織中的這種分子也被逐出了。當地也有着許多堅強的老布爾雪維克，現在都給他們一個正當的地位，重新起用了。這樣一來，局面完全改變了：一切都恢復了秩序，在頓河的反革命的爛瘡疤旁邊，建立起一個清一色的，强有力的赤軍的參謀部來，對付國內和國外的賊寇。

但專情還不會做全呢。整個的城市，這時正佈滿着白黨分子。社會革命黨，恐怖主義者，

以及極端的專制主義者，都在這里閉着會議。（那種自稱爲純粹的革命者的人們，居然和革命的最卑劣的敵人，合作起來——他們拚命的共同打擊革命——這種經常的對所必然的合作，是沒有加以批評之必要的。）

察里津正做着大批逃亡的布爾喬亞的避難所，他們偷偷地和白黨軍官通着聲氣，自鳴得意，他們獨占着人行道，充斥着得道和奇樂隊的公園。察里津是一個公開的陰謀的中心。

但這情形馬上就完結了。斯大林所領導的革命軍事會議設立了一個特別的「奇卡」，專門偵察這些人。當各處的內戰加倍激烈的時候，當國外的敵人非常起勁地四面八方進逼的時候，沒有一天，是不被獲幾個危險的陰謀地過去的。

一個叫做諾梭微支的人——是一個叛徒，本是軍事上的指揮者，後來投到克拉斯諾夫的軍隊裡去——在一種叫做頓河之波的白黨報紙（一九一九年二月三日那一天的）上，記述着這種情形。他也不能不贊成那個「不是有始無終地做事的人」的斯大林，（雖然斯大林的備辦糧食的重大使命却被鄰境的接連發生的許多意外事件所連累而嚴重地失敗了。）他指罵斯大林如何把軍權政權集於一身，如何破壞那些革命的敵人的一切陰謀和詭計。

例如：「在這時候」，這也是諾梭微支說的話：「當地的反革命的組織，力量很大，加以從莫斯科匯來了錢，他們就準備一個暴動，意欲幫助頓河的哥薩克，『解救』察里津……不幸，這個組織的領袖——就是工程師阿列克西甫和他的兩個兒子——對於正確的形勢知道得太少，計劃上有了錯誤，以致組織竟被破壞。阿列克西甫父子和一大批軍官被軍隊槍斃了……」

列寧很擔心左翼社會革命黨的攻擊察里津，他將這意思電告斯大林，斯大林答覆道：「關於那些歇斯迭里病者，請你放心，我們的手並不發抖。對於敵人，我們總是當作敵人一般的對付他們的。」

對於那些乘外敵進攻之際，武裝騷擾，一味謀殺的敵人所取的這些必要的嚴峻手段，在前線的紅軍部隊的精神上，造成很有利的結果。所有軍事上和政治工作上的領袖們，所有的兵士大眾，都開始感覺到，他們現在是被一個具有偉大而正確的思想的頑強的人所指揮着，這個人，對於那班想把舊日的奴隸拉回舊制度裏去的人們，對於那班陰謀陷害那些捍斷了鎖鍊的新的民衆的人們，對於那班懸在白的旗幟、黑的旗幟，甚至紅的旗幟下面想謀殺那些爭得自由的解放者的人們，是毫不寬容的。

斯大林負起責任，但他也需要權力，和一切辦事的人都需要權力一樣。仍然是那個叛徒諾梭微支，他提出了許多證據，告訴我們一件事實：「當托洛茨基對於原來的這個辛辛苦苦地組織成功的軍事指導部的破壞，很覺不放心的時候，他打了一個電報給斯大林，主張必須恢復原來的參謀部和委員會的職權，使他們有工作的可能。斯大林用他的堅強的手，在這電報上面亂劃了幾個字道：『不去管它。』這樣，那電報並沒有被理睬，而原來的砲兵指揮部和一部分的參謀部人員，仍被拘留在察里津的一艘船上」。

而且，爲了實施他的命令和強固布爾雪維克的統制起見，斯大林還親自上戰線去（這是一條長約六百基羅米突的戰線）。這個從未在軍隊中服役過的人，却有一種普遍的組織才能，他能够

理解，而且解決一切最複雜最艱深的技術問題（特別是在那時候，天天危險惡劣起來的形勢，使那些問題也天天愈加複雜）。

「回想起來，彷彿剛是今天的事情，」卡加諾維支說：「一九一八年的八月初頭，克拉斯諾夫的哥薩克部隊攻擊察里津，想以包圍之勢，把紅軍逼退到伏爾加河邊。在許多天之內，由頓納支的許多工人所形成的一個共產黨團領導着紅軍，以一種異常的努力，抵抗那些組織完密的哥薩克進攻。這些日子，是非常艱苦的。但是我們看看這時候的斯大林罷，他照常十分鎮靜，浸在他的思索裡，真是一夜到天亮不睡覺，他把他的不會疲倦的工作分配在戰地上和參謀部裡。前線形勢幾乎令人絕望了。由費支卡魯洛夫，馬蒙托夫和別的人們所率領的克拉斯諾夫的軍隊，步步逼我們的精疲力盡的部隊，使我們受到很大的損失。敵人的戰線，以馬蹄鐵（U）的形勢，把左右兩翼截住伏爾加河邊，天天繼續緊逼。我們簡直連出路都沒有了。但斯大林不慌不忙。他只有一個想頭：非戰勝不可。斯大林的這種百折不撓的意志，感染了他的直接部下，所以雖在一種似乎沒有出路的形勢中，大家都不失去勝利的自信。

「我們終於戰勝了。潰敗的敵人，被驅逐到頓河以外。」

同樣險惡的形勢，同樣的戰績，在東部前線上，在卑爾姆。

一九一八年的年底，這條戰線在敵人可怕的威脅之下，幾乎要失陷了。

第三軍敗退了，被迫放棄了卑爾姆。在那取半圓形之勢而進攻的敵人的衝擊和追擊之下，這第三軍是完全潰滅了。這以前的充滿了不斷的戰爭的六個月中的情形，是十分傷心的：後援斷

絕，狼餉缺乏（第二十九師，在整整的五天中，沒有分到一片麵包）。處在華氏零下三十一度的寒冷中，四周是絕對難行的路，戰線延得非常之長；達四百基羅米突以上，又有着一個毫無主意的參謀，「第三軍是陷在不能抗敵的境況中了。」

此外，許多沙皇舊的軍官，又成羣的叛變，還有整隊整隊的兵士，因不滿於他們的無能而放蕩的長官，紛紛的去投降敵人。

於是，只得敗退了；二十天之內退却了三百基羅米突，損失了一萬八千人馬，十來尊大礮，百來架機關槍。敵軍追逼過來，威脅着維亞脫加和整個東部戰線。

列寧打電報給共和國的革命軍事委員會道：「我們接到卑爾姆鄰境的黨部的一串報告，知道了第三軍的糊塗和毀滅的狀況。我想派斯大林到那里去。」

中央委員會就派遣了斯大林和麥爾索斯基。斯大林把那「調查卑爾姆失陷的原因」這主要的使命倒放在第二着，他的第一着，是要設法恢復形勢。這里的形勢之嚴重，據他在打給國防委員會主席（列寧）求撥援兵以應危局的電報中所報告的那樣，是出乎任何人的意料之外的。一個禮拜之後，他把卑爾姆失陷的原因，一一查覆，并和麥爾索斯基一同提出重整第三軍的戰鬥能力和應付將來的統盤計劃。憑着他那非常的當機立斷的手段，他實行了這些軍事上政治上的複雜的計劃——就在同一月內（一九一九年正月），敵人的進展被他遏止了，東部戰線反而取着攻勢了，紅軍的右翼竟將烏拉爾斯克佔領了。

一九一九年春季，同樣的戲劇，發生在第七軍中；——那時的第七軍，正對抗優但尼赤的白

軍，這支白軍，受着科爾却克的命令，要「佔領彼得格勒」，而且要把東部戰線的革命軍引誘到他們自己的陣地去。

倭但尼赤，受着愛沙尼亞和芬蘭的白防軍的援助，又得着英國艦隊的支持，突然成了攻勢，果然真的威脅起彼得格勒來了——如我們所記得的那樣。

而且，當地還有着他的同黨：一個陰謀在彼得格勒被破壞了。這個陰謀的線索，是由在西部戰線，在第七軍，在克隆斯泰特的海軍根據地服務的軍事專家所支持的。

正當倭但尼赤進迫彼得格勒的時候，蒲拉克·蒲拉珂徵支在邊斯河甫方面，也屢獲勝利。反叛者和逃亡者，一天天的增加起來。克拉斯那亞·高爾卡強綏拉雅·洛却特要塞的守兵，公然的投降了蘇維埃的敵軍。白軍和彼得格勒之間的距離，日益減縮了，紅軍步步屈服了。在國外，勞動者們，盼望着種種消息，舉行了失望的公開的會議，心裡充滿了痛苦和忿怒。（法國的同志們，你們還記得罷！）

中央委員會派遣斯大林，在三個禮拜之內，他恢復了革命的勝利的抵抗；二十六天以後，軍隊裏面和參謀部裡面的逼緊和混亂的情形都消失了。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共產黨全部動員了，逃亡者也沒有了。敵軍被打敗了。奸細被剷除了。

斯大林同時還領導着純粹的軍事工作，他打電報給列寧道：「在克拉斯那亞·高爾卡收復之後不久，綏拉雅·洛却特也克復了……各處要塞和城砦的秩序，很快的都恢復了。那些海軍專門家對我說，收復克拉斯那亞·高爾卡之後，把全部海軍的學問都打倒了。對於那種所謂學問的東

西，我現在只能給以憐惜了。高爾卡的迅速的克服，實由於我的斷然的措置，和一般作戰者的斷然的措置——這種措置，竟至改變了陸戰海戰的一切慣例，而用我們自己的方式去代替它。我覺得將來我應該把這方式報告你。我將來還要這樣做的，雖然我仍然尊敬學問。」

關於這一次迅雷似的戰爭的結局，是在六天以後所發的一個電報上，那是打給同一人的；

「我們的軍隊的改組，已經開始。這整個禮拜中，個人或成羣的逃亡者，一個都沒有。原來已經逃走的人，倒成千的回來了。敵軍的來降者也日益增多。一個禮拜以來，有四百個人投降我們，差不多每人都帶着武器。昨天，我們已經取了攻勢了。我們還不會得到所允的發軍；但是，我們已經較前進展了；我們不能停留在原來的戰線，這是大逼近彼得格勒了。現在，我們的進攻很勝利，敵軍已經敗退了。今天，我們佔領了盟爾諾伏，伏羅尼諾，斯泰比伏卡斯珂伏等戰線。我們得了許多俘虜，大砲，機關槍和彈藥洞。敵人的軍艦不再出現了。顯然，它們是害怕着如今已完全落在我們手裡的克拉斯那亞，高爾卡要壘呢」。

如今要講到南部的戰線了。

「誰都還記得一九一九年秋天的情形，」馬努伊爾斯基寫道：「這是整個內戰時代中的一個決定的，最危險的時期。」

馬努伊爾斯基還描寫着但尼金的軍隊攻入整個南部戰線之際的主要的情形。受着聯軍的接濟和英法兩國參謀部的幫助和支持，但尼金的白軍，進展到奧雷耳。整個廣大的南部戰線，緩緩的，波浪似的退却了。在後方，情形也同樣的悲慘。軍餉的困難，一天嚴重似一天，終於成爲幾乎無

法解決的問題。已經破壞了四分之三，缺乏着主要的原料燃料和人工的工業完全停止了。國內的各地，甚至在莫斯科，反革命分子活躍着。危險威脅着都拉，也和威脅莫斯科一樣。

在這種崩潰的大勢中，怎麼辦呢？中央委員會仍舊派斯大林到南部戰線去，作為革命軍事委員會的代表。

「到了今日，」馬努伊爾斯基寫道：「有一件事，我們不必再守秘密了，就是在出發以前，斯大林曾對中央委員會提出三個條件：第一、不許托洛茨基到南部戰線去，應當留他在原處。第二、從南部戰線，必須立刻調回一批斯大林認為不能恢復軍事形勢的軍官。第三、必須派一批斯大林所選定的能夠完成這任務的合作者，到南部戰線去。這些條件，全部都被接受了。」

但是，這架叫做「南部戰線」的廣大的戰爭機器，竟展開得從伏爾加河起，到波蘭、烏克蘭的境界為止，而且在這邊境，集合着十萬兵士。若要指揮運動這架機器，必須有一個正確的作戰計劃，必須「明白地規定前線的工作」。要這樣，只有對軍隊提出一個正確的目標，而重整軍力，使之穩固，並且實際地配他們分配在適宜的地點和時間，方才可能。

斯大林在前線所看到的是紊亂和萎靡，一種動搖而絕望的氣氛。共和國的紅軍，是在主要的防線：庫爾斯克、奧雷耳都拉上被攻擊着。東邊的側翼，無力地在掙延時間。

怎麼辦呢？去年九月，最高軍事委員會曾經定下一個作戰的計劃的。這個計劃是，由左翼沿力進攻，從柴里金通過頓河草原，直到諾伏洛細斯克。

斯大林首先注意到的，是這個計劃，從去年九月以來，迄未變更：「攻擊當由科林的部隊進

行，目的在乎消滅頓河和古班的敵人。」

斯大林審查這計劃，仔細研究，用心揣摩——終於斷定這不行。不能夠再用它。在兩個月以前，這計劃是好的，但現在形勢已經變了。應該另定策略才是。斯大林想到了應取的策略，他就對列寧提出他的新主意。我們讀一讀這信罷，這是一種歷史的資料，它不但說明着南部的廣大的戰區情勢，同時也表明着寫這信的人的決斷的透澈：

「兩月以前，最高軍事委員會的意見是主張主力戰應該通過頓河流域，從西向東的。這計劃之所以沒有實現，實由於夏季中南部軍隊的退却所造成的形勢，換言之，西南部戰線的軍隊的自動的重新佈置，損失了很多時間，給但尼金得了機會；但是到了現在，前線的形勢和在這形勢下的軍隊的佈置，已經大不相同了；第八軍（原在南部戰線的主力軍）已經前進達到頓河支流流域，蒲第奧尼的騎兵（另一主力軍），也已前進；另有一支新的軍隊加入：拉脫維亞一師，這支軍隊，在一個月之後，重行整頓一通，仍可以威脅但尼金……。誰主張叫最高軍事委員會保守那個舊的計劃呢？顯然，這只是一個頑固不堪的頭腦而已，這主意是最笨，也最能危害共和國的，這還是那個「數一數二的謀士」替最高軍事委員會想出來的呢！」

「有一時候，最高軍事委員會曾經指示科林，應該通過頓河草原，向諾伏洛斯克推進，但這條路，也許我們的飛機是可以通過的，至於我們的步兵和砲兵，却不能夠。連孩兒們也能證明：這種無意思的孤軍向敵境深入，走的又是一條絕對難行的路，結果會把我們引到全軍覆滅的

* 這封信是關於托洛茨基的。——原註

危險裡去。事情很容易明白：這種向哥薩克村落的推進，只能夠——像不久以前已經表現着似的——使哥薩克們歸附但尼金，爲了保護他們的村落而抵抗我們，只能夠使但尼金反而被人們當做頓河的救主，換言之，這只能夠助長但尼金的勢力罷了。因此，我們應該立刻——一分鐘也不拖延的變更那個在事實上已經失其效力的舊計劃，而用由卡爾到夫和頓納支河流域而向羅斯多夫作集中的攻擊的計劃，去代替它。這樣一來：首先，我們不走欲說我們的地帶，相反的，我們走的是同情我們地方，這使我們的進軍變成容易。第二，我們可以佔據一條重要的鐵路（頓納支的）和一條但尼金的軍隊的交通要道伏韞納齊·羅斯多天大路。第三，我們可以但尼金的軍隊截成兩起，那些「志願兵」，可以叫麥克諾去對付，我們即去威脅哥薩克軍的後隊。第四，我們可以使哥薩克人與但尼金不和——如果我們的前進得了勝利，但尼金一定要叫哥薩克人向西退去，但這是大部分的哥薩克人所不願意的。第五，我們可以得到木炭，那正是但尼金所缺的。這個新戰略的採用，是不容再緩了……總而言之，那個已經因最近事實的發展而過了時的舊計劃，無論如何，不能再用了，這已經變得於共和國有害，而於但尼金有利了。我們應該採取另一個策略了，現在的條件和環境，不但已經適合於新戰略，而且迫切地命令我們這樣改變……否則，我在南部戰線的工作，就毫無意思了，要變成犯罪的了，要變成無益的了，這種情形，使我有權——或者寧可說逼着我——到別的無論什麼地方去，即使是到惡魔那裡去也好，但不是留在這裡。你的斯大林。」

中央委員會毫不遲疑，就接受了斯大林計劃。列寧親手下令，命南部戰線的參謀部，改變原

定的方針。於是主力的攻擊，由頓納支——羅斯多夫而向卡爾科夫進展。結果是大家知道的，但尼金的軍隊被逐到黑海去了。烏克蘭和北高加索，完全從白軍得了解放。革命在內戰中得了勝利。

斯大林的屢次成功，其迅速和完滿，簡直好像是魔棒所指揮的事情。難得的，例外的是：在僅僅一個——同一個人的身上，竟具備着各種現實主義的創造的要素的混合物——不但在理論方面，同時也在行動方面。一個真正的現實主義者，應該有這樣的明見和勇氣，能夠看清而且宣言：最長的路有時也就是最短的路，同時還得有因此而指揮事情的進行的魄力。

斯大林到南部戰線去的另一成績，是在掃蕩白軍的最後的工作上立了大功的騎兵組織。他堅執地使人們贊成這個主張，整個革命軍事委員會本沒有想到這一層，這是由南部戰線開始的。他還需要一種戰術上的改良，就是衝鋒隊的工作。每次當主要的攻擊的方面決定之後，就立刻把精銳的部隊集中在這方向上，務要得到一個迅速的頭功。

和這種直接行動的戰術同時，斯大林並不會忽視軍事組織的大系統，他也承認一切軍隊有一致地隸屬這種系統的必要。一九一九年正月，他同意地寫信給斐爾索斯基說：「一支軍隊，不應該不顧其他地完全自動地單獨行動；在行動上，它完全和它的部队的部隊關聯着，尤其是和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關聯着。即使是最能戰鬥的軍隊，在無論怎樣的條件中，倘若中央的指揮一錯誤，或者沒有得到那接部隊的合作，那也不免於敗亡。在前線上，應該組織一個統一各軍行動的嚴密機關，實行指導確定而經過詳細考慮的戰略。任性地或輕率地決定策略，不經周密的研究，

或突然變更策略，或缺乏正確性（這一點，有時候共和國革命會議也要犯到），都不能有效地指揮軍隊。」

在關於戰爭的這一章裡，我們不要忘記一件事：在黨的第八次大會上，斯大林是竭力主張「另一種軍隊」，那種在紀律的精神中形成，由黨都編成的常備軍的。

但是，突然之間，由於烏朗格爾——那從英法兩國得了金錢，兵士和軍需品的狂妄貪婪的冒險家的起事，內戰又發生了。英法兩國，拼命的要做白俄的同謀者，想幫他們恢復鞭笞（Flogging）制度和農奴制度。

烏朗格爾向全世界宣言：他要進攻波蘭。他從克里米亞出發，嚴重地壓迫那解放不久的頓納支河流域——由此威脅整個南方。

中央委員會的第一個想頭，是重新派斯大林去對付。一九二〇年八月三日決議道：

「由於烏朗格爾的成功和古班的警告，我們應該認清烏朗格爾戰線的重大而完全特殊的意義，我們應該把它看做是獨立的戰線。現在由斯大林負責組織革命軍事會議；把我們的全部可用的軍隊集中在這戰線上，任命莫戈洛夫和弗倫宰為前敵指揮，和斯大林一同受最高軍事委員會的節制。」斯大林特別受列寧的囑咐道：「政治部剛才已經把許多戰線分配好，你可以專力對付烏朗格爾的那一條。」

斯大林就佈置起新的戰線來。中間，曾經因為生病，他暫時離開過這個工作，但是當波蘭軍進攻之後，他又作為西南前線的革命軍事委員會的一分子，而回到那裡去。波蘭軍的敗退，基輔

和烏克蘭的得勝，加里西的深入，這大部分是他的指揮之下的功勞。首先想到用第一路赤騎兵實行著名的襲擊的，也是他。

在波蘭的戰線潰滅之後，在基輔的波蘭第三路軍幾乎全軍覆滅之後，在格地雪夫和齊托米爾的攻擊之後，在第一路赤騎兵向科夫諾進展之後，紅軍可能作一次總攻擊了。但到了華沙附近，紅軍却敗於波蘭——歐洲的軍隊之手，這使那預備進攻里伏甫的赤騎兵，不能再進（那時赤騎兵離開此地已只有十基羅米突了）。

由於他那每次一到內戰的前線，就能把那種最激烈最殘破的局面恢復秩序的高強的手段。斯大林兩度得到紅旗勳章，而且被擢為共和國軍事會議的委員（這個職務，他從一九二〇年担任到一九二三年）。

我們所說的「內戰」，這個名詞其實是不正確的。打擊俄國革命的，不止白軍而已，此外還有列強。與紅軍為敵的，有沙皇和英、法的軍隊和參謀部，還有日本的，美國的，羅馬尼亞的，希臘的——還有別的國家。

帝國主義的列強，本來是不高興十分公開地把金錢，兵士和將校去援助白黨的領袖們的（這些領袖，曾先後得到法國政府的正式的承認），但是，在這個大戰已經閉幕，和平已經實現的時候，法國的軍隊和英國的軍隊却違反了一切的國家的主權，公然水陸並進，跟在德國軍隊後面，侵佔，蹂躪，劫掠起俄國來了，他們虐殺民衆，槍斃他們的領袖，無所不至地破壞工業區域。

德國的軍隊從俄國佔取了沿波羅的海諸省和芬蘭。協約國又從俄國奪取了波蘭，而且在奪取

完全之後，把它造成一個獨立國，這並不是出於對波蘭的好意，却爲了利用它阻隔俄國——他們又從俄國奪得比薩拉比爾，送給羅馬尼亞，不管比薩拉比爾人的願不願。這樣一來——我們又要說了——英國和法國就再不會跟俄國在戰爭狀態上對立了。這種軍事的侵略是一種大規模的反革命工作。他們的這樣做出來，不單是爲了報復俄國的個別締結和約而已（我們不要忘記，那首先簽字於勃來斯得；李托斯克和約的，並不是布爾雪維克，而是同時受德國和協約國的保護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者，而且，我們用不到再來說一次當時蘇俄在勃來斯得所出的立場，乃是反對帝國主義的陰險的吞併政策的，合乎正義和人權的立場——帝國主義政策的不祥的結果，現在已經十分明顯了）。但是，「自由的」英國和「革命的」法國，是都不能容納一種反資本主義的革命的，在他們看來，還以爲應該竭他們的全力，利用無論怎樣的手段，消滅這個歐洲的平民政府的惡夢*！

這些想從俄國身上割下那些由十月革命給了新的社會形態的國家來的協約國的干涉，本質上都是反革命的，那顯然的證據，只舉出一件就够，就是，巴爾帝鐸的（在戈爾支和羅森堡率領之

* 勒內·比埃先生 (M. René Binon)，法國的右派作家，曾經替法國政府，在一九一九年派遣一個艦隊，和一師砲兵，開進黑海，並不宣戰，而武裝干涉外國民衆運動的橫暴的行爲，毀過辯護的話。比埃先生說：「這種干涉，不能照普通的意義，說是對於外國的內部事件的越俎代庖」，因爲「它是超過了這種觀點的，原來它是更從一種社會秩序和一般秩序的危險關頭裡，解救出一個國家，同時解救出整個世界來……。」這真是，要使耶穌教徒相信國際反動的地位，也是很難的。

下的)德國軍隊是得到協約國的軍隊的合作的。

……後來俄國的其餘各部分都從反革命勢力之下解放了。

斯大林在這些動亂的環境之中所施展的種種特質，在那些認識他的人們的面前，却不大顯現。他只是在一一個新的活動範圍之內運用他的力量和他個人的手段罷了：觀察的迅速和切實；從許多着眼點中把握住一個具體的形勢；對於任何一件事情，能夠找出它的真正的原因和不可避免的結果，而且能夠找出這事在許多事情中所處的地位；對於紊亂和混雜的憎恨；一個計劃既經想好，決定之後，一定要百折不撓地，去準備，去着手，去安排各種完成它的必要條件；將這一切，用於鬥爭的場合，就是真正的馬克斯主義。

在這樣的意義上能夠澈底完全地實現一件工作的這個領袖，是很嚴肅的，對於那些無能的人，甚至是粗魯的。對於那些叛逆者和怠工者，簡直是無情的。——但是，每逢有人受了處分，而在他看來，覺得犯罪的證據不足時，他却要熱心地去干涉，這樣的事情很多，舉個例說，有一回，巴爾科孟珂已被判決死刑，他却去救了出來。

在人們看見民衆的命運常在左右搖擺的這時代，在每人都在作孤注一擲的冒險的這時代，在無論你願意不願意，都得負起一方面的責任的這時代，人們所有的問題，只是：犧牲了自己的生命和權利，替某種目的去服務，到底有什麼價值罷了。

這問題，應該放在社會主義的尤下去解決。假如我們發現自己是站在資本主義制度的前面，是站在帝國主義威權的前面，那麼我們犯不着做這樣的犧牲。這道理太明顯了，帝國主義資本主

義的原則，是建立在對於人類生活的侮辱上面的；武力壓迫之下的交易，因關稅制度而戰事化的商業，成爲常例的優先權制度和戰爭制度。殖民制度是一種加強榨取的監獄制度。那些殖民國家，剝奪弱小民族的自由，吞併他們的土地。土人被當做敵人和家畜看待，受着榨取，受着虐殺，被迫做苦工，他們倘若要求自由，就會被處死——比利時屬剛果，法屬東非洲、印度、印度支那、爪哇、莫不如是。此外，人們又會得爲了少數人所代表的「民族——國際」集團的利益，而挑撥起種種造成人類生活的大破綻的戰爭。

但社會主義的制度，却和這相反，它是爲人類造福的。它憑着一種全體人的合理而正直的組織，要儘可能地改善各個人的命運。這個，我們可以說它是更高級的「人道」的組織。

尊重人類生活的出題，是以最嚴重最重要的意義，向布爾雪維克們——我們這時代的最實際的社會主義者們——提出着的；他們自己也始終重視着這問題。

正因爲尊重人類的生活，所以他們說：必須把好幾種人從不幸的狀態裡解救出來（「翻罪說」在這裡是說不通的；除非上帝真的存在，而且指名的說要懲罰那一個，這樣我們纔可以相信那種超自然的贖罪觀念）。

非常的確，非常明顯地，我們應該爲了解救一千人，爲了解救萬萬人，爲了解救將來的時代，爲了建設一個不再有人犧牲人的事情的世界，而打倒一個人。

維克多·雨果，在他的偉大的史詩般的小說「悲慘世界」裡面，對於法國大革命，雖然表示着他的許多常套的誇張的意見，但也有着廣大而正確的觀點，譬如他說：「從它（法國革命）的

最殘暴的打擊之下，產生出一種對於人類的撫愛來。」這句詩意的斷言，倘若跟那讓布爾喬亞去統治十九世紀的一七八九年短促的革命並不符合，那麼，跟那十月的人們十分忠實地所創造的完全的革命，決不會不符合的了。

有的人自以爲是地說：「一切革命都是流血的，因此我不願革命；因爲我的心腸是太仁慈了。」作這種表示的社會保守家們，如果他們不是僅僅扮演一個喜劇中的角色，那麼實在是一些可憐的近視眼。他們不知道我們的另一些非蘇維埃的國家，其實也處在一種流血的制度之中。從各方面，我們只聽說凌辱和殺害。我們只要舉眼向四周一望，就能看出這種情形。然而大部分的人們，却看不到這樣遠。他們不能看到別人的痛苦。而且，差不多所有的人，他們對於革命，不從它供獻給全人類的好處上去觀察，而只使它齧給他們自己家中的擾亂和麻煩上去觀察。

G·P·U的領袖孟察斯基——他剛在不久以前逝世——曾經對我詳細解釋，他說那領導蘇維埃聯邦的政黨的目的，既然是要世界上的人們，個個合作，大家在和平中勞動，那麼叫它去做殘酷的或不尊重生活的事，在原則上是很不合理的。他又告訴我，在事實上，作爲勞動大眾的兄弟的那班革命警察，時常找着機會，不但要「矯正」「治愈」那些普通的犯法者（在監獄制度方面，布爾雪維克的忍耐和寬大，是達到了令人難以相信的程度的），而且也要「矯正」「治愈」那些政治犯。共產黨是從這個變重的原則出發的，就是：普通的犯法者，是不明白他們自己的利益，而破壞了他們自己的生活的人們——對於這種人，只要指出這種錯誤就够；至於那些無產階級革命的敵人，那些「世界革命的先驅者」，他們同樣的也是（假如他們是誠實的）弄錯了觀念

的人們——對於他們，也只要指出這種錯誤就好。因此，蘇聯的監獄，都徹底地努力要變成「學校」。

因此，懲罰的問題，從一般的進步的觀點看來，已經縮減到只有一點點兒的必要了。在這一點點兒的限度裏，若還是不加懲罰，是跟超過這限度的懲罰同樣的有罪。誰若寬容那些違反人類的大道而作惡的人們，誰也就是惡人。援救兇手的，也是兇手。真正爲善的義務，就是擁護未來。

俄國的革命，假如在一般觀念的僞君子們的心滿意足之下，採取了自動的寬容的政策，置那些足以殺敵自衛的武器於不用，那麼，它的壽命就不會有這麼久長，英、法、波蘭等國會得把它損害而把沙皇和白軍馬上送回到彼得格勒去的——事實上，這些國家曾經想盡方法這樣做過。如跟俄國革命的工作居然穩固了，而且已經照耀着人類的未來了，那完全是因爲它曾經毫不示弱毫不姑息地鬥爭過的緣故；對於一切反叛的組織，對於一切跟白軍勾結——從背後打擊——的陰謀，對於帝國主義的間諜，對於外交家和包探，對於怠工者，社會革命黨和無政府主義者，對於國家主義的孟雪維克，對於多少受着外國的幫助的變質的反對黨——對於一切起來破壞勞動者的自由和人類的正義，攻擊國家的瘋狂的暴徒。

數年以前（一九三一年底），斯大林答覆關於「蘇聯政府在鬥爭中對付敵人的嚴厲的不妥協的態度」這問題時，曾經說過如下的話：

「布爾雪維克們得了政權之後，他們就開始表示對於敵人的寬容。那時孟雪維克仍然合法地

存在，而且還可以出版他們的報紙。社會革命黨也一樣。甚至於幼年士官生們（立憲民主黨們）也能繼續出他們的報紙。當克拉斯諾夫將軍組織反革命軍隊進攻彼得格勒而終於落在我們手中的時候，按照戰爭的常例，我們至少可以把他監禁起來。更進一步，我們也可以槍斃他。但是，我們却讓他有『說話』的自由。但這一切的結果如何呢？我們不久就看出，這種溫柔，只是減弱了蘇維埃的政權的穩固性罷了；我們爲了對於勞動階級的敵人表示寬大，鑄成了一個大錯。如果我們後來再犯這錯誤，那簡直是對勞動階級犯下大罪，簡直是違反他們的利益了。這事不久就顯得很分明。很快的，大家都不得不承認：我們對於敵人愈是表示寬大，敵人的反抗的力量反而愈強。在很短的時間內，社會革命黨，戈茲和別的一些人，以及右派的蓋雪維克，在彼得格勒組織了一次軍官學校的暴動，這次事變的結果，損失了我們的許多革命的水手。連那個我們許他有『說話』的自由的克拉斯諾夫，也組織起哥薩克的白軍來。他和馬蒙托夫聯合，武裝攻擊蘇維埃政權，竟達兩年之久……因此我們很容易明白，當我們表示得太溫和的時候，那是我們錯了。」

在這後面，我要加上一段七年前斯大林對我自己所說的話，那是關於著名的「赤色恐怖」的。他談到死刑道：「我們當然是贊成廢除死刑的同志。而且，我還相信，對於我們，就蘇聯內部的制度而言，實已毫無保留死刑的必要。假如沒有那種外面的世界，那些別的國家，那些帝國主義的列強，那麼我們早已把死刑廢止了，但是那些國家，却使得我們爲防衛我們的生存起見，不得不把死刑沿用下來。」

從這些話，斯大林又談到那些最無恥的，公開和秘密的謀殺行爲的增加，這些行爲，在蘇聯

看來，乃是那個隨時隨地和俄國的反革命分子密切地聯絡着的布爾喬亞帝國的「對外大政方針」的一部分*。所以打擊得正確的人，同時必須打擊得有力。

* 在目前——一九三四年底——法國的外交政策是要大大的拉攏俄國了，對於蘇維埃的同情，在我們這裡是成了時髦的事情了，原因是爲了歐洲的均勢。這種資本主義國家的大政策的表面的玩意兒，當然是騙不倒一個人的……不過，這種事情，現在對法國民衆客觀地證明着俄國革命及其成績的真實，至少，證明着這是一個不可抹殺的結果。——原註

第四章 民族的團結

自從「十月」的那時候起，斯大林被任爲「民族人民委員」（這個任務，直到一九二三年，他才完成。）

諸民族的問題，換言之：「異質中之同質問題」，這是他所遇到的最大的問題之一。十來年之前，在各種鄭重的場合中，斯大林曾經宣言：如果說，蘇維埃共和國的第一層基礎是工人和農民的聯合，那麼共和國的第二層基礎，乃是各種不同的民族的聯合：俄羅斯，烏克蘭，巴什吉爾，白俄羅斯，喬治亞，亞塞爾拜然，阿美尼亞，達蓋斯坦，韃靼，吉爾吉斯，烏茲伯克，達韃克斯坦，土可曼。

在俄國的兩種舊制度——歷時三百年的沙皇政治和爲時只有六個月的布爾喬亞政治——被壞之後，斯大林在一切人的心目中——首先是在第一流要人如列寧和中央委員會的心目中，成爲「民族問題」的最優秀的理論家和工作者之一。就在現今，人們也還承認他是蘇聯裡最了解這個問題的人。

這的確是重要的問題，特別對於新政府，是骨節的問題；而且在大體上，是「社會主義的地

理的骨格」的問題。這問題與俄國地圖的線條以及整個點線密布的世界地圖的形狀有關。

我們在西歐的人們，時常說「俄羅斯人」這句話，以指在波蘭和阿拉斯加之間的佔地球周緣八千基羅米突以上的那個民族的大民。但是到了現在，這只是一個籠統的，簡略的說法，而且只是一個象徵的說法罷了。因為所謂「俄羅斯」，只是形成蘇聯的國家之一。它不是一個省；而是一個國家，一個共和國。俄羅斯以外，在聯邦的二千兆公頃的地面上頭，還有一打的民族，百來個小國；這些民族和國家的許多種族集團，它們先前是被歸併到那住在克里姆林的彩色穹窿下面的俄羅斯家的財產中的，現在都加入了聯邦的組織。原來的所謂俄羅斯，僅僅是這些民族裡面的最重要的一個罷了。此外，則作為那塊佔世界遊程的一半的土地的統治中心的，也是一個俄羅斯的城市；在統治上，的確是需要一個好的統治中心的。然而喬治亞人還是喬治亞人，烏克蘭人也是烏克蘭人。就是比起我來，他們也不是俄羅斯人。

在沙皇時代，這些被強迫合併的土地和人民，同樣被強迫地納入一個民族的胸膛裏面，因此「民族的」這個字的意義，就等於——多麼蠻不講理呀！——「俄羅斯的」了。俄羅斯化，消滅各民族的特質，從軀體到精神一切都粉飾上俄國的色彩；於是國界被軍人的靴子所踏滅了，民族的語言，被俄國話大聲地壓倒了。好像我們在前面講到的喬治亞的情形那樣，彼得堡和莫斯科中央政權，那至尊的宮殿裏的，對「一切俄國」伸着拳頭，穿着金邊衣服的神聖的人，他的目的，是要使殖民地化的其他民族的人民，連皮膚都換過。因此規定了許多強毒的法律，要消滅各民族的人種上的特性——甚至血液都要變過。

這些種族，如今是處在另一種制度下面了；這是一種根據社會主義的原則而合理地造成的制度。在這些原則上——這些原則，除了組織工業國家之外，同時處理着一個以世界文明為基礎的問題，而且理想的地把這問題配合到國際計劃上去，用擴大民族的計劃使它有效地實現——斯大林在過去和現今都是著名的解釋者之一。在許多的「專家」之中，他是最有威信的一個，連蘇聯其他同問題的專家們，也都承認「他們是從他的許多論文上（那是大戰前的幾年中在 *Pravda* 和 *Zhurnal* ——教育雜誌上所發表的）得了許多教益的。」

但是，那種本能的對俄羅斯人的反對，對俄國的獨裁的（即使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獨裁）憎惡（我們在前面已經看到過），在那俄羅斯帝國所在的奇怪的大陸中央的革命宣傳史的初期中，非常顯著。自從黨形成之後，人們就看到，種種民族和民族主義的影響，在勞動者中間造成相互的蔑視，而且對於俄國的無產階級，也發生了一種普遍的不信任。

在一九〇五年的時候，波爾和立陶宛的勞動者——那時還在俄國的治下——已經有着他們的獨特的跟俄羅斯社會民主黨全不相關的社會民主黨。許多猶太族的勞動者也是這樣（例如猶太勞動者聯盟）。

直到一九〇六年，在斯托克霍爾姆的第四次社會民主黨大會上，立陶宛、波爾、猶太人的政黨才和俄國的黨統一起來。但是縱一九〇五年革命而起的專制政府方面的壓迫的殘暴，去自然而然地激起民族和「小民族」之間舊有的分裂傾向的流行，這種種族抵抗普遍蔓延的必然的結果，是各民族的無產階級與俄國無產階級的重新脫離。

黨關於民族問題的綱領和策略的基本原則，在一九一三年，根據列寧和斯大林的論文而構成，經一九一三年八月的黨大會通過，作為決議案而確定。

其主要之點如下：各民族有自主之權，并可脫離帝俄而獨立。願意參加民族政府的聯盟——聯邦者：得保留領土的自治權，廢除單一的官話（俄國話），有使用方言的自由（包括少數民族語言在內），廢除任何形式的民族（俄國）壓迫的負擔。

這樣，列寧和斯大林當設定這個民族問題的馬克斯主義公式——這公式的本身是那樣縝密地驚人地合理，既然它顧到了從舊俄帝國脫離領土的可能性——之際，同時把民族問題，毫不牽強毫不臆懼地聯繫到革命問題上去。他們儘量地容許那個名叫俄羅斯的民族集團裡面的各個人種部落，都有保持統一的可能（種族自治的要素不只是精神上的自尊，還有生存的因素和創造的因素），同時並不忽視集團的統一——這「集團的統一」，它本身顯示着一種重大的實際利害。

況且，這種集團的統一，是會因那唯一而純粹的社會主義網的聯繫（政治上的和工業上的）而堅固起來的。

密切地使理論和實踐相配合，有機地使思想和行動相銜（作為實用的科學的馬克斯主義，是需要那種與現實奮鬥，被現實不斷地向未來推進的創造者的），這樣的列寧和斯大林的學說，跟那種奧地利派馬克斯主義者們的學說，顯然是相反的。所謂奧地利派馬克斯主義者學說，即叫做「民族文化自主的學說」的，在社會民主黨中頗有人支持。那班奧地利的「機會主義者」，大體上鼓吹各個民族各自組織完整的民族集團，而由社會主義分別地去適應它。這樣一來，倒造成

一種社會主義的分裂了。在這些思想的測量家的計劃裏面，不是民族主義「社會主義化」，反而是社會主義「民族主義化」了。他們要在尼古拉二世的帝國的全部面積上，把社會主義割裂成各不相同的片段。這種幻想的改進，簡直是愚蠢。所以列寧和斯大林，竭力加以反對。這是危險地超出了限度，破壞了合理的自治與有利的統一之間的平衡，而允許特別的——新的——社會主義的領域上，有民族的分割和國境的尊重等現象的存在。這種主張完全是違反馬克斯主義的堅強的組織的常識的。

在這時候，恰好來了二月革命的第一次掃蕩和帝制的顛覆。這是斯大林，他在一九一七年四月的布爾雪維克黨大會上報告民族問題。「僅僅在形式上宣佈各民族的平等，是不夠的，這不會比法國大革命的平等宣言的實際結果更好」（馬努依爾斯基）。應該做得更遠大更深刻。斯大林主張採用在沙皇統治下所鼓吹過的主張。這理論雖被接受，但不無衝突：從比雅科夫和別的許多代表中間，對那主張確定民族的獨立權，甚至容許分離的條款，起了強烈的反對——這種條款的可能的結果，使他們覺得害怕*。

我們應該特別注意特別指出的是這種民族理論的採用——這種理論，在它所表示的社會主義的大度和公正上，實在是很大胆的。對於革命鬥爭的利益上，到底有什麼貢獻。我們知道，由於

* 米柳科夫在一篇從法律上研究蘇聯的論文上面說，如果讓各個國家有退出聯盟的可能，那就是剝奪了它的法律上的資格，因此使它不能「參與任何國際條約」。但這種情形並沒有表現。事實上所表現的，倒是這種不加強迫的態度，使共產黨在參加蘇聯的諸民族中得到偉大的道德上的勢力。——原註

這種理論，使工人和農民大眾，看得布爾雪維克黨，真正是個採用合理的手段，而與沙皇的——後來又被孟雪維克支持的克倫斯基所當用的——民族壓迫相鬥爭的唯一政黨。

這種民族自由的理論，這種解放的主張，在「和平」，「土地」，「勞動者統治生產」的口號之下，和社會解放的理論相聯繫，而且把民族的要求和社會主義的要求銜接在一起——這種理論的效果，對於十月革命的預備，給了許多決定的進步的影響。布爾雪維克對於民族問題的態度，獲得了一切人的同情；並不像有些人所担心的，引起民族間的分裂。在這事實上，眼光遠大的態度勇決者，又一次的完全獲得了勝利。「科爾却克和但尼金之所以失敗」，斯大林說：「那是因為我們得着被壓迫民族的同情的緣故。」

在十月革命的另一面，在東歐的第二次掃蕩發生，布爾喬亞所組織的德謨克拉西的沙皇制度完全消滅之後，斯大林正式地成了黨裡面的民族問題的權威的指導者。

告俄羅斯諸民族書，是蘇維埃政府的第一批的法令裡面的一種。這是斯大林所計劃，所起草的。這裡面的佈告着：

「俄羅斯的諸民族的平等和主權——有自治之權，甚至可以脫離俄國，成爲獨立國家。——廢除一切獨占和（俄羅斯）民族及（希臘正教）宗教的特權。——舊俄領土上的少數民族和民族集團得自由發展。」

這表示着，對於接受聯邦的諸民族，實行一種純粹係行政性質的普遍的結合，使各民族都可儘量發展。這樣一來，許多的國家，組織成功一個各各獨立而互相合作的社會。

另一種重要的文件，是一九一七年發表，由列寧和斯大林共同署名，寄給那些包括在舊日沙皇的歐亞帝國的境內的回教工人們的。他們是在所謂「俄羅斯人」的人民之中最落後，也最受壓迫的一部分。蘇維埃政府宣道：它的最先的工作之一，是把這批成千成萬散佈在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亞，高加索和伏爾加的人民，提拔到跟別的民族同等的地位。

現代問題裡面最糾紛最悲慘的一個問題，竟得到這樣合理的堂堂的解決，到了這裡，我們且停一停來想一想罷：在一個國家的各區中間，既然這樣的容易解決，那麼在一個大陸和整個世界的許多國家中間，一定也同樣的容易解決的。說是悲慘，的確不錯，因為民族與民族之間的關係問題：——和平與戰爭的問題——實在是全部近代史中的污濁的血循環。民族意識與和平，在狹隘的原則上，無非是反對的意義。所謂「民族」，意即「擴張」；「擴張」即「貪慾」，「貪慾」即「吞噬」。民族間的吞噬，沒有一次不是你死我活地拚命的。加以資本主義制度下面的只顧個人利益的和社會保守的政策，又加重着——同時又培養着——內部的崩潰。歷史集中的缺陷的結果，（在互相鬥爭的兩條陣線上）一面是少數剝削者的集團，一面是多數被剝削的集團，一個集團鼓動進攻鄰國的大眾——於是常識指示我們：因利害的一致，而組織起另一種人類的集團來。無可諱言的是：在這世界上，那破壞的資本主義，已經把國家的界限包住了*；而且，那種本來可由人類協同決定的解放，遇着了重大的障礙——這障礙，特別是從那種逐漸的浸染人類，而且使七巧板似的地球上每個有名稱的部分都充滿了排他的不可遏止的野心的「國家崇拜」觀念裡發生出來的。並且，資本主義的主要的宣傳——（在經濟恐慌和某種思想的

深入推動着現代人的，目前的社會鬥爭的場合中，這種宣傳，更緊急化更激烈化了。——在乎要極度地培養起，挑撥起羣衆的愛國觀念，國與國之間的挑釁的離析，以及殘暴的世界分割——因爲所謂資本主義的命運，是依存於這種病態的心理和不穩的事態的。

但是，看看十月的人們：罷他們正在極複雜的一羣種族和國家之中完成了他們的革命^{***}——在這些種族和國家裡面，本來還有着一種久遠的壓迫的傳統，它時常使國家主義膨脹起來——他們，第一次的使人們看到地球上的那種對立的宿弊的合理而真正的解決；他們，第一次的使人們看到一個合理的公式，它把兩個必不可少^{***}的要求——國家的獨立性和實際的連帶關係——配合起來，使國家主義並不「反對」社會主義，而使其「包含」在社會主義之中。

這個偉大的公式的秘訣，乃是把「個別的自由」和「相互的聯合」，這兩個基本的要求正確地加以選擇和分別；規定每個發展的範圍和發展的方向，使互不相混，互不相犯，雙方平行地進步，誰也不至受誰的妨害。

人種的特質，集體底道德和智慧^{***}的個性，民族的文化，民族的精神，那表現在傳說和民謠上，表現在藝術的和知識的著作上，也表現在家族感情和祖先崇拜上的一切；那藉本地話而表達的一切（語言，這是一種推動而且發展各民族意識和精神的靈活的機器）——這一切，不但被保

^{***}這是說資本主義使國家界限率不可破。——譯者

^{***}這些國家，比形成美國的那些，還要不調和；在這些種族之間，有譬如俄國人法國人或德國人之間更多的無窮的矛盾。——原註

留着，而且被充塞着，不但在民族的觀點上這樣做，而且（更切實地）也在地域的觀點上這樣做。對於少數民族，好像重視得有點過分似的。君不見，在二十世紀的時候，莫斯科的學者們還特地創造了字母，使遠處的少數民族中間，能夠組織起記載它們的千百年來的智慧遺產來，并使它們能夠覺醒，能夠獲得新生命，能夠依照它們自己的樣式而長大。「這太過份了，這是瘋子的事」。——近視的小聰明者要這樣說。但是，有遠見的偉大的智者却並不這樣想。

至於各民族的宗教的傳統——這東西幾乎完全不是起源於民族的，在大部分的情形中，它常是外來的東西（譬如上帝，就是從別的地方輸入的，跟沙皇和俄國的官吏們一樣）——也讓它存在於原處。這種東西，只要過着每個啓蒙開化的社會中的能夠參鑿錯誤觀念的那種合乎共通法則的道德體系，那就會得屈伏的。

在內部的和民族的範圍中完全解放，完全自主的這些集體中的個體，另一方面，却被許多關係互相聯繫着。什麼關係呢？那是一種行政的，實際的，具體的，能夠對參加集體的分子的全體保證一種於各個直接有利的健全的力量，行政系統上的關係。還有軍事、財政、外交方面的同一領導。聯邦的一切財富和自然資源的共同利用。這種團結，使各個分子都能獲得很大的，實惠而穩當的利益，在這樣的一種組織之下，的確可以做出種種集體合作的事業來；經濟計劃，為普遍人類謀福利的勞動，謹慎縝密的領導，生產物的更豐富的分配；依照集體活動的發展的算學比例，而使公共的及個人的幸福同時增加。還有，把強大的兵力實實在在地分配給聯邦內的每個國家，使最弱的國家也能利用它。

換句話說：這些國家，一方面是獨立的，因為獨立起來有一種精神上的利益，另一方面又是聯合的，因為聯合起來有一種實質上的利益。這樣一來，激頭激尾地將真實的利益關係。代替了先前的在那些狂妄荒謬地以「俄羅斯各國之一統者」自命的沙皇的壓迫之下的強暴而同時又脆弱的關係。

在莫斯科人和韃靼人，——在這兩種異國人之間，有着許多實在的差異；——人們談這些差異自由存在，而且加以培養，使之發展。由於這些，人們制定一種民族的法律。但在這兩種人類之間，却有着許多共同之點：共同的需要，生活上及和平上的許多同一和平等的權利，還有許多關於公共財產的權利。由於這些，人們創造了一個總的法律。那班將來的蘇維埃國家的創造者，就是從這樣的視角，去觀察那張嵌在種族的界線之內的各國的地圖的（確實的或理想的界線）。首先，是保證集體生活的安全和繁榮的必不可少的聯繫的最低限度；其次，是各民族的發展可能的最高度。

在眼前的世界上，所謂國際間的和平，是一個荒謬透頂的公式——現代的七十五個左右的國家，無論那一國都只有一個目的（有的公然承認，有的却不承認），就是：彼此要損害別國而保存自己——在這樣的世界，那個利用新理想來改革舊理想，代替舊理想的蘇維埃組織，已經完全達到目的了。至於那個已在這種組織裡面的大陸因此感到怎樣的歡喜（而且使全世界也感到怎樣的興奮），那是不待說的了。

對於這種主張。有什麼理由可以反對呢？——或者你簡直暫時離開了地面，到極高遠的地

方，高遠到能够一眼看清地球，看清現代情形的地方去觀察觀察也好，（因為，愈是高遠的地方，人們愈會得接近偶像的，神燈的，符咒的，死的，虛幻的思想，）看有什麼理由可以反對？深刻的反對論，堅強的反對論，實在一點也想不到。這種主張，只會激怒那些大國中間的不辭的誇大狂者——因為他們是說着「一切別的種族都得受我的種族的支配」的話，而且他們是把民族主義的形式改做了有毒的擴張勢力主義論。它只會激怒那些小國中間的偏執的迷信者，因為他們被「自主」這個字眼所麻醉着，比什麼都要緊地，甚至比「進步」都要緊地，喜歡絕對的孤立，那種跟世界合作的急切要求毫不相容的孤立，那種使他們只得艱苦地過日子，而且只能在某一帝國主義巨獸的口中一點點地溜滑的孤立。

原來，對於那些弱小的落後的國家（俄羅斯集團中的大部份都是如此的）無論從那個觀點看去，這種制度，實在比那純粹簡單的獨立制度有益得多，合適得多。在聯盟中，各國合作一種公共的事情，而且彼此合理地相安。倘若分離開來，那就不會合作，而要發生競爭，由於環境的力量，彼此敵對，彼此仇恨——於是一切苦痛，一切的壓迫，一切的禍害——以及一切的屈辱——都跟着來了。蘇維埃的諸國家，雖是弱小的同時也是強大的。但是假如它們脫離了聯盟，那就毫無補償地變成弱小了。

這一切，現在已經不是——而且再不會是——一種抽象的純理論，像過去某一時期那樣的了。蘇聯各國的最近的歷史，已經提供着許多輝煌的活生生的特殊的例子，證明了這種分清物質利益和精神利益的具體的偉大手段的原則：聯邦裡面的許多落後的國家，居然和民族的發展同

時，以神奇的速度，通過了許多進化和繁榮的階段了，這是全蘇中央行政的——即聯盟的巨大的幫助的。先前的許多勢不兩立的以及世世爲仇的種族，現在是生活在相互的完全的和平之中了。甚至於大家承認「各國之間的界線，如今只賺了行政上的重要性了」（馬努伊爾斯基在第五次全世界大會上的報告。）這才真的是布告了和平的法律。這對於那些記得不久以前的內戰的情形而將它與這合理的親善比較一遍的人們，實在是一種驚人的奇蹟。即使是永遠反對的人們罷，他們看了這種現象也是不能不感動的。

但是，說話要回到這種非常的變革現象的開頭的時候去，我們應該明白，這種新的民族政策的實施，實在是一種大大的助力，使那從Brest上（俄文，答刑之意）的沙皇和財政上的沙皇之下解放出來的俄大的國土能够安定。這種政策的實施，促成了許多反革命政府的烏克蘭的，土耳其斯坦的，外高加索的 [Tiflis, Georgia]（取消）——如俄國人所說似的。在這里我們應再提一提：只因爲德國軍隊的干涉，這纔使邊境的反革命勢力猖狂，使烏克蘭，白俄羅斯，芬蘭和波羅的海諸國的蘇維埃政權顛覆（日後恢復過來的，只有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兩處）。

也是這個對於各種族和少數民族的政策，促成了那給科爾却克和但尼金的致命的打擊，——並且，也是這政策，使新國家能在清除白黨之後，動員諸民族的集團，各各組織新的共和國。

這政策，對於各民族集團的利益，竟有這樣明白的貢獻，就是，每個民族集團，只要理解了這政策之後，莫不就來參加蘇聯。而且每個民族集團只要一被了解，就會誠意地親近。在這里，又可以看出一個對於這些民族靈了決定的任務的人的能力和價值。

一九二二年，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成立了。斯大林的名字，跟這歷史上的偉大的時期，成爲難解難分了。蘇聯的憲法，在基礎上，就是沙皇制度下面的那些少數革命者所規定的這種廣大的法律。我們可以這樣的概括它：它設定——或者不如說它提議——一種經濟的及軍事的密切聯合，同時各邦有最大的獨立權，各種民族文化有儘量發展的自由，正式取消民族間的一切不平等的舊例，擴大民族竭力幫助弱小民族」〔玻玻夫〕。

現在我們再迅速地看一看三個方面的情形罷：南方，東方，西方。

在斯大林最初秘密地燃燒過羣衆的心魂的外高加索，在這各種民族互相排擠着的「同室操戈」的地方，那蘇維埃的民族政策，竟造成了奇蹟似的事態！不但種族的鬥爭完全消滅了，連祖傳了幾世紀的種族間的仇恨，也消滅了——雖然那些一時統治過外高加索三國的孟嘗維克，達契那克和慕沙瓦蒂等*。僞社會主義者們的勾結外援，挑撥內戰，造成亂勢，倒也無妨。在現今的喬治亞阿美尼亞和亞塞爾拜然中，你會得分明地認識這個道理：「對於一個小國家，除了蘇維埃的公式，沒有別的一種公式能給與這樣的自由。」

一個被社會主義啓發了的老實而正直的阿勒哈希農民，對於這個問題，想到這樣一種奇妙而有趣的比喻：「譬如有一隻象，看到有幾個孩子在草原上玩耍，暴風雨來了，它要保護他們，它就躺在他們的上面，爲了替他們遮隔暴風雨，却把他們壓得透不出氣。但是我們這一批少數的阿

* Dzhughals 和 Mossavaytists 都是阿美尼亞和亞塞爾拜然的政黨，理論上是社會主義的，和蘇聯有關係。——譯者

勃哈蒂人，實在是靠着那隻蘇維埃的大象而避免暴風雨的——因爲有斯大林撐住它的四隻腿。」

現在說到烏克蘭。烏克蘭問題，是最要緊的一個。這被沙皇的專制主義注入了病菌似的俄羅斯化的勢力，而壓迫甚久的烏克蘭，自從十月革命以後，變成了一個內戰不絕的亂紛紛的戰場：烏克蘭工人和農民反抗拉達的鬥爭，頓尼支工人對於卡雷亭 (Kareline) 團的鬥爭，德國的佔據烏克蘭，僞德謨克拉西議會的顛覆及貝特里烏拉 (Betrjuwra) 的並不借用德謨克拉西的假面具的政權的敗亡，協約國的干涉 (黑海艦隊)，但尼金的侵入烏克蘭，對波蘭白軍的鬥爭，對烏朗格爾的鬥爭。在烏克蘭所取的政治和戰術的方針，是有左右大局的作用的。

我們記得，斯大林是在一九一八年被派到烏克蘭去的；他在這里不但參贊軍事，同時也處理着經濟和政治上的事務。一九二〇年三月，他是出席烏克蘭的第四次黨大會的中央委員會的代表。一九二三年，他又參加第十二次黨大會之後的第四次民族會議。斯大林特別指明「從內部的觀點，同時從國際的觀點上看來的烏克蘭的真正的民族政策的巨大的重要性。」畢竟直到現在，那些曾經準對烏克蘭的計劃，依舊準對着它。波蘭 (它本來是跟法國勾結的，後來却勾結了法西斯蒂的德國) 和希特勒的德國，各爲自己的利益，並不掩飾它們的貪慾，而佈置着以白色的繼續成的 (反布爾雪維克的) 陰謀，伺候着機會。對於這們正直地完全地參加聯邦的共和國，時常在策劃一種秘密的謀害。

和歐洲的野蠻手段相反，在中央亞細亞，那蘇維埃化的問題，一向是暴露着遠東問題，也暴露着一般的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殖民地問題。關於殖民地問題中的社會主義作用——即這問

題中的共產國際和蘇維埃政權的作用，斯大林曾經寫道：「沙皇的俄國，是各帝國主義者的矛盾的集中點。它位於東方和西方的分界線上。它連結着兩種社會制度——一種屬於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的，一種屬於殖民地國家的。它是那種把西方的金融資本跟東方的殖民地結合起來的帝國主義的主要的支持者。因此之故，俄國的革命，也是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和殖民地革命——這兩種革命的結合點。因此之故，俄國革命的經驗，蘇聯共產黨的經驗，是具有世界性的價值的。」

不過，當蘇維埃政權開始之際，在民族問題上，有一種十分特別的「亞細亞式的」主張。這種主張表現出極強的「殖民」傾向，換言之，就是把遠方的國家視作附庸，在組織上和蘇維埃的同化作用上，主張須讓俄羅斯的分子佔取優勢，由移殖到亞洲的俄國工人，俄國的宣傳者們單獨地領導一切，佈置一切，那些土著民族，則如斯大林形容似的，「被冷落在社會主義的一旁。」這種主張是與馬克斯列寧主義裡面的一條原則不相適合的，——那是斯大林所特別尊重的一條，就是：對於公共的事業，全體分子須切實直接自覺地參加。因此，斯大林激烈地反對這種和社會主義的合理化組織相混雜的莫斯科獨占主義的表現，他以爲這種方法，太近似「保護國」的方法，或使蘇維埃的土著民族殖民地化的方法：這樣的一種制度，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實際上是拙劣的。

他自己努力要澈底做到使這些民族能够自行建設，使它們能够自立地進步，同時發展它們自己的民族特性，他把這些民族的被動的社會主義改變做主動的社會主義。這事業的成功，是全靠

看西伯利亞範圍以內的這些廣大的區域所利賴的那種偉大的經濟建設工作的。

根據這種意見，他着手土耳其斯坦所屬區域的改正（從此以後，這地方的經濟就有了很大的進步），又審慎地給中央亞細亞劃定了許多新的妥善的國界。許多共和國於是成立了；烏茲伯克斯坦，土可曼尼斯坦，達輯克斯坦，吉爾吉斯共和國。

現在受着外來的帝國主義的威脅的這整個的蘇維埃的東方……（那被不良的目的現代化了的，張牙舞爪的，搗亂的日本，走在前頭嗅着，其他的都跟在後面）。——這整個的東方，現在是被那深入民衆的正確，積極，豐富的社會主義理想，堅強地保護着了。

這種民族政策，以及從這政策的中心發射出來照耀遠方的強烈的光輝，不但是一種對於殖民地國家和半殖民地國家的治療作用而已（在這些國家裡，民族解放是社會解放的第一步，但對於這些國家，社會主義却同時帶給兩種解放）。它還直接或間接地影響着（將來還要影響）歐洲的一大批包含着被犧牲的少數民族的國家；有許多不同種的民族，擁有着一個首府和幾塊殖民地，就被一九一四年的大戰人工地製造或擴大成一個國家；譬如南斯拉夫，這不是一個聯邦，只是在塞爾維亞人獨裁之下，由壓力所造成的斯洛伐尼人，克羅地人，門的內哥羅人，以及一部分馬其頓人的集合而已；又如捷克斯拉夫，是奧匈二族的奇異的混合物中割裂出來的部分。又如波蘭，只有一半是波蘭人，又如羅馬尼亞，是被那些凡爾賽的兒戲而野蠻的外科醫生馬馬虎虎地把匈牙利人的德爾斯斐尼亞，俄國人的比薩拉比亞，再加上杜不魯德，雜湊而成的；此外還可以舉出更舊的糊塗賬來，如英國和愛爾蘭的勉強的結婚（愛爾蘭是在進行着分離運動的），如在比利

時這名義之下的高侶和法蘭德斯的結合。

在上述的這些國家裡，那民族問題上的列寧主義，是一種促進組織和革命的酵素。在下層，在它們的廣大的羣衆中間，有無數的眼睛，注視着這些使國土問題合理化的顯明的新原則。

在殖民地國家或半殖民地國家裡面，在被壓迫的少數民族中間，那帶來了雙重的解放的蘇維埃的原則，必然的會把「現在屬於資本主義的」廣大的民衆改變做「廣大的社會主義的民衆的」〔斯大林〕。

但是我們絕不要懷疑：這種光明是照耀全世界而無例外的。在歐洲的東半部和亞洲的北半部，這一個國際的公式已被應用於民族問題上了。這個公式是十分明白的；它是普遍適用的。從今以後，蘇聯的團結，已經可算是一切國家一切種族的世界團結的完整的一部分了。

到了有一天，整個歐洲完全蘇維埃化了，那時候，依舊有一個法蘭西，一個德意志，一個意大利，一個波蘭……他們各各依照着自己的智慧和精神的遺傳而發展，和現在一樣，而且比現在還要發展得更甚——但是，到那時候，在他們中間，沒有政治上的圍界，也永遠不會相敵對了。

以上是我們的眼中，——我們這些未嘗看慣這樣偉大的新事業的眼中所看到的：民族間的未決問題怎樣達到了蘇維埃化的解決的情形。這同時是理論上的也是實際上的。這些是「宇宙間」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原則。這些原則，同時那樣簡單，又那樣正確，那樣合理，又那樣高明，它們一下子就達到了許多的理想。假如社會主義這東西現在還沒有產生，那一定應該把它創造出

來，因為只有它能夠解決目前的現實；我們應該把它創造得骨子裡像象牙一樣的固定，但活用起來却像肌肉一樣的柔軟。

但這樣的社會主義，我們在這裡已經看到它在活動，它要使現在處於互相妒忌，仇恨，爭鬥的狀態中人類改變生活秩序，它要使地球上廣大的人羣的自古以來的亂紛紛的摸索，趨向到一個最完善的社會去。在我們的這個轉變的時代，在我們的這個「中古時代」的野蠻的純潔中，有先驅者們的格言，有那班具有發現世界的真實的光榮的人們的格言，揭示着教訓我們。

第五章 初層的基石 一九一七——一九二七

這樣，由於許多特有的歷史條件的具備，「那最初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的國家是俄國，——這是一個雖然有着非常堅強的革命領袖，却在經濟上和文化上都很落後的國家。」一下子飛躍，就超過了許多紙糊的共和國，超過了實行着什麼「民主的專制」和「專制的民主」的各種資本主義政體的樣品——這在理想上當然是好的，但是如何實現呢？

人們得了政壇之後，那就得將它運用，而且不容稍稍猶豫。「政府」，這一架巨大的機器，既然從一個大而無當的兇惡的偶像之手——而且在「臨時政府」的混沌狀態中，暫時動盪過一下之後——轉移到積極的極端派，熱心的思想家的手中，那麼無論如何，它應該在那個地球上最大的國家之上，在已經過去尚未臨到的兩種命運之間，繼續地轉動起來。

有三種巨大的工作待完成；抵抗外患，平定內戰，國內社會經濟組織的建設。我們不能說那第一種工作——外患——已經解決了，因為勃來斯得，李托斯克條約雖已締結，戰爭雖已停止，雖然昔日的敵人們大多數已公開地表示停止進攻，但那和革命麻煩兩年的內戰，依舊攪雜着外力的干涉。

從何做起呢？全部要做。一天一天的生活下去，就一塊石頭一塊石頭的建造起來。一切都同時進行。同時既要組織革命，又要抵抗四面八方的反革命「雪崩」，又要把那農業和愚昧的舊俄羅斯帝國（百分之八十的農民，百分之七十的文盲），那破壞的，混亂的，血污的舊帝國，改變做政治上社會主義的（還在現代國家中是獨一無二的）經濟上是進步的（跟別的國家有同樣的水平，而且更要超過）一個大國。

讓我們再回顧一下那些日子，那些成功的日子，那些重新開始的日子罷。那時的帳目和清單是怎樣的呢？從一九一七年的十一月，當列寧在斯摩爾尼院 (Smolny Institute) 聽報紅旗已經豎起，而且這紅旗從此成了世界的中心之一的時候起，後來俄國的其餘部分，是怎樣一種情形呢？一九一四年的帝國主義大戰，使俄國損失了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的金盧布，屠殺了三分之一的勞動民衆；工業生產和進出口，減縮到一九一三年的數目的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那差不多把整個帝國撕裂得粉碎的內戰，表現着一種值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盧布的損失。所有的工廠都被破壞無餘了，大部分的公共建設也如此。被砲火洗刷過的田地，大半荒蕪了，行政，教育，一切政府機關，都被大亂和內部敵人的仇恨所粉碎了。紅軍方面，沒有槍，沒有靴，沒有麵包。後來陷入了封鎖和抵制之中的新政府，先是被着列強的武裝的壓迫。讓我們切近地看一看這種性質很特別的（陰險的，不露面的）侵略戰爭的真相罷，這種戰爭的光榮的領導者是克雷孟梭先生，機恩凱雷先生，勞合，喬治先生——這一班民衆革命的謀害者，劍子手，壓迫者，和民衆的禁錮者——這班老猛虎，老狐狸，老畜生——這班發動一九一四年的大戰，破壞

一切解放運動的指揮者。讓我們切近地看一看這種如「邱吉爾先生」所說的——「這話是斯大林最近重提起的——「十四國的侵入」的真相罷。

那沙皇的護衛，白翼的冒險家科爾却克的軍隊，會從法國政府領得一千七百架機關槍，三十部坦克車，幾打的大砲。當科爾却克入寇的時候，有幾千英美兵，七萬日本兵，和六萬左右的捷克斯拉夫兵參加在內。

但尼金的六萬兵士的武裝和軍需，完全是英國所供給的。它價到二十萬支槍，二千尊砲，三十部坦克車。在但尼金的軍隊中，又有着幾百個英國的顧問和教練官。

侵犯海參崴的聯軍中，有兩師的日本兵，兩營英國兵，六千美國兵，三千法國兵和意大利兵。

英國在俄國的內戰中，消耗了一四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鎊——損失了五萬兵士——這比參加世界大戰的兵士的損失是較輕的。

從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一年，英法兩國不斷地殺戮俄國人，蹂躪俄國的土地。我們只要另外記一記這事情就好：直到一九二七年的年底，還有四百五十個工程師和一萬七千個工人，在修復那「西方文明」所留下的高加索的一個油區裡面的破壞。——總計起來，歐美各大國的大舉的干涉，在俄國所造成的破壞的，實值四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盧布之多。

我們記得：一九二一年——大戰停後的三年——那駐在俄國的法國將軍杜杜斯尼爾，怎樣的公然袒護蘇維埃政府的敵人。那法蘭西共和國大總統米勒朗（他又能够統領全世界的一切叛黨）

和另一法蘭西共和國的大總統杜美格（這個老「教士」，最近把他的——德謨克拉斯的——左手獻給了法西斯蒂，而剝削着法國人），這些先生們，怎樣的做出連英國和土耳其都不敢做的事情：正式承認那被喬治亞所驅逐的優但尼赤和會盟里爲喬治亞的元首和大使。那以公正和民主自誇的法國政府，怎樣的承認科爾却克，又幾乎要承認烏朗格爾是沙皇的代理者。

我們記得：白衛軍怎樣地在法國集中，在法國成立了一個國家裡面的武裝國家，在法國政府當局的蓄意的照顧之下，發展他們的各種組織和軍事編制。（那同一的法國當局，還實行驅逐一切曾經參加非官方的或非宗教的示威運動的外國工人，並且制定了可以無理由地驅逐外國工人的新法律）。這一班沙皇制度的劍客，曾在凱旋門下武裝列隊，那白黨刺客戈爾古洛夫，也是他們所派遣的。（大總統杜美格，在白俄看來，是有罪的，因爲他對於蘇維埃的憎恨不夠深）。至於烏朗格爾的黨徒，他們大受巴爾幹諸國，尤其是南斯拉夫的歡迎，他們在這些國家裡面武裝着——甚至於穿着制服——等候着爲那反動的復興道神聖目的而進軍的時間。（在最近，南斯拉夫譴責着匈牙利的包庇刺客，這實是沒有資格的——至多，它只配埋怨國國的競賽罷了。）

說到這里，讓我們擴大眼界，看一看後來幾年的情形，以便明白全部有組織的大陰謀的真相——到了今日，在這些陰謀上面，人們已經拉上一幅純潔的帷幕遮蔽住了，因爲，所經「歷史」這東西，好比一個高雅的客廳，在這裡面，最好是絕對不談這些醜事，以免有傷尊貴的賓客們的心。

日後蘇聯用了超人的努力力纔恢復過來的，那工業建設的破壞，實在是達到了國際合作事業

的頂點的，參加這破壞的，有政治上的要人，有軍官，有技術家，有政治偵探，有列強的外交家和警察，多少秘密的陰謀，多少的詭計啊！我親眼所看到過的許多照片資料，現在還使我膽戰心驚。有一時候，人們可以到蘇聯的任何角落去找尋，人們一定能够發見，英國、法國、波蘭、羅馬尼亞的偵察行動和毀壞行為的徽齒，跟白色瘟疫的毒菌混雜在一起。這類東西，就在現在還有些剩下。那班曾經把橋樑炸斷，把剛得解放正在喘氣的俄國的公共建設破壞，把鐵沙放在機器裡，把少數殘留的機關車弄得不可用的人們——同是這班人們，在一九三三年，把玻璃粉撒在工人合作社的食物裡面；也是這班人，在一九三四年，派他們的一個同黨到列寧格勒的斯摩爾尼院，從背後把基洛夫的頭顱擊碎。人們常常發現許多陰謀的巢穴，以及許多原來廢棄在芬蘭、波蘭、立陶宛等地的暗殺者和恐怖黨的混進。這班由白黨報紙俄羅斯的真理和別的陰謀機關所教唆兇徒所犯的罪惡，也被那些「思想正確」的大報紙假仁假義地評論着。

關於那個化了幾百萬金鎊，在全世界布置了大英帝國，反動的國際網，到處派出間諜，偵探，造謠家，破壞者和網羅者的，情報部所做的又殘忍又可笑的工作，我們有什麼可說呢！恰好有一個無意之中得到的例子在這里，可見那種毒菌的進行的猖狂：據法蘭西行動報的職員喬治·伐羅亞（現在已與該報意見不合了）。在一個斯大林的報告上所寫的序文中說——斯大林的這個報告上所說的並不是什麼了不得的大事，只是證實列寧對他所說的一種有益的意見而已——有一個情報部的間諜，混在蘇聯政治委員會裡面，甚至混入了最高指導部的中心，這個間諜，向英國政府做了一個報告，英國政府將這報告寄給法國政府，法國當局（模恩凱雷）又將這通知萊翁。

陶台先生——這是法國保王黨的首領又是那觀視法國王位的人的宰相——這樣一來，那位當時在法蘭西行動報裡辦事的喬治·伐羅亞先生，也得以知道了。

想破壞社會主義國家的威信的這種普遍的願望，要把污泥丟向那個帝國主義之勁敵的這種心理上的需要，使得一種意想不到的造謠和誹謗得以發生。但在這裏，我們不預備涉及這個荒唐的滑稽的範圍。這裡面的情形說來太長，決不是一本書所能容納的。我們在下面，只要記述一些比這些愚蠢的事情嚴重得多的事情（有些謠言和誹謗，就在現在的人們的耳朵邊，也還在鼓動着呢），就是那些特別設在中歐，專門偽造動聽的蘇聯的錯誤，使這新國家在各大國的當局和輿論中間的印象變得十分惡劣的人員和機關（這種機關的設備置是十分完全的）。每件事實一經傳播之後，另一方面總是由一位大人物向英國下議院莊嚴地加以證實（這位大人物，除了這事，就一無所能）。那偽造的「齊維諾夫」事件，對於英俄關係發生重大的影響。那保加利亞的劍子手張珂甫所利用的捏造事件，使他能夠誇張赤色妖魔的怪狀，並且給他一個機會，能從勝利者們的手中獲得一支補充的軍隊，得以屠殺自己國內的民眾。

把帝制的俄羅斯徹底翻造的這種偉大的「破天荒的事情」，會使得反動分子——尤其是叫做德謨克拉西的一種人——倉皇失措（德謨克拉西在這事情中完全露出了他們的真面目），這是在我們的意中的。然而，我們不免驚奇的是，許多忠實的法國自由主義者，他們對待革命的俄國，竟也跟英國對待一七八九年的革命的法國一樣。使我們詫異的是許多優秀的知識分子，竟也依舊公然表示不能理解這種偉大深刻的現象。（這其實就是在我們這里所說的「思想的進步」哩）。

但是在一切這些憤恨的中間，破壞的中間，呪詛的中間，我們所聽到的民衆的議論，都是很特別的，他們的議論，可以舉一個叫做浦里德的無名的新聞記者的話做例子，他說：「總有一天，我們這時代的一切人，會得理解并擁護赤俄的偉大的努力，而就在這種程度上分高低的。」——總有一天麼？但是，這其間，

「並不很短，却經過兩年之久，自從一九一八年以來，同志們，你們是記得的，『——』最近斯大林曾說：『彼得格勒的工人們，在好幾個星期之間，甚至連一塊麵包都得不到。那些能够得到一磅的黑麵包——其中的一半還是發霉——的日子，要算是幸福的日子了。』」

以上所說，就是那個好像被圍困在資本主義的動物園裡面的新政府所要四面八方徹頭徹尾地抵抗的環境。全都要做麼？事實上比這還麻煩：全都要重新來做。這是一種雙倍的工作。

當政權已經到手，却還受着「白色的歐洲人」的牽制的時候，姑且作相當的暫時的讓步，而趕緊把殘破不堪的經濟恢復了再說，這在常識上，似乎是很說得通的。在衰落到這步田地的經濟情形之中，爲什麼不可以相當利用舊有的組織，現成的布爾喬亞的制度，作逐漸復興之計呢？在致力於政治工作的完成和經濟制度的改革之前，應該專力做頂緊急的事情：鞏固戰線，保證生活。這是事實上分明表現着的。

不錯，在經濟上，是這樣的表現着，但在政治上所表現的，却和這完全相反。只有那些忙碌的小商人纔這樣做。創造世界的社會主義者可不是這樣。不錯，這種辦法好像是一種常識。但是革命者的常識是比這樣的常識偉大得多的。它看得更遠，它看出在這樣的時候，採取這樣的做

法，乃是開倒車。它決定在無論怎樣可怕的环境中，非絕對地摧毀政治上社會上的舊物，完全解散舊有的機構，絕對不願新的社會跟這些東西有所牽連。換句話說，即使差不多要毀滅到自己也仍然毀滅！這種勇敢的決心，是非凡的，是使大事的進行得到合理而驚人的效果的。

布爾喬亞們還想不到他們的時代已經過去。資本主義的權力竟會在舊大陸的某一部分上崩潰的麼？這想頭從未到過他們頭腦裡。而且，在實際上，除了戰鬥的社會主義者之外，也少有人相信革命。對於那個跟別政府完全兩樣的政府的宣言——那強調地表示脫離過去現在的一切沙皇制度（或換湯不換藥的自由主義）的宣言——一般的人持着懷疑和觀望的態度……在第四次黨大會上（一九二二年）有人作回憶的報告道：「不但是辦報的人們不肯重視工人政府的最重要的革命處置……連每個工廠，銀行，會計所，商店，每個律師事務所，都是反對我們的營壘。……」

因此在這時候，那吃緊的革命的安全問題又尖銳化起來了。革命，在這時候應該露出它的顏色，表現出它的力量。摧毀俄國布爾喬亞的工作還沒有完成。還有一部分的勝利尚未獲得呢。

所以，無論如何，應該推進這次革命，使它達到最後的目的。要把布爾喬亞一掃而空，要截斷種種中間的橋樑（破壞，在另一意義上就是創造）。應該把一切沒收充公，把商業，工業，全部掌握過來。

這好像是自願地要把革命者在鬥爭着的環境弄得更加複雜，弄得特別嚴重；這差不多是一定要使慘酷的危機，在某幾方面更加擴大；這差不多是向民衆要求一種似乎超過現實的可能性的努

力，而且特別要引起農民的反感。在這種地方，倘若換了狹隘而平庸的政策，那一定是急於要採取那種必然的維持布爾喬亞制度的妥協手段的，但是，十月的人們，却徹底破壞了一切。在一種不可算計的破壞之上，他們又添足一種決定的徹底的破壞。那「革命」，爲了自衛，爲了替自己建立更深的基礎起見，情願鑽到更深的深淵裡去。

但在隊伍裡面，也有着種種不安的心理，就是在領袖中間，它有着多少的猶豫。譬如：那時的一個大工業家烏克華斯曾經提議備款取得被沒收的烏拉爾許多工廠的租借權。在恐慌中的加勉納夫和齊諾維夫是主張租借的。斯大林反對這種主張。列寧也是反對的，不過還有點遲疑不決。後來，在烏拉爾區工作的倍拉·鏗，被中央委員會召了回來，諮詢當地工人和職員的意見。當地的主人和職員是反對租借的，他們以爲這種租借，在烏克華斯，只是一種捲土重來的手段，但對於共和國，却弊多於利。當決定這個問題的會議開會時，齊諾維夫和加勉納夫很想得到斯大林的反對他們所贊成的租借主張的報告（實際上到了後來他們也是贊成了斯大林的意見的）。但是斯大林拒絕在從烏拉爾來的人發表意見之前說話。由倍拉·鏗提了出來的烏拉爾方面的意見，終於使得租借的主張打消。那誘惑的香餌，終於被拋棄了。

布爾喬亞的生產組織被激烈地拋棄了，「戰時共產主義」建立了起來，這是指那種僅只部分地利用國家所佔據的經濟要素而言：「循隨的集中化的組織，用以從那被戰爭，革命，急工所破壞的工業中，生產出最低限度的必需的物品來，免得城市利紅軍的餓死。」

關於小麥遺方面，竟不得不實行「農民的剩餘生產物的強迫徵收」。這是一種國家的徵收制

度，一種「圍城中的制度」。

像這樣，在最後一次的激烈的打擊之後，布爾喬亞的政權的殘餘部分真正地完全消滅，成爲過去的東西了，同時白軍和外國的軍隊主力也被逐出國境之外了。在歷史的和經濟的廢墟之上，現在只剩下剩着革命與和平了。但是，大眾的生活陷於垂斃的狀態之中；商業和工業更加破落。自然界也陷在混亂之中！由空前的旱災所造成的現代的最可怕的大飢饉之一，降落在俄國的糧食豐富的區域。無論那里，那些在兩年的大戰中，甘心或勉強地儘量供給過軍餉的農民，現在是嚇怕了，不相信了，時常取反對的態度。在某幾件事情上，他們曾經反叛過（一九二一）。

至於每天向四方盼望着的偉大的援軍，那世界革命，却絕對地沒有到來！那國際的無產階級做了什麼事情呢？它也會發動過幾個地方，但是沒有結果；有的是失敗了，像匈牙利那樣，結果的確是被協約國的刺刀逼回到舊制度裡面去；而像那人們期望最深的：如德國的無產階級，却被克雷孟梭先生的機關槍所掃蕩了。

應該不靠任何人。而且，一九一九年的人們——革命第二年的兵士們——應該明白，蘇維埃政府是要用他自己的手段去建設它的經濟組織的。

因此，當戰時共產主義已經不合用的時候，就得立刻考慮起新的過度的經濟方針來。同時在西歐和世界的其餘部分，那政治和社會鬥爭也採取同樣過渡的形式——就是直接的要求 *Les Revendications Inanne distes* 和部分的統一戰線的形式。

在這樣的情勢之中，蘇維埃政府覺得已經可以安靜地實行兩年來所決不願做的事情了，覺得

可以把戰時共產主義的制度，改做市場制度了，於是就創立了新經濟政策。

在我們遺忘的世界裡，新經濟政策是沒有得到正確的理解的，有的人還大大的誤解了它（如赫禮歐先生）。人們大抵當它是布爾雪維克的急轉直下的後退，說是因為布爾雪維克冒昧地闖進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却發現了這種制度，其實是不能實現的。

這種見解完全不對：像我前面已經說過的那樣，布爾雪維克們是決定要由他們的偉大的組織者，去完成那尚未澈底的革命的。他們很知道，若是這樣做去，那一定會得增加經濟上的困難和紊亂。但是只有在政治形勢已經完全革新之後，這纔似乎不妨在經濟上採取變通的辦法。「革命者和改良主義者的差別，」有一個不常說這樣的話的人（托洛茨基）在那時說道，「在乎革命者是否只許在無階級取得政權之後，這纔採取改良主義的。」新生的蘇維埃政權的表示是這樣的：「當我覺得應該讓步的時候，我也讓步，但這要等我握到政權之後，在這之先却決不來。」

於是，事情就變成這樣了：關於農民和小麥方面，取消了「剩餘的生產物的徵收」——這種在我們看來是太暴烈的制度——而代以「交納一定量之收穫物」，准許剩餘物之自由販賣」的制度。貨幣也從新可以流通了。穩定廣布的辦法也實施了。國家的企業也建立於商業的基礎上。工資依照工作的品質和工作效能而決定。當國家不能自己經營所有的企業時（既然它已經把所有的企業都操在手裡），它可以把一部分租借給私人的企業家。

這個並沒有顯出布爾雪維克的後退（這是大家都看見的）的政策實施以後，——一九二二年——情形是如下所示似的大大地「恢復」了：國有的鐵路（六三、〇〇〇基羅米突的路線，八

○○、○○○的路工），已經提供着等於戰前的三分之一活動。在農村方面，有百分之九十五的名為國有的可耕土地，已經作着只要繳納一部分收穫物的農民的「經濟上的享受」。（雖然租借的時候有限制，又須負擔一部分的義務，但實際上可說是「屬於農民」的了。每次三○○、○○○、○○○普特（一普特等於四十三磅）的黑麥的收穫，已抵得戰前的收穫的四分之三，至於工廠，那是全部屬於國家的；但是國家所經營的只有四千（包括一百萬工人，這是實在的），租出的也有四千（比較不重要的，包含八萬工人）。私人資本在國內貿易上出現，而且有了發展。它代表着國內貿易的流通資本的百分之三十。對外貿易，仍舊是國家專營的，這在進口方面，相當於戰前的四分之一，在出口方面，則相當於二十分之一。

市場制度又恢復了，但是那勞動者政府的地位，在政治上頗為危險，被牽引着右傾。跟社會主義的進展「平行地，發生着「資本主義的進展（尤其在農村間）」——於是又要嚴加防範了」。

在醞釀着的鬥爭中，「國內的最發展的生產力是屬於無產階級政權方面的。總而言之，在市場上無產階級是具有一個比別的人們更有力的土地所有者，購買者，出賣者的姿態的，加以它又握有着政權」（特別是那使它擁有財政上的武器以及在私人企業上也可收補充的利益的國庫管理權）。「布爾喬亞方面則具有過去的經驗以及和外國資本的瓜葛」（一九二二年第四次黨大會上的報告）。

這是無數的社會影響和道德的影響之下的一種嚴重萬分的決鬥的開頭。雙方的主要目標，都

要在這個農業的俄國中間，爭取農民的市場。在農民裡面，雖有一部分窮苦者被剝削者會幫助過革命，但是現在已都不信任那些「雖然給了他們土地却奪去了他們的小麥」的革命者了。老實而近視的俄國農民，已經表現出要激烈反抗的樣子。從協和農村的觀點上看來，這新經濟政策，在它的對於企業和私人利益的部分的開放上，在它的不再施行那種使農村筋疲力盡的強迫的徵發這規定上，是有極大的重要性的。

在瞻望前途時最不自目的布爾雪維克，很知道社會主義國家的將來，全靠農村的生產經濟和都市的生產經濟之間的協調（就是「革命」本身，也只有被全體農民所接受——有時候也被支持——或被容許的時候，方能成功）。但是那班新的領袖，雖然明白地主張着這種協調，雖然指示着這種將來的偉大的協調的目標，却暫時地把重工業，電氣化，以及合理的經濟組織，國家的重要事業等等，都停頓下來。這是爲了要由一個減低計劃，使能從事必要的準備，作將來的張本的時期，先使革命鞏固起來。對於農村，他們竭力地推進合作運動，并高聲表示：他們是在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路上，雖然「離出發點較近而離終點還遠」。

在莫斯科，他們又鄭重地斷言道：「無論工業的租借或商業的條約，政府都可以同意，只要它們不至於破壞國家的經濟基礎」。

先生們和太太們，你們還記得這項宣言在「思想正確」的人們中間所引起的譏諷或大笑麼？在法國，那些堅決主張「信任布爾雪維克」的人們，陷於很不利的地位。「哈哈，他們到底這樣做了，那班強硬的革命家！」各國的聰明人儘舌道：「顯然的，他們實行第一步的退却，預備回

到舊有的資本主義的好方法去。這就是那種愚蠢的社會主義的試驗的曾經的開始。」

一九二一年，當姬采林在意大利遇着法國的代表戈爾拉先生的時候，戈爾拉先生忽然中途打斷了那個蘇聯外長向演說，說是布爾雪維克既已破壞了他們本國的經濟制度，那就沒有資格再參加政治經濟的談話。我沒有認識戈爾拉先生的榮幸，但是我要說他是一個馱子。無論怎樣，他們這種傳統的判斷，只在布爾雪維克假如有暇。在他們所承受的土地上實施他們的經濟方法的時侯，才有一點點價值和一點點意義——但事實上情形並不是這樣。不過，說這樣的套話的人，並不只戈爾拉先生一個（我們要把這些套話釘在狂妄地說過它們的人們的背上，被人嗤笑的倒是這些人們自己呢）。

「國家不願讓它的經濟基礎被破壞。」但是，我們知道我們西方的保守的共和黨人，我們的變節的政治家，會得不相信政治舞台上的人們是能够嚴守誓約，依照他們自己所決定的路線徹底做去的。這種新的方法是什麼東西呢？這是那些奇怪的東方人所杜造的東西之一。也許這是一種他們最後用以裝飾他們的政治的時髦東西。雖然如此，但當他們激昂地宣言：「我們決不讓我們自己被欺騙！」的時候，這班正直的人是合理的。他們宣佈了他們的政策，仍然格外覺得他們的正直。

「他們退回去了麼？……」不，總長先生；不，男爵閣下，他們沒有退回去。於是，在你們這班資本家的尊臉上，肌肉就拉長起來，變成諷刺畫裡面的那種樣子了。在這政策開始之後沒有多久，誰都能够證明：布爾雪維克是在各方面，實現了他們的目的，恢復了他們的工業，漸漸的

減少了私人資本的作用，而且誰都能够證明：自從在 NED 旗幟之下的經濟工作時代開始以來，他們是表現着十足的勝利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調和，私人企業和集體企業之間的調和——鯉魚和鬼子的結婚——實際上，只是暫時的一種現象；世界資本主義的面容在 NED 之前發亮，實際上只是一線回光的反照；所謂 Zepanar 不過是已經過去的歷史的年代中，曾經作爲名角而在舞台上出現過的過時人物罷了。

這就是所謂機會主義和它所表示的意義。列寧的偉大和那跟他在這混亂動搖的環境中最密切地合作的人的偉大，就在乎他們有現實的機會主義 (Poppotumisme estivo) 的手段。假如有人問你：「機會主義是好的呢？或壞的呢？」你不要答覆。因爲你不能答覆。機會主義——當然，我使用這字，只在它的一般的意義，不是在它有時所含的特殊的惡劣的意義上——是可以好，也可以壞的。他能够引導你達到勝利，也能够引導你至於失敗。利用他的有用之處，這是必須的；放過它不用，那是一種錯誤。在某種環境中，宗派主義只是一種迴避責任的行爲。當一切事物正在動搖而且傾向別方面去的時候，百分之百的固執和躲在純潔的象牙塔裡，那往往是太便宜了。但在另一種時候，人們却不應該放棄他們的不妥協性——非專制地強硬不可。無論什麼事情只要做得正直，而且，單是一個好的志願，是不够完成一種任務的，即使一旦也能做到一部分。一九二〇年的那時候，在社會主義者中間，應該被在惡劣的意義上叫做「機會主義」者的，並不是那班贊成新經濟政策的人們，而是那班反對新經濟政策的人們。因爲這班人們是爲目前而犧牲將來的，但機會主義的正確的意義，却是爲將來而犧牲目前。列寧和斯大林——以及一切偉大

的戰略家——的機會主義，是爲了進兩步而退一步。在愚笨而害怕的人們，在那些意志不定的，有意無意地在找尋遷路的社會主義者們，則機會主義乃是爲了進一步而退兩步的行爲。

況且，馬克斯主義會告訴我們：一句話只是一句話——這就是說，在一句話的本身上，是一無所有的。許多公式，只在被人們所活用的時候，方有價值。在文法上是同樣的一句話，但一被應用之後，就會成爲完全兩樣的事情。馬克斯主義是一種絕對的「相對論」(The relative absolute)。說到究竟，它乃是馬克斯主義者所做的一種事情。(而且這並不是專屬於卡爾·馬克斯的。馬克斯之所以成爲一個偉人，並不由於他的姓名，而由於他是馬克斯主義者裡面最健全的一個。)

依着是這個人——這個在一九〇三到一九一二年間，以他的「超過」許多同志倔強的堅決，把一個雖然受着沙皇的迫害的革命黨分裂爲二的人；這個正「因爲要使黨堅強」而這樣做的人——是他，在黨得了勝利之後，却主張在許多點上跟布爾喬亞的方法妥協。要是你以爲這中間有着矛盾，那你是錯了——因爲列寧，這一切情勢的指導者，他在別的場合，正如在別的場合，同樣地正確的。

這就是列寧所說的「直線中的曲線」。這個精細而有力的概念所表示的意義，並不是阿拉伯式裝飾似的曲線的組合，不是迴文式，也不是螺旋式，它是使人想起螺旋圈或愛因斯坦學說中的空間的曲線的完整的。

但在這一切情形之中，應該愈快愈好的走上確定的大道，使經濟制度依照預定的進程，回復到社會主義去，然後系統的地使它發展。

一九二二年——就是新經濟政策實施的第二年，在第十一次黨大會上，列寧斷定「退步已經到底，現在應該考慮重新組織力量了」。他接着又說，「此後的局面的關鍵，是在人材的選擇上。」在第十一次大會之後，斯大林當選為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秘書長。他在建立全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目的上，立刻把黨組織——我們簡直可以說是他把黨再組織起來。

局面依然是混沌的局面，列強尚未罷兵，至少還留着的一部分。當俄國想從他們得到什麼東西的時候，總是被婉言拒絕，只有斯堪的那維亞各國和德國不是一樣，跟這個德國，總算簽訂了拉羅維條約，成立相當的互助關係（但是很可憐）。跟別的各大國在幾諾亞所舉行的會議，毫無結果。這會議的破壞所藉口的理由，是布爾雪維克不承認沙皇時代的債務。這時候，歐洲的幾個大國，正靠着美國借給它們的九百萬萬法郎，在再建他們的戰後經濟（這一筆款子，跟先前由於戰爭的借款，是絕無關係的）。而這般列強，預備到了將來，也要振振有詞地賴掉美國的債，所以故意把人家欠他們的錢和他們欠人家的錢分得清清楚楚他們決定公然賴掉欠人的債務，使與這些債務有關的憑據，成爲廢紙。但是他們的這種行爲，是不像蘇維埃政府否認沙皇的債務那樣的具有道德上的理由的，蘇聯的理由，跟戰前的最和平的政治家所莊嚴地宣言一樣，在於沙皇所舉的外債，是用於沙皇私人的利益而且用以壓迫他的民衆的。一個拒絕負擔敵對的沙皇所浪費的借款的革命政府，跟那些否認自己所簽字的借據的政府（何況又在向戰敗國勒索巨額的賠款之後），

這其間，我們以爲是大有分別的。

當大部分的蘇聯公民在過度癡肥的，Zeping 周圍咬着黑麥餅的時候，當許多領袖們由於營養不良而消瘦下去的時候，人們開始做起建設將來的工作來了。

合理的工作。根據合作的原則而組織的工作。首先是決定主要的目的。馬克斯主義的理論和實踐在這種得着一塊廣大的用武之地。人們把理論和實踐同時引進，因爲只有理論能够教導實踐者怎樣做，使一切事情開頭就入於正軌。理論劃定了從出發點到終點的軌線。倘若這理論是正確的，那麼它一定能够伸入未來的犄角。斯大林常常引用列寧的話，理論是一切事情的大槓杆。凡是看見過斯大林在工作着的時候的人，都承認他的主要的特質是能够「在極複雜極零碎的事態中看清一種形勢，能够把最要緊的工作放在第一步計劃裡，能够把他的全部注意力對付在當前的最重要的大事上」。我們留心聽那些真正了解斯大林的人們——譬如指導國家計劃的盧比雪夫——談到斯大林的成就的時候，他們不單是說：「他做了這樣和那樣。」他們說：「他在正當的時候做了這樣和那樣。」

第一個有待解決的當前的最大問題，是農民問題。這曾經是，而且現在還是蘇維埃共和國的最大問題。

第一我們不要忘記——而且要時常提起，當時的俄國的兩特點，是「農業」和「落後」。標記着彼得格勒，奧特賽，提夫里士，海參崴，阿爾康吉爾斯克這些名稱的地方，這時候依舊是一些封建的，無秩序的，混亂的區域，另一方面，是克里姆林的外表富麗，皇冠上和教堂上裝飾着

金剛石，大公爵和 *Barons*（貴族）們在外國過着窮奢極侈的生活。不久以前，半數的土地還屬於一萬八千個貴族，其他的一半，則屬於二千五百萬的農民。由這種事態所造成的不調和，充滿在各處。工業十分落後，幾個相當廣大的部門，却又差不多有一半（43%）是受外國資本的補助的。

但是，一個現代國家的成長，是要靠工業的。要把一塊廣大的土地改變成一個偉大的國家，那是要經過工業化的。

從農村的觀點看來也是這樣的麼？是的，就是從農村的進步的觀點看來，在經濟上在政治上都一樣：唯有經過工業的居間干預，農村的社會主義化方才可能。

所以，「經濟的重心，應該移轉在工業的發展上」（斯大林）當人們面對着廣大而赤裸裸的一片田野，草原，森林的時候，空口說說這種話是比做起這種工作來容易得多的。但是，人們應該有在一張白紙前面開始動手的勇氣。

「我們的國家，應該從一個農業國改造成一個工業國，它必須能夠自己生產它所需要的一切。這就是我們的工作路線的要點和基礎。」

斯大林，工業監察委員會的人民委員，曾經這樣說。

但是，他那和列寧完全一致的理想，並不是說只要「經過工業的道路而發展」就夠。應該在各種工業之中選出幾種來：「所謂工業化，並不是一般地發展一切工業的意思。」經濟的「中心」，經濟的「基礎」，使全部工業進步的唯一的手段，據斯大林宣稱，乃是重工業的發展，

〔金屬工業，燃料工業，運輸工業〕乃是「生產手段的生產的發展」。

這也就是說：這時所應該發展的，是當時幾乎僅等於零的東西——由於前數世紀的落後，由於最近幾年的破壞，也由於那暫時還要存在的新經濟政策所引起的經濟組織計劃上的變動，當時俄國的重工業，可以說實在是沒有的。

但是列寧會堅決地指出過：「倘若我們沒有辦法建立我們的工業，使它發達，那麼我們的國家不必想成爲一個文明國家，更不必說社會主義國家了。」關於重工業，斯大林也說過同樣的話。

在這裡，我們應該插說一些和前面曾經考察過的意見相似的意思。關於重工業，又發生了一個問題，就是這個政策，恐怕是非長時間不會見效的。另外一種相反的意思似乎比這合理得多：開頭的時候，先平穩地恢復輕工業，加以發展，如紡織工業，消費品工業，食品工業，先提供民衆的食用，滿足大衆的直接的要求，先使那些最迫切的需要叫呼聲停止。……總之，那些平常的人們，那無定性的市民大衆，那些巨大的雪人，是但願目前，寧可從頭走起的。

這又是一次卑俗的邏輯與偉大的邏輯之間的衝突，是對於將來懷着繁重的顧慮的有遠見的人們與不負責任的近視的人們之間的衝突（這種衝突，只在最近方才停止）。

近視的人們說道，從小的地方做起，慢慢的發展到大的地方去罷。這樣，你們應該減少大家的犧牲，你們應該縮短困苦時期，你們應該安慰人們的怨恨，你們應該易致內部的和平，當你們缺乏着必要的生活必需品的時候，你們不必再冒昧地去做那種要把農村改變做都市的工作了，

也不必再想打破世界記錄了。

但是：

「你們的觀點是錯的，同志們。」

那邏輯和那對於將來的堅信，借從斯大林的口答覆而且解釋道：「不錯，假如從發展輕工業入手，那對於都市和鄉村的人民，的確是可以給與若干直接的滿足的。但是，在這以後又怎樣呢？只有重工業纔能作爲一個國家的工業復興的基礎。只有重工業的發展，纔能使農村集體化——這就是說，使社會主義的偉大理想實現。」

「農民和工人之間的合作是必要的」，斯大林說：「但是，要把農民重新教育，要把他們的個人主義心理除去，使變成集體的意識，要由此準備達到社會主義社會的道路——凡這些，只有新的技術的基礎，集體勞動的基礎，大量生產的基礎上，方才可能。我們只有實行這工作，纔能够永遠生存下去，否則，我們便捨棄了這工作，但那樣一來，我們就免不了要回到資本主義去了。」

況且，還有着一個國防問題，這也是需要重工業的。國防是一種神聖的義務。許多偉大的名詞，都被在資本主義的廚房裡加油加醬地弄壞了。所以，倘若不給這些名詞第一次地下一個真正的定義，那是沒有道理的。國防這名詞，當它表示野心，侵略，「你得護我」的意思的時候，當它表示破壞和自殺，當它表示民族侵略的第一階段的意思的時候，那是可恨的；但是，當它表示進步的階段，表示把民衆提拔出奴隸狀態的時候，當它表示痛恨那些一味製造口實，企圖破壞生

長着的社會主義的侵略國家的意義，而且在這目的上盡了許多堅實有效的努力，使人們不能公然反駁它們的意向的時候。國防是比生命還應該重視的東西。這一種社會的防衛的義務，跟列強的那種罪惡的信仰大不相同，它是表示着要使俄國革命的曙光真正成爲惟一的曙光這意志的。

斯大林，在數年以後，有一次對一切事情下廣泛的結論的時候，他說，蘇維埃國家的第一層基礎，是工人和農民的同盟，第二層，是各民族的合作，他又說第三層，那是「紅軍」。

所以，重工業這東西，若用俄國的道理努力把抽象觀念變成具體事實的人們所愛用術語來說，那是「第一個環」。

但是單單把重工業拿在手裡，那還不够。必須加緊工作，決心快趕。倘把日期拖得太長，那會得減損這種進取的成功價值，而且會得引起許多危險。在廣大的工場的舊時的荒廢狀態中，倘把工作拖得太久，那就是有意招致破壞的危機。因此，「定得趕緊」。

但在這裡，馬上發生了另外一種幾乎難以克服的障礙：專門人材不够；而所謂技術，是同時需要機器，也需要人的。在這募集技術人員的困難中，人們也是採取了初看好像失策的種種堅強的手段。關於這事也有兩種分歧的意見，據斯大林所說：（這是最近當我校對本書時從無線電廣播中聽到的）……「兩種不同的意見：一種主張先訓練專門人材——這是一件需要十年工夫的事情——然後，再建設機器。另一種主張馬上同時建設機器，也訓練人材。我們採取了第二種決定。在這辦法中時也發生一些缺點和一些損失。但是我們畢竟抓住了在一切中最高可貴的東西，這就是——時間，並獲得了必不可缺少着的專門人材。結果，我們所得的遠過於所失的。」

這是布爾喬維克的沉着而機敏的毅力的一次新的偉大的成功。「我們勝利了——而且這是真正當的做法。」斯大林在一九三五年說道。

但在當時，這種取漸進的舊方法而代之的突進的方法，並不是人人都贊成的，就是在負責的要人們中間，也有着異議者。有許多人做着鬼臉冷觀着。斯大林把這些人從他們所躲的角落裡搜索出來，鞭策他們去工作——「這班拔着拖鞋，穿着睡衣，戴着睡帽的自私自利之徒，他們的接近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只是爲了他們自己的生存的安全而已。」

於是，在目前的廢墟之上，我們相見未來的朝露，跟巨大的工業的影子一同密佈起來。在國家里，在廢物亂逆的卑陋的近景的前方，出現了車床，鼓風機，水閘以及黑色的虹似的大橋的環洞所組成的雲霧和光輝。在草原或鄉間的豐饒的荒地上，好像照相上的 *longes* 的排列似地，到處出現了工廠和工廠的叢集：鐵甲的城市。在科學化的綠洲和人羣的社會主義化的和舍的周圍，被開墾的平原，棋盤形或菱形的地劃分着，在一種洋洋的活潑氣象之上，映出了曳引機的來往的輻濶的運動。——在整幅地圖上面，又佈滿了鐵路和汽車路的網。

這工作被規定開始於內戰結束的時候，後來分做幾個被仔細考慮而計劃過的階級，繼續進行，一九二一，一九二五，一九二七。

消費合作社的運動，太大地被推進，在鄉村間更著成效。合作制度是向來存在於俄國的。現在是更系統的地擴大它的活動和發展。「合作社制度是引導到社會主義的大路」（列寧）。顯

然，這種制度是能够使民衆的心理集體化，造成一種共同體的氛圍，而且把社會主義的習慣引導到日常生活的實際的打算上去的。此外，消費合作社又能消除營私的中間人而自成爲國家「托辣斯」和消費者之間的中介，因此漸漸地排斥了私人的商業。然後人們又可以大量地組織生產合作社。

同時，領袖們頒佈了許多關於合理化的條例，節省的條例，禁止浪費的條例，還有關於促進生產效能，增強紀律和勤勉的條例。

……但是，一切這些事情，只有隨着「電氣化」的進展，方能實現，方能真正地開始進行。電氣化是把一切偉大的理想工業固植於地上的繫帶。

列寧早已預料到將來的世界裡的電流的功用——那時別的人們誰也見不到這一層，那時新經濟政策正在實施，而且人們正在受傷的國家的尙未合口的創痕之上，大做其資本主義的幻夢呢。

這一種從大地長出來的理想，人們叫它做 Geolo。（這是由幾個俄國字的第一個字母組成的：國家，電氣化，俄羅斯）。

「我看過你的俄國電氣化的計劃書了，」一九二一年三月，斯大林寫給列寧說，「這是一個計劃經濟，一個真正地建設的計劃，一個真正的國家的計劃，有權威的大綱，從無論那一點上說來都是如此。這是現代馬克斯主義者的唯一的嘗試，它要把經濟上十分落後的俄國的上層建築，安放在「真正正正」的工業技術的基礎上，而且這是在目前的條件中唯一能够做到的事。……那另外幾十種登在我們的報紙上出我們的醜的所謂「建設的計劃」，有什麼價值呢？那只是小兒的

鑿舌而已，沒有別的……你可記得托洛茨基去年所提出那個計劃麼？那個叫做「俄國經濟復興」的綱領，他主張全盤雇用農民大眾和工人大眾（勞動軍隊），用他們不熟練的勞動去恢復戰前的工業的殘餘。這比起 Gotha 的計劃來，是多麼無聊，多麼「原始的」啊！這好比一個中世紀的工匠，裝做易下生的戲劇中的主角。說到我的意見？……第一：關於這個計劃，不要再浪費一分鐘工夫去空口討論；第二：立刻開始用實際的辦法進行；第三：至少把我們的可用的勞動的三分之一支配給這新工作的開端（其餘三分之二——物質和人力——是「目前的」需要上所必需的）；第四：有許多 Gotha 的合作者，雖然本質上很好，但是到底缺乏實際的經驗（我從他們的論文中感覺出一種學究式的無能來），在「計劃委員會」裡面必須包含實際的人們；第五：Pravda 報，「真理報」，「消息報」尤其是「經濟生活報」，應該努力宣傳「電氣化計劃」，使家喻戶曉，引起人人的注意，把一切具體的詳細節目盡行披露，同時要特別指出：只有一個「建設的計劃」，「這就是電氣化計劃」，一切別的「計劃」，都只是空虛而有害的餽舌。」

電變成了將來的大陸的再造的中軸。一切的再建設都是從這中軸輻射出來的。近乎神奇的水力發電的源泉，已在蘇聯偉大的集體的進展上大露頭角。列寧會說：「社會主義，就是蘇維埃加上電氣化。」這是許多理想和許多事實的一種強有力的化合，它聯結着混合着許多的成分，其中有幾種成分却表現着並無共同的關係。儘管有人長時地研究着社會主義或電學，却發見不出它們的聯繫。這好像是把蘋果和橘子混同為一，來對抗教師們教給初等小學生的常識一樣。實際上，還是把堅強的現成的骨架安放在一個觀念之中。這好像是一個代數上的公式。這又像是「創世

「中」的吩咐：「讓世界有光明」。

這種使全國各個角落發生出千千萬萬匹馬力的魔術似的計劃，這電氣化的主張，在西歐人看來，好像是滑稽的吹牛。威爾斯，這個著名的英國文豪，他雖然是專做關於將來的想像，而自命在這方面有資格說話的代言人，却也被蘇聯的這種誇大引起滑稽之感。一九二二年當列寧對他說起「我們要電化歐洲的俄羅斯和亞洲的俄羅斯」的時候，威爾斯覺得這有點可笑。他並不笑這理想的本身，（他解說道：倘若英國有這樣的理想，那是人們會得相信的，因為英國有着實現這理想的方法。）使他覺得怪異的，是這個理想竟發生於愚昧而只陳列着廢物的國家，而且這是從「克里姆林的小人物們」發出的。那個布爾雪維克的預言者儘管憑着他的簡單而昏亂的頭腦，說俄國將來會有十萬架曳引機，但是這時候的蘇聯所有的曳引機，却屈指可數。威爾斯，這研究未來時代的文學專家，只有這一次，他的夢想受了限制，他料錯了未來的情形。在他的著作裡，他能否把那連現在的蘇聯小學生們都嚴厲批評的一章塗掉呢！

在第八次蘇聯大會和第四次共產國際大會上，「電氣化計劃」和「電氣化委員會」被擴大了，而且變成了建設全國經濟的國家計劃和國家計劃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特別當蘇聯已使現有的工業設備上了軌道，並從事於大規模的新的設置的時候，開始進行，更加積極活動起來。

這樣就開始了五年計劃的秩序，但這五年計劃只是更偉大的計劃的一部分而已。這普及全聯邦，而且經歷一個長長的時代的「計劃化」的偉大的過程，完全是一種蘇維埃的產物。但是它的觀念的影響，却及於全世界。這種「計劃化」的方法，在蘇聯是具體地進行着，

在別的國家，却也抽象地，口頭地進行着。蘇聯從不能向列強借到錢。但是列強却從蘇聯借得了許多重要的東西，而這就是其中之一。他們竟也抄襲了「統制經濟」的概念，而加上若干國際間的虛飾。「統制經濟」，竟成了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的敷衍的儀式！

「統制經濟」，不錯。人類如果要脫離困難，除此別無方法。這的確是普遍的萬應藥。但是「統制」是「一致」，而「資本主義」却是「無政府」（無論從國家或國際的觀點看來）。倘若「統制」一字，不具有一個完全的國際的內容，倘若它不具有一個真正的國際的內容，那麼它就毫無意義，它就毫無價值，無論對內對外。「統制經濟」是跟「和平」一樣，一被人們割成塊塊，那就不復存在的。

所以經濟計劃的觀念，全然是一個蘇維埃的觀念，這理由並不在優先權上，而是在組織上。在資本主義的國家裡，私人的企業和私人的特權，經濟問題中利益的複雜和分歧，這都使一切空盤的經濟計劃不能實行；我們只要看每年的最後的期限之前或甚至過了限期之後，人們怎樣地挖空心思，玩弄花樣，纔能造出一張表面上平衡的預算表來，就可證實。在一個實現着完全合理的建設和絕對正確地顧到公共利益的社會主義國家裡，却不是這樣，在這種國家裡，那統制的集團同時又是立法者，執行者，所有者和消費者。

蘇聯的五年計劃，當它宣布之初，由於它的細目的繁富和估計的精細，又引起了西方人的諷笑。爲什麼呢？這批人們，他們的經濟統計，本是後退着解消着的，他們本是可憐地落在世界經濟統計的尾巴後面的，却對我們提出了驚人的數目字……他們將來能夠實現這些數字麼？他們是

癡心妄想著一種簡直沒有法子開頭的大事業。當人們問他們道：「這樣那樣的工業，你們將怎樣進行？」他們就答道：「過了五年之後自然你會看到」，於是他們就投入那遙遠的風景中去了。

而且，在我們這方面，看了這種不可思議的統計，不能不想到它是我們的時髦的政治家做於浪用的對付一般公民或特別對於選民的美麗的諾言；我們要是把我們一個總長或一屆內閣為要取得我們的信用的時候的像煞有介事的担保認真看待，這才是奇怪呢。

在別的國家，要叫人們相信莫斯科的數字，真是難上難。「盲目的狂人纔會相信它！」有的人說。

另一種人說：五年計劃的數字是荒唐的想像，因為它的數目太高了。這樣一種國民經濟的突變，只在二個戰爭的時代，在大砲的壓迫之下，方才可能。

一九二八年的時候我會寫道：（讀者注意，現在是我巴比塞在這里說話）「在正在進行的五年計劃中，並不要官吏或文學家們去推敲它的數目和字句，這是立刻可用的程序；這個 *Coopérative*（國家計劃）的數字，我們與其當它是一種指標看，不如當它是一種已經獲得的勝利看。」末了，我這樣辯論道：「當着布爾雪維克向我們保證，說到了一九三二年，蘇聯的工業將增加百分之八，將有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投資於經濟復興運動中，他們的水電發動力將增加到三五、〇〇〇、〇〇〇萬瓩瓦特……這時候，我們就應該說這些事物已經可以算無形地存在着了。」

……如今，我們看到，在他們所指定的時期內，如果那些數字可以說並沒有正確地實現，那

只是因為所實現的數字超過了預定的程度的緣故。

現在，我們要檢查的是五年計劃的數字的「真正價值」了，因為隨着歲月的遷流，這些數字已經從表示未來的模糊的狀態進到表示現在的實際的狀態了。假如其中有幾項數字沒有達到，它們所占的比重也是絕對地微細，簡直可以說是無足輕重的。在許多方面，數字上實都已超過。蘇聯的經濟計劃所實現的，在重要的各方面，在一九二二——二三年的是原定計劃的百分之一〇九；在一九二三——二五年間的是百分之二〇五——這只是就初期的而言。

誰也不會對這事情覺得驚訝。十分明白地，人們看出這些最智慧的計劃乃是唯物主義的計劃。從提供了社會主義的合理的組織上以及它那跟現實處處一致的直接而簡單的密合上看來，這計劃的種種預先的估計之竟能正確的實現——雖然那實現的過程那樣曲折——實在是很平常的一件事。假如這並不是社會主義之力，那一定是魔術之力了。」斯大林說。

但是，社會主義理論之所以能夠變成這樣偉大的事實，並非單靠人類的智慧，同時也由於人類的心的力量。要在這樣的規模上創造一種合理的事業，在理論以外，還得有另一個動力。這是志願麼？志願的本身也還不够。還需要熱誠。無論通過社會主義的觀念形態或黨的直接行動（黨是人民大眾的主要的指揮者，和推動者）都需要勞動大眾的合作；在黨的方面，也在黨的方面。沒有工人階級的自願的堅決的熱誠的合作，那就什麼也做不起來，所以必須「振起勞動階級中間的被資本主義所窒息的創造能力」，「使工人們具有對於勞動的熱誠」。他們不但要具備技術的條件，也要有精神上的條件。唯有在這兩種力量的結合（本來這兩種力量是彼此相關的）之

下，那特殊的工作方才可能。

對於勞動的熱誠麼？這在資本主義的經濟學家看來，乃是欺人之談。他們武斷地說：「除了以利相誘，人們休想從工人那里得到什麼。」以利相誘，這是資本主義制度所常用的老法子，當他們能夠用它的時候（到了現在，這法子也變得難用了。）「你們會得致富」，這是常使資本家們成功的公式（但這也能够完全毀滅他們）。

在社會主義制度裡，工人們變成了跟在資本主義制度裡的時候完全不同的一種公民，在資本主義制度裡，工人等於囚徒。他勉強地勞動着，因為他不是為自己而勞動的。並且他不難看出他的勞動是不利於他自己的。因此，要鼓舞他的工作，須用特別的刺激方法，金錢，愛國主義，基督教的道德以及種種「上帝」的威力。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工人，則「為了光榮」而願意拚命地勞動，因為光榮，那就是他自己的權力和進步。因此，在唯物主義的經濟計劃裡面，人們發現了最理想的勞動。

但是，武斷的人，不只是資本家們，在黨的內部，也有人噴有煩言。這些同志說，像這種社會主義的競賽的號召，倘只是當作鼓動和宣傳起見，那是很好的，但現在真的把它當作實際而普遍的勞動，那是太過了，斯大林同志是做得過火的了。但是斯大林固執地保證這些競賽的本身的真正價值以及這種激動的積極的經濟意義。數年以後，他證明了勞動者的熱誠的確是勞動進行中的一種十分重要的資產。他得了勝利，如他這樣地記錄着似的：「今年，我們達成了一個決定的轉變。」

就是技術問題的最後解決，也是蘇了熱誠的。這個困難而嚴重的問題，我們在前面曾經說過。專門人材是急切地需要着的，但在已成或將成爲專門家的人們中間，有一大部分奸細（外國的和本國的）在着。「羣衆憑着多數，在公開戰爭中打敗我們。我們要利用科學去打敗他們。」——那「機器破壞者」的領袖巴欽斯基曾經這樣預言過。蘇維埃的專門家們很快地養成了，他們加倍努力地工作起來，不久就在質和量的雙方都達到了高度。

這種競賽的精神，是每個個人，爲了要提供最高的效能而自動地，熱烈地合理化的結果，據列寧說，這種精神，決不會被社會主義所消滅，反而會因社會主義而更加發揚；斯大林曾給這種精神下了一個定義：「社會主義的競賽的原則，是前進的同伴給予落後者以友誼的幫助，而招致一般進步的利益。」

在這種純粹黨精神的激動的進行中，不會發生過度和錯誤的毛病麼？斯大林自己曾經強調地指出許多絕對的標準的不行——那些在當時看來是太不考慮的，孩提之見的絕對主張——譬如工資絕對地均分，人人嚴格地平等之類——這些主張，性質上是很愚笨，很籠統的；在個人和集體的主義主義的人格發展得尚極幼稚的時候，這些愚笨籠統的主張，是害多於利的。我們在後面，將再講到這些滑稽的社會主義計劃。

但是，我們可以說，領袖們的不可抗的推動力和在羣衆中間，團體中間，軍隊中間工作者的意志的興奮，實在是建設工作中的，同時又例外又常有的原素。

另一種刺激，另一種推動力，那就是自我批判。斯大林是「自我批判的安全瓣」的熱心的提

倡者和辯護者們之一（他在一切時機都如此，而在一九二二年的黨大會上，特別顯調）。社會主義的戰士和黨，無論關於個人或關於集體，都有使用「自我批判」這權利這武器的任務。他們應該把一切過失一切錯誤都表白出來，他們應該對自己的忽略和弱點毫不姑息。他們倘若不來自我批判，那景成了一切過錯的負責者。他們應該在本來的任務之外，還得負起監察的任務，他們應該作爲自己的督察員。每一個人都應該從他的全部責任中成爲偉大。一個宗教改革者（Luther）的一句註釋聖經的話，（這在他自己嘴裡，原是一句謊話，）只在社會主義中纔有它的真正的意義：「每個人應該作爲自己的教皇！」

在一個以驚人的速度突然來到的日子裡，列寧不復在世上了。

他死於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享年五十有四。連最密切地在他的周圍的人們，對於他的死，也似乎不能相信（「死」強迫我們相信不能相信的事實）。他們想不到那個作爲俄國革命的化身的人——那個計劃了，預備了，實現了，救援了俄國革命的人——竟捨棄他們而去了。列寧，這最偉大的歷史上的征服者之一，這絕倫超羣的最純潔的人，這自古以來的人類中成就最大的人。

「當共產黨成了列寧的遺孤，當它自問着：『天才的導師已失，我們此後將怎麼辦呢？』的時候，斯大林的鎮靜的聲音起來了，說是他們一定要戰勝一切困難。」（卡加諾微支）

列寧逝世的數日後（他的死，引得一大多勞動者紛紛入黨，這些勞動者，如拉狄克所形容，好像是要「試將大批的頭腦去抵償那個已經停止創造的天才的頭腦似的。」）（在一個盛大的祭禮

中，斯大林用黨的名義，對這導師的親愛的靈魂，以這樣的誓言告別：「列寧當離開我們之際，留給我們一種義務，就是光榮純潔地保守共產黨員這高尚的稱號。列寧同志，我們向你立誓，我們完全要竭力完成你的遺願！」

自從蘇維埃政權開始以來，斯大林一直做着列寧的助手，在列寧逝世以後，他做了替身。

這主要是因為列寧早已把黨佈置成他自己的替身。他親自鍛鍊這個替身，堅固地，完全地，無微不至地，將他自己的一切堅強的基本力量 and 不可抗的推動力全部賦予，把它連成一架生產領袖的機器。雖然列寧有着一種超自然的偉大，但倘說列寧這人是「後無來者」的，那是錯了，因為還有黨的組織在着。列寧一去世，他的任務就會引出新的人來。這正是跟那使歷史脫臼了兩千年的君主政權的動物性的世襲相反的地方。

於是斯大林的昇起以及他的已經很大的權力的擴大，就成為當然之事。他漸漸地現出黨的領袖的姿態來了。

但是，對於斯大林所把握的這種擴大的權勢的意識，我們不要誤解；關於「專權」和「獨裁」這些字眼，我們不要輕易地搬進種種通常的錯誤的解釋裏去。

在共產國際中，在蘇聯，都不能夠發生個人獨裁的事情。不能發生的原因，在於共產主義和蘇維埃制度是在一種極正確的理論的路線發展着的，在這種制度之中，最重要的人，不過是一班公僕——但所謂「獨裁」，所謂「個人專權」，在本質上，乃是強施一己的法律，孤行一己的主張，而與公法反對。

馬克斯主義可以有種種的解釋，尤其是在對於許多事實的反應上；從這觀點，有一種特殊的解釋，甚至於一種行動的程序，可以在某一時間，在國內和國際之上占優勢。這種解釋，這種程序，是不是好的呢？這會自行解決。領袖們自己在接觸了邏輯的要求和事件的效驗之後，就會證明他的解釋或程序的正確或錯誤的。人們倘以為在蘇聯有着一種最高的權力，以為在遺傳大的組織之中，存在着用武力或陰謀人工地造成的個人的大權，（猶如這些專制魔王，一有人冒犯了他的時候，就示意劊子手去殺死——如一千〇一夜中的加利弗——或派刺客去暗殺——如墨索里尼）那是一種愚蠢的錯覺。

利用了陰謀，欺騙，賄賂，或者利用秘密警察或罪惡，或者召喚細作到客廳裡，派遣武裝兵士到會議室裡，或者在夜裡暗殺睡在床上的敵人（同時殺死兩個），這樣，人們可以成爲國王，皇帝，首相，總理——或者保持這類的地位。但是人們却不能靠這些手段變成一個共產黨的秘書長。

像斯大林這樣的人，常常被猛烈地攻擊，他也常常猛烈地還擊（的確，他總是取攻勢的時候多）。但是，一切這些喧嘩的激烈的論辯，全是一種光明正大的鬥爭，衆目共睹，盡人皆知，其所有的論點，都經過公開的嚴密的審查。這好像是當着法官和民衆之前的公開訴訟，不比宮廷中的陰謀。

實際上，在社會主義的組織中，每一個人各有其正當的地位，依照每人的能力和價值而定。這是一種被環境的力量所決定的選擇。一個人能有多少權力，要看他對於那顛覆不破的馬克斯主

講理解到什麼程度，實踐到什麼程度。「這是十分簡單的，」克諾林說，「由於他的作爲理論家的卓絕和作爲實踐家的卓絕，所以斯大林成了我們的領袖。」他的成爲領袖的理由，和他的專業成功的理由是一樣的：因爲他是正確的。

在今日，容許這樣的事情存在的國家，確還只有一個——但是，假如用另外的任何觀點去批評它，那就是毫不理解蘇維埃的制度。我有一次對斯大林說：「你可知道，法國人當你是一個一意孤行的而且喝血的暴君麼？」他的身體向椅背一仰，發出他那勞動工人的衷心的笑聲來。

在他替整個國家預備的許多計劃中，決定了各個民族的命運的這位領袖，和那自己覺得應該向任何發問的同志「報告一切」，而且宣言無論什麼時候要這樣做的人，就是同一個。

只有那和列寧一起立過大功而想凌駕中央委員會之上的托洛茨基的例外的態度，曾在十四次大會上引起了「領導」的問題。對於托洛茨基的意氣橫溢的人格，斯大林提出了公共的紀律。他宣言道：「不能夠領導黨。個不注意這一點，那是荒謬。在列寧的死後，我們還要說到遺事，實在愚蠢。公同的工作，集體的領導，黨的統一，中央委員會的各機關的統一，以及作爲主要的條件的少數服從多數：這是我們今日真正所需要的東西。」

不久以前，斯大林對一個跟一切遊歷蘇聯的知識者旅行家（特別是訪問蘇聯要人的人們）同樣好奇的訪問者詳細地談到這個工農國家中的個人權力問題道（特別關於斯大林本身的）：「不對，人們不應該獨斷獨行。個人的決定時常或幾乎時常是偏面的。在每個組織中，在每個集團中，有許多人的意見是應該注意的。在每個組織中，在每個集團中，也有許多人，會發表出錯誤

的意見來。三次革命的經驗告訴我們，在一百個未經集體地檢討和修正的個人的決定中，有九十個是偏面的。在領導一切蘇維埃組織和共產黨組織的我們的領導機關裡，在本黨的中央委員會裡，有着七十個委員。在這七十個委員裡面有着我們的最好的技術家，我們的最智巧的專門家，我們的最優秀的熟悉一切活動的詳細節目的人材。在這個最高委員會裡，集中着本黨的智慧。每一個人有改正別人的個人的意見和主張的可能。每個人有提供自己的經驗的可能。如其不然，倘若一切事情都由個人決定，那麼我們的工作中一定會發生嚴重的錯誤。但是既然每個人都有改正別人的錯誤的可能，既然大大家都鄭重地考慮這些改正，那麼，我們的決定就儘可能地近於正確了。」

我們還須更加擴大這個集體工作的觀念，以便作精密的考察：我們不要忘記那種力量和進步精神，——就是斯大林用來不但向大眾的代表要求合作，而且也向蘇聯現代史中的大眾本身要求合作的那種。

他嚴厲地指斥有些人的「對於大眾的創造力的懷疑」（藉口於大眾的知識程度不夠）。大眾是只要加以教育，他們就會領導自己，而且會領導你的。「對於大眾」，並擁有「領袖的貴族制度」的存在，因為號召他們去除舊建新的，就是他們自己。不要以兒童的保姆或羣衆的導師自居：因為，到頭來，他們受我們的書本的教育的地方，還不及我們受他們的教育的地方的多。所以只有跟大眾合作，這才談得上真正的領導：

「坐在舵邊，直到禍迫眉睫之前還一無所見，這不能算是領導。布爾雪維克不懂得這樣的領

導行爲。要領導，須有先見之明……你要是孤立着，或者只跟別的許多領導的同志在一起，那你看不到一切事情，除非同時有數十萬，數百萬的勞動者，注意着缺點，發現着錯誤，而進行着公共事業的實現……」這好像是引了一條河流來不停地沖刷一個政府機關——如希臘神話中海勾力士，決開河流來沖洗奧紀斯王的御廄一樣。

而且，對於大眾，要用說服的手段，不能用暴力。一九二五年，當季諾維埃夫替黨的獨裁的理論辯護的時候，斯大林就起來反對這種「偏狹之見」，他說黨和大眾之間應該建立一種協和，他說黨和大眾之間的互信，不應該由黨獨攬了抽象而無限的權力這事來破壞。第一，黨會得陷於錯誤；第二，大眾對於黨的信仰會得猶豫起來。

斯大林完全不是在複雜錯綜的國界以外劃出着的唯一的世界的障壁的彼方的人類的「另一部份」所想像那樣的一個人。倒是那另一半的世界中，却真正地是被一批盲目的人們所領導着的生來盲目的羣衆所組成的。

一九二五年，在第十四次黨大會上，斯大林提出了「工業化」這個口號。四年以來，蘇維埃計劃和電氣化的發展，以飛躍的速度邁進。到了現在，問題是在於怎樣有系統地實行「趕上而且超過那些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最短的歷史時期之內。」

但是，斯大林不接受「國際的穩定」的主張。他看出這是一個會得難送革命的太呆板的主張。那在工作和生活上表現着兩個不同的陣營，兩個對立的世界，世界的兩個半部——盎格羅·薩克

遜的資本主義和蘇聯的社會主義——的景象是更加分明了。正當資本主義的權力入於高虎的繁榮，毫不露出要衰落的破綻的時候，斯大林却預言了它的衰落和它的普遍的恐怖（一九二八）。

一九二七年，第十五次黨大會開會，這是一個建設的時期，特別是農業集體化問題被放在前面。「從農民的瘦馬飛躍到鋼鐵的馬」——這一個被列寧用以動人地表示他的思想的譬喻，實際上的確代表着一種偉大的事情。我們甚至可以說：這是現代的社會計劃中最偉大的一樁事情；利用機器使農民集中化，同時由理智改造農民的心理。在當時的情勢中，新近因新經濟政策而勢力加強，成了聚斂者和剝削者的富農（kulak）的優越的地位，是失敗的布爾喬亞在恢復資本主義的企圖中的最後而希望最大的對象。

一個優秀的藝術家，愛森斯坦，在一部影片裏，表現着這種「總路線」——當人們說到從鄉村的可憐的瘦馬變到機械的馬力的過程時，是這樣稱呼的。一個孤立的農民，在他的一小塊土地中奮鬥着，他的個人的土地，在廣大的農村的鑲嵌地面上，只是細微到會被遺漏掉的一部分。在這孤立的小島上，他就像一個絕望的遭難者：他害怕着暴風雨，害怕着冰凍，害怕着會得把他的麥稈曬成枯焦的旱災，害怕着會得打死它們的蠶子，害怕着會得把他的獨一無二的馬或牛害死的瘟疫。男男女女一齊從事於無窮無盡的畜生似的苦工。每季之中，他們都冒着孤注一擲的危險。他們對於工人們，又恨又羨，他們也深恨自己的隣人，又妬忌自己的隣人；只有把別人的口袋弄空的時候，纔能使自己的口袋飽滿（斯大林說）：「農人們要使自己順遂，只有損害隣人的一法。」

「我們造房子的時候，一定要緊靠隣人的房子，為的使隣人不好燒毀他們的房子。和土地相聯

的男人女人，也是當農們的犧牲，他們受着富農的大資產的壓迫，受着奸計的欺騙。被高利貸吸着血。土地的奴隸，生活的囚徒，這些散播在鄉間的勞動者，只能張着飢餓的嘴，憑空地噉着以爲滿足道：「我是地主啊！」國家對於他們也無能爲力，因爲他們的人數太多了。

但是，當他們百人一組，或千人一團，共同耕種那由他們的小塊的土地集合而成的，百倍千倍於他們原來各自所有的面積的農場的時候，那情形是多麼不同啊！這時候，他們就正當地處理事情了。那在你的霎眼之間飛速地推進着工作的機器，那比例勻當地工作着的機器，比人們強得多。而且，對於這時的廣大，堅強，豐富的全部組織，那冰雹，旱災或獸瘟之類，雖然仍不免爲害，但不能加以毀壞；在這種組織之前，富農們也不得不屈服了（這時候，蘇維埃國家就有辦法援助一切貧農，而把富農，剝斷者高利貸者，都驅逐出去）。一切收穫物都歸公家貯藏，而每一個人的所得却反而多於先前了。

在辯證法的觀點上，關於這齣正在世界的露天舞台上演出的偉大的戲劇的理想是這樣的：

「規定我們的農村的再建設的日常的實際工作，漸漸地將分散的農民經濟改變爲集體的經濟；在高度的機械化的農業的基礎上，類聚爲社會的和集體的土壤勞動，並且要使這種的發展，成爲加速農業經濟的律動和消滅農村中的資本主義原素的重要方法。」（斯大林在第十五次黨大會上的報告）

一九二七，這是一個重要的時期，因爲它表示着一個決定的發展的階段。在這時期，蘇聯經

濟達到了戰前沙皇時代經濟的水準。一九二七年的數字，除了少數的幾項較低以外，差不多全部都比一九一三年的數字高些。

這是十分重要的事實。從此以後，成立了一個證據：不但純粹的社會主義經濟可望長成，就是單獨一國中的純粹的社會主義經濟的可望長成，也是無礙的了。

這時期的農業生產的總數，較之戰前增加十萬萬盧布，即增加了百分之八。在工業上，增加了二萬萬盧布，這佔總數的百分之十二。

在現在的蘇聯的領土上，一九一三所有的鐵路的長度，本只有五八、五〇〇基羅米突，一九二七年增加到七七、二〇〇基羅米突。在整個舊俄帝國的範圍中，工人的工資，平均比戰前增加了百分之二六。九（這數字是根據購買力的統計而定的）。

「文化」的發展的比例是驚人的，舉幾件最顯著的事情說說罷：一九二五年的蘇聯初級小學的學生，比一九一三年的俄國學校的學生多了二、二五〇、〇〇〇個。專門學校的學生，則多至兩倍以上。國家化了兩倍於前的費用在教育機關上；在科學機關上；則比先前多到十倍以上。

國家的收入是二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就工業所用的機械能力而言，蘇聯僅次於美國、加拿大、英國、德國和法國之後而占世界第六位。

至於社會主義化的程度：工業生產中的集體的部分，佔百分之七十七；私人部分佔百分之二十四（其餘是合作社的）。農業生產中的社會主義的部分佔百分之二、七；私人部分佔百分之九十七。三、商業方面社會主義的部分佔百分之八一、九；私人部分佔百分之二八、一。

以生就是驚人的第二步——這還是受着農業方面的很大的牽制的。——是從可驚的常識，和
解和毅力所得的結果。

第六章 寄生的戰爭

反對派。一九二七年，發生了徹頭徹尾反對俄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的領導的大舉的攻擊。這種反對，先前在各種機會中，已經表現過許多次數，暗中的活動迄未停止，但是到了現在，却以有組織的激烈的方式，決定了戰鬥的計劃，公開發動起來了。他們的砲火集中在斯大林身上，而斯大林，就以他的非常的魄力，化身爲黨的多數派的護衛。

「反對派」，正確地說來，這是什麼東西呢？在我們歐洲這邊，這個名詞已經被說了又說的說濫了。直到現在，人們還錯誤地傳說着它。粗看之下，這一種俄國的現象——不如說是從俄國傳來的現象，完全不是當局者以外的人們所能了解的。人們只聽說許多重要的革命者，許多第一等的社會主義戰士，忽而把他們的黨視作敵黨，於是他們也被黨視爲敵人。人們只見這班人突然脫離了原來的地位，好像一羣魔鬼似的在詛咒的驟雨之下掙扎着。他們被淘汰了，排斥了，流放了——似乎只爲了意見上的小小的分歧。於是人們就試作結論，他們都是極端的宗派主義者，雙方都是——在這個「新」國家裏！

完全不對。我們如果接近地一看，就知道許多初看好像複雜的事情，倒是簡單的，——但那

些初看好像是浮面現象的事情，實際上却絕對不是的。幹部派與反對派的不合，決不在若干小事情的意見上，而是在關於將來的實際問題的根本主張上。

這是怎樣的呢？

第一，我們要注意，在列寧的偉大的智慧中所希望的共產黨，是一個在原則上決不妥協決不屈曲的黨。空想在這裏面是絕無地位的。在別的黨裏面，許多戴假面具的領袖，可以雍容和平地彼此敷衍着，使人絲毫想不到他們之間有着什麼毛病，需要施外科手術。但是共產黨卻不容許一個會得造成極小的混亂的人的存在。它不容許它的內部包含着曖昧的公式，它不容在本質的事情和觀念上混雜着「差不多」主義。它的理論是不斷地在深刻化，嚴密化的。

第二，我們應該注意，蘇維埃共產黨是一種國家的力量，在這意義上，它是領導社會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的前衛，它是拚着血肉實際地工作着的。第三，這個黨是在全新的環境中工作着的，它是一個沒有前例可援的例子。由於這三層理由，各種傾向的鬥爭在共產黨里是比較在別的地方更為嚴重的。但在同時，它也需要保持統一。共產黨中有着一種劇烈的一致運動，所以它是嚴厲地隨時矯正着一切錯誤和糾紛的。人們只要想一想它在工作着的環境和它負擔的巨大而複雜的獨創性的工作，就會知道這是非如此不可的。

現在，我們來看看那反對派的現象是怎樣發展的罷。每個待解決的問題，每件待決定的計劃，大抵總要引出兩個相反的答案，兩條分歧的路線來的，「正」「反」，「是」「否」，但每個決定總有贊成者和反對者。人們看見贊成者多於反對者的時候，就說道答案「對的」，但

「反對」者其實還存在着。它存在於種種事實本身的部分裏面，因為沒有一件事實是完全地絕對地好或完全絕對地壞的。它存在於那些反對已經決定的案件的少數分子中間，或者存在於動搖未定的分子中間。於是就發生了一種奇怪而必然的歪曲，一種反對論的擴大，發生了弊病，發生了對於全部事實的極度的誇張。換句話說，人類的喜爭的本性又出現了，發展起來了，一有力量就猖獗起來了。

在這過程中，純粹地而私利的動機，遠不如人們所相信那樣的重要。個人與個人之間的仇恨，雖然常常是因反對而產生的結果，却無論如何不是反對的原因。只有在托洛茨基的場合我們纔找得一種絕對地個人的要素，這就是托洛茨基所有的，而且發揮得很高的自以為是的感情。他的太傲慢的性質，他的不接受一切批評的脾氣（「他永不寬恕人家對於他的尊嚴的小小的冒犯」列寧說。），以及他的非居首位就不高興的目無他人的態度，這都與他的反對行為有關。意識是一個兵工廠，在這裏面，這種反對行為，當然要把一切精良的武器裝配起來。誰若要找攻擊的藉口，那是總歸能找得出來的。（在普文藝復興時代，我們知道，許多諸侯許多國家之所以擁護新教，並非由於信仰，不過是替他們私人的政治上和經濟上的野心，罩上一個合理的名義和光明正大的理想而已）。但是一即使是在托洛茨基的場合——「反對」，首先總是一個根本傾向的問題。它與事實的本身無關。它常常經由一般的思想方式，精神習慣，氣質和智力而表現出來——如果我們可以這樣說。

我們還可以斷言：某幾種心理上和性格上的個人的傾向是與某幾種政治上的傾向相合的。心

地的狹窄，不顧大局的喜歡鬭爭，是會表現成宗派主義和左傾關門主義的——智識上精神上的庸懦，是會表現成小布爾喬亞的機會主義，而且墮落為改良主義，孟雪維克主義的。

是這情形，使得反對派的問題變得嚴重，發生可怕的影響，因為，先有了問題傾向上的分歧，這纔生出對於共產主義理論的解釋的根本的分歧來的。對於一種理論的——即馬克蘇主義——的實際解釋的分歧，對於「現階段的特殊要求」的估計的不同，這是會得造成意想不到的結果，會得使全部政策發生完全兩樣的作用的。一件單獨的事實的錯誤的矯正，跟矯正一個算術和數的錯誤同樣地簡單。但是，一個傾向上的錯誤，那是一種通體的變質。毛病在於根本上，它的擴大，是按着幾何學的倍數的，它造成無數小節目上的變動，而且會得引起民族的歷史的全貌的改變。——且不去說它的破壞的結果。這是那作為國家的推動力的偉大的黨的一種「路線」上的改變。

反對派，根本是一種傾向上的毛病。

但這是傾向上的毛病之中的特殊的一種，最為嚴重的一種，它的主要的病徵，是不守紀律，明顯的分離，跟領導集團的對立。跟多數的傾向對立的反對傾向，它的目的已不在論辯，而在於挑戰了。

在這一點上，反對的作用跟自我批判的作用根本不同。自我批判的目的，是許多不同傾向與網入共同的道路上去。許多不同的傾向的存在，那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在各種論點上，大家毫不客氣，毫不曖昧地互相論辯，那是最好沒有事情。自我批判是極度尊重那作為布爾雪維克黨的特

權的發表意見的自由。

但是反對派並不遵循自我批判的路線。它的基本的不良的性質，是另立門戶，不接受公衆的解決，違反多數的決定。——多數表決，這是唯一的妥善的方法，也是使一切事情上的分歧的意見歸於一致的唯一妥善的方法。在這種情形之下，有些事情，是不免爲表決的時候所遺漏的。反對派就執着這些事情，把它擴大，使之成爲了不得的問題。對於已經議決的案子，反對派非但不接受，反要公開地或半公開地加以打擊。「反對派的意見」儘管堅強起來發展起來，於是整個組織就受到了內部的寄生的小組的攻擊。這樣，反對派就完成了所謂分化的工作，這是分裂的初步。自我批判總是公開發表的，反對却是暗中活動的。自我批判總歸站在統一的立場上講話。反對派，却表示出兩個立場來。由於這種方式，所謂「意見的自由」就在黨裡面病態地造成了一個類乎黨的，不斷地弄着陰謀的集團。當這反對的集團一旦自信毛羽已經長成的時候（它在黨外，也和一切反對派一樣，勾結國家的各種政敵，以爲奧援），它就要發動戰爭，奪取政權，把它自己的地位從異端變成正統。

在第十次黨大會上，對於這種病症所由發生的單獨行動的傾向，列寧就十分公開地鬥爭過，他便大家接受如下的決定：「黨裡面的每一個組織，應該密切地注意一種自由的保證，就是能夠對黨的錯誤作必要的批評，分析黨的基本路線，報告一切實際的經驗，遵守決議案，注意已犯的錯誤的改正，但這一切不應該當它是幾個人的特權或某幾個小組的特權，而應該向一切黨員公開。」

反對派所反對的是在什麼問題上呢？從剛纔所說的各點看來，從他們在黨的組織裡面無理地堅持種種跟多數的路線相反的傾向而且一味強固這些傾向——這事情上看來，我們很容易明白，反對派是在蘇聯和共產國際所領導的一切大問題上，處處表示着反對的。它竭力把觀察這一切問題的角度，變得跟領導的多數方面所觀察所研究的角度不同。

雖若把十九世紀末葉以來的俄國革命運動的顯著的事實大略一看的時候，就會看出有兩種基本傾向——就是引起了孟雪維克和布爾雪維克的分裂的改良主義的傾向和革命的傾向，是連在這側握了政權的布爾雪維克黨裏面，也還相當地存在着。有幾位領袖：加勉納夫，季諾維埃夫，在某一程度上的托洛茨基，我們已在好幾次重要的機會中，看見他們是反對革命的方法的。他們本想阻止十月革命，待得十月革命既已成功之後，他們又想避免無產階級的獨裁。實際上他們的喜歡立憲民主制度，甚於喜歡社會主義制度。他們不相信在資本主義的世界裡面，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能夠存在，能夠持久；他們不相信由此可以獲得中農階級。他們又批評國營工業，以為這是資本主義式的企業。他們贊成黨裡面的小集團可以自由存在，這就是說他們贊成黨的分化。這些屢次把季諾維埃夫、加勉納夫，和托洛茨基聯結起來的觀點，構成着「反對派」的最重要的人物的基本的特質。這實在是孟雪維克的酵母的再發。

當列寧在世的時候，反對派是反對列寧的觀點的，那時列寧實際地領導着「他在二十五年間親手鍛鍊成功的」黨——這是他自己的創造物。但自列寧死後，他們借斯大林為口實（假如我們可以這樣說），加強他們的攻勢，用同樣的論調來反對同樣的問題，名義上却假託是要保護列寧

主義的完全性了。

斯大林，他在列寧主義的旗幟之下，在他所進行的鬥爭之中，毅然保護着那被少數分子的叛逆所危害的黨的統一。保全黨的統一，這成了他的偉大的使命，猶如先前這曾經是列寧的偉大的使命。猶如這也會經是列寧和斯大林兩人共同負擔的偉大的使命——列寧和斯大林兩人，如我們在前所見那樣，意見從未分歧過。無論在理論上，或在戰略上。

上面所說起過的斯大林以黨的名義所立的誓言，還有這樣的第二段：「列寧同志當他捨去我們而長逝之際，他囑咐我們要保全本黨的統一，如保全我們的眼睛的瞳孔一樣。列寧同志，我們誓當光榮地完成你這遺願！」

在這偉大的導師死後，黨的分裂就成爲可能的了，這終於成了一種非常重大的禍患。

局面是雙重地改變了：在斯大林旁邊，不但不見了列寧，而且出現了托洛茨基——列寧一死，托洛茨基是毫無忌憚了。

整個反對派都以托洛茨基這人物爲中心。假如說他並不完全代表着它，我們總可以說他是完全象徵着它。反對派之所以成爲大患，就是由於他的緣故——是他在革命歷史中和蘇維埃政府的初創時所負的任務賦予他的權力所造成的。

在今日，托洛茨基，作爲對當局公開地鬥爭的結局，被放逐在俄羅斯國外，却選以過去的人民委員的銜頭，受着資本主義國家的警察的迫害和許多大報的諷刺。在我們西歐的天空下面，人們之所以還要追逐托洛茨基，對他報復，無非因爲他曾經參加過十月革命。並不仔細推斷事情的

國際布爾喬亞，是只要迫害了一個布爾喬亞，就以爲快樂，以爲光榮的。但在這一種早已應該有的迫害以外，托洛茨基却得到了各種反蘇維埃制度的人們的支持和同謀，我們不必說明他的現在的政治活動，誰都能夠證明，他和他的徒衆，是在謀害着蘇聯和共產國際的。這實是一種謀殺的行徑，破壞的工作。

要不要再說一次，托洛茨基的個性對於他的傾向無疑地有很大的影響這事實呢？很早的時候，還是列寧在世的時候，托洛茨基就顯出了跟別的領袖們不能相容的態度。「跟這個同志共事實在太難了，」季諾維埃夫曾經這樣怨聲道，他還是常常站在托洛茨基一邊的。的確，托洛茨基是本「托洛茨基派」的了！

托洛茨基的性格的專制，他的在不獨能出風頭反而被排斥被忽視的時候的仇恨，他的「拿破崙」——這些刺激得他去背叛黨，刺激得他使自已成爲戰鬥的列寧主義的割裂者，刺激得他循着政治鬥爭的道路，想達到他半公開的組織新黨和第四國際的目的的原素，究竟到了什麼程度呢？這說起來是很難的。但是我們不能不說，托洛茨基曾在一九二二和一九二三年強烈地反對過黨，但在這兩年的中間，即一九二二年，在第四次黨大會上的演說中，他却以很約略的方式，替那關於棘手的新經濟政策問題的多數者的一切觀點辯護。雖然如此，那高唱著不斷革命論的托洛茨基反對派，在大會閉幕之後，却仍然竭力表示革命已經停止，說新經濟政策是資本主義的一種變相，是二種 Thermidor（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法國革命墮落之日）。這種一轉眼就反復的矛盾態度，似乎證明着某種做出來的個人性質的干預。

雖然有着上述的許多刺激他的原因，但托洛茨基的分裂的重大的理由，主要地還是他的對於政治原則的概念。如果說那偶然的原因是出於虛榮，那麼那基本的原因却是意識形態上的。它在於和列寧的布爾雪維克主義的原則根本不同的傾向上。它顯示着另一種政治性質，另一種估計，另一種方法。由於這一種根本不同的傾向的強烈而尖銳的發展，由於它的猖獗，於是托洛茨基就漸漸的成了和整個正式的布爾雪維克政策對立的反對派了。

以孟雪維克開頭的托洛茨基，到底總是孟雪維克。他的變成反布爾雪維克主義者，固然因為他是托洛茨基派，但那必然的原因，在乎他是一個老孟雪維克。我們可以這樣說：托洛茨基主義喚醒了他內部的老孟雪維克的習性。

有許多人，盡其能事地把列寧和托洛茨基兩人作比較（這事如今已成爲流傳的了，例如勃魯耶爾，他以爲列寧是獨特的深思寡言的人，托洛茨基是漂亮的雄辯的人。甲克·薩杜爾以十分的技巧，列舉着一個天才的人和一个學問的人之間的特質的對照。這類的巧妙的對比的要點，可以說相當公平，雖然把這樣的一種文字遊戲應用得太廣時會發生危險（在這種遊戲中，那許多現成的對仗往往會使得你陷於錯誤）。然而首先注意的是，這兩個人並非同等的人；而且，我們是不能够拿無論什麼人物去和列寧的偉大姿態，相提並論的。

但是，就是托洛茨基自己的性格裏面，也有着許多很容易使他的美質變成缺點的嚴重的矛盾。他的誇張而不寬廣的批評能力（列寧的批評能力和斯大林的一樣，都是百科全書似的廣博的），使他的注意只膠住在瑣屑的細節上，妨害他觀察全局，引導他達到悲觀主義。

此外，他又太多想像。他的想像是無節制的。而且，他的想像往往自行反來覆去，沒有根脚，分不清楚那一個可能那一個不可能（這無論如何不是空想的職能）。列寧會說，托洛茨基能夠完善地建立九個好的答案，但第十個就會把全盤弄糟。跟托洛茨基一起工作過的人們會得告訴你，每天早晨，他們醒來，剛睜開眼要爬起來的時候，他們就不禁喃喃地說道：「不知托洛茨基今天又要想到什麼新花樣呢？」

他把一切不同的方面想得太清楚；各種的猜疑壓迫着他；正的想法和反的想法同時闖入他的心中。「托洛茨基是一個鹵子似的跳上跳下的人，」列寧說。於是，他遲疑了，他動搖了。他委決不定了。他缺乏布爾雪維克的果斷。他多疑懼。他往往本能的地反對正在着手的工作。

此外，他又太愛說話。他喜歡賣弄他自己的嗓音。「即使是對着一個人，信任地說着，他也要高聲大嚷。」他的一個舊伴曾經這樣說。總而言之，這個人有着一個律師，一個雄辯家，一個藝術批評家，一個新聞記者的性格——但是不合於一個開闢新的道路的政治家的條件。他缺乏現實上和生活中的專一的絕對的魄力。他缺乏行動者所應有的勇往直前的大決心。他沒有馬克思主義者的信力。他疑懼，他常常疑懼。由於這種畏怯，所以他到底只是個孟雪維克。但也由於這種畏怯，所以他變成過度的激烈有時會發極端主義的癡狂。人們倘不知道從托洛茨基的狂暴的激動中去觀察他的弱點，那是沒法去了解他的為人的。

在一種全體的檢查中，馬努依爾斯基給我們一個更廣大的看法：「幾乎不斷的反對派的運動的連續，表示着黨裡面的最怯弱的分子，從布爾雪維克的地位退出着。」所有的反對派都告白着

退縮，幻滅，初步的氣餒和昏睡的毛病。

在外國，也是這樣：「在目前資本主義相當穩定的時代，許多社會主義者開始動搖起來，離開了共產國際的隊伍。」永遠牽着這面旗子不停地進行，這原是艱苦的工作。到了某一時期，脚會得軟下來，手指會得鬆開來——倘若其人並不是負這樣的使命的人的話。

要問歷史的大道邁進，是更堅強的基本的行動的方法的。應該知道怎樣離開種種的醜態者。在反對「運動」的存在，的埃利溫特哲學家們的精緻的理論之前，第奧謝納忍著怒氣，不聲不響地走了幾步，以證明運動的實在。羣衆們也跟着走動起來，證明種種反對理論的無用。一件事物，當有十萬人共同做着的時候，這裡一定存在着某種良知（「良知，」照笛卡爾說來，就是每個人頭腦中都有的合理的部分）。在種種矛盾的論爭中，人們總得依從大眾的良知。由於平庸，由於紛亂的卑細，由於孟雪維克主義的扶調，也由於斯大林所說的，「在組織裡面的孟雪維克式的放蕩脾氣，」所以托洛茨基失敗了。假如托洛茨基是合理的，那他一定會勝利的。同樣，那在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在社會民主黨裡面反對孟雪維克而且造成分裂的布爾雪維克，一定是要失敗的——假如他們是錯誤的話。

反對派的表现，首先當然是在那俄國革命的最重要的問題方面，單獨一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可能性問題。

關於這問題，列寧在革命以前已經考慮過。他在那時寫道：「資本主義在各國的發展的程度

極爲不齊。因此，這個結論是顯而易見的：社會主義不能夠同時在各國獲得勝利。它首先在一個或數個中獲勝……這不但會得引起衝動，而且會得在其他國家的布爾喬亞階級裡，引起壓迫社會主義國家裡的勝利的無產階級的，直接的傾向來的。」

十月革命的勝利使勝利的戰士們對着兩種工作：全世界的社會主義化和部分的社會主義的具體的建設。這兩種工作，應該從何開始。或那二人手呢？

列寧的意思，以爲最要緊的，顯然是俄國已經可以建設的地方先建設起社會主義社會來。

托洛茨基却恐怕這會把革命引進一種致命的絕境。在資本主義的戰線的某一部分崩裂起社會主義的小隊來這事情，他覺得是自取滅亡，（他一害怕，於是他身上的孟雲維克的脾氣就復活過來，不，又醒過來了。）他說，在目前的情形之下，我們應該把俄國革命看作是暫時的革命。

我們記得一九一七年的中間。在第六次黨大會上，普萊奧勃拉泰斯基曾經主張，說俄國的社會主義化有待於別的各國的社會主義的建立。由於斯大林的堅決的反對，這個托洛茨基所授意的主張——在崩潰的沙皇的俄國裡頭的社會主義的建設的可能，須俟世界革命的完成——的修正案才不被通過。

卡爾·拉狄克，對於這事的見解，很是有趣，尤其因爲他有一時候是曾經同意於托洛茨基的觀點的。他說：

「托洛茨基回到第二國際的觀點去了，在分裂以前，他在俄國的黨的第二大會上，曾經提

出這樣的觀點，說是「無產階級獨裁」的意義，應該是一個代表國內多數的有組織的無產階級的政權。」

照這樣說來，無產階級的革命除非得到一半加一以上的票數，那麼就應該一點也不做什麼了；在托洛茨基，不但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的勝利，只好算是一個歷史的插話，「就是這單獨一個裡面的沒有得到絕對的多數的支持的勝利，也只好算是這樣。像這樣，托洛茨基顯然是變成了第二國際用以和列寧主義對立的「文明的歐洲的社會主義」的。社會民主黨對於革命毫無信仰。在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們想來，社會主義的革命只有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裡，纔有可能。在俄國那樣缺乏勞動者的基礎的國家裡，是不可能的。他們對於俄國，只相信可以有一種布爾喬亞的革命，這種革命，和一切布爾喬亞的革命一樣，只是統治權推移的一種儀式——從貴族推移到布爾喬亞（布爾喬亞的勢力充分發展，特別由於少數優秀的勞動階級的接替，而大大地繁榮起來）。而工人階級和農民的全體，却依舊被布爾喬亞所踐踏着。斯大林已經告訴我們，這種關於俄國的實際的革命力量的不正確的估計，造成了社會民主黨對於一九〇五年的革命的可憐的迴避。

我們知道另外的一些「反對派」如季諾維埃夫，加勉納夫之流，和列寧，托洛茨基，斯大林們同樣的黨的要人 *——他們的傾向，是和托洛茨基一致的。他們說：「預言着單獨一國的社會主義的建設的人們，在黨裡面，培養了機會主義的精神，」他們又說，「這一切會得斷送了革命的無產階級所既得的地位的，」最後，他們又得意地高唱着這樣的論調道：「他們放棄了革命的

* 還有一九一九年死種的新葛爾特洛夫。——原註——

國際工作了。」這就是他們的偉大的口號和偉大的姿勢——這真是對風車的戰爭啊！

托洛茨基（以及希爾費丁）的大體理論，是說社會主義的經濟的建設，絕對地被世界資本主義經濟所決定，就是要等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中，資本主義經濟起了一種命定的向蘇維埃經濟的變質的時候，方才可能。拉狄克——在那時候——也說：「在世界資本主義的前面，我們不能算是一種力量。」這些和別的一些人們，他們害怕着。人們看見在這反對派的集團裡，憂慮的喘息，恐怖的戰慄，攪做了一團。

列寧和斯大林，他們對於事情，完全是另外一種看法，他們確切地把事情放在適當的地位：單獨一國的社會主義的建設，是一種必須利用的力量。「給我一種很大的槓桿，我將舉起這個世界。」阿基米得曾經這樣宣言。拉狄克就很有趣地說——這時拉狄克又變成他自己了——「單獨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是列寧的戰略中的支持阿基米得的槓桿的支點。」

列寧可並不忽視全世界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組織（列寧是從不忽視任何一點的）。他就是爲了這個目的，所以在俄國開始努力着的。在逝世以前所寫的最後的許多論文裡，列寧承認，俄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這是一種準備第一批材料的建設），照資本主義的不平衡發展的法則看來，是可能的，雖然俄國是「文化」落後的農業國家。

被托洛茨基和季諾維埃夫痛斥爲「國家主義的狹隘理論」的斯大林的主張中，沒有一次不宣說着：「別的国家裡的革命的發展和支持，是已經勝利的革命的主要的工作。」他並且也承認蘇聯在政治上還是一個孤立的存在，我們不能當他是一個「穩固的大國。」但是在「臨時的」和

「暫時的」這兩者之間，是有着差別的。他又竭力證明單獨一國的建設，對於革命的普遍化工作所負担的有效助。他又指出蘇聯的建設對於各國的內部情形，對於別的已成立的蘇維埃國家之間的共產主義國際的強大，起着怎樣巨大的，逃不過的，雷光似的交互的反射。

「我們不應該，」這列寧主義諸問題的著者說：「我們不應該把單獨一國的革命的勝利，看作純粹是一個國家的事情。但是我們也不應該把俄國革命，看作是一種非得到外力的援助不可的呆木的東西。」這雙方面，並不是那一方面有賴於另一方面，而是雙方面互相利賴的。

至於人們所注意的國防，「萬里長城，」他早已把這問題整個地解決，而且樹立了若干標柱。

「被外國的資本主義所決定麼，你說？讓我們來看一看……」於是斯大林加以廓清道：「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演說裡面說：事實上，我們始終是在世界經濟的統制之下的。這話對麼？不對的，這是資本主義的鯊魚的夢想，不是事實。」斯大林又證明，這種假想的統制，從財政的觀點看來，決不會及到國有的蘇聯銀行上，也不會及到同樣是國有的蘇聯的工業和國外貿易上。從政治的觀點看來，這種統制，也不會有。像「統制」這名詞所包涵的種種實際的意義，是都不會發生的。這些人們，是在那里見着統制的鬼。另一方面，「擴大對於資本主義的世界的關係，並不是我們讓他們去支配的意思。」

馬努依爾斯基（在一九二六年）指出了托洛茨基所想採用的恢復沙皇時代的經濟的「接受遺產法」的錯誤。這可真的是把俄國送到世界資本主義的支配下面去了，因為俄國資本主義經濟，

本來是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一部分啊。革命的俄羅斯，既然保持着跟別的國家不同的基本原則，那麼它的情形也是不同的。

最後，作爲結論，斯大林強調地主張一種必要的工作，就是對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者們說明：工人階級是不要布爾喬亞幫忙也能够建設起新社會來的。

……無疑地，事實的推進，使我們相信當時只以爲是夢想的事情無不確實，而且使我們也有了能够分析這種事情的經驗。但是，這種爭論，即在當時，也使我們覺得十分奇怪，我們想俄國的革命，除了在它已經得到的唯一的土地上面儘可能的建設社會主義——顯然，世界上的別的國家裏面的無產階級革命，是一時不會得成功的——另外還有什麼出路呢？倘不這樣，便怎麼做呢？捨去了這塊已得的地盤，聽其荒蕪，再去進攻世界的其他部分麼？這真是所謂改良主義者的愚蠢的狂言。而且，對於現世界的一部分上的社會主義的成功，偉大的引人的力量，怎麼能够否認呢？只要對於這個廣大的動人的問題稍微想一想，我們就會想到，正因為那些完全陷於資本主義裏面的先進國家裏面的革命遭受着特別的困難，以至於需要外來的助力，所以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存在和穩定，纔是幫助無產階級革命的普遍的勝利的一着重要的棋子。但是，我們還得相信這一個大陸革命的蓄水池*的建設的可能，而且須以充分的遠見，預先看出來。

在這種使得蘇聯的共產黨員劇烈地鬥爭的混戰中，有兩個識見正確切中現實的人，好像在黑影之中活動着。列寧和斯大林，面對着一大批沒有定見的反對者，這一批人缺乏信仰，缺乏勇氣，而且——如其中的一個在懺悔的時候所說的那樣——深於懷疑，因此弄得失了主意，而且糊

塗得竟至於暴露出極幼稚荒唐的矛盾來。

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兩人，在這里真的表現為彼此正相反對的。這是分處在現代人類的兩極端的兩個典型人物。斯大林的全部重量完全支在理智和實際常識上面。他用無瑕的，不折不扣的方方法武裝着。他知道一切。他完全理解列寧主義，他完全理解勞動階級的領導的任務，他完全理解黨的領導的任務。他不想出風頭，他不亂想標新立異。他只努力做他所能做的一切事。他不是一個雄辯的人；他是個實際的人。當他說話的時候，他只選取簡單明瞭的語言。和列寧一樣，他是深鑽同一個洞眼。他時常用問話（因為問話能引起聽衆的深思），而把同一句話說了又說，跟古代的宣教師一樣。他能對你指出一切優點和弱點毫不錯誤。他的揭發改良主義者的虛假和機會主義者的私心本領，也是無人能及的。拉狄克說：「機會主義者們在他們的可憐的身上罩着無論怎樣的外套，他都能够看得破。」（你，你這個自命為正統派的傢伙，你只是一個假扮左傾分子的右派罷了！）

這個著名的單獨一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問題，——我們又要重說了——充分地表現了在蘇聯組織的開頭就發生着的意識的和政治的決鬥之中的蘇聯領袖們所處的地位。它也明白地解釋着，為什麼斯大林的膽敢攻擊著名的托洛茨基的自衛的鬥爭——尤其是在列寧死後——可以說是一種「塔布」（Taboo），它「掃除了第二國際的遺穢，而使黨清潔化，少年化。」反托洛茨基主義的鬥爭，是對小布爾喬亞的混亂，卑污，怯弱的神的鬥爭——總而言之，是對在黨的中心反革命分子的鬥爭。

不久以後，在右翼出現了另一個反對派。在農民問題上，那領導的多數派陷入了左右兩派的夾攻之中。左邊，托洛茨基反對派否定農民在革命中的任務，右邊，布哈林的反對派忽視了無產階級對於農民大眾的革命的任務——前者憎惡着富農的醜態和新經濟政策所造成的污痕，後者討厭着恢復過程中的連續的破壞的情狀，害怕着戰鬥，因此對階級鬥爭大潑其冷水。不要左傾，也不要右傾，對於民衆和國事，作一種正確的估計罷！譬如關於小農民，倘說：「他們將被富農所吞噬，」這估計得太低了。倘說：「他們將吞噬富農，」這又估計得太高了。聰明的估計，必須確切，適如其分。……

不但是加勉納夫和季諾維埃夫，起初反對托洛茨基，後來却跟他聯合，我們又看見，季諾維埃夫也和布哈林聯合，把農民問題看作列寧主義裡面的主要問題。「閉口！」多數派喊道：「你們這樣一說，簡直是把列寧主義俄羅斯化。而取消了它的國際的價值了。」馬努依爾斯基說：「你們陷到奧多·鮑埃爾的覆轍裏去了。」（這是叫做「民族文化自決」的奧地利學派馬克思主義的民族主義。）^[註]

斯大林不知疲倦地一一從頭開始，把每個原則安排在適當的地位，重新提出：「列寧主義的基本問題和出發點，不是農民問題，而是無產階級獨裁的問題，是如何獲得而且維持無產階級獨裁的問題。農民問題，跟在奪取政權的鬥爭中的農民和無產階級的聯盟問題一樣，是附帶的問題。」

於是，他去對付右派。在第六次國際大會的議事日程上提出不但要對右派的錯誤鬥爭，（那

時右派想制止對於新經濟政策所造成的狀態的矯正的行動，）而且要對各種跟右派妥協的傾向鬥爭的問題者，是斯大林的意思。

事實的經過是怎樣的呢？我們就系統地講一講這次鬥爭的種種情形。

托洛茨基的分離的最初的表現，是勃來斯得·李托斯克時代和古賓斯基時代，那時他使得黨陷於十分困難的地位（「黨發寒熱病了」列寧說）。這時代的黨內的動搖和對列寧的攻擊，激起了克倫斯基的暴動。

列寧死後，托洛茨基起初相當隱蔽地發動着對於黨的攻擊，但到後來，在後的兩本著作新趨勢和十月的血所引起的論爭中，他的攻擊就變得公開更強烈起來——在那兩本著作中，他以偏頗的歪曲的態度表示着黨的任務和他自己的作用。那有名的「五十三人」（一九二五年）的信，提出着「國家將要毀滅的問題」。

黨的會議錄上證明了，黨對於托洛茨基，是一向取慎重忍耐的態度。一九二三年，當列寧生病的時候，托洛茨基重作最高行政機關的「政治部」的主席。黨本想儘可能地感化托洛茨基，而托洛茨基却日益顯著地努力爲了一己的利益而收羅發生在各方面的不平者，把這些不平者弄成一個集團，而自己作爲它的領袖。這個與黨對立的隱然的集團，那時已經由拒絕對於托洛茨基主義的批判，而接受托洛茨基的歪曲的路線。

列寧死後，斯大林重新發動鬥爭的時候，他對於這一個列寧的舊敵，起初并不用制裁的手

段，而用「教育的方法」（雅羅斯拉夫斯基的話）。這種想加以說服的企圖，毫無效果，現在問題是變成了這樣：托洛茨基這人是不是還可留在黨的幹部或者甚至還可以留在黨裡面呢？當托洛茨基採取了所謂「克雷孟梭主張」的主張，就是主張在戰時必須改組政府——的時候，這問題是變得更加緊急了。這樣的一種理論，使用於蘇聯，使用於有着堅強地一致而和諧的組織的統治機關的時候，真正是一種引起分裂和內戰的手段。

一九二五年的十二月，就是布爾雪維克黨舉行它的第十四次大會的時候，季諾維埃夫和加勉納夫作為組織嚴密的反對派的領袖而出席——其中多數是列寧格勒的代表——高聲地提出着各種論調（單獨一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的不可能，對於富農的估計的不夠，社會主義的生產範圍和國家資本主義的比較，分派活動的完全自由）這個反對派，得到了「新反對派」的名稱，雖然這是很不對的。它的代言人季諾維埃夫要求和中央委員會的報告（報告者斯大林）同時，他也要提出一個報告。這個要求被允許了，這等於一個正式挑戰的宣言。

斯大林對這進攻着力地給以反擊。他認為：這一切的過失都是出於「一個基本的過失」，這就是——對社會主義的勝利缺乏信仰。

在一九二六——二七年間，發生着反對派的擴大現象，它的理論形成了集中的形式，它想進行一致的行動，決定的行動，大學的方式。

在托洛茨基周圍的「反對派」，編纂了一本鳴不平的備忘錄，一個綱領。秩序井然，形成着一個完全的計劃，一個理論的體系，特意指責黨的領導完全離開了列寧主義，整個路線犯了錯

誤。同時，這一班現在變成了公開的敵人的斯大林的新敵，對外一味散播着詆毀現存的蘇聯和黨的宣傳。

爲了對付這種挑釁，對付這種愈演愈烈的攻擊，中央委員會決定由政治部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聯共大會開會前的一月，把黨的主張公布，讓反對派提出一切駁議——他們的駁議可以由黨報發表或送交組織。用這個方法，中央委員會決定在一個月之內公開地討論所爭的各點。

但是，在一九二七年九月三日，反對派就提出了它的有一百二十頁之多的「綱領」，並且要求把這馬上公佈，分送各個區委員會和小組。黨拒絕接受這件違反黨的決定的事情，但是把討論的期間延長爲四個月，同時說明這是一種「奢侈」的行爲，正在緊張地工作着的建設者，本來是不容許這樣地浪費時間的。

倘若我們要知道反對派的一切曲折，那就應該把這件作品（綱領）的內容澈底考究一下。這些由批評和謾罵雜湊而成的斷片，好像是替反對派做的遮蓋遮蓋的一幅被頭，一張皮；這包含着關於黨和政府的理論，生活，行動的主要的各章的巨大的公訴狀，形成着一種徹頭徹尾修改了現在的列寧主義的法典——它的名義是叫做一種新的列寧主義。

這本挑戰的百科全書，要在這裡轉載是不可能的，連節錄也不行。它的大大小的方面實在太多了。

況且我們並沒有仔細去考察這一種平行的列寧主義的每一章節之必要，因爲到了現在，蘇聯的反對派已經完全失其重要性了。許多反對派的問題都已立刻被事實所清算。歷史的最後的答覆

已經給了他們。事實的發展，社會主義建設的進步的表現，在今日大大地摧毀了反對派的理論，使它們的大部分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此外——這是一件可以使批評家省掉裁判行爲的事情——差不多全部反對派的重要分子都已經信服了幹部派處理事情的方針，因此公開地表示了改過自新（這在他們的識見上和品格上，都是可敬的）。

但是，我們永遠不要忘記，反對派是一個深刻的傾向上的危機，它依然秘密地，危險地存在着——即使不和托洛茨基的繼續活動和別的許多活動相關——雖然它此後簡直沒有爆發的機會。此外，有些人雖然已經見到沒有什麼希望，但懷恨在心，總在想打擊的方法。我們最近發見，那派遣尼古拉夫暗殺基洛夫的恐怖機關「列寧格勒中心」，是舊季諾維埃夫、加勉納夫、托洛茨基反對派的「餘孽」和沙皇的刺客以及外國的後台老闆所組成的，它的目的之一，是要用暗殺手段，一個個地打倒現在的蘇聯的領袖，既以雪反對派失敗之恥，又可引起國內和國際的糾紛。

像這樣，我們倘把那一九二七年的反對派的歷史底的綱領所構成的巨大的公訴狀仔細研究一下，就會發生如下的感想：這當作參考資料看看倒也好的，由此可見當時有這樣嚴重的糾紛，但這種文件，就不過如此而已。

我們再要說一次，這裡所舉的種種事實，只是見反對派所表現的，使用惡劣的方法或把好的方法惡用的幾個例子而已。他們這樣做，就是要向那領導的方法，傾向，觀念挑戰。（在論爭的兩方面的每一行文字中，都可看到「歪曲」這一流行的字眼），所以這根本是一個列寧主義的原

則和戰略上的，或強或弱的——向左或向右的——偏向的問題。

第一，許多被反對派利用了去構成他們的歪曲的謠言和失敗的預言的——詳細的統計上的根據，都是不正確的，這原因，或者是那些所引的數目本來錯誤，或者是因為問題中的一切要素並沒有被正確地處理，所以那些數目也顯得不正確了。

例如：所謂工業上和運輸上不敷需要的程度的增加（這是主要的控訴）；與工作効力的增加相較工資增加的遲緩；勞動日子的縮短；補充時間的縮短；男工工資和女工工資的差別的增大；童工工資的低落；失業工人的增加；對於失業者的補助費的分派等等……。

第二，許多控訴的提出是毫無證據的，而在別方面就不免與黨的早先的決議及已經實現的結果正相衝突。例如：關於富農的進步的捏造；黨向富農要求支持；黨的內部對於民主化的壓迫；工業化的目標的放棄（因為陷於新經濟政策的陰影中）；使合作制度和電氣化對立的企圖（這也與新經濟政策有關）。

第三，反對派的很多的提議，都顯然是危險的，愚蠢的，能够造成破壞的結果的。這批積極的提案，都表現出缺少對於現實的了解，只含着虛張聲勢，籠絡羣衆的性質，這裏面有的是案子的本身就不好，有的是提得過早，尚非其時。

例如：（除了對新經濟政策的弊害的太容易的批評，對於這類根據直接的需要而暫時舉行的事情的檢討，以及對於有些立刻可以停止的事情的要求停止以外。）主張對於那種會得破壞蘇聯的聯邦統一的右傾民族主義的歪曲路線，加以支持；主張增加批發價格（第十五次大會指出這種

主張所能產生的可怕的反響，而準備採用這種主張的反對派，沒有看到社會機構的全體，只是想討農民的歡心，希望得到他們擁護而已）；主張限制生產（關閉若干工廠，過度的組織化）；還有同樣是籠絡羣衆的主張：免除貧農的賦稅，收回合作事業中的國家資本，（這就是說擴大私人資本）；向富人徵收等於沒收的附加稅；突然廢除私人資本；清算新經濟政策，在它還不會全部實施之前；實行小麥的附加的徵稅（這一定會引起蘇聯的正在大費氣力的信用政策的破產）。這一切的主張，對於那些只想在展覽室前面表示自己的漂亮的工作的人們，實在是十分動人的。但是它們只能在紙頭上面胡亂地安排安排許多問題，這些問題，在實際上，是只能夠逐步解決，而且需要相當的時間的。

要舉出種種顯而易見的事實，如富農的危險啦，失業工人的增加啦；工人住宅的缺乏啦，官僚們的「脂肪變性啦……這顯然是很容易的。在無論怎樣的情形之下，說說這樣的話也很容易：「這事應該進行得更快些啊」。但是，問題在於應該明白：進行得更快些是不是可能；應該明白：進步上的相對的並非絕對的緩慢，是不是黨的領導上的錯誤，而且還應該明白：根據這一點理由，是不是需要根本推翻黨的全部政策。

舉個例說，黨不能夠供給大批的必需的金錢去建築工人的公共宿舍，這是不是黨的罪過呢？至於在農村工業化的偉大的主要的工作中（這工作，人人知道是必要的，但是實際上却同時由於被動和自動的延緩着），却主張由將來可能的電氣化計劃去消滅那正在發展的消費合作制度，這

豈不是一個滑稽的方法麼？我們知道，這種「合作制度與重工業衝突」的矛盾論，跟那「單獨一國的社會主義與世界革命衝突」的論調，差不多是出於同一形式和同一節目的。我們應該想一想，我們是不是應該爲了一個尚未實現的更大的目的而把已經實現了一半的目的放棄呢。另外一種人的主張是這樣的：或者馬上做一件具體的事情出來，否則便從末做起。

至於反對派所熱心地提出的有許多有益的主張，却明明白白就是黨所預定的和已在實施的政策。在這些地方，反對派好像發現了美洲一樣，其實他們只等於附在驢尾的蒼蠅而已（并且只好算是非洲產的那種擾害牛馬的「*Weg. 蠅罷了*」）。

投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於工業罷！反對派吩咐道。但是，工業中的投資的曲線，繼續上昇到了一九二七年，就是在反對派的這個吩咐出口的時候，實際上已經達到四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了。有幾項反對派的提議——譬如關於農業生產物的更好的分配，救濟貧農和小企業者，訂立董工法規之類——簡直是從已成過去的或正在實施的議決案裡抄下來的。

「民主化」的問題，這就是說人人共同工作，大家均分勞動的果實的問題——尊重政治計劃中的少數人的意見問題——這本是列寧和斯大林看得第一要緊的問題。真的，從來沒有一個政府，像蘇維埃政府這樣地一定要做這許多的報告，要受黨的控制，而且和民衆十分接近。蘇聯的公共生活的編年史上，充滿着記錄國際大會，黨大會，蘇維埃大會以及各種委員會和「全會」的羅馬數字和阿拉伯數字。在這些排得很密的數字中，平常的人看了簡直會迷失的。一有論爭的問題發生，這問題就自然而然地會成爲公開，在大衆中爆發。

官僚？是的，控告官僚，無疑地是總歸對的。官僚常有一種要無益地肥胖起來的可憐的傾向，他若一瘦，却又要瘦成木乃伊。他得拚命地爭他的地位，而且也得對於這個必要的機關盡些正當的努力。然而，同樣地，行政機關也是需要受得起攻擊的，人們常常做着戲劇似的激烈態度，閉着眼睛，加以惡罵，爲什麼呢？只因爲他要攻擊政府，根據某一個或別一個理由。在這時的二十多年以前，即一九〇三年，列寧答覆孟塞維克們和托洛茨基道：「明白得很，人們的攻擊官僚主義，無非是表示他們對於中央機關的組織的不滿的方法罷了。你是個官僚主義者，這只是因爲你是大會所任命，並不是出於我的意思，而且這恰與我的意思相反……！你是在野蠻地，機械地執行着，這只是因爲你根據着大會的多數的決定，而不顧到我的意見，不和我作個人的磋商……！你是一個專制者；只因爲你不願意把權力交還你的舊日同事的手裡，你的舊同事們更加堅強地保持着他們自己的主張，因爲大會不接受而愈感憤恨」。列寧這樣地表示過，他真是一個有着「一百隻銳眼的極其利害的心理學家」。

一九二七年，在第十五次黨大會以前舉行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全體會議，對於托洛茨基和季諾維埃夫盡了很大的努力，它勸告托洛茨基放棄他改組政府的理論，放棄他所加於中央政府的「Thermidorien」(法國放棄革命的熱月黨)的謾罵，勸他無條件地接受黨的路線。托洛茨基和季諾維埃夫拒絕了這種確定能够恢復黨內的和平的可能性。他們因此被罷免了中央委員的職，被譴責而且受着這樣的警告：如果他們再繼續妄動，則將被開除黨籍。

托洛茨基和季諾維埃夫(後者在列寧格勒特別佔有勢力，他是此地的蘇維埃主席)繼續鬥爭

着。他們想煽動共產主義青年團與黨反對。他們開了更多的秘密會議，印了更多的秘密刊物，小冊子，他們強佔會場，後來又到街上示威，例如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的那一次。在第十五次黨大會上，有一個專門關於這一種反對中央政權的猛烈的政治陰謀的報告。由這報告中所提出的證據，人們知道托洛茨基和他的附和者決定組織一個新黨，也有中央委員會，區委員會，市鎮委員會，也有技術機關，內設籌款部，也有機關報而且也有國際組織的計劃，企圖篡奪第三國際。在托洛茨基派的會議中，用武力阻止正統派的中央委員會的分子入內（因此，像雅羅斯拉夫斯基和別的幾個同志，被「體力的地」從莫斯科的一個會議中逐出。）

第十五次黨大會企圖調整這種不幸的危險的情勢，責令托洛茨基解散他的組織，並且又一次的叫他放棄那種不但超越了布爾雪維克戰士的權利，而且有失對於「蘇維埃的忠心」的鬥爭方式，最後，又命他停止對於黨內多數的觀點的有系統的攻擊。但是那由一百二十一人簽名的托洛茨基派的抗議書，不但並不接受調解，反而更強調了攻擊和分裂。於是，托洛茨基和他的附和者被開除了黨籍。但在這個決議中還開着一扇方便之門，就是，如果他們的思想和行為願意改正，那麼個別地恢復黨籍的事情，可以考慮。這事實，和托洛茨基派的漫畫，——把雅羅斯拉夫斯基同志，這位監察委員會的主席，形容成是隻斯大林所牽的，兇猛得要咬人的狗，其間相去不知有多大的距離啊。

人們也許要這樣說：「反對派在引起領袖們對於種種弱點特別注意，並且使他們防範這樣或

那樣的危險，這不是很有用麼？」

這是不對的。第一，在原則上，要使領袖們經常注意一切，自我批評才是比死鬥還有效得多的方法。

第二，很顯然的，在蘇維埃國家的有規則的，逐步的成功上升曲線中，並沒有反對派參加的痕跡。反對派並不是沒有改正的機會，但是，他們反而在進路上設了許多障礙，使人們白費許多氣力去迴避它們，——蘇聯的偉大的上昇之所以把反對派的勢力消失之時刻爲一時期，這事也是理由之一。現在的蘇聯的領袖們值得人們的信仰，因爲他們自十月革命以來，從未改變過他們的立場和觀點——凡是列寧做下的事情，仍舊依照列寧的原則做去，並不依照列寧主義的改本和偽版。

這里，我有點偶然地要引證一件多年以前的，還是革命以前的，而且是上一世紀的事情：那是瓦諾·斯都魯亞講出來的，一八九八年斯大林私下訪問提夫里士的大工廠的工人們的故事——這並不是昨天的事情呢，但情形是這樣的：「蘇蘇給人家認出了果斷和堅決，」同時他激烈地指責他所看到的許多同志的「優柔」，「遲疑」，「卑劣的妥協精神」，這個蘇蘇，在當時（那時他還只有十九歲）已經察覺出許多智識分子的必將變節，「果然，這些智識分子的一半，就在第二次黨大會之後，投到孟雪維克的陣營裡去。」

在當時那樣地出現的斯大林，在三十年後，以同樣的姿態出現在反對派的面前。這是同一個人，同一傾向正確的人：現實在義的人，有信仰的人，前進的人，跟觀念模糊的，悲觀主義的，

踟躕不前的人們反對的人。

反對派做了各種挫折革命的銳氣的事情，它在世界上（盡他所有的力量）散播懷疑毀滅的幽靈，失敗的絕望和頹喪的陰影。

「搖一搖我們的反對派罷！」斯大林說：「撕開他們的革命的浮詞；你看，在他們的根本上，是存在着妥協性的。」

另外一次，斯大林又說：「托洛茨基主義努力在我們的革命的部隊中注射着信仰缺乏的毒素。」

在世界上已經散佈到某種程度的托洛茨基主義，攻擊着共產主義國際的組織網，用盡手段，想破壞着十月的事業。在托洛茨基的周圍，烏合着從各方面來的各種人物：被開除的，變節的，心懷不平的，還有無政府主義者——這些人們，發動一種有組織的侮蔑和怠工的鬭爭，一種專門反布爾雪維克，反蘇維埃的完全否定的，具有着種種叛變的方式的鬭爭。這批變節者竭力要做俄國革命的掘墓者。

把托洛茨基看做是一個反革命者這事情，是很對的——不過，顯然這並不是說，托洛茨基具有像那反蘇聯的布爾喬亞反動人物的全部意識。

斯大林曾經說過：「反對派的結局，是會投到白黨的懷裡去的」。有許多人覺得這種預言未免過火，也許是出於鬭爭的忿激的。但是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的流血的事件，不祥地證實了他的話——我們難道只有着這個證據麼？

假如反對派得了勝利，那麼黨必至分裂爲二，革命就要陷於一種悲慘的狀態。奧爾佐尼基支說：「托洛茨基主義的勝利，必至使蘇維埃的建設陷於毀滅。斯大林的打倒托洛茨基和打倒右派的勝利，實在好比十月革命的一次新的成功。」

斯大林並不因爲解決了共產主義的核心反對派的問題，把這種政治上的拜贊廷主義 (Byzantinism 糾紛)，一刀兩斷了，就覺得滿足。他還幫助別國的共產黨克服過右傾的動搖，解脫過機會主義和改良主義的惡性的誘惑，例如一九二六年五月後的波蘭共產黨；還有在一九二七——二八年「把他們的選舉的戰術用到真正革命的政策上去」的英法兩國的共產黨。同時，機會主義的進攻，也及到了德國共產黨裡面。但是共產黨的德國排斥了勃朗特雷派 (Brandtlers)；正像捷克斯拉夫的排斥了海希斯派 (Haisists)，美國的排斥了勞夫斯東派 (Loysonians) 和不拍派 (Peppers) 一樣。一九三三年，保加利亞的共產黨，靠了斯大林，纔能消滅那種自左而右——從煽動民衆而到機會主義——地動搖着的不良傾向。「無產階級應該有一個明白的目的 (綱領) 一條確定的路線 (策略)」，斯大林說——他說得出，也做得到。

我們回想起一件事實，那是很有趣的，可以作爲一個非常清楚的頭腦纔有的先見之明的證據，那是一九二〇年，德國的社會民主黨 (這是次於俄國共產黨的最重要的黨)，雖然似乎有着強大的勢力，而且十分統一，斯大林却對它的統一下了一個充滿懷疑和含蓄的判斷，他認爲這統一是「表面勝於實際」。親眼看到現代的歷史的悲劇的發展的人們，就知道這應該是多麼有力，

多麼聰明，十二年後，事實完全證明了它的真實。

從這時候起，斯大林比往常更加謹慎地保護着列寧主義的完整的偉大性；這列寧主義，是從各種陰謀之中解救出來的——在那自由的偉大的試驗，雖在不斷地進步，却尚未成熟的時代，在蘇聯的革命者和無產階級，正用他們自己的好比輸血似的犧牲，熱心地，但是緩慢地給一個巨大的新的組織創造生命的時代。

第七章 偉大的口號一九二八——一九三四

俄國革命的最近的現階段。一九二八年五年計劃的時代。

在類屬上是唯一的一種民衆，一種全新的民衆，一個跟別的國家完全不同的國家，在進攻着自然力。他們在失敗和暴風雨之中，隱隱望見，他們快達到電氣化了，他們在它的四周工作着。

這包括一九二八到一九三三這五年的計劃，它在一九三二年底，即不過四年之後，就被一個新的五年計劃所代替，因為它在這時已經完成了，這個計劃，同時樹立於都市和農村裏：工業的發達——一躍千丈的進步——農村中的社會主義化的成功（這兩個最要緊的問題，是彼此密切地不可分離地關聯着的。）這個俄國，它本是落在世界工業的後面的，現在要把它完全社會主義化，使它趕上前面去。

我們再來看看那些發展得已爲我們的自力所不及的基本目的罷，——那是，如斯大林所規定似的：「要把落後的俄國，變化成技術上現代化的國家——使它可以不受資本主義國家約束，使蘇維埃政權能够堅固，社會主義能够勝利，要能够消滅富農，改革私人的小農業生產，使變成農業的集體化，要建立充分的國際力量，」而且，這種單獨一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也要脫離外國的

資本。

所說的這個唯一的國家，雖然在十年以來，經過又興奮又有計劃的奮鬥，創造了許多顯著的成績，但是世界的輿論，對它還不會解除武裝，還不肯原諒它的跳出一「舊制度」；資本主義的大報（這實在並不是報告新聞的報紙）依舊固執地繼續着它的不正當的新聞政策，一筆勾消這些成績，就像勾消一紙契約一樣，要是遇到勾消起來覺得太說不過去的地方，那就說這些成績是放棄了社會主義的原則的。從第一次五年計劃的開頭一直到完成，同樣的偏見的譏諷還出現在這些官辦的報紙上，以下是斯大林自己所蒐集的若干摘要錄：

「這是一個計劃麼？」紐約時報說：「算了！這只是一個空想！」（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同時，Daily Telegraph說：「完全是破產！」上面已經說過的紐約時報更誇張地說：「可恥的失敗。」「行不通的！」波蘭的 Gascia polska 報說：「毀滅是顯然的了。」意大利的 Politica說：「全系統的崩潰，」Financial Times 好像它可以絕對證明地說。美國的 Current History 同樣明確地說到五年計劃道：「目標的崩潰，原則的崩潰。」

「在蘇聯，五年計劃是只存在於紙上的。它從來不會成功過，」一個俄國人這樣寫道——他是一個因行為卑污而被開除黨籍的共產黨員。同是這人，在一九三一年所作的一本書上，又告訴我們：「在俄國，人們不至於餓死的地方，只有監獄；」他又說：「所有的蘇聯公民，鞋子都是破的，眼光都是陰慘的。」「我看不起什麼世界革命。」在另一本書中說。斯大林一九二七年會對美國的一位大農業家康配爾氏說過這樣的話，至少，康配爾氏是有承認這事情的厚顏的。

既然說到這里，我們再說一件事罷，請聽：「在莫斯科的旅館裡，人們把小孩子串在鐵串上烤來吃。」也許，在今日，至少還有許多可敬的人們，是也承認這事情的。

被巨大的數字所支持着的一九二八年的五年計劃，在四年之後，完成了百分之九十三。在重工業方面，四年內的成就，達到百分之二〇八。從一九二八到一九三四年，國家的生產增加到三倍。一九三三年的年底的生產額，等於戰前的四倍。

從一九二八到一九三二年，工人的數目，從九、五〇〇、〇〇〇增加到一三、八〇〇、〇〇〇（大工業方面增加了一、八〇〇、〇〇〇，農業方面增加了一、〇〇〇、〇〇〇，商業職員增加了四五〇、〇〇〇。）——當然，所謂失業，是變成過去的歷史上的事情了。

在生產總額中的工業部分，換言之，就是對於農業生產而言的工業生產部分，一九一三年是百分之四二，一九二八年是百分之四八，一九三二年是百分之七〇。

工業中的社會主義工業部分，在第四年的末了，是百分之九九·九三。

國家收入，在這四年中增加了百分之八五。計劃完成之日，這項數目是在四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以上。一年之後，又增加到四九、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其中有百分之〇·五是資本主義的和外國的成分。）

工人和職員的薪工的總額，從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增加到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能讀能寫的人數，就整個蘇聯而言，在一九三〇年底爲百分之七〇，一九三三年底，增加到百分之九〇。

在這里我們暫停一停且把這些證明着人類史上破天荒的進步的數字，跟上面說過的那些公平的預言對照一下子罷——什那「破產」啦，「行不通的」啦，「毀滅」啦，「崩潰」啦……這些話，都還是當五年計劃已在全世界的反對之下快要告成的時候說出來的。

許多新的工業部門進行起來了，從機械工具，汽車，曳引機，化學製品，電動機，飛機，農業機械，強有力的渦輪和發電機，高速鋼和各種的鐵，一直到人造橡皮和人造絲都能製造。兩年以前，我從倫敦到列寧格勒去，當時所乘的大船上的一切，所有的一切，無論是機件，是佈置的東西，無不是蘇聯的出品（連兩口鋼琴——一口是爲旅客預備的，一口是爲船員的——都是的。）我在莫斯科看見過一架很大的飛機（一到這大建築物的裡面，人們好像覺得置身於一個機器展覽會裡。）這裡面沒有一樣東西不是蘇聯所出，蘇聯所造的——除了着地用的輪盤的橡皮胎。

幾千個舊的工廠被重新建設過。幾千種新的企業，組成着形形色色的集團，攢簇在許多大企業的旁邊，有幾種大企業的偉大，是佔着整個現代工業文化的首位的，如 *Dnepropetrowsk*、*Cheljabinsk*、*Bobrsk*、*Ouralsk*、*Kramatorsk*。

有組織的科學的探險隊，能够把大地的每個富源勘察出來。許多新的偉大的工業中心產生了，這里，那里，如：烏克蘭、北高加索、外高加索、中央亞細亞、哈薩克斯坦、卜里亞特蒙古里、韃靼、巴斯契爾、烏拉爾、西部西伯利亞、遠東。

「四年中間，」美國的 *The Nation* 雜誌說：「在地球上出現了五十多個新城市，每個有從五〇、〇〇〇到二五〇、〇〇〇的居民，每個都是完整的而且有特殊價值的工業中心。」一個巨大的城市替新泊河兩岸布滿了水泥和金屬的建築物，坐落在世界最大的水力發電所之一的旁邊（再過幾年，這個發電所將昇到世界的第五位或第六位*）在庫茲尼支的多礦的盆地上，突然有了六個新城市，六〇〇、〇〇〇人口。在極北的地方，由於一個磷酸鹽礦，也一下子出現了一個城市，馬上就集合了五萬居民。

比愛爾·陀米尼克——他在別的方面，由於喜歡把社會主義當作民族問題看的脾氣，曾經發表過許多極其幼稚的普通意見——當他完全從堅強的事實的基礎上作了觀察之後，關於蘇維埃亞洲的工業的發展的偉大，對我們這樣地表示：「……在烏拉爾嶺以外，有着三個偉大的工業中心，從蘇聯的工業中心每個都有法國那樣大這意義上說來，那麼法國的北部的中心，勞倫區的中心，羅亞爾的中心，對比着烏拉爾嶺外的那三個中心，正是相形見绌，這三個中心，就是包括 *Magnitogorsk*, *Sverdlovsk*, *Tobolsk* 的烏拉爾中心，包括 *Novosibirsk* 的庫茲尼支中心，這兩個正在工作中；還有一個盜加拉斯特羅亞中心，則尚未開發。這些地方，在盛起於草原上的三個新城市（其中兩個，在過去三年中已經有了三〇〇、〇〇〇人口）的周圍，新的國家組織起來

* 第聶泊的水閘，能發七五〇、〇〇〇匹馬力，但是加拿大的 *Beaucharnais Saint-Lawrence*

所發的馬力比這還多。*Colorado* 的 *Hoover Dam* 且能發到一百萬匹馬力。但是，將來西伯利亞的 *Channan*，能發一百萬馬力，*Banská Ostrava* 則將有二、六〇〇、〇〇〇匹馬力。即使希臘神話中的巨人 (*Titan*) 神族，也只不過把 *Pelion* 山移到 *Ossa* 山上去！

了，人民很快地繁殖起來了，一個赤色的亞洲不折不扣地造成了；蘇聯這偉大的天平秤的另一個盤上，放上了新的價值了。」

我們應該常常注意常常說起的，那是在這個大過美國，歐洲或中國兩倍，而且每三年間人口要增加一千萬的*一個國家裡面運動着的發展工業的合理化的力量之大。在這種偉大的力量的總動員中，沒有一個個人的努力不被計算在集體的計劃之內。工作上的每個小節，機器上的每個零件，都彼此聯繫着。那中央的唯一的指導機關，無時不從整個國家上着眼。它分配着工作，調整着工作。

我們再得說一說這個為大眾的利益而全體工作的方法，在這個方法之下，大家必須工作出最大的效果來——這種方法，在那種被資本主義的無政府狀態統治着，在為個人謀私利的負擔下歪曲了勞動的目的，充滿着私人企業的茶亂矛盾的國家裡，是不可能的。

從前，某一塊地方是種稻的。但這辦法不好；據富於經驗的人們的報告和專家們的證明，這裡最適於種棉花。於是，人們就揀別處種稻，這里，成了一大片棉花田，為利用棉花起見，應該建設一個紡織廠，許多紡織廠。於是裝置動力，在適宜的地點建設起來，道新的工業中心又得跟交通網相連接：於是水力發電所，鐵路，車站，馬路，運河……一一出現了。此外，還得有訓練工人和技師的學藝所和技術專門學校，種種勞動和文化的中心，對於兒童和成人的教育上的設備和組織，博物館，實驗室，醫院，運動場，無線電，電影，戲院。複雜而偉大的蘇維埃埃的分子，

* 歐洲的人口增加，差不多要比這達到兩倍半。

就是這樣地建立起來：於是那化合的分子——那些綜合的城市，那臨時發生的城市，就依照自然定理，在它們的機械的中心的周圍聚集起來。像這樣，許多城市，在合乎當地的需要和國家的需要的計劃所決定的適宜的地位上，合理地建立起來。像這樣，許多經濟的基礎，纔能合而為一地互相聯繫起來。

另外的許多景象，引人注目地顯現出來了。斯大林在第十七次黨大會（一九三四年一月）上說：「我們已經設定了烏拉爾·庫茲尼支聯合的基礎，把庫茲尼支的炭和烏拉爾的鐵礦聯繫起來。烏拉爾的新的經濟基礎，這樣地就從一個夢想變成了一個現實。」斯大林又宣告道：「石油工業的強有力的新基礎，已在烏拉爾嶺的南面和西面——烏拉爾斯克，巴斯契爾，哈薩克斯坦區域之內建設成功了。」

日常用品的輕工業呢？這種工業，是爲了發展重工業而被故意耽擱了一下的，因此常使主婦歎氣，市民埋怨（見鬼！買一點奶油要等候一個半鐘頭。買一件外套需等候三天。）但它不久也重新上了軌道，怨聲也就消滅了。四年之中，輕工業的生產增加了百分之八四。售貨的商店有規則地增多了起來。現在，所有的飯館供給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人的飲食。食品貿易和零售的數字在一九二八年是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到了一九三二年，則爲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真的，你若到莫斯科去跑一趟馬路，你就會看到，裝備齊全的店鋪滿街都是，其所備貨物的充足，並不亞於世界各大都市，這一種新的現象，顯然的大進步，一年勝過一年。

現在，我們要問，這一切的資本是從那裏來的呢？這個問題在這裏是表現着極其特別的形式。斯大林說：「通常，在資本主義的國家裏，投於大工業計劃裏的資本，不外乎從借外債或掠奪而來。」（戰爭的賠款，殖民地的勒索，勞動上的不正當的剝削。）

蘇聯却不能採用這些方法；外債麼，它借不到，掠奪麼，這是它讓給那些「文明」國家去用的手段。它的資本，是只得從自己身上籌措的。

蘇聯政府除了租稅之外，還有着許多財源，因為它握着一切的獨占權。它的國富，主要的是在於國營事業的收入上的一部分的徵收（商業*，運輸，郵電專業等等……），在於社會機關的盈餘，至於從民衆的收入則很少用強迫的租稅的方式，而用公債共享股（Participating Share）以及儲蓄銀行的存款這些方式。（因此，在每年有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從民衆的收入中，只有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是從義務的繳納，稅捐或保險費而來的。）

蘇聯人民委員會財政部長格林科告訴我們，四年之中對於五年計劃的投資，共達一一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但當初的預計，不過八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而已。

格林科又說：「我們完全推翻了布爾喬亞們的理論，據他們說，蘇維埃國家倘得不到外債的援助，單靠自己的財力，那是無從把那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程序實施起來的……。」

「我們的資本之所以這樣容易集合，主要的原因，在於一件根本的事實上，就是，在我們

* 我們要注意，蘇聯是受到了世界經濟恐慌的影響的：有幾項輸出品在量上雖然增加，但近幾年售價却大跌，煤油即其一也。

這裡，像資本主義國家那樣的浪費國幣的情形，是不存在的，在資本主義國家裡，有許多的寄生階級，他們並不生產，却要消費國幣的很大部分，這樣一種階級，在我們這裡，已完全消滅了。……我個並不實行帝國主義的政策……在我們的社會生產中，並沒有無政府狀態。我們的全部國富，差不多沒有一文不是作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資本之用的……。」

偉大的言語，它的莊嚴和深刻的意義，不是人們所能故意誇張的，在一九三四年從一個現任的財政部長口裡說出來的這些言語，顯著地表明着集體組織中的一種澈底的變革。這些包含着確定事實的全部重量和全部內容的語言，是全人類所應該反覆而深思的：「我們這裡無所謂逃避，無所謂規避。我們不能够欺騙。那些蛀蝕着資本主義國家的骨骼的，什麼中間人的有毒的寄生主義，什麼投機行為，什麼醜聞怪事，我們都是不認識的。我們實行着一種公開，正直的政策，我們的整個政治組織，完全爲了集體的利益和每個人的利益而忠實努力地工作着。」

爲了堅固我們的印象起見，且引幾個對外國的比較來看看。

一九三三年，由於商業稍稍恢復景氣的結果，美，法兩國的經濟生產較戰前略有超過：美國的比例爲戰前的百分之一一〇·二，法國爲百分之一〇七·六。英國（都是有點恢復的）爲戰前的百分之八五·二，德國爲百分之七五·四，至於蘇聯，則爲戰前的百分之三九·一。

我們放眼看看這些數目的峯尖罷，這些純粹的數字，表示着什麼意義呢？在世界統計的圖形上，最高地畫出着的這一個山峯，在今日是叫什麼名字呢？

一九二九年，即資本主義的工業生產達到頂點的一年，蘇聯還僅居世界統計的第五位，落在生產額達一三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盧布的美國，各達三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盧布的英國和德國，以及達二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盧布的法國的後面。

自從資本主義的生產跌落到百分之三六，僅值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盧布的時候，蘇聯就昇到世界生產力的第二位，僅次於美國。

在農業機器和機關車的製造上，現在的世界記錄是被蘇聯所占有的。（單是農業機器一項，它的每年的生產就值四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盧布，美國的生產只值三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盧布。）

在一般的機器的生產上，蘇聯佔着世界的第二位；煤油，鐵以及鋼的生產，也是同樣；電力的生產居第三位（次於美國和加拿大）。製鞋工業也居於第三位，我在這裡特別舉出這個例子來，乃是因為有些人常常愛說俄國人太可憐，總是穿着破鞋和「假想的」皮鞋的緣故；已故的拔佳以爲美國和捷克斯拉夫兩國的新鞋底，足以鋪遍歐洲的土地，的確，在這項工業上，這兩個國家還排在蘇聯的前面。

倘若我們想看一看把世界最大的工廠排在一起而形成的大路，那麼這簡直是把超自然的異物召來；我們在這裡面能看到的：Magnitogorsk 冶金廠，現在還不會全部完成，等它完成之後，將與現在在巨大上佔着世界記錄的美國 Gary 廠並駕齊驅，Tseliabinsk 的巨型曳引機廠，莫斯科的斯大林汽車廠，Izmailovskiy (在頓巴斯區) 重工業機械廠，莫斯科的加剛諾微支廠（製造滾珠

輸本的)——這些都是在巨人世界裡面的巨人。魯剛斯基機關車廠是歐洲首屈一指的一個。別的多機器廠(製造機器的機器和製造金屬品的機器)，都是佔全世界的第二位或第三位的。

另外種種對外國的比較：

失業。當這失業一事已從蘇聯消滅的五年計劃時代，別的國家的失業人數，英國是從一、二九〇、〇〇〇增到二、八〇〇、〇〇〇；德國從三、三七六、〇〇〇，到五、五〇〇、〇〇〇。法國的失業人數，也不斷地增加，雖然在一九三三年年底暫時停止過一下，但現在還有一、六〇〇、〇〇〇完全失業的人(死者傷者不算在內)，二、九〇〇、〇〇〇部分失業的人*。在美國，根據亞歷山大·哈米爾登學院的調查，一九三三年三月的失業工人數為一七、〇〇〇、〇〇〇。在意大利，有一、三〇〇、〇〇〇失業工人。西班牙的失業人數，在一九三四年九月為六五〇、〇〇〇(比正月多二三、〇〇〇)。

有的人告訴我們，在上述的國家的有幾個裡面，失業人數已經減少了。但是我們要注意，人們說是在減少着失業者的地方，同時也在減少着工資的總數。但我們尤其應該注意的是，在這世界上，比資本主義國家裏面的製造公開的失業人數的手段更無恥的虛偽手段，是沒有了的。比當局官廳的，在字眼和數目上玩弄花樣，掩飾真象的這種欺騙大眾的更周密的手段，是沒有了的。沒有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不抵賴它的失業人數。他們「忘記了」的全部工人，他們「忘記了」那些

* 法國的這個數目，是根據工廠及礦師監察委員會的報告所供給的工業工人失業着百分比的總數而求出來的。

沒有多少小工人的企業，他們「忽略了」全個的工業區域。有的地方，實行着一種制度，把一個工人的工作時間，分而爲二，把一半分給一個失業工人之後，他們就把那個失業者的名字從失業名單上拭去。但在實際上，情形一點也不會改變，因爲兩個一半，加起來仍是一個（這是美國的事情），至於那種專門掘將來的陷坑的無益的公共工作，可以不必說了，那種只改良些言語並不改良事實的紙上計劃，也可以不必說了……還有那種戰爭工業的膨脹（各國皆然，尤其是德國和日本），也不必說了……像這樣，失業者的人數，在羣衆的被迷惑了的（*Fragiles*）——法西斯化（*Fascistes*）的——眼中是消退了。況且，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只有極少極少的一部份的失業工人受到一點救濟，其餘的都是聽天由命地生活着。

「三年以前，」斯大林在一九三三年報告道：「在蘇聯有着二、五〇〇、〇〇〇失業工人。目前呢，蘇聯的工人數目增加了四、五〇〇、〇〇〇。」

工資呢？在我們所說的四年中，工資低落的比例，在美國是百分之三五，德國是百分之五十。英國也是百分之五十，意大利——在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一年之間——從百分之二四到了百分之四五——這自然是依照購買力而算出來的。在蘇聯，則工資增加了百分之六七。（產業工人的平均工資，一九三〇年爲九九一盧布；一九三三年爲一、五一九盧布。）

工作的品質和生產量如何呢？生產量的增加，在美國的繁榮期中，據蔡斯（*Shawt Chase*）所說，是百分之二五。在英國經濟情形最好的時代（一九二四——一九二九），是百分之二一，德國——從一九二三到一九三一年，生產能率的增加爲百分之二七（據寇泰斯基——*Kroschmar*

的統計)。蘇聯，當上述各國的生產能率大大地減退的時候，它却增加了百分之四〇。

現在我們要講到對於學者和科學機關，以及對於這些人和機關的各種活動，所給的巨大的補助了。這裏單說一說關於公共教育的情形罷。我們知道，蘇聯的人口，是每年三百萬以上地增加着的。每年的小學生的增加量，和這相等。我們不必去講在蘇聯生活的一切部門中進步最快的「文化」部門的細節目（在蘇聯，教育是廣播似的推廣着；無論哪一個角落都傳播到。每個企業就是一個文化中心，每個兵營都是學校，每個工廠，也都是製造新人的工廠），——我只要說一說，在蘇聯，各種的學生，共達六〇、〇〇〇、〇〇〇人，他們的教育經費都是國家負擔的（蘇聯的每三個人中，有一個學生）。在各個共和國中，我們舉出一兩個來說說：在韃靼，一九二三年的學校的數目是三十五個，到了一九三三年，就增加到一千七百三十個，啓爾吉斯（高加索西部的一个共和國）人中，一九一四年的時候，文盲的數目佔百分之九十四；現在則一個文盲都沒有了，即已等於百分之〇了。在塔吉斯坦，一九三二年的學校多於一九一四年的二十六倍，哈薩克斯坦則多了三十八倍，有七十種方言在蘇聯被培養着。其中有二十種本來沒有寫法的，如今都已有了字母。

最近蘇聯的關於公共教育的預算，較去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同時，在英國，關於這同一事業的預算，却減少了一一、七〇〇、〇〇〇金鎊，在德國，則從一九三〇年起，這同一的預算一直在減縮着：一九三〇年爲六九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一九三一年爲五九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一九三二年爲五七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從一九二六年以來，德國所減縮的公共

教育經費已達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在美洲北部，學校中的學生，不斷地在減少。在瑞士和美國，兒童教育的理論，已在被開始放棄了。

報紙。一九二九年，蘇聯每日報紙的印數爲一二、五〇〇、〇〇〇；到了一九三三年，增加至三六、〇〇〇、〇〇〇。

藝術的部門呢？

關於戲劇和演劇的，新的指導的理論的繁重的研究，關於蘇聯的電影的澈底的創造，這裡說起來話太多，那就講講蘇聯的文學吧；況且，文學在這方向中，也是有着美麗的建設的進步的，況且斯大林是特常熱烈地關心文學和藝術的發展的。被斯大林叫作「靈魂的技師」的作家，其社會的任務，是將種種新的因素，導入現代生活的描寫中，而引起一個不但和社會主義社會的統一相關，而且也高度地和藝術本身的進步有關的問題來。這就是具體的觀察上的，理論上的，表現上的種種廣大的遠景（Perspectiva），也就是作爲人類之進步的積極的反映的，那一種人類義務的感覺。蘇聯的文學的文化，在乎要使作品裡面的「人」豐富起來，發展起來——誠如馬爾洛所觀察到的那樣。

在今日，我們還不能說蘇聯的文學已經完全脫離了摸索的時期，但它已經積集着許多重要的作品，這些作品，或以表現民族生活的深刻，或以反映大眾的工作的正確，或以其精神的聯繫性（Solidarite），準備着在文學史上劃着一個新的大時代。我們要舉出若干最著名的足以代表各

個方面的作家姓名出來麼？下面就是：高爾基，綏拉非摩維支，革拉特珂夫，費定，錢諾諾夫，伊凡諾夫，潘菲洛夫，畢力達克，愛倫堡，法捷耶夫，蕭洛霍夫，英培爾，錢列捷珂夫——這其中還不會把非俄籍的蘇維埃作家說在內，而很著名的許多批評家和記者，如拉狄克也沒有說在內（博學而輝煌的盧那却爾斯基，已在一九三三年逝世）。

許多西歐的舊派的作家，還不大懂得這一批他們所未甚理解的生力軍對他們預備着的，不久就要發動的渾底的巨大的鬥爭——這一批作家，他們的地位雖然還很薄弱（比起那些已經牢牢結合的布爾喬亞作家們來），但是在他們的較之舊作家們稍欠精練的作風中，却提供着更多的實質，更多的思想。

我們必須再三把握文學在勞動者集團中所表現的那隱在的潛勢力。在斯大林的推動之下，共產黨特別擴大了作家的運動，首先，是由抑止文學組織中的政治的宗派主義入手，在後，由那著名的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三日的布告，根本地剷除了宗派主義（這種宗派主義，是曾在全國的文學生產中引起了一種危險的），這個布告，組織了蘇維埃作家聯盟以代替原有的各種團體，這聯盟的基礎，乃是一切作家的廣大的統一戰線，自正式的革命作家以至「同路人」作家都參加在內。我們應該清算文學中的宗派主義，「斯大林說，「而且要清算它在以前所造成的怨恨。」蘇聯作家聯盟的成員，共同以努力於「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和防衛蘇聯為宗旨。對於這綱領，那使我們之中的許多入感到是關於蘇聯國民文學之豐富的一種啓示的蘇聯作家大會（一九三四年八月，在莫斯科），是莊嚴地接受了。所有的蘇維埃作家，都以莫大的為誠在這個綱領之下

團結起來。

那偉大的理想，是在社會主義的坦直光明的大路上，它的科學的和道德的證明上，將嚮導者的使命，課給作家（這時作家的工作範圍就得擴大）——但是並不要把文學活動一味呆板地附屬於政治宣傳。這一種社會意義在精神創造上的應用，必能使那些「爲藝術而藝術」和個人主義的，自私的藝術，以及這類藝術的狹隘性和悲觀主義，一起消滅（在歐洲和美洲，我們也應該把在同一方向上發生着的種種分散的力量廣大地組織起來）。

在我們這些還充滿着以精神的使命自豪的犬儒主義和愚蠢思想的老大國家裏，凡有真正感動心魂東西，實際上是被蔑視，被犧牲着的。我們看見，科學和文化，怎樣被輕賤地利用於戰爭工作和舊社會的保持之中。作家，藝術家，學者，一切的智識分子，都被那想把最後的一點社會力量都葬送到軍備的深淵裏面去的政府，束縛得貧弱不堪。做學生的現在已無所謂前途，僅有的前途，是他們的人格之喪失。他們的畢業證書，無論如何只是一些廢紙。他們被獨占着，被饕餮着——無論作爲發明家和作爲教育家——以作預備實際的或理論的戰爭之用，或者作爲剝削無產階級之用。他們是無論自己願意也好，不願意也好，總得拚着他們的頭腦，變成戰爭原料的供給者（跟別的軍火商做不幸的親戚）或反動派的警察。

我們把眼光移到另一方面去罷。死亡率。死亡率從前在俄國是很大的，千人之中竟有三十人以上。在最近四年中，這已從百分之二十七跌到百分之十七。現在蘇聯的死亡率，比英國，荷蘭（十五——十四），新西蘭（在這方面，新西蘭可說得天獨厚，它的死亡率千人中不到十人）

都還要高——但是已經比西班牙和匈牙利（二六），羅馬尼亞和奧地利（二五），意大利（二二），德國和法國（二〇）低了。

一九三四年之初蘇聯的國防經費的預算，佔全部預算的百分之四·五（日本爲百分之六〇，法國爲百分之四〇，意大利爲百分之三三）。紅軍兵額爲五六二、〇〇〇人。日本兵額爲五〇〇、〇〇〇人。希特拉所要求的是跟法國一樣，三〇〇、〇〇〇人，但據最低的估計，實際上他的手裡，攪着六〇〇、〇〇〇大軍，但德國的領土比蘇聯的要小到五十倍呢。蘇聯的軍備進步甚速，據伏羅希洛夫在一九三四年初的報告：在一九二九年，每個紅軍士兵所有的機械運送及軍器的能力平均有二·六匹馬力，到了一九三四年，就增加到七，七匹馬力。

當蘇聯的生產大舉動員，而它的零賣的商業，增加了百分之二七·五的時候，此外四十八個國家，却看着他們自己的商業，跌落到一九二九年的數目的百分之四三。工人的工資則在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二年間，從四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減到二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從五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圓，減到二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圓，從三八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鎊減到三二四、〇〇〇、〇〇〇金鎊。——在那些用馬克，用金圓，用金鎊的國家裡。當這種統計發表之後，實際的情形還在壞下去。

在一九三〇——三二年間，在美國有五千零銀行破產（虧空了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圓，雖然有八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圓的補助金）*。

一九三二年，德國的政府，爲了「穩定」五個銀行起見，竟不得不吐出一、〇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的馬克來（雖然總歸是納稅人的錢）。

同時，在法國，在同樣的辦法中，對於那些就要破產的大銀行，也化了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法郎。我們隨手從一個保守黨的報紙裏引一段報告來看看罷：三〇〇〇、〇〇〇的失業工人，一五〇〇、〇〇〇窮困的知識分子——在一九三三年單是巴黎和塞納河就有二二〇〇、〇〇〇件破產事件（到了現在——一九三四年年底，巴黎區的失業工人已達三七〇、〇〇〇人）。

預算上的虧空：一九三〇年，在美國爲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圓，在法國爲二、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法郎；次年，美國的虧空增多到三倍，達二、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圓，法國變成兩倍達五、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法郎；法國最近的預算，虧空到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法郎。*意大利的虧空額則爲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里爾。現在，在美國，只有一個靠着一班上等頭腦竭力想些既苛刻又有效的計劃作基礎；在法國呢，除去經常發行彩票的不道德行爲之外，還有政治的通貨膨脹和緊急令，把法國人的喉嚨扼緊使吐出所有存款。隨你增加租稅，隨你把工資，薪水，失業工人救濟費和撫恤金儘量減少，隨你把用於發展科學，社會事業，教育和進步的經常費儘量減削，隨你減低公債利率（Coupon）使小有貯蓄的人們一起破產，但是財政的虧空，依然不斷增大。甚至於抵賴債務的「經濟上的新道德」也無濟於

*一個對照：好萊塢的電影明星葛露索·嘉寶，她每年有二〇〇、〇〇〇金圓的新水。她的錢多到這樣，最近，人們勸她只要在無線電播音中說一聲「Allô」，允許給她一五〇、〇〇〇法郎，她却拒絕了。

事。在法國，不還美國的債這事情，在有些人們，竟成了一種國家的光榮，但對於那個Boche（德國）的不願意付出並沒有欠人家的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法郎這事，那些人們却要加以嘲罵。法國的諷刺歌作者，對於那個討厭地訴說人家騙了他的山姆叔叔（美國）大事嘲笑。——最後，連那彼此間互相設立的關稅壁壘——竟至形成了關稅戰爭——和那發瘋似的搶着提高關稅的辦法，——各國想藉此解決那只有國際協商才能解決（但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國際協商是決不可能的）的問題——也無濟於事。

有一個可笑又可怕典型的例子，足見關稅和那損害本國消費者的攫奪行為的愚蠢的：這就是法國的咖啡。咖啡並不是一種奢侈品，這真正是大眾食料中的一種主要的必需品。況且，照法蘭西全國的消費量說來，法國殖民地所出產的咖啡，分量極少，所以在這裡又並沒有要保護國家農業的特殊問題。咖啡一百公斤值三三〇法郎（加上零售者的利益，是三六〇法郎。）但是每一百公斤的關稅，却要三二一法郎，再加上一八〇法郎的消費捐，二〇〇法郎的營業特許捐，此外還有許多別的苛捐雜稅，結果捐稅一項，竟達六三〇法郎，等於原價的兩倍。這就是在我們的國家裡那疲弊的財政制度的負贅，用以對付消費的國民的大打擊，這是真正的欺侮。

和這同時，在巴西，却發生着大量地毀滅咖啡的事情。有一種經濟刊物，用很慎重揀選過的

*法國的國債，僅六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法郎之鉅，地方政府的債務還不在內。國庫的空虛，不把鐵路的全空算在內，也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法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參院政委員會主席加育的報告。）

字眼，在最近報告着道：「在現在的這次運動的結束時，巴西爲提高市價計，將使三二、〇〇〇、〇〇〇袋咖啡脫離市場云。」三二、〇〇〇、〇〇〇袋，這數目表示着全世界一年中所消費的全部咖啡的一倍半！

我們看到，在那按照大眾的需要而規定社會組織的地方，是那樣一種情形；我們又看到，在這按照他們的社會而規定大眾的需要的地方，又是這樣一種情形。

因此，連小孩子都能明白：在這邊，只有紊亂和沒落。

在那邊，則是秩序和上進。一切事情都是有計劃的，自從人類成爲人類以來，人們從未在世界上實現過這樣的一種集體的進步。誠如斯大林所說：「我們看見了律動急劇的實踐在擴大着。」他又說：「每一個國家發展的時代，都有它的史詩，在今日的俄國，那是建設的史詩。」人們也從未看見過這樣盛大合理化的工作，一九二八——三二年的計劃，是人類的智慧和意志的空前地偉大的證據。

但是在這里難道絲毫沒有缺點麼？不錯，這里是有着缺點的。但這是要吹毛求疵地方才看得出來的。運輸事業還發展得不够。蘇聯只有八三、〇〇〇基羅米突的鐵路，但比它小到四十倍的

* 消費者，就是納稅者，就是專門納稅的動物。租稅有三類，就是直接租稅，間接租稅和鹽捐的租稅。既然廢除了工作，使失業的人有些工作做，（在另一方面也就是他們永遠地失業）既然使關在兵營裡的兵士有一口酒喝，因而使經常受中間人剝削的農民也有點儲蓄，又減低了酒的運價使大酒商不難獲利，那麼，直接伸手到一切國民的口袋裡去搜刮，不是理所當然的簡單的事情麼？

法國却有着四〇、〇〇〇基羅米突。雖然鐵路貿易在最近三年來已經由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噸增加到一七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噸，而運河和河流的貿易也從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噸增加到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噸——但這中間有着一種假如不遇意外損害就不至於有的耽擱。

此外蘇聯的審查人員證明着，原料的價格，尙未縮減，而且在實行計劃的四年當中，完全不會有所縮減。因此，這種價格的縮減，應該列爲第二次計劃中的首要工作。另外還有許多缺點，也應該努力克服！

在今日，看了蘇維埃的經驗的總帳之後，那班布爾喬亞以及他們的「雜役女僕」——那些大報紙，取的是什麼態度呢？

故樸恩凱雷氏在阿根廷的一個報紙 *La Nación* 上，發表了他的意見。當解釋資本主義的恐慌之際（這是從彼此拔刀相向，生活在關稅戰爭之下的許多國家裡發生出來的一種恐慌。）樸恩凱雷先生歸咎於蘇聯的那種力求安定自己的經濟的罪惡的企圖。他以為世界的別的六分之五地面上的國家的經濟的破產責任，都是在蘇聯身上的；爲什麼呢？因爲：「蘇聯實行五年計劃之後。那就要把它的製造品很快地傾銷出去。由於這種政策，蘇聯有意侵入別的國家，擴大種種使這些國家無以自保的經濟上的困難，混亂和矛盾。」當我們想到這種幼稚已極的估計是出於一個會負政治上的重任的人物之口的時候，實在詫異之至。一向我們總沒有想到，樸恩凱雷先生竟已這樣

的返老還童了。

在敵人的旁邊，有着一種很特別的友人。

譬如像馬雷先生似的新聞記者，——他是最近發表的一篇通訊的作者，在他的通訊中，把最大的謗謔隱藏在讚美之花和一種可惜太笨了一點的大公無私的假裝的下面。馬雷先生，除了舉出許多假造的數目之外，也未嘗不舉出一些結果，一點進步，但是他隨後反用毒針一下子把它（這些進步的結果）刺死，或者，就證明這一切（結果）——到底！——只是託那良善的老資本主義救主的福罷了。

也有着赫禮歐先生似的歡喜吮舌的大政治家，這西歐資本主義的代表，這將急進的標記送給反動政府的供給者——這位赫禮歐先生，他不得要領地，却竭力把蘇維埃社會主義縮小成這樣的尺寸，使能放進他自己的競選的綱領裏去，這把戲，他在這個機會裡又玩了一次。

我知道有人要對我說了：「只要你肯說，俄國的壞處也有你所說的好處那樣多，那麼我們總會相信你。譬如，赫禮歐先生，他在一本近著裡，作着一個公平的客觀的報告，也說到光明面，也說到黑暗面，但是你，由於偏見，只是一味地頌揚」。

對的。但這只是真理使這些成爲頌揚的。我們沒有杜造一點證據。

懷着偏見的，是那班資本主義的共和制度的昏庸觀念的僕人們，他們看不見在另一世界裡活躍着的創造力的深而大。他們沒有把蘇聯的事實配合到它們本身的真正的時間和空間的範圍中，配合到它們的世界和歷史的範圍中，配合到它們對於人類的影響中去理解。他們說不出真實來。

事實擺在這里。那歐洲的一個最窮困的國家（雖然它面積很大，）又蒙昧又受束縛，又被壓迫，又飢餓，又流血，又動搖的一個國家，竟於十七年中間，變成歐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業國家——而且滾頭撒尾地可算世界第一的文明國家。自古未有的這樣一種偉大進步，是這全世界各國與之爭敵的國家所獨有的方法——這也是自古未有的——所完成的。而這種方法，是一種思想的力量所產生的——這種思想，跟別的國家社會的領導思想完全反對，是博愛的，科學的，正義的思想。

單單說這一種事實（這一種人類精神的勝利）是『有趣的』，或者『在原則上我們不應加以反對』，這是並沒有理解它，或者簡直是騙人。將這非常的圖畫的少數黑影掩蓋它的光明所在方面；將這些制度跟我們的制度等量齊觀，這真是大開玩笑了。

但是，我們且按下赫禮歐先生似的獨人樂隊，模恩凱雷先生似的低能兒，馬雷先生似的耶穌教徒，巴黎強尼先生似的醉漢，巴諾夫先生似的無賴漢，來看看那些大報紙罷。且看他們怎樣的把這一顆苦的丸藥嚥下去。

Le Temps (時報) 在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七的那二號上，說着：「蘇聯並沒有靠外國資本的幫助，第一盤已經賭贏了。」同一報紙，在數月之後——即四月間，又說：「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只能慢慢地越行的建設的階段，共產主義似乎快要一下就跳過去了。實在的，布爾雪維克是誤過我們了。」

Round Table (圓桌報)：「五年計劃的實現，造成了一個驚人的現象。」

Financial Time (金融時報)：「成功是無疑的了。報紙和演說上所表現的共產黨們的高興不是憑空的」。

Neue Freie Presse (新自由報)：「五年計劃是現代的巨人。」

吉勃遜·爪微 (Unital Dominion 托萊斯的主席)：「當我們後退的時候，俄國却進步着。五年計劃已經邁進了……靈魂和理想……俄國的青年和工人有一件我們這里所缺的東西，這就是希望。」

The Nation (民族週刊，美國)：「五年計劃中的四年，表現了真正驚人的成功。蘇聯以一種戰時的緊張的努力，從事於新生活的基礎的建設」

Forward (前進，英國)：「大戰期內英國的成功，比起這個來，只是微塵而已。連美國人也承認，即使西部的建設得最起勁的熱狂時期，也不能與之相比。……全世界的空前的偉力。對於敵對的資本主義世界的威武的挑戰。」

第八章 農村

在農村所完成的工作，尤其重要。

這是更大的一場鬭爭，更大的一項勝利——因為這必須把那具有更深固更頑強的繫帶的一種傳統根本鏟除。

農民問題一向會被解決過麼？沒有。這一次才是偉大的開頭。最重要的一步工作已經完成了——這是只待現在更加以鞏固的一種決定的勝利，一種進展——這種工作的理由，是應該深深地輸入「地之子」們的頭腦裡面去的。

讓我們最後來眺望眺望這廣大無垠的農田的全景罷。

「征服農村的鬭爭，從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七年間，通過我們整個革命，就像那「赤色的線」一樣」。斯大林說。

要說服多數的農民，叫他們同情革命或至少不反對革命，那是比較容易的，因為他們之中的大多數，在舊制度下過着的是悲慘的生活，所以要他們從沙皇制度和革命之間選取一種，他們是不會遲疑的。但是一旦革命成功之後，那要受種種政治經濟情況的規定的社會主義建設工作，却

遇到了一個可畏的障礙：就是經濟總體中的那巨大的農業部分。

「社會主義建設工作的最大的困難之一」，列寧早就明白白地說過：「在於俄國是一個農業國家。」同是列寧，他又觀察到，農民中的小有產者，在原則上，是對於資本主義的傾向大過對於社會主義的傾向。

怎樣地把農村完全包括在總的建設計劃之中呢？對於那些巨大的產業，問題就以驅逐大所有者——這是公敵——的手段直接地加以解決。但剩下的小塊的土地的所有者呢？——跟一切土地上的農民一樣，這些Koujik (小農)，是根本地，全心地，應該管他自己的出地的。

當蘇聯全國有點像識水性的人落在水裡而掙扎着似的，在新經濟政策中掙扎着的時候，列寧會說：「主要的工作，決定別的一切工作的工作，應該把別的一切放在它的次位的工作，乃是要在我們所要建設的——無論怎樣困難，怎樣笨拙都要建設的新的經濟工作，和那無數農民賴以生活的農村經濟之間，建立一種聯繫。」

這聯繫，當求之於大眾共同的利益，農民的物質利益之中，這是一件對人有利或不利的事情。不是一句空口的大話。

「把農民推進到社會主義去的絕不是一種神秘的感情，而是他們的利益。僅僅是他們的利益。」

要向他們指明，辦社會主義是於他們有利的。怎樣去指明呢？我們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是集體的耕作。集體的耕作，完善的耕作，是需要土地被共同享有，工作者共同合作的——它的收

效比別的一切方法都大。它能够直接把每個人的利益的要求，配合在社會主義的觀念之中。現實觀念多於神秘觀點的俄國農民（他們特別迷信事實），是很容易被數目字所說服的——當他們看到了集體耕作中對於個人的利益實在比個人零碎地耕作時所得的利益來得又大又可靠的時候。農民是相信數目字的符咒的。

問題是在貧農，特別在並不很窮的農民和小康的中農上面——因為那些窮得精光的農民，既然沒有什麼可以失去，問題是容易解決的。在聯共第十五次黨大會上，斯大林特別注意中農的問題。他考慮這事實，早在十月革命時代，當中農們相信布爾喬亞的確已經打倒，富農將完結，紅軍開始在內戰中得了勝利的時候，他們實在是傾向我們的。」

跟中農締結一種堅固的同盟，是必要的事——這一種同盟，「決不是遷就他們的成見的同盟，」而是要使他們理解而且承認那種「在一般的蘇維埃經濟和特殊的農村經濟的集體化意義上」的改革的必要，以及剷除那富農的寄生主義的必要的。因為，像這樣一種對於大眾的征服，並不是強迫所能奏效，而只有靠說服才能成功的。

這是十分自然的，要推廣那已經大有進步，而且在批發和零售方面打定了基礎的消費合作制度到生產合作上來。

所以，當無主的土地改變「國營農場」(Govkhoz) 或者是純粹而單純的國家農場（這是作為例子的）的時候，那些私人經營的土地，就改爲「集體農場」(Kolkhoz——農業生產合作社)。

實行五年計劃的四年之後——同時就是蘇聯的小麥的種植面積到達二一、〇〇〇、〇〇〇公頃以上的時候——集體農場成立了二二四、〇〇〇個，國營農場成立了五、〇〇〇個（一九三四年年底，集體農場增加到二四〇、〇〇〇個）。

參加集體農場制度的農業生產的，最百分之六十五的蘇維埃土地和百分之七十（現在是百分之七十五）的農民的土地。農民的土地中實行集體生產方法的百分比，以如下的程度增進着：一九二九年為四；一九三〇年為二三；一九三一年為五二；一九三二年為六一；一九三三年為六五，包括二、〇〇〇、〇〇〇農民的經濟。我們看見廣大無際的平原中的計劃周密的發展，是波浪似的推進着。集體農場和國營農場合併起來，佔據着蘇聯的穀物種植地的百分之八五的面積。

而且這些農場的領域是很大的：在美國，四百公頃左右的農場，僅占全國農場的百分之一，而蘇聯的集體農場的平地面積，却有四三四公頃；國營農場的平地面積則為二、〇〇〇公頃。

集體化的物質利益的增進，在目前社會主義大大地傳入了農村的過程中，有許多特著的事情證明着。我們舉出一種來說一說：現在，誰都承認：在烏克蘭，由於巨大的資源的利用，已經能夠避免旱災威脅農作物的重大的危險，而且一九三四年的氣候雖然較壞，但整個蘇聯的收穫，却比一九三三年更為豐登。

國家幫助農民之處：

(一) 替他們設備了值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的，二、八六〇處機器和曳引機的站所。

(二) 借了一、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給集體農場——我們要知道，這種借款乃是一個集體組織借給另一集體組織，是一批全體的人借給另一批全體的人的。並不像法國政府借給鐵路和輪船公司的堂堂的補助金那樣，有二大部分是落到了高級官吏和董事會的手裡，中間人的份子也不必說了。

(三) 借給他們四、〇〇〇、〇〇〇噸以上的種子和穀物。

(四) 減輕貧農的租稅和保證金，所減之數超過三七、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反過來在一九二九——三〇年中。「個體的農民」對政府提供了七八〇、〇〇〇、〇〇〇普特 (Pood, 一普特等於四十三磅) 的種子，集體農場，則提供了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普特。一九三三年，兩者的數量倒了過來，集體農場所提供的為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普特；個人農民則為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普特。這里我們還須提起，使大家記得種種研究會，實驗室，科學學校，探險隊，農業考察團的大量而平均的增加。這種完善的農事組織，由它的巨大的分類，它的研究，它的選擇，它的關於耕種和施肥方法的經驗，它的分配制度，對我們提供了它的本身的驚人統計。

一九三四年年底的蘇聯的經濟繁榮的程度，竟到這樣：蘇聯政府取消了集體農場欠它的債務——這筆數目可並不小，有四三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但是對於這些免掉了債務的集體農場，却另給獎勵金和物質的補助，「世界上還有那一個政府能够這樣闊綽？」有一晚，莫斯科的中央無線電台非常自豪地這樣問道。

還有更出色的事情呢！由於斯大林的提議，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把麵包券和麵粉券取消（一九三四年十二月）。這種券是一九二九年所創行的，那時，百分之八十六的小麥是出於「個人的」農民的供給的，而且，那時還有着二五、〇〇〇家的私人商店。（現在都已經消滅了）。實行這種發券制度必須有一個很繁重的管理機關，但是它保證工人和職員們，能够以最低的價錢換得够量的麵包（雖然城市的市場裡的麵包價錢很高。）到了現在，大工業既已勝利地普及於都市和鄉村，小麥的百分之九二既已出諸集體農場和國營農場的供給，國立商店既已達二八三、〇〇〇家之多，「國家財富既已在各種和麵包同樣重要的商品上都有了空前的增大，那末，作為蘇維埃政治的一次新的勝利，麵包和麵粉的普遍而自由的售賣制度，該是可以實施的時候了」（莫洛托夫）。

我們要不要將蘇聯的農村的情形跟我們的農村情形比較一下呢？我們最近聽到法國的議會裡，曾發生過一次關於小麥問題的辯論。議長報告了「樁非常重要却誰都毫不知道的事情：在生產的農民和麵包的消費者之間，存在着一種剝奪雙方的中間人，他們在國內每天可以獲得一千萬法郎的利潤。此外，法國的農民，出賣他的小牛的時候，每公斤得價二法郎五十生丁；同一小半只在同一村中轉賣的時候，就值十法郎一公斤，賣到城裏，竟值五十法郎一公斤了。製酒者把他的上等酒出賣，在村鎮中，一公斤之價爲一法郎五十生丁，倘若他口渴時向酒店買回，那就得出四個法郎一公斤。他若到了都市中去買酒喝，那就得卅十五法郎一公斤；在漂亮的飯店裏，那就要二十法郎了。這種情形怎麼樣調劑得好呢？只有若干臨時的辦法。在資本主義的制度之

中，個人的橫行和陰謀不會收斂，而且這些陰謀能夠爲了自己的利益而操縱捐稅制度和市場的自由，而且蔑視那些印在「官報」上的價格，——在這樣的情形之下，要想實行一種持久的調整辦法，是不可能的。在我們的國家，從那標着「自由」，「平等」，「博愛」的政府機關裡，只能夠定出些似乎專爲對付小生產者而設的法律而已。

……現在若要知道一些關於農業上的生產率的情形，我們就看一看這些事實：蘇聯的棉花的生產額，在三年中間，從全世界的生產額的三分之一，增加到成爲五分之一又，蘇聯的甜菜的產量在一九二九年，佔世界其他各國所產總額的三分之一，到了一九三二年，就增加到世界產量的一半以上。

集體農場的形式有兩種：一種是「公社」(Commune)，一種是「聯合社」(Artek)。

在公社裏，所有的合作者 (Kolkhosians)，將全部經營的事業作爲公有，而這包括他們所有一切，他們共同生活着。在「聯合社」裡，每個合作者有他自己的房屋，有他自己的家畜飼養場，在必要的時候，也可以有專用的耕牛；在他跟別人共同參加的廣大的事業範圍中的少數小事務上，他還是一個私財所有者。

「聯合社」的形式是斯大林十分熱心地所主張的。於是，「讓步！」「新經濟政策！」「社會主義的放棄！」——有的人這樣喊着，有的人則想喊而沒有喊。

且慢，社會主義道東西，跟那些不願意知道真相的人們在不明白真相的人們中間所講的傳說

相反，並不是創造出來用以討人厭惡的，並不是用以強迫人家，像一個債主那樣，一味向人們大叫：「你必須怎樣怎樣！」的。正相反，它是使他們離開混亂的。社會主義的目的，決不是要隨便地從每個男人女人那裏剝奪掉所有使他們滿足的東西，也決不是要這樣的用特殊的束縛強迫他們忍痛地以過份的個人的束縛換來政治的平等、社會的正義和生活的安全——這些是社會主義所供給他們的。私有財產的限制，並不是一種目的，而是藉以達到一種於人人更有利的十分完善的境地的一種手段。所以我們不要把限制手段一味亂用錯用，必須把這種手段減少到必要的最低限度。我們所要做的是把生產手段社會主義化。好，就把這社會主義化罷。但是，以後呢？

以後？那正在被事物的力量所改變着的人類的意識，是會得——被事物的力量——完全改變的。現在還存在着的傳統意識，那時自會消解。到了有一天，人們處理這些問題的態度，跟今日的還着腳於過去的歷史的人們的態度，將完全兩樣。到那時候，人們自然會喜歡最純粹最完全的集體主義的形式了。到了將來，無疑地「公社」是要完全排斥掉「聯合社」的。無論如何，在將來決定一切的，乃是那天擇自然地所表現的深的利益。況且，現在的「聯合社」制度，並不跟平等的真正意識相衝突，它只是違反了狹隘的（反馬克思主義的）公平主義的公式罷了。

我們還可以考察一下「每個合作者的福利」（這如今成了一句口號），「你要自己的耕牛麼，同志，」斯大林說，「那你就有耕牛。」他又指出「為合作者謀幸福」這句口號，已沒有新經濟政策開始時代具有的危險的意義，——在那時候，這句話是含着回到資本主義而反對社會主義本身的意義的。到了今日，在社會化過程當中這句話，完全是一句有用的正直的勉勵。何

況，整個社會主義本身，原是嚴格地向「最大的幸福，最小的努力」這原則進行的呢！

……在目前，最重大的工作是在農村中進行着。但是，這絕不是容易的事體，而且現在還需要使它堅固，並常時張着眼睛戒備着。在這裏的確有着反抗。這反抗是以富農的絕望而猛烈的反抗爲支柱的。此外，人們還得忍受這樣一種偉大的工程的學習時代所難免的種種挫折。有一時候，政府曾經失過足！因爲進行得太快了。斯大林的論文「勝利衝昏頭腦」（這論文變成了一種格言）指出了正鵠；阻止了偏向。於是共產黨員和專門家漫山遍野地動員起來——在工作恢復正道的原則上，不管範圍多麼廣大，務須重新確定全部的方針和出發點——加強基礎，然後再重新出發。每一個曳引機的站所，變成了深入而且照明農民大眾的頭腦的理想的城市。這樣，有二三、〇〇〇老練的共產黨員，一一、〇〇〇專家，同時有一、九〇〇、〇〇〇復員員和機器師出發挽救，而在短期間內達到他們的目的。

許多的危機，接連不斷地發生。大部分的集體農場竟沒有出產。於是，甚至於許多共產黨員，也坦白地提議取消這種消費的試驗。

於是，我們的堅強的領袖，又一次的顯示了他的眼光的遠大，他激烈地反對這種近視的籠統的結論。他在許多喧囂之聲上面大聲疾呼道：

它們沒有出產？這跟一九二〇年的工廠一樣：它們將來會出產的（況且能出產的已經很多）。但是，「主要的，它們乃是整個結構的基礎，制度的基礎——我們不應該以商人的眼光，離開了現時的條件，去觀察經濟的出產，經濟的出產，是應該從全部國民經濟的觀點上，在數年的發展

的時期內去審察的。唯有這樣的觀點，纔可以叫做真正列寧主義的，真正馬克思主義的。」

因此，這也就是斯大林主義的觀點。

諱告了「右」的工作放棄者和「拆濫污者」的斯大林，也督責了「左」的「空談家」以及隨事敷衍的領袖們。這樣，他毫不留情地處分了一批農業區域中的共產黨員，因為這一批人，在一九三二年收穫很好的時候，不知道必須設法在集體農民的市場上出售小麥之前，把國家所要囤積的小麥先囤積起來——這樣是更有利於農民的。

他並且批評了人民委員會，因為人民委員會所頒布的關於這件事情的命令，在他看來，是欠明白強調。

「集體農場化」的結果是顯著的——他承認——但是，倘以為此後就可聽其自然發展，那是一種很深的錯誤。大困難還多着……

得留心農民，不要讓他們把自己的工作推諉到集體農場的別的分子的身上去（對於斷沒有鬼附在身上的工人，可不必顧慮到這一層）。「事業的責任，是從作為個人看的農民身上移轉到集體農場的領導者的身上了……因此，黨應該取得集體農場的管理權……」

在黨和農村之間，往常總是缺乏充分的聯繫的。「官吏們將他們的身體深陷在他們的衙門裡的靠手椅子裡面，絕不知道集體化運動已發展到衙門外面去了。」

有的時候，共產黨員太想坐享其成。他們把集體農場估計得太高。「他們把集體農場捧成偶像，」斯大林也跟反對那班主張廢除集體農場的人們一樣激烈地反對這些人們道：「他們想，只

要有了集體農場這一種經濟上的社會主義的形式，那就萬事齊全了。」

但是，斯大林着重指出（而且，在這特殊之點上，他揭示了一切馬克斯主義的自我批判的要點）：集體農場，和蘇維埃一樣，表示着經濟上或政治上的社會主義組織的形式，然而只是形式。而一切是依存於內容的。一九一七年，蘇維埃是被孟雪維克和社會民主黨所領導的，……「沒有共產黨員的蘇維埃」，這是俄國反革命的領袖米留訶夫的口號。集體農場的集體形式，對於反革命分子，也會給予造成「沒有共產黨員的集體農場」的機會。

斯大林又說：「攻擊原有的富農的，舊式的簡單的鬥爭，已失了它的存在的理由了。鬥爭現在是換過了形式。假如有些集體農場發展得不够，假如小麥的囤積成績不佳，那可不是農民的錯誤，而是共產黨員的錯誤。許多人雖然備着黨證，其實不過是糊塗蟲罷了。」

斯大林對於那些坐等事情自己成功的「大人老爺」同志和「能够把無論什麼事情掩在嘩啦嘩啦的空話裡面的」嘩啦嘩啦同志，是毫不容情的。他曾經講過跟一位負一區之責的同志談話的情形。

我們聽一聽，看一看這短短的一幕罷：

我——你們一區裡的播種怎麼樣了？

他——我們已經動員播種了，斯大林同志。

我——好，後來呢？

他——我們很努力地解決了問題。

我——好，後來？

他——我們有了一種更有利的改變，斯大林同志，我們馬上就要有，就要有一種更有利的改變。

我——好，結果呢？

他——我們擬了很多改良的計劃。

我——喂，我們一區裏的播種到底怎樣了？

他——對於播種，暫時之間，我們還不能做什麼，斯大林同志。

雖然如此，奏效的結果依然在許多小小的障礙之上積集起來，而且，農村的面貌，畢竟跟原來大不相同了。即使並不如我們的熱誠和我們的對於將來的渴望所希冀似的變得快，但它畢竟是改變了。斯大林說：「古老的鄉村，和它的觸目的教堂，它的前排的爲警長、牧師、富農所有的漂亮房子；和它的後排的東倒西歪的農家，——這樣的一種農村，是開始在消滅了。在它的原址，出現了新的鄉村，有着公共的，經濟的設置的建築物，有着俱樂部，無線電，電影，學校，圖書館，托兒所，有着曳引機，刈麥機，打麥機，汽車。消滅的，是先前的名人的身影，剝削的富農，吸血的放高利貸者，投機的商人，「小父親」——警長。現在的名人，是集體農場和國營農場的人們，是學校和俱樂部的人們，是曳引機和打麥機的駕駛的頭目，是田野工作和牧畜工作的突擊隊，集體農場村落的最好的男女突擊隊員。」

完結了，只殘存於圖畫和舞台去了；那些使得窮人們眼光撩亂的教堂上的五顏六色的發光的

裝飾品。那些醜陋得好比豬欄的街道和廣場——以及那些時常有馬車經過礙礙軌軌作聲的崎嶇的道路。完結了；那些像關在村中好像關在箱子裏面的奢侈而威武的人物，貴族小姐，嬌媚的從軍車上走下來，傲然穿着古裝，圍繞着流線型的漂亮的白色的獵犬；富不可言的地主以及穿制服的人們——上自穿鑲金邊的制服的豪奴，下至牢監頭子——還有偽善的頭面上縹着猥褻的亂髮的穿長袍的人們。

完結了。現在，場面是偉大的機器。在這里經過的，或者在這裏發號施令的，都是些穿着工衣，臉相誠實，堅毅，幸福，得意的人們了*。

在有些完善的集體農場裏——例如卡巴爾達的集體農場——人們已經開始看見了種種接近將來的農業城市的形狀的幾何圖形：一個半圓形的大廣場，和一條大路相接，四周好像是從這半圓形中延長出來的半徑線似的，許多的街道，區分着各有特質的許多扇形地段；這裏，是廠棚和地下倉，那裏，是曳引機和汽車，另一地方，是學校和技術訓練所等等……一言以蔽之，這是一個「城市農村」的建築的合理化組織。這是一個好像邊上用刷筆畫着的大玫瑰花形的半面。

* 維克多·波萊 (Victor Borée) 在他的地獄的天堂 (Le Paradis Infernal) 一書中說，蘇聯的農業狀況，由於日開墾的土地比較的太少（對於一六八、〇〇〇、〇〇〇居民，只有一四〇、〇〇〇、〇〇〇公頃左右），所以是很危險的。赫里歐先生是——當然——贊同這觀點的。但是，即使蘇聯的農業，目前在質和量上生產率都還不够，不錯！但這總却更好，還使它將在將來有大大地發展的餘地，（無論在廣大上和進步上都不缺乏將來繁榮的條件，）如果情形相反的是很危險的。——原註

當蘇聯的鄉村，雖有困難，但正在完善化，理想化的時候，我們的目光且轉到另一個被最高的資本主義所踐踏着的大陸——美國——去。小麥的播種，在這種是減少了十分之一。農業生產的價值，從一九二九年的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圓，跌到一九三二年的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圓。兩年之中，農場（土地和機器）的價值，減少了一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圓。百分之四十的農夫押掉了他們的產業，而一九三二年之所以只有二五八、〇〇〇件被剝去抵押品取贖權的案子者，却靠了農民的武裝的叛亂。

至於「復興運動」(C.R.A.)，這資本主義的頭腦的發揮，除了在收穫上實行了馬爾薩斯學說的原則，除了自殺政策之外，別無何種救濟；減少了百分之八的耕地的面積，獎勵有土地的農民停止耕種，獎勵種棉花的農民把他的收穫品的百分之二十五到五十埋棄地下。要是有一陣暴風，來把許多的作物毀壞一下，那就快樂了，國家的勝利呵！

法國的報紙發表着，太好的收成，「威登」了香巴泉 (Champagne) 的葡萄種植者。……這裡，那裡為改善現狀起見，都需要着洪水，冰凍，雹子和葡萄蟲！

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巴西大量毀壞咖啡的事情。這類又罪惡又瘋狂的辦法，說起來使人憎惡得要發抖，我們不再說下去。總而言之，這類辦法，在近幾年中，是特別被普遍使用着的。這並不是偶然的，孤立的事情，這原來是資本主義的一種政策。

除了美國所實行的，對於農業和工業上的破壞和流產的獎勵制度的例子之外，我們在法國，也已看見明令禁止採用生產率太豐富的葡萄苗，禁止在公共工作中採用完善的方法（在有幾種合

同中，規定禁用機器等。在他自己的「資本論」一書中，卡爾先生指出着解救危機的方法之一：限制而且停止把舊原料改變做新原料。

爲求進步起見，我們最好採用中古時代的器械！

我們再看一看這樣一種景象罷——這景象是在世界各處的一切工作部門中不斷地發生着的，它簡直好像一幕悲慘的笑劇——在法國北部的 *Wettering* 和別的地方，——人們把水菓一大塌車一大塌車地除野草似的加以芟除。在比里尼斯山東部——和別的地方，——人們把水菓一大塌車一大塌車地棄在大糞窖中。在倫巴爾底——別的地方也有這樣的事麼？——農民們把大批的蠟燭掉。穀麥的焚毀，到處皆然，人們本來用以播殖，要它健全地發芽，長成的種子，現在是被殺害着，被埋葬着。人們還殺害着，埋葬着幾公頃的甜蘿蔔，大批的豬和牛。人們把可以成渠的牛奶，倒在美國的河中（這也不但美國如此）。人們把整船的鱼，倒在海裏。屬於 *General Motors* 公司的成千部新的裝配齊全的汽車，被用特製的大機器，粉碎地敲破着。

這些故意的破壞，這些大量的毀滅，正當別的地方缺乏着這類被毀棄的物品的時候，正當飢饉殺害着人類的時候，正當中國和印度的千千萬萬的民衆在吃草根和樹皮的時候，正當即使在毀滅着這些食料和生產品的國家裏，也充斥着失業和餓肚的人們的時候——在舉行着。

資本主義的最後的結果，是殺害自然，殺害物質，人們所能控告一個制度的罪狀之中，沒有比這樣一種大量地舉行着的而且大叫着：「把世界顛倒，使人類復歸於野蠻」的自我摧殘的罪狀更來得卑污的。

在蘇聯，某地的一切剩餘的生產品都自動地移補到缺乏着這些物品的地方去；這樣，那裡會有上述的荒唐事情發生呢？「在我們這裡，」斯大林說：「誰若主張採用這種辦法，我們就馬上把這人關進瘋人院去。」

倘若我們現在回頭再看蘇聯，而且從事物方面移到那作為事物的泉源和嚮導的——人物方面去，那麼，我們就注意到，上述的一切事物所賴以實現的那種速度，是一種特殊的衝動所激成的。這其間有着過額的利益，過額的生產率，這都是從那被「理想」所刺激起的熱心所產生的。社會主義的競賽，是壓在「成功」的秤盤上的「稱不了的」巨大的重量。

蘇維埃的工人，是跟別的工人同樣的人。但是，我已經說過一次，他們的頭腦和工作，跟資本主義國家裡工人不同，在資本主義國家裡，工人是對雇主鬥爭的，而在蘇聯，工人是為自己而勞動的。輝耀在蘇聯工人的臉上的得意和歡喜的感情，是使久離蘇聯而於一九二八年回國的高爾基大為感動的一種「改變」。「這是社會主義的工人所製造的！」人們常常在工人的羣集中聽見這樣的話——話中是含着驕傲的聲調的——當許多集合，並峙，掩蓋，繁殖在故俄羅斯帝國的領土上的工作，一一以電影上的藝術的剪接的速度，實現出來的時候；同時，全世界的別部分的生

活却在後退着。

這班工人，當他們想到他們的有用的努力一旦得到了報償的時候，就感到歡喜和榮耀的交集了。他們對於「生的歡喜」的意義，給了一種更確切更深刻的解釋。從前是，雖在超人間的苦難之中，雖在零碎或大學的屠宰之中，生的歡喜仍能勝利。如今，照克諾林的美麗的解釋說來，生

的歡喜，是成了社會主義中的信仰的標幟了。

蘇聯的偉大的工場之中，那力量的非常的運用，那或大或小，或零或整，處處成功的真正超人的努力，提供了一大系列史詩的材料（而且，蘇聯的現在的文學，的確變成了這一種在自由之再生的人類的，英雄的工作時代的雄姿的，讚美歌集）。年年月月的狂進，數目的豐富，以及層層地直上青雲的建築物的偉大。種種的品質，種種的能力，一瞬間在這樣一種氛圍之中鍛鍊成功了。一個參加第聶泊大水閘的建設工作的，美國技術顧問，古柏（Mr. Copps）先生，在舉行大水閘的開幕典禮的時候對我說：在許多完全意想不到的極困難的情形中，一切的記錄，甚至於一切預防，都被工人們所超過。他又說這樣一種對於工作的拚命，從來不會有過。此外，有兩萬個優秀的工人，是完全從這一次工程中練出全身本領來的（在這一次「四年戰爭」中像這樣的工人總數有八十萬人）。

這一切事情是完全合理的。一切都爲了工人，一切都於出工人。這是大眾的動力的代數學的公式。

潛在的競賽，到處都有着，在一切做手工和做頭腦工作的人員的心裡。每一個人都想儘可能地進步（因此，就發現種種的捷徑去達到目的）。每一個人都努力精益求精。他們不得不然地變成了經常的發明者。人民委員會軍政部長伏羅希洛夫氏，在數月以前曾說，在一年中間，他所接到的兵士們的條陳，達一五二、〇〇〇件之多，內容都是關於軍事組織和技術的建議和發明。伏羅希洛夫接着又說，這些條陳的大部分，都是很有趣而且值得研究，值得注意的。

這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個人心的進步的組織者，是那完全的社會主義的黨，是那無瑕的社會主義的黨——共產黨。我們可以說，這黨的每一個成員都是服務者，也可以說每一個都是領導者。共產主義在世界上創造了人們所難以想像的大批的使徒。在舊俄帝國和蘇聯以外的各國，這類使徒的大部分，陸續變成着殉道者。然而同樣的多的使徒，還是不斷地增添着。在地球的全部的地面之上，共產黨員大量地布滿了他們的，血液的美麗的紅跡；在我們的目力所不及的遠處，所有的這些被害者，所有的這些橫陳在他們的紅旗下面的偉大的屍首——其數有一百五十萬。不知大家有沒有覺得，歷代以來被虐殺的猶太人的數目，已經被那遭害的社會主義者先驅的數目所超過麼？最近八年之內，共產黨員之死者，傷者，受罰者，共達六百萬之多*。

誰能說出世界各資本主義國家監獄中所發生的一切情形呢！誰能暴露出布爾喬亞階級的獄吏和他們的專門使人受苦難的虐害狂的天才們所創造的，千千萬萬幕地獄和畜生般的慘劇呢！意大利、德國、芬蘭、波蘭、匈牙利、保加利亞、南斯拉夫、羅馬尼亞、葡萄牙、西班牙、委納瑞拉、古巴、中國、安南、非洲。看了無論那一處的布爾喬亞和他們的警察的工作，我們就可以宣言：我們是在一個血的時代。但在世界的混沌中，我們却聽到了第米特羅夫那樣一個人的控訴的聲音之美。此外，我們又看見那被釘在十字架上的泰爾曼那樣的可作光明的象徵和標幟的堅強人

* 據「國際赤色救濟會」(Secours Rouge International) 的優秀的指導者斯太爾瓦 (Helene Stasova) 的報告，一九二五——一九三三年間的數目，爲六、〇一一、九六一，當然，這並非全是共產黨員但是我們知道其中大部分是共產黨員。——原註

物。

說到蘇聯，誰若要知道一個人怎樣可以爲了一個理想而犧牲自己的情形，那得去查黨史，那上面的少數爲人所知的例子，代表着千萬萬無人知道而且永遠不會被人知道的事實。不論他的職業如何，蘇聯的共產黨員同時總兼作一個兵士，又作爲一個教育家，當他有成爲一個英雄的必要的時候，他也就成爲英雄。

不過，這班自己過着起碼的時常是苦行的生活，就以爲滿足的人們，却絕不如有些人所想像那樣，是平等主義的信徒。在我們這裡，一個腦子還不會正常地消化各種思想，眼睛裡充滿着半生不熟奇里古怪的社會政治學說的普通的人——對於共產黨員總有三種大的不滿，在他們的這些不滿的論調中，共產黨員簡直成了嚇人的鬼怪：第一，共產黨員是反對愛國的；第二，他是要剝奪每一個人的所有物的；第三，他是要把社會造成一個廣大的規則極嚴，萬事一律的兵營，把一切人的智能削得像鋪路的磚塊，那樣刷平的。但是，共產主義的國際，却剛剛相反，它們是贊成民族的擴張的，不過有一個唯一的條件，就是不要用槍砲去擴張，也不要交託在所謂商人的手裡去擴張。共產主義國際的廢除私有財產的理論，只是不利於極小部分社會的寄生者和壟斷者的利益，另一方面，反要將一種很大的利益，提供給地球上的每一個居民呢。（一切公共的惡行，無可辯論地，都是那求富的競爭所引起的精神上和物質上的擾亂所造成的。）至於「平等」，倘若它一旦越出了正義公道的大法則時，那反而是社會主義之敵；正義公道的大法則（實際上，這就是社會主義的基礎）在乎要使每一個人，有同樣的正確的政治權，換句話說，是要在一切人類的

界限開，消滅那種人造的不合理的不平等。要證明社會主義是一切制度之中最大最好地培養個性的一種，這很容易。況且「社會主義是不能夠不顧個人的利益的」（斯大林），但這與少數個人的獨占的病態的擴張，完全相反。

關於這最後一點，在不少的社會主義者之間，也有着一種由熱心過度所發生的紊亂。斯大林最近演說「鄉村法令」的時候，叫這班「百分之二百的人」安靜下來，勸他們不要瞎說那些被布爾喬亞作家們當作時髦的說着的「平等原則」的蠢話。不應該犯同樣的愚蠢，「馬克斯主義者是不應該去分袒布爾喬亞作家的愚蠢和無知的。」

斯大林十分明白地強調這一點：「馬克斯主義並不把平等理解做個人的需要和生活條件的劃放，而把它理解為階級的廢除，這就是說，使工人們在打倒了沒收了資本家之後，得到平等的解放。……一切工人，義務平等；各盡所能；一切工人，權利平等；各按工作而取報酬（社會主義社會）；一切工人，義務平等；各盡所能；一切工人，權利平等；各取所需（共產主義社會）。馬克斯主義所根據的事實，是人類的需要和嗜好，無論在量上，在質上，無論在社會主義時代或共產主義時代，總歸不能相同，也不能劃一。除此以外，馬克斯主義向來並不承認過，現在也不承認另外一種平等的形式。」

斯大林又提起，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斯和恩格斯嘲笑原始烏托邦社會主義者，說他們是反動的，因為他們宣傳「全體的苦行和野蠻的劃一」。此外，蘇聯的現象充分地證明着，無論人家怎樣說，社會主義總是表示着每個人的特殊的智慧和能力的強度發展的意義的。

但是，在競賽中黨所號召的特別的軍隊，乃是青年。蘇聯的青年大眾，是社會主義的衝鋒隊。青年分布在鄉村間，摧毀過去的幽靈，宗教上和社會上的成見。一切這些年青人，這些少女，這些身體柔軟，面孔清明如鏡的人們——這些受過絕未中傳統之毒的教育的人們，他們在農民心裡的廣大的範圍上開鑿着，猶如一隊曳引機。

無論那裡，青年的光輝的酵素總在發揚着，當蘇聯的青年們排成寬大的彈性的四邊形把紅場塞滿的時候，當他們充實了可容四萬五千個位置的運動場的時候，他們給予人們的印象，也是令人難忘的。

青年在一般的理論上，他們的本身是不完全的，在許多點上，他們是天真無知的，要是不把他們組織在那偉大而正當的社會機構中，那在他們本身是毫無意義的。等他們有了見解之後，他們會得走在大道的前頭，他們成了將來時代的成人，我們應該十分尊敬他們：因為他們的發展的力量，因為他們是未來時代的主人，因為他們的有用的智慧。

我們又要問了，在這方面上，可以說毫無瑕疵麼？那無疑地是有的。如果我能够舉出一切的成功，也得把一切的缺點一一舉出，因為，為公平起見，必須對好處和壞處都給一個正確的比例——就蘇聯而言，從沒有這樣做過。對蘇聯的批評總是輕率地瞄準着一方面，而絲毫不注意到別的地方的。

但是，一個好的領袖的着眼點，跟一個公平的批評家的着眼點是不同的，他應該特別注意缺

點和被統。例如，當農村經濟一般地發展的時候，他注意到家畜飼養的情形——這是完全沒有進步的一種事業，這一部分的現在的數目，較之一九一三年毫無增加。

因此，對於家畜飼養問題，就得特別注重了（只有養豬事業相當有點進步）。對於這一方面，也得跟對於運輸方面，冶鐵方面，煤炭方面，輕工業方面，原料成本方面那樣的同樣着眼——還有那永遠存在的官僚問題方面。

官僚（或者，不如說官僚主義），這是一個在人性中不斷傾向於繁殖而阻止任何進步的現象，在這裡面還似乎隱含着一種對於傳統的過度的尊敬。它在組織方面所起的作用，跟在理論方面關於公式所起的作用一樣：那是一種完全離開它的本來的目的和存在的理由而另成一種各別的存在傾向。官僚主義是一種終於會得生出眼睛和耳朵來的人面瘤。

所以：「我們今日的困難的根源，是如下種種：官僚主義和社會行政中的紙面管理，專講『一般的路線』的空話（把這些空話代替切實而積極的領導）；個人的責任心的缺乏，工作中的獨立性的缺乏，工資中的劃一制度，對於工作成績的系統的檢查的缺乏，對於自我批判的害怕。」要克服這些困難，斯大林用非常簡潔的話，提出了一個十分明白的方法：「把領導的水準提高政治水準，」這就是說，我們的頭腦裡應該時時刻刻想着我們所做的事情的全部意義，和這件部分的事實在整個計劃中所佔的地位。

我們應該一直往前走，不要左看看，右望望。對不起……如其不然，偏要左看看，右望望——瞧着左右的歪曲傾向，并且，隨時準備着向前作一突躍，或者稍為後退一些。（左傾的好

徒比右傾的好徒還要危險——披雅特尼斯基說——因為他們容易把人引上錯路。斯大林對於這些危險，特別當心，他甚至於以為人們倘不向這兩種歪曲傾向中作一種鬥爭，那就是對於另一種的妥協。

此外，對於我們的一時的成功，我們不要太感興奮，太興奮了就會在將來的門跟前分了我們的心。這會得拖累或阻礙我們的更大更強的所有物：我們的路線。這正確的路線，它是屬於革命者的；因為這是他們所創造，他們所支持的。有一條正確的路線，而且知道怎樣實踐它，這種事情在一般獲得統治權的政黨活動中，是很少的。你看別別的國家看：你找出多少統治的政黨是有着正確的路線而且在實踐着的？老實說，在目前，世界上還沒有這樣的政黨，因為一切政黨，都是沒有遠大的目的地生活着，都在恐慌的紛亂中徬徨，都沒有看到那脫離泥沼的路。只有我們的黨，才知道前進的路，而且使它的工作在這路上勝利地進步着。」

種種非常的事實允許一個政治家在今日發表這樣的高聲的判斷，聽了而且理解了這判斷的人們，應該有這樣一個結論：為尊重這偉大的路線起見，為完全遵守這偉大的路線起見，我們應該不停地警戒，不停地鬥爭。不要中止，不要錯失。

第九章 明天做什麼

那活躍的激動的蘇聯，誰若想把它看個清楚，必須在遠景中去觀察它，換言之，須從它的將來的計劃的印象中去觀察它，這幅移動迅速的電影似的一切映現，在一瞬間就成爲過去而變成陳舊的了——這些都得上許多後記！

在一九三四年一月舉行的俄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大會的莊嚴的氛圍中——在這「勝利者的大會」中——在這被斯大林的關於一九二八——三二年的「五年計劃」的紀念碑底的報告所統制的大會中——斯大林又開了一頭嚮往無盡的將來的大門。第一次五年計劃已經死了。一九三二——三七年的第二次五年計劃萬歲。

人民委員會的主席，蘇聯的最重要的工作者之一，莫洛托夫曾經說過：經濟「基礎」再建設的時代已經確實地告終了。現在我們是要從質和量上，去發展消費物品的生產了，是要改善一切人的生活條件了。

在開始要普及蘇維埃世界的內部的偉大的基礎上，大工業的範圍和分量將變成兩倍的大。
（生產手段的生產，將達四三、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等於第一次五年計劃的百分之二

〇九。

機器的製造，炭和石油的生產，將增加一倍。曳引機，機關車，鑄鐵，鋼，銅，化學工業，都將變成三倍。木材的生產差不多是兩倍（百分之二七六）。貨車的製造要變成五倍，汽車則要變成八倍。電力將達到三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或百分之二八三以上）。

新的五年計劃中，輕工業，食品工業，消費工業，工業合作社等等，也將增加到一倍以上（總數為五四、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或百分之二六九以上）。

在這新時代中，特別注意的，是品質的增進，技術的改善，機器的換新。一切工業的電力化，需要一種很艱難的工作。農村，鐵路，以及能力傳達上的電氣化，將大有進步。

勞動的生產率，到了一九三七年，將自一九三二年的百分之四一增加到百分之六三。原料品的成本（這在一九三四年，已表現着比一九三三年低了百分之四·七）將降低百分之二六。

預料中的——而且決定要做到的——農產物的增加，為百分之一〇五（二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曳引機站所的數目——將自二，四六六（一九三二年）增至六、〇〇〇。農業勞動的機械化，增加百分之六〇。全部曳引機的力量等於八、二〇〇、〇〇〇匹馬力。

鐵路的運輸業務將增加一倍，河道和海洋運輸，將為以前的三倍，汽車的運輸，則將為十六倍。（鐵路之中，將有五、〇〇〇公里是電化的，有一〇、〇〇〇公里將由單軌改成雙軌，二〇、〇〇〇公里將重建，一一、〇〇〇公里是新造的。）

白海和波羅的海之間，莫斯科和伏爾加河之間，伏爾加河和頓河之間的運河，均將完成。一

九三七年將有二一〇、〇〇〇公里的新的公路。國內航空線之長爲八五、〇〇〇公里（現在只有三三、〇〇〇）。

投資的數目，在工業上：是六九、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農村經濟上：一五、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運輸上：二六、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新組織的企業和改組的企業，共需費用一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這是無論什麼預算和工業計劃中從未有過的大數目）。這個新計劃所要實現的另外許多主要的目的，我不想一一列舉了……

跟工廠的發展一同，住宅的建築，將達六四、〇〇〇、〇〇〇平方公尺的面積。

工人的實際工資，到一九三七年，將爲一九三二年的兩倍半。

文盲是完全消滅了，跟上五年計劃消滅失業那樣的完全；所有的蘇聯公民，將都能讀能寫。

七。學校和學院中的學生的總數，現在是人口總數的千分之一四七，將來要增加到千分之一九。社會保險金的總額將加倍。

「這是一個妄想的計劃」。有人會這樣說。「關於我們現在已經站立在它的堅實的基礎上面的那個計劃，人們有什麼話不會說過！」莫洛托夫簡單地答道。

社會主義蘇維埃聯邦共和國，這樣的在經濟的各主要部門上，將成爲世界各國中最強的國家了。*

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黨本身又在斯大林的領導之下——的蘇聯，這樣地大大的實現了的

偉大而英雄的新生之夢中，竟也免不了戰爭的惡夢的攪入。

我們是知道大戰以後的時代中的所謂「公式的和平主義」(Prattism Official) 的歷史的悲喜劇的。那壯嚴的「國際聯盟」的曖昧的性質，它的出名的對於保障和平的無能，使這個凡爾賽和約所產生的和平殿堂除了被人用以維持凡爾賽和約的結果之外，就毫無價值**，終於，這裡面的德國放棄了他那永遠做被別的強盜們所打擊的強盜的角色，終於，這裡面的日本，也離開了它，而仍舊在國際的光線的集中的線束之下做着卑劣的欺騙的行為。

對於蘇聯的進攻——這是個經濟上的大出口，又是個社會主義的閃耀的火山——顯然是那狂吠的資本主義的預算中的事情，要蘇聯的領袖們犯個錯誤，相信那被帝國主義國家雇用的營養家所鼓吹的做戲似的和平論調是誠意的，那可把他們看得太老實了。他們相信，在這些危險的藝術家旁邊，應該盡一種監督的任務。

我們知道，蘇聯第一次跟國際發生關係的結果，是多麼無效，我們知道，季維諾夫在軍縮會

* 我們在這里再講一講一九三四年年底的結果，這已表示第二次五年計劃的偉大的目的必能完成。國家的收入，在這一年中增加了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在十二月底總計為五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電力比一九三三年的數目增加了三分之一，計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瓩。一九三四年的鋼鐵的產額，比一九三三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以上。溫陞利賓在是驚人的。斯大林不免得濶地證明着。接着他又說：「不要太得意了，同志們，你們要想到鋼的生齒，並沒有照這樣的比較增加呢。」(鋼的增加，只比上年多了百分之四〇)。——原註

但只關於領土的分割方面，並不涉及那將嚴地處定的「一般政國的改革應作為實過的題章的先例」的條款。——原註

議上所提出的全部的裁軍或至少部分的裁軍，這提案，雖然十分合理，却引起了多少的怨恨呵。然而蘇聯是固執着它的不可動搖的和平政策的。蘇聯的操在能人的手裏——從前是斯大林，現在是季維諾夫（但都取決於斯大林）——的外交政策，表現着一個永久的堅強的和平的現實主義。（侵略者的定義之規定，擱淺的潮於破壞的軍縮會議之挽救，並把它改組為經常的「和平會議」；拒絕只為幾個新的好戰的國家團便宜起見而改訂凡爾賽和約，因為這些新的貧便宜的國家，並不比現在的條約中估着便宜的國家來得有價值；向各國提議互不侵犯條約，而被多數的國家所接受；跟美國和法國建立堅固的外交關係）。這種光明而確實的和平政策，是被人人所承認的——除那些懷着成見故意否認它的人們。

「我們是世界和平的一個因素，」斯大林在第十七次大會上說。他又極其精確地接着說：「在我們的周圍，一切的由於各種理由都不願在暫時或長時發生戰爭的國家，已經團結起來了，而且不能不團結了。」

由於三十二個國家的邀請，蘇聯終於也加入國聯了。這事情實在是對於和平的一種保證，因為這是帝國主義的國聯，在環境的強迫之下，非和蘇聯合作不可而改變其態度的一種保證。

但這並不是一種完全的保證——大大不是。戰爭的危機依然存在着。

這危機在日本的態度上顯明地表現着。毫無疑義地，日本是想佔亞洲的一大部分，它先從中國下手（它已併吞了中國的滿洲和熱河），切斷了中國的脊骨，而進攻蘇聯。它把這事公開地宣言着，而且層出不窮地用着挑釁手段。它把滿洲改造成一個設備的陣地，在這里佈滿了軍

用品，飛機場和軍事交通線。在外交政策方面，日本和德國互相諒解，暴烈地粗魯地彼此接近着。

在那被民衆底的軍政部長伏羅希洛夫叫作「犬儒派的直爽」的日本的態度之前，蘇聯的態度是一種勇敢的，堅定的，高尚的態度，可退讓的地方，總是退讓着。

但在退讓之中，是有個限度的，這限度是被如下的文字規定着：「我們不要別國的一尺土地，但是我們也不願意割讓我們的一寸土地」（斯大林）。

一旦若戰爭爆發了，蘇聯是要保衛自己和他所代表的人類遺產的一切的*。

不管偉大的將來如何，但若是一旦宣起戰來，蘇聯民衆的自信的最大的原動力之一，那一定是斯大林。伏羅希洛夫，這位國防部長是非常地被人民所敬愛着的，但是作爲大元帥的，無論現在和將來，總是斯大林。他將把一切政治軍事的指導權集中在手裡，或者不如說，他將在風雲緊張的時期之中，繼續作這種領導，而這，在蘇聯的一切人看來，就是「一種勝利的保證」。

* 最近英國和法國的巨大的飛機操演中，有一個可怕而很有發覺的證據，我們最好注意一下：那就是對於轟炸機的有效防備的不可能。據我們的最著名的軍事專家之一陸軍中佐窩幾埃（W. E. Fairbairn）的觀察：（他在李齊堆——Lyautay——上將作序的一本書中寫道）「巴黎也許會在戰爭開始的數小時中就被毀滅，」他語調巴黎的全部的破壞，說是只有另外在許多完固的「甲殼」之下方才可以重新建設。……「這並不是如有些人們所相信似的幽默之談。」保羅·化爾（Paul Faure）特別要使人注意的說。此外，英國的航空大臣倫敦特里勳爵（Lord Londonderry）和法國前航空部長柯脫（Pierre Cot）也公開地宣道：「在現代的科風狀態之下，沒有一種人力，

能阻止那些足以毀滅倫敦和巴黎的爆發的彈雨。(據則基溫——Paul Langwin——說，只須一百噸就够；或者，在英國的操演中，四百噸砲彈可能落在倫敦市。對於被毀滅了首都的國家，唯一的出路，就是由它這方面派遣轟炸機隊去破壞敵國的首都。對於城市是如此，對於軍事中心也是如此，「只有一個例外」，柯脫說：「那是俄國，因為它的領土那樣大，其廣大部分是可以避免這種襲擊的。」曾經以它的廣大擊敗了盛極一時的拿破崙的俄國，的確是有着這樣一種得天独厚的處(反之，日本這地方是容易破壞)。既然如此，足見蘇聯的爲和平的努力，決不單爲它自身的利益而已。——原註。

第十章 兩個世界

如上所說，我們是站在新時代的曙光之中——在這個，正如卡加諾微支所說的似的，在橋下流着的海洋的時代裡。

初看似乎還有介於中間的「第三種人」的地位，但在實際上，這是沒有的。在這兩個基本的黨之間，一切別的政黨都是演着幻滅不定的喜劇的。從這事態顯然可知涉有第三個世界。沒有第三條路。沒有中立的餘地。一切非革命者都是保守派——連改良主義者也比較的是在社會的保守者擊之內的——甚至於中立的和一切不管的人們，也是把他們的死力放在保守派的一頭的——甚至於半革命者，也是要復歸於保守派，而完全死於此中的。不完全，就是無。

因此，那布爾喬亞的迷人的自由主義，雖然跟一切的「中庸之道」一樣，信徒很多，雖然喊着「也不反動也不革命」的口號或類乎此的種種言語，但總歸是在對於現實的解釋上犯了愚蠢的錯誤的。事實的要求堅決地告訴我們，在我們這時代：非反動即革命。只有這兩條路，由於邏輯的力量和環繞的力量，中間層總歸免不了要左傾或右傾的（差不多常常是右傾的）。這一個現實的算學公式，毫無逃脫的方法（況且，這是我們的整個現代歷史所決定的）。為更深刻起見，我

們要重複地說：誰若不是革命者，也不是保守黨，那麼無論他怎麼說，怎樣做，總歸是保守黨。中庸之道是一種戴着假面具的反動。

在今日，還是同樣的一種普遍的區分，基本的性質也是一樣，現在表現上已經不同。

現在是有新的事實——這是什麼事實呵！勞動運動和革命意識的普遍的強大。在大戰之後，——這是一種使人算不清它的千百萬人的犧牲和數萬萬金錢的損失，而且沒有一種正大的理由的戰爭——接連發生了許多革命。這許多革命中的一個，而且已經成功，在一個廣大的國家裡，建立了馬克斯主義的政府。最後，在二十世紀的第一個四分之一中，是資本主義的肚子上東了「赤道線」的腰帶時代*。同時，世界社會主義的武器，那國際組織 (International) 又重新鍛煉過了。

不久以後，發生了世界經濟恐慌。「這是暫時的恐慌，跟前幾次一樣，」那些眼花撩亂的祭司們說，「這是第七次或第八次。」不對，這乃是資本主義的致命的恐慌，沒落的，衰老的，腐爛的恐慌，它的一切方法用盡了，它的一切出路阻塞了（他們叫着：「生產，生產！出賣，出賣！」但是一切買主同時也是賣客，彼此在世界上擠住了。資本主義的商品回到了出產的國家裡，使它不能夠呼吸了）。商業因小產而死了。這完全是（資本主義的）原則本身所產生的自然的結果。我們不能歸咎於生產的過剩，因為目前的生產對於整個世界，其實還是不夠的。弊病在

* 這恐怕是資本主義發展到極度之徵。——譯者

於由經濟上的國家主義所造成的分配和生產上的無秩序。這和一切大企業之下的欺騙行為的充斥是同樣自然的。如今人們不能再把那種傳播貧困，造成破產，而且獎勵盜賊的方法，把那種由工作生產着飢餓的制度（且不說已在四面八方表現着的大戰），舉作管理事業的模範了。而且，人們也不能再把美國的工人，「鍍金」的工人，舉作奴隸的快樂的例子了；這就駁倒了那班籠絡羣衆的人們的最大的論調之一了。

資本主義，因為要繼續維持其資本主義，所以非把它的目的掩飾起來不可。它裝成一種靠不住的純潔。恰如不久以前斯大林非常動人地說過的那樣：資本主義不能夠「抬着頭」逃出恐慌，「它只有把四脚落地纔能逃出。」

在社會主義的進步和資本主義自身的腐敗的進步之前，布爾喬亞很急地在掙扎着。它改善了保守黨的掠奪的政綱（它這樣做是有物質上的條件的），它現在所表現的面目完全是假裝的了。資本主義制度已被藏起來。露在外面的，已不是原來的樣子了。

這一種叫做「法西斯主義」的新裝——它雖不是布爾喬亞政權的必需的附着物，但事實上已經普及各國，而且變成了資本主義的一種新制服了——它的主要目的，在於分化敵人，特別是要一下子分化勞動階級和社會主義，而把非工人階級的勞動羣衆吸收到自己這邊。這種計策，自從大戰以後，當統治的階級受了破壞，遭遇失敗的時代開始，就長時的預備起來，進行着一種持久的，強烈的，極周密的宣傳。

戰後的一切幻滅和一切生活的困難所引起的大衆的不滿，被資本主義用了某種德謨克拉西的

籠絡人心的言語，和某種從社會主義的術語裡胡亂借來的觀念（這簡直是公然的偷盜）煽動起來，加以利用。資本主義提煉了各種痛苦，各種欺騙，各種忿怒的成分，把這引導了去反對它自己所指定的少數的箭標。

這些箭標之一（除了社會主義之外），是議會制度，說是爲了掃蕩假託的自由起見，應該把這種制度掃蕩（自由本身事實早已被消滅了）。於是，一切以色列的罪惡都堆到議會制度的頭上去（其實呢，議會制度也活該如此！）。這是替布爾喬亞制度本身卸責的一種狡猾的方法。

此外，還有着許多布爾喬亞所要免證的事情。今日的反動的統治階級，比任何統治者更嚴重地懲戒那些其實充滿在它自己的制度中的醜行，舞弊以及幾乎是公開的貪贖枉法等情，它又表示得很憤慨地把許多資本主義的惡行僅僅歸罪於那些橫豎因爲厭倦了階級的法律的偉大的尊嚴而已。貴完結的人們，而並不歸罪於全體的資本家。

這樣的弄清文字遊戲（例如關於「制度 (Regime)」這一個意思寬泛的字），新式的反動者就創造了某種有着很能牢籠民心的漂亮的某種反資本主義。這其實是唯一地保守資本主義的方法：廢除議會代以獨裁的政府，而且追究那些愚笨得會把自己的犯罪讓人發現出來的人們——於是資本主義就變成不可攻擊的了。

這種資本主義的防衛運動，在它的表面的消極的綱領的初步中，就產生了各種換湯不換藥的組織，同時組織了反對勞動的堅強的集團。

農民階級和中下階級，被挑撥起來反對工人階級；職員階級被挑撥起來反對體力勞動者，一

切人又被挑撥起來反對職員階級。納稅人，不大明白現實情形的退伍軍人，許多少年人，都被挑撥得昏頭昏腦。指導原理是什麼呢，那是組織無組織的人們，組織游離的人民（叫他們加入一個有人操縱着的新組織），而且把工人也塞進去使他們窒息。

社會主義——這陳腐的東西，這一種癬疥，這萬惡的根源，這跟議會制度一鼻孔出氣的東西——人們把它的性質想成歪曲而加以攻擊。人們威嚇民衆，使他們相信社會主義是要害他們倒置的。

有的人說：「社會主義已經得了勢了：在英國和德國，但是你看他們做的事情如何。」說這話的人忘記應該說：那一班人也許是徒擁社會主義者之名而從未實現社會主義的。但是，我們應該承認，由於大戰期間和大戰以後，那班社會民主黨領袖所給予工人階級的實在的失望，所以這種癬疥是很有勢力的。這些或不忠實或幼稚的周旋，這種實際的叛逆，的確破壞了社會主義的信用，特別在那些共產主義的不折不撓的力量尚未成熟的工人環境中，起了削弱的作用。

另一方面，人們得意地提出那個變質為資本主義擁護者的社會主義者麥克唐納來，一好像在一個禁酒的社會裡提出一個改正了的酒徒似的，「史諾登先生說（他說這話的原因只是爲了發洩他個人的妬忌和怨恨而已）。至於蘇聯的成績，人們是把它隱匿起來，對民衆瞞着的。」

新的反動特別要毒害工團主義的組織（這是當然的）。我們知道墨索里尼對於這問題的想頭怎樣，我們也知道那班煽動希特勒的人們叫他怎樣做着。泰遜歐先生明明明白他說過：「要消滅世界恐慌，只要政府對於工團作一種有效的統制好了。」全照這原則的國家組合制度就在意大利

利，德國和法國（在法國是改裝的）出現了。這是一種壓迫的，新的軍國主義的制度——這使克虜伯先生非常高興；他使每個工人都做了老闆的兵士——一個工具或者可以說是一枝有兩隻腿的鎗。

但是，法西斯主義用的反對社會主義的最大的武器，乃是國家主義。

國家的統一和偉大——它預言道——只在把那以紊亂，貧困和失敗為主要原則的國際主義打倒之後，方才可能。因此，打倒外國人，打倒入籍的外來者，打倒居留民，打倒猶太人——特別要打倒社會主義者，尤其要打倒共產黨。

國家主義是法西斯主義的動力的原則。這是使資本主義的機會主義的集團能夠進行的愛國主義的酒精。這是一種酵素。

的確是一種很強的酵素——最簡單，最可怕，最猛烈。這一種毒菌，在數萬萬的人的心中燃起火燄。關於國家的利益和光榮的神話使最無色彩最中立的市民也奮激起來，——何況許多頭腦空虛只愛高談的青年！這是許多壞的本能之中最愚蠢的一種，因為，它傳染極速，盲目地醞釀着一切災禍。

「我們，唯我們獨尊！」這是一個可以省掉一切深思一切遠見的籠統的公式。一個最好的「萬能公式」，它同時適合有錢的人，有鎊的人，有教堂的人以及一切別的愚蠢的人們的切身利益。

這樣，在最後的決鬥中的社會保守主義，表現在所謂恢復道德和國力，打倒社會主義和自由

的形式之下，表現在超乎一切批評之土地自動軍事化的一個強力政權的形式之下。這是變成了一個政黨的資本主義的警察。

這就是法西斯主義已經灌到納稅者的頭腦裏去，而且還在灌着的藥汁——這就是自稱爲能够治癒恐慌和蕭條的方法。但這恐慌和蕭條其實却就是那些方法所引起的。各種的法西斯主義，在表面上彼此不同，實際上，却是一個東西。

法西斯主義雖然製造了一種德謨克拉西的假面，也畫上了社會主義的臉譜，它雖然高聲地說着革命，統制經濟甚至於反法西斯主義的話，而且坐在無產階級的原則上以抬高自己的價值——但是這一種存在於意大利、德國、匈牙利、波蘭、巴爾幹半島、葡萄牙、奧地利的所謂「民衆復興的主義」，這一種普遍地用最大的屠殺，最慘的酷刑對付着爭取自由的民衆的「主義」，這一種目前正在法國和別的未經它的蹂躪的國家之內，招募着小布爾喬亞和教會信徒中的青年，以作它的羣衆的「主義」——其實是一點也不德謨克拉西，一點也不新的。這不過是飾了毛的，鍍了錫的，軍事化了的，舊的資本主義。在這只有太老實的人會相信——但也只在開頭的時候——的醜陋的主義之中，在這推它上前，其實就是拖它落後的醜陋的主義之中，同樣的許多巨大的基本的矛盾，依然存在。

它毫無貢獻。法西斯主義在現在和將來，永遠只是不吉的古物中的一種假東西，法西斯主義者的想像中的獨創的工作，只是決定他們的襯衫的顏色，或者把吸烟可以養生的道理說服羣衆而已。

社會依然是這樣的社會，在這裏面，人們只有靠破壞方能繁榮，人們只有靠殺人方能生活；依然是這個侵入新的大陸，破壞弱國的疆界，使土著人民為他們所呼吸的空氣付稅；依然是這個卑劣的社會，在這裏面，一個人非成為癡愚就不能設算，這裏面的選舉是強姦民意的，這裏是人割割着人，人謀害着人的，這裏的許多偉大的社會事業的到期的兌現，是跟虛偽的表面的決定絕對兩樣的；這社會依然是跳舞場裝飾着火山的社會。

這樣一種制度，是解決不了恐慌的，反之，那國家主義愈是發展，破壞也愈將擴大。

它毫無貢獻——一定要說有，那只有死刑的判決。布爾喬亞的統治所建立的「秩序」，是在實際的紛亂之外的墳場的秩序。

怎樣可以避免這一切呢？戰爭。於是，我們重新要看見防禦毒瓦斯的面具的醜態，運兵的火車——活人的柩車，跑去讓別人屠殺的羣衆，佈滿金屬殘屑的曠野，成為礫堆的村鎮，躲在地洞裏面竄息而死的民衆。……

然而，戰爭也是在戰場的壕溝裏和城市的廢墟中廣播着的社會革命。

在目前，使這種虛幻的政綱，使這種空中樓閣的子虛烏有政綱之所以能够成立的原因，在於——除了它的德謨克拉西的「招鳥鏡」以外——它這方面有着暴力，國家的力量。在於歐美各國的政府都是法西斯，或準法西斯的。

在統計的跌落在數字的減少上大受影響，在經濟上日趨崩潰的資本主義，在政治上，是還

很有力量的。這些破落戶還是全身武裝着，他們的腳雖然站不大住了，但是他們手裡還有着機關鎗，坦克車，炸彈，軍隊，他們有着很多的城市警察，簡直可以到農業公會裡去展覽一下。他們有着法庭（監獄），報紙，學校，外交家以及聯合進攻的同盟國。他們有着法律。他們製造法律條例，跟製造貨幣一樣，他們也實行法律的「通貨膨脹」。一切掃蕩國內的自由思想者的工具，掠奪弱者的武器，濫用文明的手段，向一部分小布爾喬亞鼓吹國家主義，使之發狂，使之拚命的技術，浪費勞動力的方法，以及暫時維持這個墮落而破壞的時代的本領——他們都有着。

這一切所造成的結果，是在多次的預備會議和初步協定之後，大家一齊擴張武備。還有對於軍火商人的白皮文書，他們漂亮得很，就是對於將來的敵國，也肯賣給他們的產品。（我們來回憶一下許多最好的先例：上次大戰中，在保加利亞戰線上，曾有許多法國兵，被敵方用的法蘭西G.T.式兵器轟炸得無形無蹤。在北非洲里夫戰爭中，法國兵受着法國步鎗的射擊。克婁梭德公司（Clausen）的雪奈台爾（Schneider）先生，統制着，經營着捷克的La Sude軍火製造廠，而這廠就是供給德國的軍火，煽動希特勒去發動戰爭的。最近，在急進黨大會上，梭那克（Jean Sordano）老實地宣佈，雪奈台爾賣了四百尊坦克車給德國，而法國西南部的某工廠也賣給德國許多製炸藥的物品。在別方面，這種雙方的定貨也在進行着，不久以前，中國和日本對於他們的共同的軍火供給者之一，同時運動，要他把那些殺人傢伙的價錢減低些。這類真實的事情，竟荒唐得跟滑稽畫一樣了。

從波羅的海到地中海，所有的國家都陷在資本主義的破壞的勝利中。

第一是意大利。對於勞動階級和革命者的迫害，卑劣的恐怖，比古時異教裁判所還要殘酷的苦役和毒刑，其方法之多是人們所想像不到的；還有普遍的手鎗和坦克車的威脅，以及充滿了疾病的牢獄之中的慢慢的害死。

墨索里尼，這世界反動的揚聲器，是當外國資本家還頗為富有的時候，是爲了準備多出賣一些人來造成自己的地位，才作爲一個純粹的社會主義者，而出現到社會舞台上來的。到了現在，這個殺害了馬戴奧蒂 (Mussolini)，殺害了他的成千成萬的兄弟的兇手，他爲了掩飾他的許多叛逆行爲和罪惡，而利用那實爲現代的特徵和恥辱的，無聲的重大的陰謀。他把他的光榮移植在意大利上面。

這「黑衫黨」的領袖，這意大利人的黑色國王，他只把意大利的門面粉飾了一下，此外，他毫無實際的成就，——除非把減少意大利人人數的工作算在內。目前，意大利這個國家，在經濟上，已是除了德國就要算歐洲最悲慘的一個，但它的破壞的擴大，仍未停止（法西斯主義，「世界的再造者啊！」）。在這教員穿着軍衣上課，工人們——連有工做的——沒有食物喂兒女的意大利，爲了發展商業起見，而舉行着祈禱大會。在這里，充滿着一種由嘴套所造成的靜默，在這里，建立着一種使遊歷者看了滿意的秩序。

不久以前，這位掌握外交，自任部長，在外交政策上愛管閑事的漂亮人物（他既是修改和約的贊成者，同時却又是反對者——無論什麼事情，他總是要自己上前，剛愎自用）。曾經宣言意大利已到最低的退潮，「它不能再往下落了。」……什麼醫生，學者，教員，教師，這類人

物都是奢侈品。誰若到處都想找這類人，那一定是要失望的。——這一位從前曾經對他們的國民放散過天花亂墜的預約的虛偽的法西斯獨裁者，是這樣的宣言着了。

卍字架（這是兩個絞架交叉起來的）的德國。勞動階級在這國家裡英勇地反抗着，但是他們却有着一整個的有待再造的運命。希特勒——和他的陰謀，他的流氓臉孔，他的跟鼻頭相連的垂直的小鬍子，以及他的醉後的道德家的私心——是高踞在超過兩個老滑頭的權力之上；與登堡和克雷孟梭（凡爾賽二約無理的惡作劇，是這個流氓的議論中唯一地說得響的問題）。

希特勒的統治是勞動階級的虐殺，軍事和無線電樂隊的演武，是如山的訟案，是國家大員的殺戮，是和他的心腹的感情的分裂（六月三十日之夜，非常的政變的亂行）。

他也只是個資本主義的代言者和代理人。雖然他對於猶太人却是一個強盜。現在，他把自己造成一個神聖的太上皇，他的政策，違背了那把他推上皇位的國社黨的政綱。爲了討那勢力很大的國權黨（Reichwehr）起見，他從國社黨的政綱中刪除了「一切有變關意義的（用了社會主義的字眼寫着的）」，能够使這政綱變質的，而且能够使那已返於童年的德國看成德謨克拉西的條文。

他焚燬書籍，他焚燒了德意志議會（Reichstag），他還想在歐洲放火。

他要做到的。那架被希特勒立在頂上高談闊論着的機器，是有着某些很利害的機件的。一個會被打得半死，但是還保存着堅強的活力的大國所有一切力量，一切財富，德意志式的周密的「管理」，還存在於這種繁密的人民的大部份中的有紀律的堅執的信仰——這一切，都被狂熱地利用於重整武裝的工作上面去。他們是要能够在經濟的總崩潰之前造成什麼具體的顯著的結果。德國

的有工做的工人，今日所賺的錢，比前幾年失業工人所賺的錢還要少。（貧困是最好的教訓者呵）。在德國的饑行之上，共產黨看到自己的精神上的勢力日益擴大起來了。現在，那個毫沒有建設的綱領的希特勒的唯一的救星，乃是戰爭。一旦他覺得了武備已足，同盟已立的時候，他就丟棄他的面具。從來沒有一個國家，是這樣顯明地被拖向毀滅的路上去的。

在奧地利，政府不大歡迎外來的強盜行為，它只容許它自己的。工人們應該被國家的軍隊和警察公然殺死，被內衛團（Einwohnerwehr）私下殺死——倒也沒有別的殺法了。陶爾斐斯總理，他屠殺了大批的勞動者，却替他們祝禱，這個信基督教的總理，這隻歐洲的獸苑中的袋鼠……他終於被暗殺了，幸而是這樣，他自己倒沒有留下兇手的名聲。

在巴爾幹，白色恐怖已歷十五六年，和意大利一樣。保加利亞，有官廳的強盜行為，有大批的屠殺，有森林似的絞架（成千成萬的人被吊死，被腰斬，被活活焚燒，被千刀萬剮，被斬斷四肢，被拔落指甲和頭髮，男人和女人，被燒紅的鐵通到肚子裡燙炙——另外還有類似的許多方法。——這些方法，歐洲各國幾乎無不應有，我們的這種好像難以相信的列舉，不啻是對於我們的時代的一種咒詛的呼聲）*。

在同樣的制度的頂上的，有羅馬尼亞的好玩的國王嘉樂爾，還有故塞爾維亞王亞歷山大。亞歷山大是塞爾維亞人和協約國中雜居在塞爾維亞的人民之中的劊子手，殺人犯的頭腦。他的所以成爲國王，乃是某天晚上二羣匪徒越牆而進在一個化妝室裡刺死一男一女的結果。塞爾維亞，已經在一九一四年做過大戰的實端的供給者；薩拉熱窩。它現在又踴躍欲試，向匈牙利——不如說

是有達佩斯（這裡做着國社黨所屈的烏斯泰契（Ustasja）的恐怖黨的巢穴）的霍爾蒂（Horthy）政府（霍爾蒂是有虐害狂的劊子手們的老頭子，是假幣製造者的保護者）去挑戰，藉口於亞歷山大王的廢死在南斯拉夫人民（這種人民是還未曾被這位好國王所殺害的）間所引起的匆促的喪禮。但是機會不好，這藉口却落了空了。在這單子上，地位最高的，要算畢爾蘇斯基，他在一個發瘋的工人看來，竟是一個國王（他曾經使人鎮殺單純的罷工工人和單純的五一示威者），他無情地背叛了法國，只因爲法國窮了，不能接濟「正式的」波蘭。此外，還有麥薩里克，這聰明的大總統，他對於德謨克拉克西和簽緊急法令的愛好，跟對於勞動階級的憎恨一樣的深重。至於瑞士，它今日的與衆不同，不單單是因爲「和平」在此作寓公，也不單是因爲「國際聯盟」設立於此，所以大家只講和平，跟在教堂裡只講愛一樣——而也因爲瑞士已經變成了和英國一樣的冷酷地排斥外人的地方。況且，在下次大戰的時候，瑞士已經開始做起中人來，介於好戰的雙方，經營戰爭的商品的生意。

在法國，社美格先生已經下台了，除他自己之外，誰也不覺得這事可惜。這並不因爲他的意思壞；他姑婆那個老武夫與登堡的榮譽，而且有點學樣：「直起脊骨像開正步」——這位和那

※ 對於種種的酷刑，大報紙永遠裝作不知道。可是執行死刑的日子，則竟像是大節日一般。在匈牙利，有一次被死大批革命者的時候，竟轟動了大批時髦的布爾喬亞太太小姐，觀禮者，竟滿清這些被人們從牢監裡牽了出來的「暴徒」。在蘇黎世，當弗里特曼（Frittmann）在攻擊教堂的罪名之下，被毫無證據地判決死刑之後，竟有五萬人去參觀他的死刑的執行，當時的情形會像繪入電影中。——原註

行險徼倖的泰迭歐先生在一起的杜美格先生，他有大權獨攬的嗜好，他常在無線電中甘言蜜語地叫人挖腰包，拚性命，他的糖屎病的演說，是想在把法國人扼死以前，先搶空他們。他堅決地實行軍事預算和警察預算的膨脹，以及先前泰迭歐所計劃的「政府改革」政策——這是已經和那盛行於鄰國的法西斯主義制度很相像了的。

但是，他太要跑得快了。在議會的解散之前，他竟不得不放下。他的後任，繼續實行着這個虛偽的國家偉人的政綱，而且手段更巧妙。也是和那兩個變得分不開的朋友——泰迭歐和赫禮歐在一起的時候，他主張簽緊急法令的制度。要是他不這樣的堅持「政府改革」政策，那麼他顯然會在他的意見書上加上「國家經濟」的字樣去。在這樣一種情形中，一個字眼能夠有什麼效果呢？人們通過了許多解救恐慌的辦法，過了許多時候看看，這些辦法毫無效果。他們並不跟恐慌鬥爭，只是在它的前面逃避。和那對手糾紛太多的史達維斯基案件毫無解決辦法的前政府一樣。這個政府也是不能解決什麼的。在內政上，它要求「靜靜地」工作。它要求「信任」（讓政府去做），政治的休戰（尊重政府的政策），公眾的正直（我們來消滅罪行），神聖的統一（把一切外國人驅逐出去）！在外交政策上，恢復和解，議價還價以及「*laissez*」的糾紛。

法蘭西帝國和殖民地怎樣呢？政府大舉地召集了一個法蘭西帝國會議，目的是要從這些被征服的該責罰的屬國裡，榨取出更大的生產率來。但這是枉然的。實際上，好久以來，整個非洲的這些被榨取的土著，已被鎮迫着精疲力竭地拚命在工作了。土著人民是一批做苦工的畜生，打仗的畜生，納稅的畜生。在加蓬（Gabon）——這裡的黑種人口顯然是在減縮着的——黑人們常常

賣掉了老婆去納稅。在法屬赤道線非洲和法屬西非洲，不納實物的土人，引起那種掠奪的文明的屠殺或破壞村莊。在摩洛哥，女人是租稅的實物。在安南，人們建設了作開墾殖民地之用的鐵路，這些鐵路的完成的情形，可以說每一條枕木代表着一個土人的屍首，要是有一個本國人抬起頭來反對這種行為麼，人們就在祖國的名義之下打倒這「強盜」。

在西班牙，專制制度已在四年以前被西班牙民衆的忿怒的暴動所掃蕩了，但是，唉，代替這個的，却是一班有着對一點點紅顏色就要發怒的雄牛心理的共和黨。他們一開始就用槍彈對付罷工者，就大學地殺戮那些把政權送給他們的工人和農民。現在，他們把那被勒魯政府的無恥的法西斯化所引起的革命，殘酷地淹在血泊裡。紀爾、羅勃爾和他那天主教和法西斯的「平民行動黨」現在做了一九三一年的革命的承受者和那軟骨的亞爾豐十三世的繼承人。特別是在 *Madrid* 有了很大很深的影響的一九三四年革命，是被遏止了——這是社會黨的軟弱和無政府黨的背所造成的失敗——但是並沒有被熄滅，它也並未解除武裝。西班牙的土地是在羣衆的重量下面震動着。

現在的英國，乃是出色的帝國主義，它的政策，乃是傳統的布爾喬亞帝國的自私而貪婪的政策，大英帝國，將是世界的反動的最後一個強大的堡壘。

對於勞動者的解放和人類自由的恐怖和憎恨，從那班英國的領袖的演說中的聰明的假仁假義和傳道的深心裡面，時常透露着（這一個可怕的大專制家們的集團，當那勞動的領袖也要參加在內時，他們一下子就把他壓倒）。就是自命爲自由主義者的勞合，喬治和別的同類的君子們，

也流露着這種恐怖和憎恨。

英國的策略之中的堂皇的好詐，這「情報部」的霸王，在它的持久的沉着精神上，跟墨索里尼之流輕躁的政策大不相同；墨索里尼之流，一心總要比什麼都要緊想地在現代編年史中顯耀他個人的權威，誇示他這意大利大寄生蟲的簽字。英國的摩斯萊動靜是跟黑衫黨很相像的，但是法西斯主義似乎不會很快的以那樣的形式統治英國：第一，因為英國的大眾堅決地反對着，第二，因為現在統治着的帝國主義並不馬上就需要它。

在印度，英國政府從天空散播過轟炸機的文明（這無論如何是英國的報紙所報告的），而且用了機關槍和鐵棒，在無罪的，赤手空拳的，忍耐的羣衆中間，打開過血路和血河。在這樣的地方，甘地主義者的制約民衆的運動，不管就是屠殺運動。甘地，這奴隸性的夢想家和進步的敵人，他出賣了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人民。只能替印度祝福的人是毫無用處的。我們要提防那些專門騙人的教主啊。

還有別的國家麼？那操在軍閥手裡的日本，變成了一個怪物，它的全部經濟都戰時化了。它鼓着氣拚拚拚，要變成世界第一陸軍國和海軍國。它是世界市場上的軍需和戰具的主要的購買者。對於它的那班可憐的迷信的軍隊，一種更惡劣的命運等待着他們——等到「軍部」覺得可以動手的時候。

這個統治着日本帝國的軍部，對於華盛頓條約大感不滿，那條約，曾給它規定一個海軍力的係數：「三」，當英美兩國都是「五」的時候。日本要求和英美平等，它廢除了這個條約。而

且，它還想做東方帝國，這就是說，它想變成太平洋上不受任何限制的主人。它一直追求着這個夢想，名義上，它宣告繼承了「維持東亞和平的神聖使命」（它，它是屠殺中國的兇手啊！）事實上，它勾結英國，反對蘇聯（這是早已準備着的），同時也反對美國——既然地球上並沒有兩個太平洋，那麼美國當然是它的敵人了！

在美國，羅斯福先生集許多要人於一堂，好像舉行扶乩似的，想求出資本主義制度中的經濟平衡這難題的解決。他用了種種「掩眼法」和法西斯主義的把戲，使人看去好像會得成功。他不能不用這些手段，但是這些手段不會成功，當國民經濟依舊被壓迫在少數大資本家的私人利益的專制和獨裁之下的時候，怎麼能够瞎想一種人人利益調和的國民經濟呢？一個社會，好比一所房子，應該從基礎建設起，不是從屋頂開始的。羅斯福的只是表面的暫時的種種試驗，表示着要從屋頂開始，去建築社會經濟的房子。這是空論上的事情，文字上的事情。說得更壞點，這是兒戲或欺騙，歸根到底，這是完全立脚於資本主義上的。

斯大林在最近對威爾斯的談話中，十分明白地解釋着這一點。在威爾斯看來，羅斯福先生的政策似乎已經到了最後的最後，把「盎格羅薩克遜式的社會主義」（？）置諸奇蹟似的實行了。斯大林很稱讚羅斯福在「把資本主義的破壞修復到最低限度」的工作上所表現的「意志和勇氣」。但是他叫人注意，羅斯福並沒有把資本主義的基礎上的無政府狀態根本拔除。但這一層他可做不到，因為，美國這個國家，實際上操在私人資本家的手裡，羅斯福先生是無用武之地的。要是他真地妨害了資本主義的利益，那他就不滾蛋不可了。從羅斯福的這種不澈底的政策裡，什麼結果

都不會產生出來的，除了些轟動一時的烟火以外——而且，資本主義在這些政策上之所以冒社會主義方法的牌子者，只是爲了它要繼續統治，不得不如此而已。

然而，另外有着兩樣的事情。另外有着正當的力量。另外有着無數的眼睛，在一種光明的勢力之下睜開着。

讓這種大眾的感化力 (Morali sation) 趕快發展罷！誠實是可敬的，但是，我們現在已經到了這樣的一個時候：無知是變成可恥的了。

破天荒地，人類的一部分，已經從根本上改革過來了。所有的人的眼光都集中於蘇聯，要看它跟別的一切或進步或落後的國家，到底不同在什麼地方。我們的義務，就是要同時理解這一切的情形。

要是，當我們看了上述的，充滿着寄生階級的意志所造成的種種苦難的那個世界之際，我們不禁陷於忿怒咒詛之中了；使我們如此的，是一種極明白的證據，和一種驚怖之中的發喊求救的必要。然而，我們且停一會，靜靜地想一想罷——作爲一個有思想的動物，是應當深思的，我們像巴斯加那樣的來向自己賭一回東道罷！

將來是往何處去的呢？法西斯主義呢？或社會主義呢？應該往何處去呢？

法西斯主義普遍的國家主義的反動麼，既然各國的國家主義都只是想損人利己的，既然在地球上的國家差不多有八十多個，既然這一種組織的發展對於各國，都一律用的是破壞手段，那麼，這種主義有什麼意思呢！……在這裡面，除了仇恨的聯合，除了圖私利的破壞的聯合，此外

還有什麼聯合呢？人類的末路，從未有像在這樣一種情景中似的用科學方法安排過！

另一方面呢？那普遍化的蘇維埃的原則，是能夠實現的麼？是的，而且這是於一切人有利的，而且，這是唯一有利的，而且，這是唯一可能的。人們採取了社會主義的方法之後，那麼一切現在落在我們身上或懸在我們的頭頂上的普遍的不幸，就一件也做不出來了，在一個蘇維埃的社會，是每個人愛護每個人的，這個社會，是支持一切人的，它是使每一個國家的疆界美麗化和合理化的。

至於那點綴着共和黨的標語，却在它的裡面蠢動着「物」和「人」的所有者，商人，投機家，拐子，騙子的巨大的腐蝕的反動潮流，——不但那組織了勞動者國家的大眾在反抗它，同時，在每個國家裡總有半個國家的人，是反叛着，毀壞着它的鎖鍊的。

這種革命的力量不絕地在加強着。社會鬥爭，如今在我們的國家裡，取了廣闊的強大的「統一戰線」的形式。這就是說，這是一切勞動階級和一切「左傾」的黨的或久或暫的聯合（但它是發展成經常的）而且也聯合農民層和中小布爾喬亞層（最後這三者，構成着世界各國的民衆的多數部分）。

我們已經跨進了具着忠實的，合理的革命性的大眾運動的時代——我們已經看到種種範圍非常廣大的運動，例如一九三二年阿姆斯特丹大會所產生的「反戰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運動」和一九三三年的「巴黎大會」（在波雷耶爾大廳 St. Pierre 舉行的）。這個大會，又是國際化的統一戰線的專門組織的靈魂，是佈置的主要的工具。現在，目的是要組織了一切被剝削者被壓迫者的力

量，用了對資本主義本身鬥爭的方法，去阻止戰爭，掃除法西斯主義和法西斯化——這都是資本主義的結果。全世界都是如此，或從側翼或在中軍，都參加這由政黨指揮着的直接的戰爭。（這些政黨也參加着統一戰線，如法國、奧地利、意大利等國的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最近開始實行的那樣）。這樣，威脅那愚謔殘暴的舊「秩序」的一個運動，一個全體大眾的動員，就發生

了。

這個運動激起了一切活着的民衆，反抗政府的死的壓力，反抗投機者的致命的壓力。

既然是布爾喬亞的專制政府先下手爲強地開始了反革命的行動，那麼，對於不幸的人們，對於被壓迫的人們，對於被犯罪的人們，除了革命的方法之外，就沒有別的方法。反革命者方面，掌握着武裝，掌握着公共事業，而且有無線電供他們傳播謊話。革命者這方面，只有「合理」。這就是最後在決鬥，——如羣衆在歌裡面所怒吼似的。

在這廣大的亦攻亦守的運動中的我們的目的之一，誰說不是保衛蘇聯呢？

蘇維埃社會主義的統治，是唯一地能夠創造繁榮，創造公德的——這些公德，跟那些喜歡聯關地在每個都市裡出風頭的墨索里尼或史達維斯基型的人民的無聊的榮譽條例，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十月革命，眞的在道德和公共精神上，甯來了一種淨化作用，這是無論什麼宗教改革或政治改革所沒有做到的——無論是基督，無論是新教，無論是法國革命中的「人權和公民權」的爭取。

在向著將來進行的世界集團中，種種的事實證明着：一切工作者——工人，農人，中等階級，智識分子——的利益是一致的，一切工作者應該以工人階級爲中心而團結起來。這並不是說，工人階級是一種高等分子。應享什麼特權；這是說：這是最好的安排，因爲在它的組織上，在它的社會的表現上，在它的經驗上，在它的理論和歷史的身分上，都是反資本主義的，並且，鬥爭的最重要的武器，是操在掌握着生產品的人們的手裡的。工人無產階級實在是一支現役的軍隊。在戰爭中，現役軍隊的任務並不是指揮後備軍隊，而是要和後備軍在最困難的戰況中合作。

事實又證明着——我們不應該偷懶地不說一說這些真實——爲了要避免紊亂，我們應該實際地擁護國際主義，因爲歷史遺東西，是不管我們願意不願意，向來是以國際的態度向我們表示着的。即使在國界以內，我們倒不超脫國界的觀念，也就做不成一點事。最後，我們應該丟棄改良主義，而且不可跟那攫取政權的財閥集團結合。改良主義的公式是毫無意思的。當它從社會主義裡面創造了一個意義兩歧的中庸地位，而在這地位上一旦踏上了工人階級的是跡時，那它就非獨斷不可了。

現在是有着兩個世界：社會主義的和資本主義的世界。在這兩個世界之間，只有一個在言語上，是德謨克拉西的，在事實上是封建的「第三世界」的畸形的海市蜃樓存在着。

我們必須在這一個真實上聯合起來。

青年們不應該再受那法西斯主義所假扮的退老還童術的騙，也不應該再受法西斯主義的腐物所發的磷光的騙。

對於時代的要求的最偉大最重要的答覆，正應該出於青年。青年的使命，並不是把他的能動的力量用於腐敗的傳統，也不是絕望地把世界從左向右的亂推亂拖。他的使命是依照自然依照科學而創造新的事物。青年人，乃是人類的父親。

一切退伍兵士，——這些九死一生的人們，這些在世界大戰中浴過血或成了殘廢的證人，這些曾經在三千公里的戰線上，毫無理由地互相衝突過，而且親手造下當代最殘酷的屠殺的人們——他們不要接受那些預備再來一次的政府的徵發罷，他們不要再做未來的大戰的憲兵罷。

而且，讓居人類的半數的婦女，也能明白，世界的和平與秩序，是只在這些最高的真理被實踐之後，方能實現的。

第十一章 把舵的人

我們再回過頭去，看一次這個永遠在已經做好的事情和正在做着的事情之間的人物的臉相。
〔或者，用他常說的話——當人們跟他談到工作上頭的時候——來說，是：「比起以後應該做的事情來，這是一點也不算什麼的。」〕

他是我們的敵人們的鞭子，他們是沒有認錯的——克諾林說。他是我們的黨的名姓——浦勃諾夫說。他是古代的鐵軍裡面的最好的一個——馬努伊爾斯基說。老布爾雪維克們之所以被人尊敬——米珂揚說——並不因為他們資格老，而是因為他們不會老。

他的歷史是在一串重大的困難之上的一串勝利。從一九一七年以來的他的生涯中，沒有一年，他所做的事情，不是使別人成名的。這是一個鐵人。他的名字描寫着他：「斯大林」——鋼。他像鋼一般的不可屈，又可屈。他的權力，就是他的驚人的智慧，他的知識的淵博，他的非常的自制力，他的正直的熱情，他的嚴酷的進步精神，他的決定的敏捷，穩當，堅強，他的對於所需要的人材的選擇的時常留心。

死者總是遺留在地球上的。凡有革命者的地方，總有列寧在着。但是我們可以說：在斯大林

的身上，比在別的任何人的身上，更多的存在着列寧的思想和言辭。他是今日的列寧。

在許多方面，人們看出他類似那個非常的烏拉第米爾·伊里奇；同樣的理論知識，同樣的實踐精神，同樣的堅定。他們的不同在那裡呢？請看蘇聯工人的兩種意見：「列寧，是指導者（Directer），斯大林，是領導者（Chief）。」又：「列寧是更偉大的人物，斯大林是更堅強的人物……」但是，這種的比較，我們不再做下去了，在他們的籠統的形容中，這種比較也許會使我們對於這兩個非常偉大，而且互相影響的人格陷入人爲的誤解。

如果要說，我們也可以說：由於環境的關係，列寧更是一個煽動者。在今日已大有進步，大有發展的廣大的指導制度中，斯大林是只要通過黨的中間關係，通過組織的中間關係，就能更順利的推動了。我們可以這樣說：斯大林在今日，並不是一個激烈的大會場上的人物。況且，那種最適於暴發的專制魔王之用的——還有，在這班成功的使徒之中只有一個，也常常用它——惡河似的雄辯之力，他從來沒有用過，這一點證據，是可供將來要批評他的歷史家們深思的。他所走的是另一條路，他和蘇聯的工人，農民，智識份子以及許多把他們的祖國放在心頭的世界的革命者們——總有兩萬萬以上罷——相接觸，也是用另外的方法的。

我們在前面已經瞥見過他的偉大中的若干秘密，在他的天才的富藏中，到底那一種是主要的呢？倍拉·鏗在一句很美麗的話中說着：「他知道不要走得太快。他知道算準時機。」倍拉·鏗以爲這是斯大林的特質，是惟他所有的特質，而勝過別的一切等候時機，隨機應變，抵抗勾引的誘惑，有一種可怕的耐力。使斯大林在一切歷史上的革命期中，對於革命的實際的貢獻最多，而

犯錯誤最少的，豈不是這力量嗎？

在提出任何意見之先，他總要多多權衡，多多考慮（「多」並不是時間長）。他是極端慎重的，要使他相信很不容易。他告訴一個對某一第三種政黨起着懷疑的，親近的合作者說：「適度的懷疑是集體工作的一個好的基礎。」他謹慎得好像一隻獅子。

這個純潔而光明的人，如我們在前面所見過似的，是一個簡單的人。人們的難得會見他，只因為他常在工作。當人們到克里姆林的一間客廳裡去訪問他的時候，只見一共不過三四個人守護在樓梯下面和走廊裡。這種天生的簡單性，跟別人的「矯揉造作」的簡單——例如，斯堪的那維亞的一個君主簡單到願意到在街上去步行，又如，希特勒叫他的宣傳員們大吹大擂說他不吸煙也不喝酒——是不可同日而語的。斯大林規定每天上午四點鐘睡覺。他不像勞合·喬治那樣的有十二個秘書，他只有一個，就是普羅斯克洛皮雪夫同志，他並不是叫人寫了文件單簽一個名的，人家供給他材料，他就自己來全部做好。一切都經過他的親手。雖然如此，他還是能够親複或叫秘書代覆他所收到的每一封信。人們遇到他的時候，他是誠懇和藹的。他的「真正的誠懇——緩拉菲瑪，戈普耐說。「他的善良」，「他的文雅」——在喬治亞和他一起鬥爭過的巴爾巴拉，介巴黎支說。「他的愉快」——奧拉凱萊徐維里說。他笑起來像小孩一樣。

舉行高爾基六十歲紀念慶賀會的時候，在那莫斯科的大歌劇院中，當開幕之際，好些要人集合在從前國王和大貴族所坐的包廂的後面廳堂裡。在這裡，忽然發生了一陣非常的喧嘩。他們捧

腹大笑著。這裡面有所大林，奧爾佐尼基茲，里珂甫，蒲勃諾夫，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卡加諾維支，披亞特尼斯基。他們講着內戰時候的故事，引起了可笑的回憶：「你記得你從馬上跌下來的事情麼？」「是的，這隻混賬畜生，我不知道它着了什麼道兒了……。」於是一陣哄笑，一陣大高興，一陣青年的雷聲，震動了小小的廳堂裡的天花板——這是建設工作的偉大的拉雜者們的短促而甜蜜的休息。

列寧，他也是拚全力地笑的。

「我從未見過像烏拉第米爾·伊里奇那樣的笑聲十分動人的人，」高爾基說：「簡直使我們覺得奇怪的是：看到這樣一個嚴格的現實主義者，一個對於社會的大悲劇的迫臨看得很清，感得很深的人，一個對於資本主義世界懷着不可動搖的憎恨的人——竟也能够這樣的發笑，笑出眼淚的笑，笑得氣絕的笑。」於是高爾基下結論道：「這樣發笑的人，是需要一種偉大的，堅強的道路上的健康的。」*12

笑起來像小孩的這個人，是愛小孩的。他有三個小孩。大的，傑斯契卡，兩個小的：華西里，十四歲；斯維特蘭娜，八歲。他的夫人，娜其達·亞里路易娜，已於去年逝世；她入土以後，只有一個高尚的平民婦人的美麗的臉子，和一隻美麗的大理石似的手臂，呈露在諾伏·台維基墳場的一個大墳中。他差不多把那個在一九二一年事變中被人殺了父親的阿爾西翁·緞爾夫尼

* 要是斯大林有一天知道了「一九三五年 Vermont 年會上所說的偉大的蠢話：「斯大林私人的用錢，每年達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法郎」。那我就在這裡聽到他的笑臉了。」——原註

當作養子。他又父親似地照顧在巴庫被英國人槍斃的介巴黎支的兩個女兒。此外還有許多！我還看見過阿諾德，卡伯蘭和波里斯·戈爾斯因的快樂，這是兩個奏鋼琴和鈴的神童。他們對我講起，他們在音樂研究所獲得勝利之後怎樣地被斯大林招了來，並且，他還給他們每個人三千盧布，說道：「現在你是資本家了，下次在路上碰到的時候，你還向我行禮嗎？」

在列寧和斯大林笑聲的周圍，我們可以說，又是一個相同的現象有着幽默。他們常常將它使用。斯大林最愛把一種滑稽的或諷刺的形式，加於他的思想的表現上。

台明·培特尼對我們講了一個美麗的故事：「在一九一七年七月的日子的前夜，斯大林和我都在真理報的編輯室裡。電話來了，克倫斯泰特的水手們問斯大林：「示威的時候，要不要帶了槍去？」他在電話裡將怎樣回答呢？」——我想，於是很留心地聽「槍，那是你們的事情，同志們！至於我們作家，我們是帶了鉛筆去的。」當然，培特尼說：「示威的那天，所有的水手是都帶了他們的『鉛筆』的。」

但是，他在必要的時候也能節制他的笑，當愛米爾·露特維希經他解答了一個問題之後感嘆道：「你對於自己正確到何種程度，毫無意見！」這時候，他溫和地答道：「誰知道，也許我也會不對。」在另一方面，當這同一作家對他提出這問題：「你相信人家會把你比作彼得大帝嗎？」的時候，他却正經回答道：「歷史的比較往往是冒險的，你所說的比較却是無聊的。」他并不在人們給他的一切機會中都高聲大笑。

他的經常態度之一，是「不要出風頭，不要逞能。」

斯大林寫了很多重要的書。其中的大部份，是在馬克斯主義文獻中具有古典的價值的。但是每逢有人問起他是怎樣的一種人的時候，他總答道：「我只是列寧的一個弟子，我的全部野心就是成爲他的一個忠實的弟子。」我們不免覺得奇怪地看到：「在許多關於他所領導的成功的事業的報告中，斯大林定規要把一切所得的進步的功勞歸之於列寧；雖然大部份的功勞實在是他的，而且，假如他自己不是一個創造者的話，根本是不能實現列寧主義的。」弟子」這個字，在這裡，原也是價值很高的——但一般人總把它用成可以減輕他們的特殊使命，使他們便於躲在衆人之列的意義。這其實並不是表示着隸屬，而完全是表示着友愛的。成們想起了哲學家塞納卡的簡潔美麗的格言：「*Deo non pato sed assentior*。」——「我並不服從上帝，只是我所想的和他的相同。」

我們所以還要化些時間來理解這類人，並不是由於他們的複雜，却是由於他們的簡單。我們分明地看出，個人的「傲慢」，跟那人們會得加到這個人的名字上面去的——推動他向前，而且在面對着敵人的時候支持他的「驕傲」，完全是兩樣的。驕傲是信仰。在這個有許多科學家真地在試驗使死人復活，試驗着用死人的血救轉活人的大國家裡，在這個感化着罪人，在這個著名的有毒的宗教已被一陣風吹光的大國家裡，「信仰」是從大地的本身中產生着，跟森林一樣，跟作物一樣。這是對於合理的永恆的正義的信仰。這是對於知識的信仰——關於這一點，列寧曾經十分深刻地解釋過，有一回，有人向他說起一件使他受了損失，而且縮短了他的壽命的卑劣的行動，他回答道：「你希望怎樣呢！每一個人是照着他所知道的做的！」這是對於社會主義制度嗷

化身爲這制度的大眾的信仰，對於工作，對於如斯推茨基所說的「生產力的暴雨般地增大」的信仰。「工作」，斯大斯說，「是一種正直，英勇，光榮的事情」。這是對於「勞動法」，對於共產黨法律和它的極端的正當的信仰。「我們相信我們的黨」，列寧說過，「我們在它身上看出我們的時代的精神，正義和信仰。」「並不是每個願意入黨的人就可以入黨」，斯大斯說「並不是要每一個人到黨裏而去做工，冒危險的。」

倘若說斯大林信仰着大眾，那麼，反過來說也是對的。新的俄國所奉給斯大林的，是一種真正的崇拜。但這是由信仰所造成，而且完全從下層湧出來的崇拜。他的肖像在紅色的大佈告上，總是比馬克思和列寧的來得突現的這個人，他是對於一切事物一切人都很關心的人，他是做了已做的一切，將做應做的一切的人。他在過去保護了俄國，他在將來還要保護它。

我們很知道斯大林自己說的這話是不錯的：「以偉人爲歷史的主要的創造者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但是，我們雖然應該否認嘉萊爾所主張的，「英雄」在一切事業上的絕對的功勞却不應否認他的相對的功勞。在這里，我們也應該想起，相似的事物，是互相服從的。偉大是對於事情的趨勢有先見之明，而走在它的前頭，並不是跟在它的後頭，而且豫先安排下阻止它或歡迎它的工作的人。英雄不會創造一塊未知的土地，他却能發現它。他能够激起廣大的羣衆運動——雖然一方面這種運動已在自發着的——因爲他知道它們的原因。全然是合乎實用的辯證法，要能够發現一個人的特長，——對於事實也要如此。在一切偉大的環境中，應該有一個偉大的人，作爲一部集中的機器。列寧和斯大林並沒有創造了歷史——但是他們把它合理化了。他們使「將來」接

近起來。

我們生在世上，是爲了替人類的精神，造成最大的進步的，因爲，畢竟較之一切，我們是還個——人類精神——的委託人。我們活在世上的過程中的天職，是避免做不可能的事情，而盡力去求最大的實際的成功。我們不是要使人相信我們將來能够阻止他們的死亡。我們是要使他們能够充實地正當地生活。我們不應該把身體和靈魂，掙給那些爲人類的自然性所產生的不可醫治的災難，但是要掙給那些由社會制度所造成的可以醫治的禍患。我們在地球之上，只能用了地球上方的方法上升。

當你在夜間經過紅場的時候——在這廣大的場面之中，好像可以分做兩部份：一部分是現在的，這就是說，世界上人口極多的一個國家的；一部分是一九一七年以前的（自古以來的）——你彷彿會覺得，那個躺在黑夜的寂寞的廣場的中央的墳墓中的人，是世界上唯一不寐的人；他好像看顧着他的四周的都市和農村中大放光明的一切事物。他是一個真的導師——工人們笑着承認他同時是個領袖又是個同志，他是一個真正關心大眾的，父親似的兄弟。雖然你并不認識他，他却早已認識你，關心着你了。無論你是什麼樣的人，你總需要這個恩人。無論你是什麼樣的人，你的命運的最好的一部分，是操在另一個也關心大眾，而且爲你而工作着的人的手裡的——這是一個學者的頭腦，工人的臉相，穿着兵士的服裝的人。

觀世新個一看人個一縱

譯者 魯徐 · 著者 比巴
售經總店書華光：行發店書知新
有 所 權 嚴

版出通大月二十年七四九一

行發通大在日一月二十年七四九一

No. 122 D. 0001-3000

16 H
277123

4

27712